

# 遠東新形勢



遠東出版公司印行

MG  
D731.0  
2

蕭·夏·邁·卡·斯·著  
仲·持·賓·符·梅·益·合·譯

遠  
東  
新  
形  
勢

遠東出版公司出版



3 1797 5207 0

# 目次

序.....一

## 第一編 日本對華的侵略與反共公約

第一章 日本侵華的目的.....一

第二章 日本的帝國主義聯盟政策.....一六

第三章 遠東戰爭中的不干涉和「綏靖」政策.....四〇

第四章 「中立」國家的兩面性政策.....七〇

第五章 蘇聯與遠東戰爭.....七六

第六章 中國的抗戰與反共協定.....一〇六

## 第二編 中國民族革命和抗戰——抗日統一戰綫

第一章 蔣介石——抗日國防領袖.....一三三

第二章	中國的國軍和抗日戰爭的戰略·····	一四七
第三章	游擊戰和抗日人民的國防根據地·····	一七一
第四章	統一戰綫——中國的革命統一和民主政治的基礎·····	一四四
<b>第三編 經濟的侵略與防禦</b>		
第一章	侵華戰爭的破壞與掠奪：華北之部·····	一四四
第二章	侵華戰爭的破壞與掠奪：華中華南之部·····	一五〇
第三章	軍事的與金融的干涉·····	一六〇
第四章	建設與抗戰·····	一六〇
<b>第四編 結論</b>		
	中國的解放——到遠東的真正和平之路·····	一六四

## 序

遠東戰爭已經使日本軍閥感到不少的驚慌了。最顯著的驚慌無疑地是在這番戰爭的長期的延續。日本帝國主義原先準備給予中國三個月抗戰期限，就叫她屈服下來，把「事變」結束。然而我們快近戰爭第三年的末了，而中國人民要抗戰，到把侵略者逐出了中國土地為止，這一種決心絲毫沒有動搖。除了戰爭的長期延續之外，日本還面對着一個事實，就是萬眾一心的中國人民，這浩大的被壓迫民族大家團結着，下着決心，拚着犧牲，要抗戰到底，使中國的民族解放，中國的民族獨立奠定了堅固的基礎。這才感着兩重的驚慌了。

這一回中國的抗戰，就其統一的，有組織的全國性，及其對於全世界的影響看來，實在是空前偉大的歷史的例子，證明着帝國主義列強不再能夠用了私相授受以及互爭雄長等舉動，決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民族的運命了。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反動的貪污勢力也不再有了把「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出賣給帝國主義掠奪者這一種自由了。要招雇幾個叛國者或是傀儡，僱用「國民政府」的名義，本來用不着發動勞民傷財的戰爭。想望着幹這等勾當的人們，雖在戰爭開始之前也找得出來。要是一九三七年中國人民，中國各種軍隊和革命勢力應否抵抗日本的侵略，可以由汪精衛或是王克敏來決定的罷，那就一定不會有什麼抗戰了。爲了救國，要求着擁護着抗戰的是中國人民大眾——學生、工人、手工業者、農民、商人、民族工業家等等。抗戰以來，中國人民大眾才加強了爭取民族自由的決心，

——而汪精衛則完全揭去了假面具，這一來當然他再不能取得信徒和權力，來出賣民族了。日本要使中國民族屈服於侵略勢力，如果 needing 這樣的一政府，那麼這在現在是比一九三七年以前更不中用了。面對着中國人民，中國軍隊，中國英勇的游擊隊，以及領導着求自由的歷史鬥爭的中國國民政府的憤怒，侵略者對於這一種傀儡是必須加以保護的。

日本帝國主義所遭遇的第二種大震驚是所謂柏林、羅馬、東京反共三角同盟的崩潰。德國帝國主義者把本身的希望寄托於日本的能力。這就是她一面可以威脅在亞洲的英國殖民地，一面又可以作進攻蘇聯的恫嚇；日本呢，則把反共的把戲用作侵略中國的口實，要切斷蘇聯對於中國獨立鬥爭的援助，把中國征服下來，用作進攻蘇聯的戰略地域；在這一種任務上，把那有優良的戰爭根據地在波蘭及芬蘭的德國作為反蘇聯的同盟者，這在她也是有着急切的需要的。

德義日這三個法西斯強國憑着反共公約，向他們敵對的帝國主義國家英法美表現了兩種姿勢：（一）爲了重分殖民地及帝國主義市場，聯合他們的勢力來威脅英法美；（二）謀求解決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競爭狀態而以反帝國主義革命的堡壘，即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爲犧牲，因爲蘇聯的存在少不得使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及屬地革命化呢。那些受着威脅的帝國主義列強——尤其是保有全世界大多數市場的英法——充分準備好把飢荒的侵略國的槍尖轉向蘇聯；他們把軍用原料、金錢及戰略根據地供給侵略國而以弱小國家爲犧牲，甚至還在戰爭中間跟

侵略國相勾結——只要他們自身的屬地保持着安全而他們自身對於帝國主義世界的領導權不至於受着侵犯。然而飢荒的侵略國所不能讓步的卻正是這一項條件；正同以前歷次求謀擴張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一樣，他們忙着攻擊敵對的帝國主義利益了。這就是說，反共公約在日本一向只能爲宣傳的目的加以利用，實際上不能成爲反蘇聯的軍事同盟，即足以聯合一切帝國主義國家，而讓日本這一未來的反共產國際的先鋒戰士吞滅中國的同盟。

然而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滿洲以後，日本軍人卻不容易把他們心中懷抱得深切，而在前又獲得十分成功的野心放棄呢。於是他們打算把他們遵守反共使命的誠意表顯一番——先後在張鼓峯和諾蒙罕攻擊着蘇聯的前哨。可是結果呢，他們遭受了嚴重的打擊，不得不求謀休戰，以挽救慘敗的局面。這是反共公約本身所遇到的又一重大的打擊，一面使德國愈益懷疑於日本充當反蘇聯同盟者的價值，一面則使英法方面預測着，意料着可以把遠東戰爭轉變爲反蘇聯戰爭的人們失了望。同時歐洲方面帝國主義列強間的決鬥的臨近迫得帝國主義德國對於蘇聯在西方的實力採取了較現實的見解。法西斯德國不由得體會到反共公約對於這一公約的「著作者」愈益變得危險的武器了，因爲在蘇聯的東側的那同盟國日本已經僵住，而英法兩國急於利用這一公約促使德國在進攻蘇聯那一種強大的革命力量的中間，消耗她本身的實力了。正同日本對於蘇聯在東方的國防力量感到了苦痛的經驗一樣，德國及時警覺到：要免得自身陷於破滅的深淵，還是看重蘇聯的威力，向蘇聯低頭。歸結是一面踢開了日本把反共公約丟掉，一面則準備好跟她的帝國主義勁敵英法兩國一決雌雄。蘇聯接着利用了歐洲方面主要的帝

國主義列強開這一場鬥爭，把西烏克蘭及白俄羅斯那邊德國意想的反蘇聯戰爭根據地，以及波羅的海，尤其是芬蘭方面連英法在內的「反共」思想集團的意想的戰爭根據地清算一番，爲的是要把反共公約的殘餘打得粉碎。

反共公約——日本軍人爲了要把中國的征服作爲進攻蘇聯的預支的代價，用以確保有利的國際基礎的這一種非常惡毒的計謀，東方及西方的戰爭魔鬼們藉以勾結這一種帝國主義計劃現在是歸結於可恥的失敗了。表現在現在將近三年的中國獨立戰爭中間的中國民族革命的新興的力量正是促成反共公約的危機的一種動力。蘇聯開發着巨大的資源，動員着偉大的人力，在社會主義勝利之路上急劇地前進，這是使反共公約的危機加深，而至於破滅的又一動力。使日本帝國主義所抱的征服中國的目標落到最後的失敗，使中國人民從一切帝國主義者及其所勾結的中國內奸的茶毒之下獲得自由，這還是中國爭取民族獨立的戰爭的偉大的任務。然而反共公約的陰謀一經破滅，中國求謀最後勝利這一項任務也就大大地便利了；因爲反共公約的主要意義是要把中國征服以後，用作向中國民族最好的友邦——反抗着帝國主義束縛的中國革命的唯一友邦及同盟者——作戰的戰略根據地。

\*

\*

\*

\*

\*

在現在快滿三年的遠東戰爭期間，國際局勢發生了幾種重大的變化。遠東戰爭是新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

一方面，這世界大戰爲的是要重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庸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所表現的帝國主義戰爭是在帝國主義外部的前線，即在亞洲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世界的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市場的前線。在歐洲帝國主義的內部前線方面呢，則英、法、和德國現在正在作戰，這場戰爭快要發展爲歐洲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間致命的戰鬥了。交戰的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英、法、竭力要把戰區擴大到全世界，而把英國甚至於美國和日本拉進到自己方面，尤其是要使蘇聯捲入了戰爭。英、法兩國在對德國戰鬥的時候，並不忘卻資本主義世界集團對抗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所抱的目標既要使這場帝國主義內部前線的戰爭轉變爲資本主義世界對蘇聯的國際干涉戰爭，同時又要在他們中間激烈的競爭上，利用蘇聯強大的力量。然而蘇聯對於違反着自身的安全及和平的陰謀及行動卻並不取着消極的態度，爲了要摧毀本國門口的帝國主義戰爭根據地，爲了要加強本身的安全，鞏固本身的國防，使她附近的戰區有着限制，爲了要運用本身的勢力，使國際和平的區域擴大，而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區域縮小，蘇聯在鬥爭上是十分積極的。因此在擴張着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一般背景上我們眼見着國際局勢的三種不同的潮流，這就是：（一）帝國主義陣營中間，在其內部的及外部的各前線的苦鬥，以及不住地進行着進攻蘇聯的準備和陰謀；（二）利用了帝國主義列強因他們內部的鬥爭及深銳的矛盾而遭遇窒礙的時機，蘇聯所進行的反攻；（三）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偉大的鬥爭；這正是被壓迫國家及殖民地方面日益滋長的爭取自由，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的表現。

新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主要中心現在是轉移到歐洲了，可是遠東戰爭卻沒有減退下去。恰正相反，日本帝國主義要使中國成爲日本的獨占地域，以作控制東亞的確當的根據地，這一種在中國的鬥爭日益感得困苦了，因爲日本的資源及戰鬥力日益衰竭下去，而中國人民的抵抗則非但繼續不懈，而且還準備着對侵略者的反攻。就此看來，我們不再可以說：中國僅僅是一個錦標，投在爭奪着殖民地的勢力圈及市場的帝國主義競賽中間，——它同時又是偉大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場所了。控制着歐洲局勢的是帝國主義戰爭，在這戰爭中間英法正向新興的德帝國主義挑着戰，爲的是要維護保持他們所自誇的「太陽永不落下」的遍世界的帝國。然而歐洲卻不再是帝國主義列強所獨有的大陸，不再是帝國主義世界的壓迫，剝削及戰爭的根源了。蘇聯這一個大國是在那裏。蘇聯是一個對抗着帝國主義的民族的革命勝利的煥赫的標幟，是在歐亞兩洲都有強盛的聲威的反帝國主義的國家，是中國的獨立鬥爭的鼓勵者和援助者，又是一切民族的勞苦大眾在其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要求限制戰爭，要求國際和平的鬥爭上的領導者。正如斯大林先前所說：「一個新的因素已經出現了：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在國際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心臟和殖民地壓迫政策的活動地之帶，橫跨着蘇聯的廣大領土，單是這一浩大地域的存在就足以使全世界革命化了。」

\*

\*

\*

\*

\*

使中國民族獨立鬥爭所遭遇的國際局勢，革命化，給中國開通了貫徹獨立目標的途徑的大抵就是這一種

聯的地位。一九〇二年，列寧的著作上早就說過：「俄國革命是一以破壞不但歐洲，而且（也可以說）亞洲的反動勢力方面最堅固的堡壘爲本身的任務的。」據他所作的解釋，沙皇主義本是一封建軍國的帝國主義。「沙皇時代的俄國」據斯大林進一步說，「是各種資本主義的，殖民勢力的，軍國主義的壓迫——形式最野蠻的壓迫——的淵藪。」這是「沙皇政府劊子手對於非俄羅斯民族的統治，」同時又是「歐洲帝國主義的巨大的後備軍，」在分割土耳其，波斯中國等等的時候，西方帝國主義的忠實的同盟者，「西方帝國主義最重要的堡壘，照先前那樣，使西方金融資本跟東方各殖民地聯結起來。」俄國革命徹頭徹尾破壞了「這封建軍國主義的帝國主義，」也就使西方帝國主義失去了它那最重要的堡壘，失去了它那忠實的同盟者，失去了它那巨大的後備軍。新俄羅斯——蘇聯變成了地球六分之一的領土上，從金融資本和帝國主義得了解放的各民族的堡壘，它變成了全世界勞動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尤其是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東方各被壓迫民族的忠實的同盟者和巨大的後備軍。

列寧在一九二二年指出，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在意義上就是新的人們及新的階級體會了求謀自由及進步的生活和鬥爭，不僅爲着他們自身，還爲着一切人類，因爲這才可以使那佔着世界人口大部分的幾萬萬人不至於再呆滯下去昏沈下去呢。正惟東方人類那一種歷史的呆滯狀態和昏沈狀態引起了歐洲許多先進國家的停滯和腐敗，還給西方帝國主義提供了巨大的後備力量，可在帝國主義的內部前線，攻擊革命大眾，撲滅他們求解放的鬥爭。東方新民族對於生活，對於民族自由及民族自決的覺醒使一切被壓迫被剝削人類在反抗帝國主義統治的鬥

爭上獲得了巨大的新後備軍。在中國印度等國家中間這一種覺醒及解放運動，對於已經解放的蘇聯各民族和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勞動階級，正如斯大林從前所說，「毫無疑問地是很強有力的同盟者，應當鄭重地加以注意。」因為這些民族沿着同解放的路走，每一步都像機器的大槌似的痛擊到帝國主義身上。

\*

\*

\*

\*

\*

在這一部提供於中國公衆的書裏，我打算就中國人民這一次偉大的鬥爭，就中國的民族解放鬥爭所遭遇的國際的及國內的情勢，嚴正地記述一番。在研究着，描寫着這一劃時代的當代戰爭史的時候，在多年來旅行於中國前方及後方，「自由中國」及淪陷區域的時候，在我把這裏所提供的觀察及研究的資料蒐集起來的時候，中國民族統一戰線——這一中國新生的民族革命統一的基礎——的決心和憧憬，英勇精神和犧牲精神都會激起了我心中的感奮。我確信着中國民族的及人民的求自由的鬥爭，對於爲要使我們戰爭籠罩下的世界免除帝國主義的毒害而從事鬥爭的一切人們，「毫無疑問地是很強有力的同盟者，應當加以鄭重的注意。」我寫這部書的目的就在積極地至誠地幫助這一偉大的鬥爭。

一九四〇年四月亞細亞狄克斯

**第一編 日本對華的侵略與反共公約**

## 第一章 日本侵華的目的

在這次日本對中國「不宣」的戰爭開始的時候，就可以看出日本軍閥的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要把一九三一年的征服東三省，擴大到征服中國。第二個目的與第一個相密切聯繫，是要把英法和美國——特別是英法——逐出中國海和沿岸乃至遠東。

自然，此外還有反共的目的，起源於歐洲法西斯的宣傳，而由日本人的宣傳普遍地鼓噪着，說這是「中國事件」的中心目的。其實，在這點上，那正是一種外交和宣傳，而不是實際的軍事征略。至少，那與日本這種反共目的直接有關的主要的雙方，中國和蘇聯，認為是如此。蔣介石將軍常公開痛斥日本的反共政策是掩飾征服中國陰謀的謊言。蔣氏曾經說：「要是日本真的切想反共，她為什麼不去進攻蘇聯而進攻中國呢？」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史太林在聯共十八屆大會中分析五年來蘇聯的國際形勢的時候，曾指出日德意在反共公約中，形成了一個反對「英美法在遠東的利益」的集團，這一個「三角形」正補充了所謂「軸心」，那是德意「反對英法在歐洲的利益」的軍事集團。據史太林的意見，這個以反共為目的的集團的形成，是侵略者欺騙公意的煙幕的把戲，照他說，那是一種很笨拙的把戲，「因為在蒙古的沙漠中，或在阿比西尼亞的山地中，或在西屬摩洛哥的荒野中找尋共產國際的「溫床」是很可笑的。」史太林描寫日本軍事征略的進程和方向道：

「佔領了東三省以後，日本又於一九三七年侵入華北和華中，佔據了北平、天津和上海，而開始把她外國的競爭者從佔領區逐出去……一九三八年年底，日本佔奪了廣州，一九三九年初，又佔奪了海南島。」

事實上，日本軍事征略的中心目的，是要把華北和內蒙變成像「滿洲國」一樣的日本獨佔的軍事經濟根據地，然後征服中國。同時，日本軍部企圖強迫中國聽從日本所提出的「中日合作」的要求，而與日本和「滿洲國」締結反共「聯盟」。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對南京政府施用一些直接的軍事行動（像一九三二年進攻上海一樣，但範圍較大），而給它以打擊，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在上海一帶和上海——南京交通線上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展開，卻有與英、美、法在這區域中利益發生嚴重衝突的危險，並可能造成有關列強合作反日的威脅，這在日本的政府和軍部是都切想避免的。

在華北可就不必擔心這樣的危險，因此日本軍閥很快的在那裏採取了攻勢，以「懲罰暴戾不法的中國人」是的，日本的進攻天津和北平，是同進攻上海一樣破壞了「九國公約」。但日本人卻非常明白當一九三一年侵入東三省的時候，英國爲什麼拒絕與美國合作援引「九國公約」以制裁日本的理由。那時候，英國對華殖民的死硬份子，對日本侵略行動曾表示了如下的猜測和幻想：「日本人是替我們去打布爾雪維克呢！」同時，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曾在東三省幾百次的邊境事件中，表現了這種目的。而且，日本侵華的新浪潮，還是由日德反共公約的締結來揭開的，這公約後來加入了意大利，甚至這樣有力的日本同盟者如匈牙利、「滿洲國」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政府也加入

了。接着日本向南京直接提出要求，叫它跟日本一同加入特殊的遠東反共聯盟。當戰爭發動後，甚至日本在華北的戰略也着重於這反蘇的目的，它把四十萬以上的軍隊集中於東三省和朝鮮的邊境，以與蘇聯的遠東紅軍相對峙，而日本在華北的軍隊，也首先向察哈爾和綏遠，即朝着外蒙古的方向進攻。這一切，自然不僅是爲了宣傳的目的。這其實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外交把戲，其用意乃是向英國保證，叫她對於日本侵略華北和內蒙所取的態度，儘可不必與它在東三省事變時所取的態度不同。

在侵華戰爭中，日本軍閥最需要的是九國公約簽字國能够採取一種中立和不予干涉的政策，一種不予干涉日本軍事行動的政策，那就是，事實上承認日本在侵華戰爭中的交戰團體的權利，而日本的侵華，是以壓迫中國政府向日本軍事統治投降爲目的的。日本在華北軍事侵略的發動，以及她在一九三七年七月進攻平津區時所表現的挑釁態度，證明了日本軍閥是怎樣有把握地認爲他們在北方的行動決不致引起國際複雜反響的危險。然而這卻不<sub>能</sub>壓迫中國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最後，樹立日本海陸軍對上海——那是英法美在中國沿岸的利益和勢力的主要根據地，又是南京政府的經濟中心——的控制，便成了與日本在北方軍事行動同樣的另一個目標了。

自從日本一九三二年進攻上海以來，他們一直就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區——虹口與楊樹浦一帶——進行着這種行動的準備。這次行動的開始實際上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那一天，日本的第三艦隊裝載了「遠征軍」所有一切的裝備，不經通知駛入上海的港口，以作爲要求上海周圍中國區域「撤防」的後盾。這個要求，於第二

天由日本總領事在那所謂「淞滬和平協定國際委員會」席上提出。在日本軍隊進攻華北的情形之下，這次日本海軍的集中上海以及中國區域撤防的要求，都顯然是日本進攻南京政府行動的開端。從純粹軍略的觀點看來，中國守軍是否宜於不在內地而在上海對抗日軍的侵入，那是大成疑問的，而且事實上，日本海軍已控制了上海的港口，並且在公共租界方面有着堅強的軍事根據地，此外日本軍隊還在機械化設備、重砲和空軍方面佔着壓倒的優勢。但日本宣傳家所發出而爲上海有幾個英國作家所支持的論點，卻說接受了日本「撤防」的要求，可以使日本不致在京滬綫區域受南京政府的直接攻擊，這種虛妄的論點，就是說說也太可笑了。因爲日本當時切想避免英美法對它在上海軍事行動的聯合干涉，這其實只是一種外交的行動，中國軍隊的退出上海，正適合了日本的計劃。日本的計劃是要使中國從上海的外國利益中孤立起來，日本軍事行動和軍事壓力的威脅，就是爲了切斷中國政府與上海的聯絡。

一九三一年東三省的被佔，明明是日本破壞了九國公約。英國對美國援引該約的拒絕，事實上表現了日本和英國都反對美國在東三省問題上援用九國公約的意見。這個事實，說明了當時英國的政策，是寧願與日本妥協，而不贊成英美聯合行動去對付日本。

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軍部採取蠶食的方法破壞九國公約，限制它可能引用的範圍，而使該約全部失效爲目的。英國贊助英日妥協的政策，讓日本在東三省、華北和內蒙一帶自由行動，但以尊重英國在華中和華南的

優先利益爲交換；這種政策首先被日本利用着破壞九國公約，進行對華北的軍事侵略。當一九三一——三七年間，在這次侵華戰爭之前，中國連續地喪失了東三省、熱河省和冀察兩省的一部份，此外還抵抗着日本的侵入綏遠。在這個綿長的時期中，日本一次也不會受到其他有關列強聯合宣言的提示，指斥它破壞九國公約，因日本曾在該約中誓言「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以及領土和行政的完整」的。講到東三省和華北，恰巧是形成蘇聯遠東邊境和外蒙古的廣大後方的區域，日本在那裏任意逐出中國的政府當局和軍隊，建立她的軍事根據地，霸佔對外貿易、工業和經濟資源，英國則不僅不準備聯合美國，援引九國公約反抗侵略者，相反的，她卻願意擔任了一種善意中立的任務，而以尊重英國在中國其他區域利益的讓步爲交換。

但日本答應了對英的讓步，卻又進而要求英國再讓步，就是他們也許要宣佈全部中國爲他們的軍略根據地，自然囉，那是爲了進攻共產國際、日本與德義的反共公約，對南京政府參加日滿反共聯盟的要求，以及明白指向蘇聯和外蒙古的進攻華北的行動，都正是日本要在英美法在中國沿岸的利益和勢力的根據地中，（如上海）取得交戰團體權利的論據。日本對英國的要求是，如果她對日本進攻蘇聯的神聖使命真的維持善意的中立，那末，當日本爲了反共政策而對南京政府施行軍事壓力時，英國必須首先採取中立和干涉政策來證明。如果英國認識日本進攻蘇聯的使命，日本就要求英國的中立和援助，而日本對南京政府軍略要地的直接軍事行動，是爲了強迫它承認「滿洲國」，並對日本在華北和內蒙區域的特殊計畫，不加干涉。

依照了這個計畫，日本慎重地實行對南京政府軍事行動，以強迫它接受日本的要求，這要求是直接或間接關於華北的，即乾脆叫南京政府不要干涉日本的侵入華北。蘆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提出的要求有一條是「河北省的撤防並有效取締抗日和共產主義的團體」，據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中國在國聯的聲明中所載，日本對南京政府曾採取了如下的程序：

「七月十二日，日本大使館參贊奉政府訓令，偕同日本陸軍助理武官，及海軍助理武官各一名，訪問中國外交部長，勸告中國政府「不干涉」前一天所成立之地方協定。」

「七月十七日，日本大使館致一備忘錄與外交部，要求中央政府不干涉地方談判，並不作任何方式之軍事準備。同日，日本陸軍武官奉東京陸軍省訓令，謁見中國軍政部長，警告中國援軍雖為自衛之目的，亦不得開入河北省，並以要求如被拒絕後之「嚴重後果」相恫嚇。」

照聲明中所稱，當時日本採取了「兩條途徑，以實現其對華北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統治的目標。在軍事方面，她堅持派遣大規模的武力開入河北省，但同時卻阻止中央政府採取防衛的措置，這樣，她就可更有效地迫使地方當局屈服。在外交方面，她竭力壓迫中國中央政府不過問華北，並進而同意地方當局在日本軍事壓力下所接受的任何條件。」

據日本的估計，英國必將勸告中國政府不抵抗日本的侵入華北與內蒙，如同她在東三省被侵時所做的一樣。

日本預料英國將採取中立和干涉的態度，並作最後調解的準備，因為全部衝突發生於北方，而問題又是涉到日本在華北和內蒙區域的地位。日本軍閥預料到英國的這種態度，同時決定反對英國或英美的調解。他們當時的目標，是要取得對南京政府軍事行動的交戰權利，以強迫中國接受其他的要求，如成立親日政府，反共聯盟和中日經濟合作。爲了適應英國的態度，日本準備實行的唯一讓步是：她可以把全部的軍事行動，僅限於一種專爲反對南京干涉日本在華北和內蒙行動的「討伐」運動。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即當日本的軍事行動僅限於華北的時候，英國態度很明白的是把華北讓給日本。遠東的英國主要機關報字林西報，在得到中國軍隊大規模調動去抵禦日本侵入華北的報告後，就於八月二日表示如下  
的意見：

「我們希望這報告並不確實，並希望日本能鞏固她在華北的政權，而中國政府能在它的權力中運用最好的方法，以使它的人民忍受這侵略者統治中國土地能力的新表現。」

這篇社論又說南京的拒絕日本對華北的要求，證明了它「不能把握七月七日所發生的危機的迫切性。」  
八月四日，該報的社論稱讚有些中國領袖們的「責任心和對於現實的把握」，因爲他們覺得「對於這樣的壓倒優勢力量的抵抗，結果必將不可避免地毀壞了辛勤努力所達到的進步和成就，而且，全國的統一也將因事件的悲慘和混亂的後果而受到危害。」

這篇社論又警告中國，如果要抵抗，必將遭日本「完全征服」，因此勸告中國對「日本某種溫和的姿勢，應該作願意適應的表示。」在這篇社論中，曾有下面一段「忠告」蔣介石將軍的話：

「蔣介石將軍會始終確信以超人的忍耐，對日本維持着和平。要是中國仍能沿着復興的路線前進，縱然再破壞一些領土的完整，只要不損及那維持她人民的安樂和幸福所繫的經濟計畫的行政組織，那末，繼續把這種確信維持下去，不是也很值得麼？」

在這裏，我們看到英國的代言人是怎樣暗示着，只要日本的侵入限於華北和內蒙區，英國便將採取一種不干涉政策，並準備調停，在這樣情形下，也決不引用九國公約，同時，它又警告中國政府，要是因抵抗日本的侵入華北而引起英國利益所在的別部份的戰事，那末，英國還是要採取不干涉政策的。後來，這個警告是完全被證明了，上海的英國報紙，甚至替日本證明，一九三七年八月他們在上海是受了中國的挑釁和進攻。英國對華北的態度，既已確定了是一種中立和不干涉的態度，因此英國的接受日本的宣傳，說中國在上海的挑釁，是對日本的侵入華北的一種報復，明白表示了英國對於日本在上海和揚子下流的行動，也將維持中立和不干涉。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字林西報社論中，論及日本總領事岡本兇罵中國政府向上海日軍挑釁的聲明，道：「岡本先生痛苦地證實了少數人所要竭力否認的事情，就是：中國政府在日本侵入北方的情勢之下，已決定把北方的抵抗配合了對上海日軍的猛烈進攻，來適應目前的政治軍事需要了。」

這時候，儘管它以前曾警告過中國不要抵抗日本，儘管它接受了日本的宣傳，說中國的進攻上海日軍是爲了配合北方的抵抗，但這個英國報紙的另一篇社論，卻又認爲中國政府在北方和上海的行動，是出於正義的自衛。這篇社論說：「無論在上海、冀東或北平，中國已被迫處於一個小動物的地位，她在進攻的危險下，是這樣忙碌地準備着防衛自己。」

但這却並非暗示英國對於它利益所在的上海的戰爭，將改變中立和不干涉的政策。這只表示了這個英國報紙已知道「日本的所謂和平，只是對中國非常苛刻要求的別名」。（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字林西報社論）這「非常苛刻的要求」和日本對華北要求的區別，會由該報坦白指出是八月十一日日本艦隊的馳抵上海；這顯然造成了一種新形勢，在這種形勢中，該報又指出：「中國當局是不能讓他們上海周圍的領土受着這樣明白的威脅，而毫不作任何應付的準備的，雖然他們希望避免這區域中的衝突。」

該社論沒有說明爲什麼中國政府要抵抗日本對「上海周圍領土」的威脅的理由，不過一星期之前，它還勸告中國政府不要干涉日本在北方的政權，而應該設法「在它的權力中運用最好的方法，以使它的人民忍受這侵略者統治中國土地能力的新表現」呢。照這個上海的代表英國的報紙說來，只有當上海被威脅的時候，中國政府對它國家和人民的責任纔是分明的。這是英國代言人加以讚揚的抵抗的責任，而英國自然還是維持中立和不干涉的政策。因此，字林西報在上引的社論中說：

「上海合理地希望維持中立所需要的和平，但不能因此就批評它的市民不能認識現在中國所碰到的更大的問題。中國政府知道，在他們人民所經歷的艱苦中，在決定保衛它國家的幸福和完整的迫切困難中，它是得到上海以及一切能以理性的智慧、眼力和對主義的忠誠去研究事物的人們的深大同情的。」

但這同樣的「理性的智慧，眼力和對主義的忠誠」卻要求人們從別方面去注意日本在平津的屠殺，以及征服華北五省的軍事行動。在那裏，中國政府的責任不是抵抗進攻，而是接受「領土完整的再度破壞」以及使中國人民「安於」北方領土的再度喪失。

事實上，自日本在華北開始軍事行動後，侵略者的認識是早就確定了的，因此，誰是以後上海的進攻者的問題，絲毫不能影響這事實。而且，如果九國公約的效力要維持，那末，侵略華北和侵略上海，同樣是對於這公約的破壞，其實，這兩面侵略正是同一軍事行動連續的補充的階段，目的只是爲了征服中國。跟英國以前對日本侵略東三省和內蒙時所取的態度一樣，現在英國的態度，還是主張中國政府對於日本的侵略華北，應該不加抵抗。這是由於英國傳統的對日政策，在東三省、華北和內蒙問題上，它多半是與日本成立諒解，而不援用九國公約，即英、美聯合行動的。但當日本侵略上海時，英國卻主張中國政府應該抵抗，它也贊成英、美對日聯合行施壓力，不過以這種行動不妨害英國在華北方面的對日諒解政策爲前提。

舉例說，一九三二年日本進攻上海（同樣的，日本也宣稱這次戰爭是因十九路軍企圖進攻上海租界挑起來

的)並沒有改變英國對於日本侵略東三省時不採用九國公約的態度。相反的，英國代表利用了中國在上海抗戰的機會，便作為「中立」的調解者，竭力把日本進攻上海的問題與進攻東三省的問題分開來。現在，如果日本軍閥要在一九三七年把北方和上海的聯合侵略更大規模的重複一下，同時又要英美保證採取中立和不干涉的政策，它就必須小心使上海的行動，仍然表現為中國挑釁和報復的事件。爲了這些目的，日本所捏造的中國進攻他們軍隊的謠言，自然是很有用的。因爲這樣，日本就可以直接展開對南京的軍事行動，而英國則將維持同對北方一樣的中立和不干涉的態度，這也就阻止了美國援用九國公約的意圖。英國利用着這種「中立」又將如一九三二年一樣，在把華北問題與上海問題分開的基礎上，企圖進行中日間的調解了。

日本對於英國這種調解企圖的回答，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轟炸並用機槍掃射英國大使許閣森這一天，許氏正在從南京到上海去的途中，八月二十八日字林西報的社評論到這不幸事件，歎惜日本的子彈竟使一個人失却了活動能力，這個人人在去上海的途中，原是跟那結束上海戰爭的國際努力有關的。該報又揭露了「公開的祕密」，說許氏在南京時就已在爲和平使命「盡最大的努力，甚至在上海和南京的戰事發生以後，他還沒有放棄他的希望。」但這却不是日本軍閥對英國所要的東西。他們所要的是英美不僅對於華北問題而且對於整個「中國事件」保持中立和不干涉。他們要阻止第三國對日本軍事行動的干涉，那就是，要第三國實際承認日本的交戰團體的權利，特別在中國沿海的英法美利益中心一帶。這時候，他們不要英國任何的調解，他們要行動的自

由，以便「將中國擊至屈膝，使她永無戰鬥的精神。」如日本戰時第一任首相近衛所說。

一九三二年，日本自公共租界北區進攻上海，結果締結了和平協定，由中日代表以及英、美、法、意諸國駐華使節簽字，這幾位使節作為「友邦」的代表，在協定中說明是「幫助談判的進行」的。根據這協定，「中國軍隊應駐紮於他們現行的地位，直至以後常態恢復為止。」即中國軍隊應駐紮於曾被日軍逐出的中國行政管轄的地帶。照日本的解釋，這次規定的意義是上海以及附近的中國行政管轄區域，應「撤除軍備」，即肅清中國軍隊，直至日本認為「常態恢復」為止。該協定另一條說：

「日本軍隊應撤退至公共租界及租界以外之虹口一帶，如「一二八」事變前之情形。但如日軍數量增加，得暫時駐紮於鄰近上述區域之地帶，自不待言。」

但以後的事實，證明了日本竟把這項解釋為：他們可以有權把虹口區域以及「鄰近上述區域之地帶」，改造為經常的軍事根據地。除此以外，日本在租界內的軍事區域，又擴展至楊樹浦區以及其他租界外的部份，並在英國所領導的公共租界當局的容忍之下，積極地有系統地加以設防。這種「撤防」的實在意義，會由上海大晚報的社論（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說明如下：

「在一九三二年，上海曾允許它的公共租界的大部給一個外國交戰國家用作戰爭根據地，這破壞了上海歷史的中立原則，我們當時會一再指出，認為這遲早將造成不幸的後果。回想當時有幾個外國批評家，都相

信日本的軍事行動不致破壞上海的中立……這種見解，無論出於怎樣法理的根據，他們以後總該後悔了。」因此，這形勢是很明白的，日本對上海的中國行政管轄部份的任何新進攻，必仍將從公共租界發動。而且這也很容易假定，任何這樣的進攻，必將以「事件」爲引子，然後提出要求，抗議上海出現中國的軍隊，以加強所謂「非軍事化」。

在蘆溝橋事變以後，日本就開始強迫平津「撤防」。當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日本要求上海「撤防」的時候，中國政府對於上海不可避免的危急的命運，是不能再存幻想了，如果它再不馬上竭力作抵抗的準備，便將是平津事件的重演。在他們逼迫中國投降和阻止有關列強干涉他們軍事行動的戰略中，日本在上海所運用的戰術跟在華北是不同的。他們只是很簡單的要求加強「一九三二年的和平協定」。從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起，日本的兵艦集中於上海以及它的周圍，八月十一日，一個日本艦隊駛泊港口，計有巡洋艦四艘，驅逐艦七艘，以增強日本在上海原有海軍的力量。因此，八月十二日，就有兩師中國軍隊趕到上海。同一天，日本召集「加強一九三二年和平協定國際委員會」日領事在會中請求各國支持日本所提「撤防」的要求，但結果援助它的只有意國的代表，這也就證明英美法的代表，已完全明白日本在上海的用意是什麼了。八月十三日，虹口的日本海軍向閘北發動「撤防」的進攻，遭受着中國軍隊強烈的抵抗和反攻。

要瞭解日本侵犯上海的戰術，人們必須記住這個港埠因治外法權所造成的特殊地位，而日本就是濫用這種

治外法權來進攻上海的。日本可以把他們的兵艦集中港口後發動進攻，因為他們有着一條約權利。但當中國在同一港口放置障礙物，阻止日本的進攻時，他們就違反了這同樣的「條約權利」，因為這規定着他們應該開放河道以便利「航行」，「自由貿易」以及「保護外國財產」的。日本可以在公共租界的北區建立壘壘，用兵艦排列長蛇的水陣，他們的海軍陸戰隊可以裝備坦克、重砲和轟炸機，這一切都是在日本的「條約權利」範圍之內。相反的，中國軍隊如果在中國管轄的領土上出現，日本卻要說是破壞「一九三二年的和平協定」，是對日本兵艦、堡壘和陸戰隊的「威脅」。 日本對閩北的進攻，據說是反抗「威脅」的正當的自衛，而中國向虹口的反攻，卻是對那有治外法權的日本人的挑釁。八月十三日，上海市長因中國軍隊遭日本海軍的攻擊，向日本總領事提強硬抗議，這證明了當時的敵對狀態不是戰爭而只是一種「偶然事件」。八月十四日，市長又向上海首席領事抗議，因日本利用公共租界作為進攻中國管轄區域和中國軍隊的根據地，這又證明了當日本從公共租界各國所代表的治外法權的地位中進攻中國時，那「中立的列強」是都袖手旁觀的。

日本的計畫，是要充分利用「治外法權」、「條約權利」和「一九三二年和平協定」的全部作用，來反對中國軍隊在上海的出現。這樣一來，可以使侵略者儼然成了公共租界的「保護者」，而斥責中國當局向日本挑釁。中國的守衛者只有兩條路，不是放棄上海，便是用盡一切方法保衛上海，中國軍隊揀定了後者，他們終於在閩北應戰，轟炸集中港口的日本海軍，以阻止日本援軍和軍火的上陸，並向公共租界的日本根據地反攻。事實上，向中國挑釁

的正是日本，它要藉此發動他們海陸空軍對渤滬區的聯合進攻，以征服這個中國的要港，然後把它作為繼續進攻南京政府的根據地。中國如果要盡力保衛上海，那末，除了用反攻答覆日本初次的進攻外，實在更沒有別的選擇了。因此，日本所傳關於中國在上海「挑戰」的謠言，只不過是侵略者的虛構，而英國的報紙和代言人的接受這種虛構也是一種外交的把戲，他們藉此證明他們中立和不干涉的立場，並企圖把上海戰爭與華北戰爭分開，以進行調解。這樣，日本藉口中國的「挑戰」，建立他們「保護」並征服上海的「交戰權利」後，又進一步的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宣佈封鎖從上海到汕頭的中國船隻。同時，日本海軍當局又聲稱不干涉第三國的「和平貿易」，但日本在封鎖區巡邏的兵艦，得隨時遮攔外國商船，加以盤問，並搜查「戰時禁制品」。這裏，英國中立和不干涉的政策，又幫助日本取得了封鎖中國海岸和禁止中國航行的「權利」，並漸漸的把封鎖擴展到外國的船隻和商業。

最初，日本在進攻華北和內蒙的時候，事實上曾取得了「交戰的權利」。他們立刻又把這引展到上海，說中國為了干涉他們在北方的軍事行動，會在那裏向他們「挑戰」。這一點真的又讓步了，雖然有着某種保留，但並沒有改變英國中立和不干涉的政策，於是「交戰權利」又引展到華中全部的海岸，說這為他們在上海作戰所必需。最後，日本完全明白了，從上海到汕頭對中國船舶的封鎖，並不致引起有關列強的責問，乃又於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起擴大封鎖，包括了北至秦皇島南至北海的區域，實際上包括了中國全部的海岸。這樣，進攻華北和內蒙的「交戰權利」，變成了進攻全部中國的「權利」。日本對於九國公約引用範圍的蠶食，已完成到這樣的程度，即日本軍閥

可以集中他們全部戰爭的機構來對付中國政府，而不必再害怕英法美通過九國公約的干涉了。這是日本的勝利，但不是對中國的勝利，而是在遠東對英法美的勝利。

總括起來，當他們在一九三七年夏天發動現行的侵華戰爭時，日本軍閥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第一，他們的目的是在征服華北和內蒙，以及迫使南京政府接受日本關於黃河以北區域的一切要求，即實際承認日本對華北、內蒙和東三省的征服。這就是這次軍事侵略的最初目的，這次軍事侵略，是由日本大陸征服派的軍閥所挑起，而以該派的滿洲系，即關東軍及其在冀察的少壯份子為最有力的推進者。該派對於中國領土的胃口是越喫越好的：在一九三一年，他們允許以長城為限；在一九三五——三七年，又說是黃河；等到佔領了上海和南京，他們又要把揚子以北的領土作為他們征服的範圍了。這派軍閥，既主張武力征服中國，還更夢想着把日本的殖民帝國擴展到蘇聯的濱海省，到西伯利亞的一部甚至全部，至於把外蒙作為進攻遠東蘇聯的橋樑，那是更不必說了。然而，在現行的侵華戰爭中，這攫奪蘇聯領土的夢想，卻不得不代之以對蘇聯實力更現實的認識，和侵略者進犯該國領土完整所可能受到的危險了。

第二，進攻華北和內蒙，是直接進攻中國政府配合的。除了強迫「不干涉」北方外，進攻中國政府的目的，是要破壞它的作為中央當局和國民政府的性質，而把它削成爲日本軍事統治下一個傀儡政府的地位。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使上海與南京割斷，將它變成一個日本的根據地，以阻止外國對南京政府的援助和供給，同時，還將藉

此爲根據，發動預定的「閃電戰」，以殲滅蔣介石將軍領導下的中央軍。

佔領上海的任務，首先放到日本海軍的身上，日本海軍想以推進「撤除軍備」的計畫，即阻止中國軍隊在上海抵抗，來解決它。這種企圖失敗以後，海軍就在陸軍遠征隊的援助下，向這個中國的大都市進攻了。照日本海軍領袖的打算，上海戰爭的任務不僅爲了保證北方軍事征略的迅速成功。同時，這也是沿中國海岸向南推進的機會，而這正是以日本海軍爲首的帝國主義派所主張的。在上海戰事開始後的第一個月中，日本的宣佈封鎖中國全部海岸，等於日本海軍聲明上海的佔領，將是它向廣州和海南島行動的第一階段。

最後，因着日本武力佔領了天津和上海，排斥外國租界在中國要港的特權地位的運動也開始了。這次運動主要集中於進攻英國的地位和利益，因爲英國願意對日妥協，實是英美法三國陣線中最弱的一點，而這三國都是日本所要逐出遠東的。英國的遠東政策更被日本利用着，以阻止主要有關列強基於九國公約的聯合行動。英國對日「綏靖」的政策，跟那把侵略中國掩飾爲「反共」的把戲是有聯繫的。日本跟德意締結了反共同盟，以保證別國不干涉它的侵華，因爲這是反蘇戰爭的準備和序幕啊。在這種外交的陰謀之下，日本提出了許多的要求，如中國加入「反共」聯盟，即日本有權在中國沿岸和內地建立「反共」軍事根據地；由日本的「顧問」改組中國的軍隊；接受中日滿經濟集團中的「中日合作」這一切，都是爲了「反共」的目的。日本的用意，是要拿「反共聯盟」來代替已被撕碎的九國公約。

## 第二章 日本的帝國主義聯盟政策

自從把東三省造成軍事侵略的根據地以來，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確保國際對她連續侵華的不干涉。日本懷着這個目的，接連地退出了國際聯盟，解除了華盛頓和倫敦的海約，而與德意締結了反共公約，利用這公約作為代替九國公約的外交工具，並恃它的軍力逼迫着中國。在反共公約中，意德作為日本聯盟者的任務是支持日本的侵略，因為侵入中國和進攻英法美在遠東的利益，是日本準備反蘇戰爭所必需的。在另一方面，日本也感激地證明了德意在歐洲和地中海的侵略，以及他們對英法在歐洲的地位和殖民帝國霸權的聯合挑戰，是「反共」行動的正確途徑。

自然，反共公約不是日德間反共的「文化協定」，而是一種使歐洲侵略行動和遠東侵略行動相配合的帝國主義聯盟，它互相幫助着侵略，特別是掃除敵對列強所加以侵略的阻礙。前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在其所著遠東的危機一書的序言中，會正確地指出一九三一年以來，世界各部侵略行動的相互關係道：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軍在東三省加於中國政府的攻擊，實是對於戰後各國所建立的限制和避免戰爭的新制度的第一個大打擊。這在世界歷史中，日益被公認為一件危險的事情。當時侵略者的軍事成功，已鼓勵了其他不滿足和專制的政府對這種制度繼續的打擊。」

長遠以前，侵略國家就決定標榜他們的侵略行動是爲「反共」而戰，起先是日本攫奪了東三省和熱河，接着是意大利攫奪了阿比西尼亞。德國和意大利組成了所謂羅馬柏林軸心，起先還沒有說它的目的是反共。直到阿比西尼亞被征服，西班牙戰爭開始之後，羅馬柏林軸心決定與日本聯盟，這纔宣布共產國際爲聯盟反對的目標。

史太林在上引報告中，會確切地分析侵略集團形成的真正原因道：

「日本想辯護她侵略的行動，說她受了九國公約的欺騙，以致不能向中國擴展她的土地，而英法在那裏卻擁有着巨大的殖民地。意大利也說她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後分割土地的時候受了欺騙，因此她必須從英法的勢力範圍中去取得補償。德國因遭受帝國主義大戰和凡爾賽和約結果的嚴重打擊，也加入了日本和意大利的隊伍，而要求擴展她在歐洲的領土，並返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勝利者從她奪去的殖民地。」

日本、意大利和德國形成了一個集團，以互相幫助撕毀凡爾賽和約和其他戰後的條約如九國公約等，並發動重分世界的戰爭。爲了適應某一時期的需要，他們否認進攻英法美的利益，卻宣言發動「反共」的戰爭。他們把真正的目的掩飾起來，不讓全世界的輿論知道人民的生命是怎樣爲了帝國主義的目的而被犧牲着，這正是今天帝國主義的聯盟和戰爭的特徵啊。

日德意協定的主要目的，是在掃除那些修約和侵略的障礙，如英法在歐洲所佈置，以及美國聯合英法在太平洋一帶所佈置的戰後的和約，如分別加於戰敗的德奧匈土諸國的凡爾賽、聖日耳曼和塞佛里斯諸約，還有維持戰

後和平的國聯、約以及華盛頓條約與白里安凱洛格和平公約，形成了一種和平的維持現狀的國際體系，這正是那三個侵略國家所要破壞的。日本首先打擊了這個體系，她違反九國公約和國聯盟約而佔領了東三省，她又是退出國聯的第一個。接着，德意爲了共同的目的，也加入日本的隊伍了。

太平洋乃至遠東的均勢，是由華盛頓公約建立的，該約實際上爲美、英、法和日本諸國所締結，雖然九國公約簽字各國中還有意比荷、葡和中國。蘇聯是一個遠東和太平洋的國家，同時又與中、日兩國相接壤，然而她在這太平洋的均勢中不僅沒有發言權，而且相反的，她的遠東邊疆，還被那華盛頓公約的簽字國，特別是英、法，視作日本擴展的最好出路，因爲這可以免得日本向英、法在南洋的勢力範圍和殖民地進攻。這種態度是向日本保證，對那鄰接蘇聯的中國領土的侵略，尤其是同時對蘇聯採取威脅的姿勢，英、法將毫不反對，這樣，也就使九國公約不加援用。因此，進攻東三省和華北自然成爲日本破壞九國公約的最好方法了。日本軍閥只要表示侵犯蘇聯遠東領土的意圖，就擔保可以把英、法、美在九國公約基礎上的一致立場完全破壞。這是一九三一年東北事變的教訓，對於日本以後擴大的侵華，對於柏林、羅馬軸心，都是如此。這樣，反共公約的理想首先經過東北事變的試驗，而這次試驗的成功，又鼓勵了所有的侵略者拿這作爲策略，以在世界各部進攻戰後維持現狀的集團。也許有人說，日、德意是那利用反共煙幕以破壞戰後和約的策略的合作創造者。但是創造這種策略的基本條件之一，卻是在於英、法政府部份的包括美國企圖把侵略的刀鋒從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特別是他們在亞洲和非洲的殖民地，轉移開去，而鼓勵侵略者從俄、蘇

戰爭中去找尋他們的出路。

讓我們從目前的日本侵華戰爭中，觀察一下反共公約所擔負的任務吧。

那反共公約，對於該公約據說要反對的共產國際，實是一種欺騙。如果有人拿英國去代替該約所反對的共產國際，那纔近乎真實。這欺騙已成爲一種最嚴重的帝國主義聯盟。這個公約的意義，不應從官方公開的解釋中去找，而應該從簽字各國的特殊聯合中，尤其應從他們對於意國、征阿、意德進攻西班牙，以及日本侵華的共同立場中去找。從這一點看來，這公約對於英法是一種警告和廣泛的暗示，就是說，羅馬、柏林、軸心當發動侵略，封鎖英法在地中海的交通線時，並沒有忘卻日帝國主義這個因素。在日本方面，這同樣是一個警告，特別對於英國和美國，就是說，日本在遠東方面撕碎九國公約時是有着歐洲侵略者的支持的。因此，羅馬、柏林、軸心與日本的聯繫，除了集中進攻英國，使她與美國分開外，就沒有其他的目的。另一樁同等重要的工作，就侵略集團的利益看來，是使英法與蘇聯相分開，而這，由於這些國家要把侵略轉移到蘇聯去的企圖，也是不難做到的。

日德合作反英的相互利益，早當反共公約締結以前，就已在兩國國內研究着，並且反映於公開討論中。在反共公約成立幾個月前，柏林軍事學評論（Militärwissenschaftliche Rundschau）曾發表一篇鮑爾上將（Al. Bauer）關於締約的文字，批評一九一四——一八年德國遠東政策所造成的「錯誤」。鮑爾上將認爲日德兩國如果在一九一四年締結一個聯盟，或至少一個中立協定，那末，也許可使俄國不致參戰。他在指出德日協定對於德國的益處

後，又指出它對於日本的益處道：

「在日本方面，它對東亞的目的，必然是與盎格魯·撒格遜列強相矛盾的，因此，日本最好的聯盟者，當莫過於德國的海軍，因為它能在北海牽制全部的英國海軍，而當遠東決戰時分散英國的海軍力量。」

關於反共公約的實用，鮑爾上將的日本同僚也有同樣的意見。一九三七年秋天，東京日之出月刊會邀請了幾位日本海陸軍的將領辯論，「假使日英發生戰爭」將如何的問題。這次辯論的結果，斷定「英國不致作戰。」在這裏，我摘譯辯論時各發言者最重要的言論如下：

森山大將說：「英國要把它在遠東特別是中國的利益保持永久的理想，是一種基本的錯誤……如果英國墮入了自掘的陷阱，那只有去怪她自己。意大利已從反共公約中增加了許多力量。她是再不會對英國「唯命是從」了……如果英國要與意大利啓戰，她必須首先準備放棄地中海以東的一切。在日本的背面，意大利可以向英國顯示一條堅強的陣線。沒有她，意大利就難以應付了。」

伊佐見上校說：「那締結英日同盟的英國，已不是今天的英國了。今天，它的地位已大大的低下，而只和日本處於同一的水準……它的政策改變了許多，她現在正和美國一樣向蘇聯接近，企圖給日本以打擊，如果日本想染指於她的禁鬱的話……我想，在目前情形中，蘇聯已被英國造成一種工具了。」

上松大將說：「美國對於現行情採取一種審慎的態度，因此，日本應該小心翼翼的不激怒美國，而集中

力量進攻英國。」

伊佐見上校說：「我卻主張給英國以小小痛苦的打擊，這樣，她將認識日本就是生意經呢。」問到英國如果表示戰爭，將發生怎樣結果的問題，安籐大將反駁道：「別開玩笑了！那是無需想到這種危機的。英國和日本相隔一萬公里，她能對日本怎樣？而且還有意大利。英國怎能進行戰爭呢？請放心吧。」

上松大將說：「我們要不要打擊英國，那是不成問題的，我們只要表示準備打擊，表示我們爲了生意經，因此要使英國退出中國。」

問到日本是否現在就必須向英國挑戰，安籐大將回答道：「我相信一種逐漸和堅決推進的政策是最有效的。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利用中國來把英國的勢力逐出中國……勝利的日本是少不得這種策略的。我們應該充份尊重英國在中國的權益，並充份滿足它的商人精神。同時，我們應該在政治上對它施行壓力，使它認識實際所受的損失而退出中國。」

當這些談話發表的時候，日本軍閥的注意正集中於排斥英國在上海和揚子各埠的利益。德國雖然於一九三六年秋天首先與日本締結反共公約，但在這些演詞中還沒有直接被提到；而後來加入公約的意大利，在侵華戰爭開始時是被當作日本反英的主要聯盟者的。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征服，以及她在西班牙戰爭的領導地位，使她成了軸心的領導強國。據日本海陸將領在上述會議中所說，反共三角形的主要目的是英國，而日本在這個三角形

中的任務，是負責「地中海以東的一切。」至於對於蘇聯的戰略目的，上面會說是爲了英國現在「正和美國一樣向蘇聯接近，」更爲了蘇聯已被「英國造成一種工具。」後者的觀點，湊巧跟上引鮑爾說話中的意見相合，他認爲在德日協定中，含有一種阻止蘇聯在大戰中加入英法方面的保證。這也同樣爲了美國，阻止她牽入英國方面，以便日本跟她的歐洲聯盟者，「集中進攻英國。」

日本和德國，當時是柏林、羅馬、東京三角形的前哨，而意大利則是三角形的中心，德國參謀部據關報德、國、防（Deutsche Wehr），在德國攫奪奧國的前夕，論述這種情形道：

「對於大德意志，意大利帝國實是到那原料豐富的非洲，乃至世界大海的印度洋的橋樑。這是地中海的中歐海軍強國。一個中歐區域如果沒有地中海，就將像一個囚犯，它的戰鬥活動將被孤立和限制。因此，那南北軸心（柏林、羅馬）是正向海洋擴展着。」

柏林與羅馬聯盟，就是爲了不致使德國的「戰鬥活動被孤立和限制，」而羅馬、柏林軸心的對日聯盟，也是爲了同樣的目的，鼓勵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並進攻英法美在遠東的利益。德意不能直接影響太平洋的均勢，以便有利於日本，這正同他們既不能給日本侵華以有效的援助，又不能作爲海陸軍的聯盟者，來支持日本對蘇的衝突。或對英美海軍干涉的反抗一樣。在侵華戰爭的初期，日本也並不希望她歐洲的聯盟者超過外交以外的任何援助，因爲他們是正在地中海和中歐，忙於自己的侵略政策和行動。然而，日本卻可以利用歐洲的危機，來阻止外國干涉她的

停華和對英、美、法在遠東利益的進攻。羅新斯基（Herbert Rosinski）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份的太平洋事件上發表中日戰爭的戰略一文，曾指出反共公約的任務說：

「自東三省、遼寧的教訓後，英、美、法都以極度的恐慌注意中國現行的危機和未來的形勢，那日本控制中國全部的形勢。中立的治外法權地位的殘餘，仍以外國租界和砲艦的形式存在着，這構成了現行衝突的唯一特徵。它們已經而且不可避免地引起許多次足以造成世界戰爭的事件。但在這裏，又正同在北方一樣，世界政治棋局上的形勢，證明了有利於日本，它能以適當的聯盟來補充它自己不足的力量。自反共公約最近的擴展包括了意大利，英國在兩個可能的干涉者中，已受了更深的打擊，由於歐洲方面的束縛，她似乎不能再把大部份的海軍力量分散到遠東，沒有英國的援助，美國單獨是不能採取有效行動的，即使輿論比現在更有利的話。」

這顯然是三個簽字國替反共公約規定的任務。然而，我卻不能同意羅新斯基的意見，以為意德的惘嚇或威脅，足以使英國「不能」用她部份的海軍來支持美國對日壓迫的行動，我也不相信沒有英國的援助，美國就「不能」採取有效的行動。「毫無疑義的，英、法、美和蘇聯的聯合力量，很易制止法西斯和納粹在歐洲的侵略事業；要制止日本的侵略，在中國一致堅決的抗戰和蘇聯遠東軍隊的強大力量之下，自然將更容易，只要英、美、法不從他們中立和不干涉政策中去鼓勵日本就好了。那反共公約作為帝國主義聯盟的性質，遠不及作為利用英、美、法把侵略轉向蘇聯的幻想的陰謀性質來得危險。即使沒有英國的援助，美國反對日本侵略的行動，也不能說是美國「單獨」行動。

因爲中國在對日的長期消耗戰中，已證明了她的能力，儘管事實上日本侵略軍隊和軍需工業都是靠美國供給的。

意德很需要日本在遠東的行動，特別是在中國沿岸，因爲這可使日本海軍成爲香港、安南和星加坡周圍的一個實際的威脅。意德作家都勸日本趕緊南進，並說這是一條比打中國軍隊還更容易得到勝利的路。例如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漢堡出版的遠東評論（Ostasiatische Rundschau）曾載有一篇荷屬東印度的通信說：

「當地政界的人士，都敏感地認爲中日衝突也將多少取決於荷屬東印度的未來。他們以爲日本的勝利，等於是把日本的統治擴展到印度洋，而荷屬和英國，不能確定地阻擋這種事情的發展；這種事情的到來，他們認爲是自然的現象。」

納粹作家薛斐爾（Paul Scheffer）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份亞細亞雜誌上發表亞洲的無人島一文，討論英國準備保衛荷屬殖民地的問題說：

「在英國與荷蘭間，對於他們在東方的地位，盛傳已成立一種諒解。如果真的存在，那一定是非常秘密的，而且有許多疑點。荷蘭不能從他們東印度幾百萬的臣民中組織一個强有力的軍隊，雖然荷屬東印度位於從日本到星加坡的要道，這樣的軍隊對於英國將很有價值。相反的，保護荷蘭的屬地，以肅清從東方到蘇彝士和從星加坡到澳洲的要道，終還是不列顛的工作。荷蘭顯然已接受了英國對於這個小帝國的保證，但怎樣的情

形纔算是荷屬婆羅洲的威脅而給予援助，那顯然還在倫敦懸而未決呢。」

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的遠東評論，討論到菲律賓的問題，它認為日本侵略的浪潮，已捲入了馬尼拉，它說：

「美國在菲律賓的地位本無價值，但過去半年來中國的事情，證明了在現在不同的情形下，卻是有價值的。美國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大部份都繫於中國的港口，這些港口，現在已歸入日本的掌握，顯然不會有恢復的希望了。」

這個納粹雜誌在說明美國現在已決定把菲律賓當作到中國的跳板之後，又指出美國還將決定「這個把日本隔在一邊，把荷蘭和英國屬地隔在另一邊的障壁，」是不許「從美國戰鬥力中剝奪去的。」

意德對於反共公約的興味，顯然是爲了對英的侵略聯盟。爲了強迫英法不干涉意德的侵略西班牙，同時又爲了造成一種有利於德國進攻奧捷的國際形勢，日本在遠東的行動是必需的。據日本報紙所傳，墨沙里尼在一九三六年就已在很積極的促成第一次反共公約。但因了德國的勸告，意大利卻沒有簽字，這樣可使這公約保持對英警告的性質，而不是造成確定的威脅，威脅是直到日本開始進攻華北和上海，意大利正式加入公約後纔造成。這新的三角協定，當時不僅是對英的警告，並且宣言偽裝的反共集團已由協調進展到行動。當意大利加入反共公約時，大阪每日新聞和東京日日新聞都誇言把意大利拉入公約的是日本，並且還說日本將趁早承認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當侵華戰爭發動時，日本在聯盟中的任務是領導反英，而德意的工作則是把英美方面對日本侵略的任何干涉，

打上「幫助共產國際」的烙印。

在希特勒進兵奧地利的前夕，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希特勒向國會發表演說。在這次演詞中，希特勒第一次宣稱德國願意日本的勝利，自然因為這樣可以幫助日本「反共」的鬥爭。希特勒說：

「我不同意那些政治家的意見，以為打擊日本，就能對歐洲有利。我怕日本在東亞的失敗，決不會有利於歐洲或美洲，而只有利於布爾雪維克的蘇聯，我覺得中國無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都不够抵禦布爾雪維克的進攻……我甚至相信日本最大的勝利，對於世界的文化和一般和平，也遠不及布爾雪維克的勝利來得危險。」

於是希特勒又提示英國，說德國在中國雖有巨大的商業利益，但她卻沒有理由幫助英國去解決她遠東的困難和煩惱。關於這點，希特勒說：

「德國在東亞沒有領土的利益。她在那裏只有經營商業的願望。這並不叫我們袒護一邊或另一邊。但這卻叫我們認識，布爾雪維克的勝利，連這最後的可能也將被破壞了。」

「而且，德國在東亞是曾經有過屬地的。這曾經使某幾個列強，聯合了黃種和白種的人民來反對德國。在今天，我們真的再也不願意被請回到東亞來了。」

希特勒所說布爾雪維克在中國的威脅，以及把日本當作反布爾雪維克的救主，都不過是德國履行她在那以

反英爲目標的反共公約中的任務。約莫在同時，上海的德國商會曾經寫了一封信給東京的德國商會，抗議該商會在德國報上的親日宣傳。這封信也會送給德國元首看，指出那反共陣線是一種欺騙，信裏有一段說：

「……在日本侵入以前，我們記得整個中國無論在經濟和秩序方面都處於最有希望的繁榮的境地，而且共產主義的危險也已減削到最低限度。但是由於日本的侵略行動，這種根本的發達卻被無情地破壞了，共產黨的危險不僅沒有進一步的排除，而且反因此滋長起來。」

上海的德國商會，自然並不反對德國政府的反英政策。他們只怕這種政策危害了德國在華的貿易，特別因爲德國正式加入了日本反對中國的「反共」宣傳。一九三八年三月出版的該商會的一九三七——三八年度的報告，會說明這種情形道：

「我們跟意大利不同，我們將在中國失去了善意，那德國商人在戰後二十年來赤手造成的建設工作的結果。即使中國的政治家理解我們對日協定的用意，但他們卻不能影響中國的人民大眾。中國的人民是不能想像一國既以反共公約幫助了日本而又算是中國的友人的。我們在經濟上全靠這些買賣的人民大眾的感情，在日本佔領的區域中也是如此。現在那些人的感情是反對我們的。只要加以節制，這是可以避免的。」

在同一報告中，該商會又警告德國政府不要過於相信日本侵華的勝利，說：

「……征服中國僅僅限於鐵路和較大的城市。現在還談不到對於這些鐵路所通過的各省的控制，而且

要造成這樣的控制，也還沒有頭緒呢……」

「戰爭使那些本來很少聯繫的各部團結起來，並在一夜之間促成了中央政府和西南諸省的統一……如果這始終如此，那末時間是於中國有利的。」

這個商會的報告，又毫不隱諱地揭露了在華德國商人對於日本征略巨大中國市場戰爭的感情，它說：

「毫無疑義的，誰要是明白這次侵略的真正目的，就會知道日本在中國的勝利，等於是外國貿易結束的開始。在日本經濟的建設和擴展時期中，我們仍將受歡迎。然而，正因為這點，最後結果我們必將喪失我們在未來長期的中國容許下所能維持的地位。東三省的發展證明了日本人在那裏玩的是什麼把戲。」

「中國一旦自由，屬於她自己的時候，實際上將特別對於德國提供無限的希望。中國的大陸是正在趨向現代化的開端。只有在這幾年中，那傳統和習慣在現代化道路上所樹立的障壁是打破了。這個國家的開放還只在現在開始，而日本正要替她自己來獨佔它。」

這報告也證明了德意集團與日本合作的基礎，只在於他們聯合反英的立場。這也就是為什麼當中日戰爭開始時，日本報紙特別強調日本在遠東的反英。我曾在上面引述過日本海陸將領關於這點的言論。當一九三七年九月戰爭開始時，日本空軍第一次轟炸廣州，日本軍部機關報國民新聞，就發表一篇社評，論及空襲廣州的意義，開端道：

「日本如果惟恐強迫清算英國在華的利益，那末，日本在華的目的，將永遠不能完全達到。」  
這篇社評的結論說：

「空襲廣州，大大地嚇壞了英國，因為該國巨大的投資利益，都集中於廣州及其附近（香港。）因此，日本的空軍必須一而再的去轟炸廣州，直到全城從地圖上消失為止。」

日德意聯盟一開始就是羅馬·柏林軸心或日本手中的馬鞭，雖然張着「反共公約」的幌子，實際上卻使英法按照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調子，在歐洲和地中海跳舞，同時，又逼迫英國在遠東退卻。很顯然的，如果爲了德意的利益，利用日本侵略來鞭策英國的「馬」，那末，唯一正確的路徑，是沿着中國海岸向華南邁進，而且，照反共公約的歐洲作者所希望，還應向中國以外的地方南進。日本冒險對蘇聯作戰，不僅無益於德，更無益於意，這只將解救了英在遠東方面的困難，此外還將加重日本自身的危險，因為意、德在歐洲也正利用着反共的幌子，對英、法利益進行侵略的行動啊。這就是說，日本如向東、西、伯利亞或外蒙進行侵略，她將是完全孤立的，固然，她可以從她太平洋的勁敵方面獲得道德的支持或甚至物質的援助，自然以相當補償他們的利益相交換。如果這樣，日本儘可同英、法或美去締結「反共公約」，而不必同德、意締結了。這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張鼓峯「事件」，恫嚇着有擴大爲日、蘇、法、美模衝突之勢的時候，又間接地證明了。那時德國正忙於對捷、克作外交和軍事的準備，她首先對張鼓峯「事件」，很感興趣，但這只是作爲對英、法的一種提醒，表示德、日合作中含有着可能，如果能讓德國在捷、克自由行動的話。倫敦

熱切地響應了這種傾向，它在公開的宣言中聲明如果日蘇間衝突擴大，英國並無意於調解。然而德國可不希望日滿行動有這樣的轉變；她只要知道英國對於法國與蘇聯合作防衛捷克的義務的態度。這時候，日本的偵察機又回去報告，說蘇聯軍隊不僅前進支持他們張鼓峯的前哨，並已開始向東三省和朝鮮全線總移動，柏林和羅馬都勸告日本務使「這邊境事件局部化。」

那一九三六年秋天宣布的第一次德日反共公約，照上面所說，是對英國的一種警告，而不是確定的威脅，它還要求英國承認德國領導對蘇的反共陣線的任務。在這次公約締成之前，意大利於一九三五年征服阿比西尼亞，因此意國在那通過地中海到印度和太平洋的英國航線範圍中，建立了一個戰略根據地。這步完成後，意德就於一九三六年夏天聯合對西班牙共和國進行軍事的干涉。據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的德國國防雜誌中一文所說，這次行動的目的，是給西班牙一個重新負起她的「歷史使命」的機會，而這「必須從直布羅陀海峽開始，因為她力量的範圍，是位於歐洲與北非之間。」在該誌另一篇關於「西班牙海軍」的論文中，茄陀少將（Rear-Admiral Gadow）說明西班牙要重新負起她歷史的使命，就應該佔有特別是那一巴塞隆納、瓦倫西亞、馬拉加、直布羅陀以至巴里阿列克羣島的軍略要區。一九三六年柏林出版了一本地中海區域的書，作者為一署名「Markmann」的軍事專家，書中詳盡地討論英國的直布羅陀地位在空襲下易被攻破的問題，尤其是當西屬摩洛哥用重砲和魚雷艦隊佈防的情形之下。這位作者又指出，控制直布羅陀就等於是「埃及和亞丁的安全」就是每年通過蘇彝士的三千萬噸

運輸的安全；西班牙領海對於法國的重要性更其來得大，因為「從巴里阿列克羣島，法國的海上交通隨時可以被割斷。」因此，在那時候就已經很明白，意德軍事干涉西班牙共和國的目的，是爲了他們在西屬摩洛哥、直布羅陀和巴里阿列克羣島的利益，此外，還爲了替西班牙的軍事法西斯在西班牙領土上取得航空根據地，特別是在法國南境。這就是當德國最積極地在地中海與意大利合作而又與日本締結反共公約時候的國際形勢。

當意德進攻英法和她們殖民帝國間的海上交通線時，日本在太平洋方面也同樣很忙碌，一面撕碎了對英美的海約，一面又進行華北「自治」的陰謀。這陰謀的目的，是要割佔中國在黃河以北所有的土地。同時，又壓迫南京組織「反共聯盟」和加入「中日滿集團」。在侵華戰爭爆發前，日本的外交官吏曾經與英國談判，以試探因羅馬、柏林軸心在地中海的行動以及德日協定的宣布，究竟使英國反對日本侵華的態度，已經軟化了多少。

當最後日本陸軍決定在華北行動時，柏林的德意志、普通報（*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便覺得很滿意，以爲此後英國的外交行動，可不再僅限於歐洲的形勢了。阿比西尼亞的征服，和對西班牙的軍事干涉，對於反英都會有過幫助，現在，日本又轉而援助羅馬。柏林軸心，特別是德國在中歐的行動了。天津和上海是英國以及其他國家在遠東的兩個最重要的貿易中心，這兩個都市在戰爭初期的佔領，說明了侵華戰爭是以日本獨佔中國廣大市場的行動開始的，此外，英國在華的金融投資中心，事實上也都成了日本侵略軍隊包圍中的孤島。

隨着西班牙和中國兩組戰爭的發展，德國侵略的形勢也成熟了。在一九三八年春天，德國割併奧地利，同年九

月，又攫取捷克、英國的「調解」縛住了手足，而法國又背棄了與蘇聯合作保衛該國的諾言，讓她去受德國的侵略。接着日本又佔領廣州，切斷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聯絡，並攫奪了海南島。

日本海陸軍的南進，以進攻上海為開始，這是日本取得意德在地中海行動聯繫的相應的運動，這是加到英國在亞洲屬地兩翼的聯合的壓力。上海、廈門、汕頭和廣州，都是使日本海軍接近它「海外」聯盟者的侵略範圍的階石。侵入華南是剝絕香港的經濟資源，而攫奪海南島，則是切斷它與星加坡在戰略上的聯繫。海南島的佔領，還使日本海軍在法屬安南外面的東京灣，樹立了控制的地位。

日本海軍想變成中國海和西太平洋中的一支配者，以太平洋中的密克羅內西亞羣島作為日本帝國的海上生命線，這稱霸的程序，在中國海部份就這樣的完成了。凡是在中國海中有戰略重要性的島嶼，以及全部的中國海岸，現在已成了一連串的日本海軍根據地和據點了。香港雖然不在內，但她正同中國港埠中的任何外國租界一樣，也已被日本的海陸軍隊包圍着。日本在海南島的海軍根據地，不僅是對香港和安南的直接威脅，同時也威脅着荷屬東印度的整個區域，菲律賓，特別是那不列顛殖民帝國在太平洋的門戶——星加坡。海南島的佔領，曾被歡呼為整個「反共陣線」極有意義的進展。值得注意的是當日本海軍在海南島登陸前未久，一九三九年一月底，據神戶出版的英文日本紀事報（Japan Chronicle）的報告，日本議會的質問者曾經詢問內閣，「日意間進行締結新協定的談判」以增強反共公約，是否屬實。他又質問這協定除了作為反蘇的工具外，還將包括歐洲的問題，是否確

實。當時的外相有田答稱：「共產國際在中國和西班牙的活動日益顯著，因此必須採取有效而適當的反措施。」田又向議會報告，日本政府已隨時喚起各國政府對於經由安南和其他區域輸入軍火問題的注意，如果必要，並將採取適當的步驟。當另一個質問者提議那條通過安南的路線，「應該由日本海陸軍迅速加以截斷」的時候，海陸兩相當答稱議會應該確信海陸軍的注意，並說他們不能洩露海陸軍軍事行動的計劃。不久後海南島就被佔領了，意國報紙感激地贊揚日本海軍給法國以這樣的打擊，因為法國剛會拒絕意大利關於吉布底、蘇彝士運河管理權，突尼斯、科西嘉以及尼沙的要求呢。

海南島的問題這樣解決了，日本就又把他們的注意轉移到中國各港埠中的外國租界，自然特別是英國的租界，一九三九年夏天，華北日軍宣佈封鎖天津的英法租界，他們馬上又獲得成功，因為英國答應了日本許多的要求，在那「有名」的有田克萊琪協定中，他們承認了日本在華的交戰權利，並答應不干涉日本對付「敵人」的行動。德國海通社立刻把這次英國失敗的意義報告全世界。這消息首先着重指出英國使美法捲入對日爭執的「失敗」。它又說，有田克萊琪協定，不僅將決定天津事件，並還將「自動地決定其他租界的問題。」最後，它又指出英國在未來只能維持她在星加坡和香港的軍事地位，而且，爲了免得冒險對日大規模衝突，英國已決定「撤退她在遠東的地位，因爲這無論如何是不會安全的了。」

天津的反英行動，是日本軍部派在一九三九年夏天所發動的大規模運動的一部份，目的是與德意締結軍事

聯盟，以強化反共公約。在有田克萊琪協定成立前幾天，前日本駐德大使 Honda 在大阪反英大會席上發表演說，說明軍部派關於「加強反共陣線」情形下對付英國手段的意見，他說：

「在歐洲，英國受了德意嚴厲的壓迫，到處顯示着可憐相……阿比西尼亞和捷克斯拉夫，知道了信任英國結果的代價是什麼……只要一用機關鎗，天津問題是霎眼之間可以解決的。日本能夠馬上解除租界裏面英國軍隊的武裝……只要日軍決心排除一切障礙，關於外國在華租界的問題是可以當場解決的。這樣的決心，常可以說服美國和法國，不要替英國抓取火中的栗子。如果英國打倒，蔣介石政權也便要消失了……現在應該是日本擺脫華盛頓條約枷鎖的時候了，如果他們妨礙日本的戰略計劃，日本儘不必考慮第三國的權益……英國儘管怎樣增強印度的防務，印度是總有一天會成爲日本屬地的。」

從德意在地中海和中歐侵略的政策或行動的觀點看來，他們與日本締結「反共」聯盟，只有一個基本的目的，那就是，通過日本在東亞侵略的中心，來威脅英法德意在外交上給日本侵略以充份的支持，甚至支持日本宣傳的謠言，說對華戰爭是一種「拯救中國出於共產主義」的行動。但事實上，他們卻更知道，而且已取得日本的保證，英國將爲聯盟的主要目標。據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五日大阪每日與東京日日檢討中日戰爭的聯合特刊中所載，日本在這方面的任務，是「保衛中國使不致受蘇聯的蘇維埃化，並把這個大國從西方殖民的列強特別是英國的支配下解放出來。」這樣的一種任務，——即借名「反共」的神聖使命，在遠東進攻英國——是意德很爲同意的，因

爲這正合於他們當時的政策。爲了互相幫助反英，以適應各自在歐洲和遠東侵略行動的需要，柏林、羅馬、東京的三角形，就這樣的形成了。對英國在華利益的進攻，自然也等於是對美國利益的進攻，因此，意德在外交上對日本侵略的支持，也就是意德方面對美國的挑戰。但鑒於日本和柏林、羅馬軸心的利益，它很小心的不激怒美國，卻分化英美，以集中一切向英國進攻。

至於蘇聯，德意主要所關的是阻止英法，以蘇聯所主張的集體安全爲基礎，與蘇聯共同建立反侵略的聯合陣線。所以，通過了他們遠東聯盟者反蘇的威脅，而把這個目的達到，那就是意德的希望。日本雖有向蘇聯挑戰的充分自由，但只限於日本侵華戰爭的戰略需要，至於日本作爲德意聯盟者的義務，卻是集中向英國進攻。日本又被鼓勵着在中日蘇的邊境區，發動進攻或敵對行爲，因爲一切這樣的挑戰，對於阻止英法與蘇聯在西班牙、捷克和中國問題上的合作，是有用的。

自從一九三八年九月張伯倫達拉第在慕尼黑會議中拋棄了捷克以後，意德的這種態度，卻很快地轉變了。在這以前，德意和日本已經認識到蘇聯決心要根絕滿蒙邊境反蘇的挑戰，而以發動對侵略者的總反攻來答覆這樣的挑戰，她在張鼓峯的戰鬥力量，也證明了這點。在張鼓峯，日本不得不向後退却，因爲德意都勸她停戰。一九三九年夏天，日本在「諾蒙亨事件」中又重襲了同樣的經驗，爲了進攻蘇蒙邊境，她不得不償付了嚴重的損失和大敗。這又使得德意明白，在將來，所可期望於他們「反共」聯盟者的，只有是反英了。在另一方面，德國也不得不認識到，爲

了與英法進行外交交易而對蘇聯挑釁，是日形危險了。蘇聯在莫斯科三國談判中的堅定立場，表示她決不能容忍直接或間接的侵略，無論在波羅的海方面或羅波邊境通達烏克蘭和黑海的方面。

爲了保持對日的反英聯盟，以及爲了避免歐洲方面對蘇聯的邊境衝突，那反共三角中最有直接關係的德國，卻急忙地促成了反共公約的修改。這次的修改，意思就是尊重蘇聯的安全和戰略利益，而以蘇聯確保不加入任何敵對的國家集團爲交換。這雖然使日本震驚，但可並沒有使德意與日本的反英聯盟就此中止。相反的，就德意的利益說來，加強這種聯盟的需要，是並不減於以前的。

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德蘇互不侵犯公約簽訂以前的幾個月，德意曾與日本進行關於締結反對英法的軍事同盟的談判。據上引大阪每日與東京日日聯合特刊的社論所述，這次談判是爲了討論下列的問題：

「德國和意國，都要求加強東京、柏林、羅馬軸心，以應付英國包圍德意的政策。」

照這篇社論所說，日本方面是贊成「加強這個軸心」的，但只是爲了「制止蘇聯反日的行動和破壞英國援蔣的陰謀。」經了長時間的討論，日本平沼內閣決定「支持東京、柏林、羅馬軸心。」

對於德意反共公約的主要目標是從遠東方面進攻英國，日本的目標，則是強迫英國承認日本對全部中國的征服。反共公約是日本軍閥強迫英國改變遠東政策的工具，他們一面用軍事力量破壞英國在華的勢力範圍，一面又爭取英國來支持日本軍事經濟勢力支配下的遠東反共聯盟的計劃。平沼內閣中的外相有田，曾於一九三九年

「如果聽任中國布爾雪維克化，東亞就將落入共產國際的統治下。我常在對英美大使的談話中，指出這一點。」

有田說，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意思就是日本「滿洲國」和中國在共同防共的目標上合作。爲了這個目的，絕對需要日本軍隊駐紮於中國各地，特別是蒙古新疆一帶。有田又繼續說，他相信列強都會明白蒙新特殊行政組織的樹立，自有它本身的充分理由。尤其因爲這區域與英美的資本無關，日本自然應該和它發生特別密切的關係，而英美是不應該加以反對的。

這樣，上述日本向德意的提議，是對他們保證：遠東方面，日本當在軍事上支持反對英法以及英法各自的利益和屬地，但德意也必須在軍事上支持反對那些干涉日本「解決中國事件」的任何列強，以相交換。日本要利用反共約來與英法造成遠東慕尼黑，使英法也出賣捷克的同樣方法，把中國出賣給日本，因爲他們正也懷着同樣的幻想，要使日本侵略的刀鋒轉向蘇聯啊。英國想拿有田克萊琪協定首先在華北施行，這就證明了有田在上述聲明中的估計沒有錯，他相信列強都會明白日本在北方的計劃，「自有它本身的充分理由。」然而，這不能再爲德國所接受了，德蘇互不侵犯公約的締結，終於把日本冷淡地丟棄在一邊了。

### 第三章 遠東戰爭中的不干涉和「綏靖」政策

中國號召全民族抵抗日本的侵略，人民的團結，軍事的統一，以及戰鬥精神的堅決，是中國現代民族革命史中從來未有的。但是三個關係最密的列強——英國、美國和法國，雖然他們在中國沿岸的利益和地位遭受了日本直接的攻擊，雖然反共公約也是以他們為目標，卻決定扮演著「中立觀察者」的角色。這些「中立者」無疑的知道，這種態度等於是放棄中國全部海岸，包括條約口岸，讓日本海陸軍去支配，因為事實上誰都知道中國沒有一個足與日本海上霸權對抗的海軍，戰爭儘管怎樣轉移到中國的內地，日本在太平洋上勁敵的「中立」政策，除了把中國海岸的外國貿易中心，特別是英美的利益讓給日本以外，更沒有別的意義。而且，這三個主要的列強，還決定使他們在華的治外法權，他們依照「開戶開放」和「機會均等」原則的在華經商的權利，以及他們在中國沿海和內河自由航行的權利，不要干涉日本海陸軍作戰的行動。中國政府最初並不相信這點。大隊的中國軍隊衝到上海去，希望有關列強對侵略者的壓力，和中國的保衛者來共同阻止日本的侵入，然而這種集體抵抗侵略的企圖卻證明是徒然的，因為有關的海軍列強，並不準備與中國的軍隊聯合保衛上海啊。

自然，英、美、法等列強，並非願意把他們的地位放棄給日本。他們也不是畏懼日本，或日本的聯盟者。也不是他們確信中國能够勝利，所以纔讓中國自己去對付侵略者。這「中立」政策倡導者的英國雖想阻止日本南進，卻又從

不掩飾的表示這種政策的目標，是要從中國民族獨立的完全勝利中，拯救英國乃至日本的利益。這種「中立」政策的根據，是以爲日本在中國內地的長期戰爭中愈形削弱，他們對英國的野心和要求也必將減低。他們估計日本必將需要一個強國的調解，而這個強國鑒於一個侵略的日本對於牽制蘇聯的任務，是不能讓日本大陸帝國主義完全失敗的。這種估計又基於一種希望，那就是，中日戰爭最後也許會變成日蘇戰爭的序幕，如果這樣，太平洋列強方面自必將維持善意的中立或甚至給以援助。總之，這「中立」政策的目的是坐觀兩個國家在長期消耗戰中的搏鬥，然後準備與侵略者和解，而以考慮第三國的利益爲基礎。

這種政策的主要性質，跟英法等在西班牙戰爭中所採取的不干涉政策沒有分別，雖然因英國在華投資數量的鉅大，兩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由於蘇聯的政策以及她鄰接中國的地位，像對西班牙共和國一樣斷絕中國軍火供給的陰謀是不能實施的。但遠東的「中立」政策，卻正同樣有利於侵略者，舉一個例，美國駐華商務參贊安諾德（Julien Arnold）曾在一九三九年六月 美亞雜誌上，發表中國的命運與美國的前途一文，其中有一段說：

「美國輿論都同情中國的抗戰，然而據事實所昭示，我們給予日本的物質援助，卻比給中國更多。在過去幾年來，我們對日輸出的大宗都是軍需品或與軍需工業有關的貨物……有人誇言我們在過去幾年來對滿輸入年有增加，但滿洲官方的材料，卻證明了所有的輸出品，都是軍需工業用的。這樣，在最近幾年來，我們每年對日的輸出中總共約莫三萬萬美金，只有很小部份不是軍需品。

「如果誰要是在中國跟着日本軍隊走，就可以目覩所有都是美國機械化的裝備，他也許會想，除了作戰的人員以外，他簡直就是美國軍隊了。」

在這次戰爭以前，英國是在華權益最大的強國，她的金融投資和政治勢力，使她成了日本最大的勁敵，她也是最直接受日本侵略影響的。她對這次戰爭的「中立」政策，造成了英國利益重大的損失和破壞；她想用綏靖侵略者的經常政策，來減輕這種損失，如果可能，她不惜以別人作犧牲，主要是犧牲日本所侵略的對象以及美國對日的地位。

一九三六年秋天，正當德日締結第一次反共公約的時候，英國向美日建議保留華盛頓海軍條約第十九條，不得在夏威夷以西東經一百十度的太平洋區域設立海軍根據地。這次建議的目的，是使日本不能在中國海和太平洋中密克羅尼西亞羣島一帶樹立特殊的海防，從而在這區域中主要是中國沿岸取得新根據地。為交換起見，英國主張美國也不在菲律賓到夏威夷一帶的海軍根據地設防。美國對於這點的態度，在一九三二年美國國務卿史汀生致上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波拉的公開信中，就已經着重提出過，這封信包括了美國對於日本侵略所採政策的充分說明。因為英國反對英美合作援用九國公約，這封信終於公開發表出來，其中有一段說：

「華盛頓會議主要是一種裁軍會議……美國政府當時放棄造艦的領導地位以及不在關島和菲律賓增防的願望，是以九國公約為基礎的，這公約不僅確保全世界的國家在東方有商業的機會均等，同時還反對

任何強國以中國爲犧牲的軍事擴展。誰要是沒有考慮到基本所關的前提，就不能討論修改或廢除九國公約條款的可能。」

然而，現在，英國不管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繼續破壞九國公約的事實，不管日本對於英美其他海軍協定的廢棄，卻又建議廢除這些條款了，英國這種建議的內幕只是替日本解除美國干涉她在華北和內蒙繼續侵略的恐懼，而同時以日本保證不向上海和華南沿岸推進相交換。這就是當日本和羅馬、柏林軸心宣布合作的時候，英國反撥行動的用意。

英國提議不等東京的回答，就遭了華盛頓的反對，而東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在以前史汀生的信中，美國表示如果日本繼續破壞九國公約各款，如特別指出的「以中國爲犧牲的軍事擴展」，她就反對討論這一點，但這一次的回答，卻沒有直接提到九國公約。她說這個條款的保留問題是可以討論的，但必須跟菲律賓的中立以及整個遠東問題的新調整聯繫起來。

美國對於英國建議的答覆着重於美國與英國合作的願望，第一個目標是「菲律賓的中立化」，實際上就是與英國海軍合作，保證菲律賓以及荷屬東印度和英國屬地的安全。這答覆也表示美國願意從對英合作中來達到「整個遠東問題的新調整」。在這裏，美國沒有表示英美合作究以九國公約爲基礎，還是另闢途徑來阻止日本的南進。有一件事卻是確定的：美國正同英國一樣，不願意蘇聯來參加威脅日本。從強調英美合作，以及當時英國在歐

洲和遠東的對蘇政策兩點看來，可知美國準備給英國在遠東的計劃以外交的援助。至少美國並不反對英國勸誘日本把侵略轉向蘇聯的企圖，只要在「新調整」的時候，對美國利益加以考慮和保障就好了。不達到這點，英國儘管切想對日讓步，以免得日本南進，美國可是不準備討論菲律賓一帶的不設防問題的。實際上，英國要美國放棄保護菲律賓的權利，並繼續容忍日本侵略華北和內蒙的破壞九國公約的行動，以使美國也加入英國勸誘日本轉向蘇聯的計畫。至於日本方面，爲了她海洋和大陸的擴展，爲了她對於羅馬柏林軸心的義務，以及爲了拆散英美聯合陣線而單獨對付英國的計畫，自然也是反對英國這種建議的。

一九三七年六月，日本向英國提議進行英日談判，以討論兩國在華利益的問題。英國同意了，談判就在倫敦開始。英國一面又向中國政府的代表保證，她並不想恢復在華「勢力範圍」的政策。但是，當時日本在華北的軍事行動，已公然以將中國政府逐出北方爲目標，因此，這時對英的談判，只是表示日本想取得英國對於她佔領華北時的援助或至少中立的保證。在這樣情形之下，英國同意與日本談判這樣的問題，無疑地想使日本在行動時尊重英國在華北以及中國各地的利益，並且還企圖照英國在東北事變中所會試行的同樣基礎，進行中日間的調解。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動，促成了談判的決裂，因爲日本軍閥既已決定用武力解決問題，英國自不能再對侵略者繼續談判，以冒險觸怒中國和美國了。

當日本的機關槍和大炮出動時，英國便對這不宣的戰爭宣告了「中立」，美國也跟着這樣做。恰當那時候，美

國務卿赫爾咨文各國政府，聲明美國所採取的和平原則，這美國的和平原則當即得到了五十餘國贊同的答覆，日本也在其內。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當上海戰爭正在劇烈進行，中國的軍隊和人民拚命保衛這個英美的利益中心的時候，赫爾又另外發表了一個聲明，呼籲「中日兩國政府」停止作戰，而以和平方法解決他們「現行的爭端」。美國政府對於日本侵華戰爭不準備援用中立立法（如它對西班牙戰爭所做的），因為這在實際上將幫助了日本封鎖中國。它下令禁止國有的商船，運輸軍火給「中國和日本」。

這對於中國以及對於美國在華的威信，究竟有怎樣影響，宋美齡女士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美國的論壇（Forum）雜誌所發表中國站定了她的立場一文中，曾有如下的說明：

「……我們從未以悲觀的情緒，想像美國將禁運軍火至中國，並拒發護照，禁止美國顧問來華。」

「……我們覺得美國是在阻止我們獲得保衛我們自己的工具，因此，這等於是幫助我們的敵人，以實現他把我們擊至屈膝的恫嚇。」

「這種行動，在不宣的戰爭中，在非法的封鎖中，在要把中國擊至屈膝的遍及世界的宣言中，在對我們全體國民最非人道的殘殺中，更將大大地損害了我們。」

同時，英國在歐洲正忙於把遠東戰爭跟歐洲方面的侵略政策和行動分開。當中國籲請國聯斥責侵略者，並援助中國抗戰的時候，英國却提議召集九國會議，把中國要求國聯援助的呼籲，轉移到九國公約簽字國身上去。神戶

的英國報紙日本紀事報，曾指出英國這種措置，目的是要使這案件從國聯的手中脫出。英國提議召集九國會議，顯然是爲了保證談判，而在交戰兩國間進行調解，這表示英國並非援引九國公約來反對日本。爲着強調這點，其他非簽字國家如德國和蘇聯，也被邀請參加。在另一方面，這次九國公約會議的召集，而又美國和蘇聯的參加，也是英國的一種外交把戲。她想把召集國際會議對付日本侵略的實際責任，主要地轉嫁到美國也許是蘇聯的身上。果然，日本拒絕出席一九三七年秋天在不魯梭爾舉行的會議，德國也謝絕了邀請。在會議中，日本被斥責爲侵略者，但卻沒有實際制裁日本的步驟，因爲英美都採取着「中立」政策，而美國又拒絕在英國的推動之下，獨負保衛英美在遠東方面利益的責任。不魯梭爾會議並沒有閉會而只是無期「展延」到英美認爲宜於繼續的時候；這樣一來，國聯就此脫出責任了。自此以後，國聯除了勸告會員國在可能範圍內給中國以個別援助外，它對中國的幫助，只限於一些藥品和防止傳染病工作等。

一九三八年五月，英國的遠東政策在實際承認日本新征服的途徑上採取了一個決定的步驟。前字林西報主編格林（O. M. Green）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太平洋事件上發表英國與日本侵華戰爭一文，指出「有兩個方面，如果需要行動時，英國當不會是被動的，那就是中國海關和香港。」他說中國海關的重要職員多半是英國人，其中如總稅務司，「那些人從不會忘記他們是中國政府的僕人，他們對於中國政府的忠誠是不會變節的。」但在這篇文章發表前的一個月，英國却由她的大使與東京政府締結了關於上海海關的協定，並且得到中國海關的英華總

稅務司的諒解。日本紀事報認爲這協定是「一種必要的暫時的協定」。這協定還允許日本支配下的南京「維新」政府，有權指派江海關監督，並規定在日本佔領區域中所有的中國海關，都可同樣指派。日本外務省在官方宣言中解釋這協定，說明在北平「臨時政府」和南京「維新政府」管轄的區域中中國海關所徵集的稅收，都作償還外債之用。同時又同意以江海關的稅收，存入橫濱正金銀行，因此該銀行，實爲外債及上述「政府」平衡稅收的代理人。這協定由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梅樂和（Frederic Maze）簽字並認爲合法。

在這次協定締結以前，總稅務司已把到期的庚子賠款付給日本，雖然中國政府會下令停付。上述的協定，確定了那以總稅務司爲首的中國海關的英籍職員作爲日本侵略軍的僕人的地位。他們並非處於海關官吏的地位，並非如上引格林氏所說「那些人從不會忘記他們是中國政府的僕人，他們對於中國政府的忠誠是不會變節的」。這次協定對於中國政府有關的要點是：（一）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受了英國政府的勸告，承認北平和南京的傀儡政府，（實際上就是日本侵略者）有權指派海關的監督制定和頒布稅則，以及處置中國的海關收入；（二）總稅務司允許取消日本佔領區中的中國國家關稅。就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方面說，這是一種不忠實和出賣的行爲；就總稅務司發令的英國政府方面說，這是參加日本破壞九國公約的行動，違背了該約簽字國「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行政完整」的誓言。美國政府以及除中國外的其他簽字各國，對於這次英日協定並沒有提出抗議，這也是一種容忍毀約的行動。

日本對於這次協定的用意，除了控制中國的對外貿易和中國的港埠外，是要使中國的民族抗戰與英國（列強中最有關係和最受攻擊的國家）相孤立，並鞏固那日本所製造的傀儡政府。就日本說，這協定是一種侵略和戰爭的行動，並配合着對英國的誘惑，即以海關收入來拯救債券持有者，主要是英債的利益。英國外交認爲這協定對於債券持有者是一種「成功」是「必要的暫時協定」(Necessary Modus Vivendi)。事實上，這是承認了日本決定「中國」關稅和統稅對外貿易的特權，使它可以同時徵收重稅，以維持日本軍閥所雇用的傀儡政府，以及暫時償付英債。英國曾經爲首打開中國對外貿易的門戶，現在却又爲首簽具中國對外貿易的死刑判決書，承認了侵略者以封鎖中國對外貿易並把日本的競爭者，尤其是英國逐出中國爲目標的特權。

當上海戰事開始的時候，日本自許有自由輸入他們貨物的特權，藉口這些輸入品只是供本埠的日僑所用。早當一九三七年五月初旬，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日高在對日廣播演說中宣稱，在四月中，日本自由輸入上海的貨物達四萬噸之鉅。這公開的宣告，顯然想使海關的英國當局認爲，爲了英國債券持有者的利益，還是與侵略者締結協定的好，這樣一來，日本對於海關的控制就被承認了。海關協定成立以後，東京的朝日新聞就說，英國終於「認識了中國現實的形勢」，這第一是由於南京「維新政府」的開幕，其次由於贊助華北經濟發展的中日經濟協會的成立，最後是由於日本的宣告控制華中的航路。該報又指出因了這個協定的成立，英日間關於控制中國海關的問題，可以算是解決了。該報說：

「有許多問題，英日間意見都不能相合，幸而由於英國對現實形勢的把握，那海關問題是和平地解決了。這正是未來英日一般關係改善的預示。」

英國外交企圖「和平」解決的第二個大問題，就是英國租界問題，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問題。她也想用解決海關問題的同樣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據英國方面材料的估計，英國在華投資總數約達三萬萬鎊（包括香港的投資），實際上大部份都集中於上海。直到日本佔領上海為止，公共租界實際上等於是英國的租界，它的成文和不成文的章程以及那自稱為「上海工部局」的政策，都是由英國決定的。這種政策的目的，無非是爲了保障英國的利益和投資，以及英國在這個中國金融商業和外國資本中心的政治控制權。經了三個月英勇的抵抗，中國軍隊退出上海後，日本侵入者便轉移他們的注意，要來清算英美在這個利益的主要壘壘中的特權了。這也就是英國當局企圖「和平」解決這個問題的信號。

當上海戰爭時，英國當局對這「戰城」的政策是一種特殊「中立」和「不干涉」政策，這有利於侵略者的進攻，而妨害了武器簡陋的被侵略者。日本利用公共租界北區以及各國軍艦所駐紮的港口，作爲對華作戰的根據地，工部局毫不提一些抗議。在另一方面，工部局對於中國的抗議也置之不答覆。由於英美政府採取了「中立」政策，工部局顯然不能作什麼。然而，同時，這「中立」却至少禁止中國的保衛者，利用公共租界作爲他們的作戰根據地。在這方面，工部局的巡捕，萬國商團，英美意各國的防軍，以及法租界的防軍，確乎竭盡了他們的職責——這正是日

本所希望的。老實說，中國當局也並不希望什麼。當兩租界防軍封鎖華界的進出口時，中國軍事當局也增強他們方面的警戒，以防備日軍利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其餘部份，作為戰爭的根據地。

除了英美的「中立」政策以外，工部局對於參加該局的各國，如英美和日本，也採取着它自己的「中立」政策。據澳洲法學家斐薩姆（Justice Feetham）關於「上海的租界及其政府」的報告所說，租界的歷史發展了一種「特別的規律」，即由於它特殊的地位，公共租界必須擁有某些權力。這一特別的規律，「處於租界領導地位的英國認為，對於「租界及其政府」實是一種有效的「憲法」的代替，它規定着中國人進攻租界時應有的措置。但是，外國進攻租界的可能，以及利用租界或租界一部份作為進攻中國轄區的根據地，却從不為上海的英國父老們所想到。所以當這在一九三二年以及一九三七年再度發生時，租界的「政府」除了保衛它防備中國人攻入租界的特權外，簡直不知道怎樣做。照斐薩姆的報告所說，這些特權計為：

（一）防禦：租界有權採取積極措置，以防備侵入或進攻（不是外國而是中國的侵入或進攻。）

（二）武裝中立：租界有權在中國內戰中維持武裝的中立。

（三）拒絕中國武裝軍隊進入租界：租界當局有權要求所有的中國軍官，包括中國政府軍隊的軍官，尊重租界的中立，即無論在平時或戰時，必須把他們的隊伍駐紮在租界以外。

我們必須知道，當日本利用公共租界作為進攻中國的軍事根據地時，工部局就是依照着這些「特權」做的。

它直截地告訴「中國軍隊的軍官，必須把他們的隊伍駐紮在租界以外，以維持租界的中立」。

在日本軍隊佔領上海的中國轄區以後，英國對於租界的政策，也漸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同時，並企圖爭取日本的軍事當局和他們的傀儡政府，以達到新形勢下的英日合作。上海大美晚報在一篇上海的未來的社論中，說明英國這種政策道：

「……誰都知道，公共租界的官吏已急忙地對日本許多的要求讓了步。也許他們的祕密諒解還超過了所知道的。日本巡捕迅速的擢昇，新的日本職員到處都是，實際上，在每一個重要部門，總有一個日本人佔着第一等的位置，在相當時期後，他也許會昇為該部門的領袖。」

該美國報紙指出，這一切的造成，都是因為租界當局「無意阻止日本運用武力方法的擴展。」英國應付日本壓力的政策，包括了實際承認日本在整個上海的「主權」，並允許日本享有租界的行政權。一個侵略軍隊要管理一個像上海這樣擁有幾百萬中國人的敵對的城市，即使有很強的警備軍隊以防萬一，也是異常困難的事情。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的佔領軍隊自然願意與工部局合作，如果工部局能够幫助日本管理中國人民的話。自然，這種合作只能是暫時的，到了某一時候，日本是不會再需要英國控制下的工部局服役的。由於工部局的這種政策，現在日本是正在壓迫中國的報紙，接辦中國的教育機關，以及控制租界內的中國公共事業。還有，租界的警務當局，也與日本的軍警當局相合作，常把中國人移到日軍司令部去「審判」。英國儘管這樣一味和侵略者以及他們的傀儡合

作，外國租界的命運却仍無法挽救，而且，英國這種對日合作的手段，只是替日本移去最後的障礙，而完成英國的投降罷了。

外國租界的實際任務，最初是直接或間接地被當作日本作戰的根據地，同時並作為封鎖中國抵抗的區域。後來，在日本佔領租界的周圍以後，租界又成了侵略者軍火供給的根據地，以陰謀破壞中國的貨幣，屯積外匯，購買侵略的軍火。同時，英國（和法國）的租界當局，愈益幫助日本管制中國的人民，愈益成為日本的警察機關了。

這種經常對侵略者退讓的政策，終於招致了不可避免的結果，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間日本對天津英租界的進攻，便是一個例子。天津英租界的封鎖，不僅是對租界的進攻，並且企圖強迫英國在整個租界問題上投降，此外，還威脅英國，如果不幫助日本造成「遠東慕尼黑」，她在遠東的利益，就將被摧毀。英國當即要求與日本在東京談判天津問題，以及造成天津事件的其他問題。結果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有田克萊琪協定，這協定承認日本在中國有充份的交戰權利，維持中國佔領區中的「和平與秩序」，最後英國並答應不妨礙日本「對付敵人」的行動。這協定的意義，會由日本紀事報（英國在日本的報紙）加以說明，說「英國對華政策的目的，只是為了保持英國的權益，而並非妨礙日本的軍事侵略。」依照有田克萊琪協定，英國未來對華政策，也會由該報解釋如下：

「事實上，英國過去支持中國國民政府的法幣，並不能算是破壞中立，如果英國為要與日本妥協，突然停止了這種支持，也同樣不能算是破壞中立。」

英國的要求談判，和以後有田克萊琪協定的成立，表示英國的「中立」政策，現在已進而要支持日本摧毀所謂佔領區中的中國抗戰的企圖了。尤其重要的是英國一面表明與日本就整個中國問題成立妥協，一面却又要求把這協定只在華北開始實施。在日本強迫中國投降的計畫中，關於華北、內蒙和西北區域的計畫是特別來得重要，因為這跟日本作為「遠東反共聯盟」領袖的使命以及「遠東慕尼黑」的計畫，都是有關係的。這特別是日本軍部的計畫，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都稱「華北和內蒙區域」為「反共區域」。反英運動在天津進行，同時又配合了日本對滿蒙邊境的武力進攻，以試驗英國對於日本在「華北區域」特別要求的態度，日本的計畫是想使「中國事件」達到慕尼黑一樣的解決。日本也想從這試驗英法蘇談判對於英國在遠東態度的影響，那時候，為了聯合抵抗德國的三國談判，正在莫斯科舉行呢。東京談判證明了英國政府願意與日本在北方合作，以鼓勵日本反共的計畫。在另一方面，東京談判又表明英國於華中、華南的佔領區域中支持日本之外，同時又堅持美法的利益也必須顧到。有田克萊琪協定成立兩天後，美國就咨照日本，美日商約在咨照日起六個月後失效。日本報紙認為美國這種宣告，是一種「增強英國態度」的姿勢，因為美國覺得「英國在東京會議中讓步太多了」（大阪每日和東京每日）。在重慶，美日商約廢止的咨照，被稱為美國反對日本以及反對英國「對日妥協」的一種行動。但英國的態度只「增強」到某種限度，即她拒絕日本要求拿有田克萊琪協定應用於華北範圍以外的英日問題，如果美法的利益不被考慮的話。至於英國準備在有田克萊琪協定基礎上解決華北問題的態度，却絲毫沒有變更。在這點上，就英

國看來，美國的宣告並不足為繼續全面談判的阻礙，倒是因為日本反對這樣有限制的談判，這纔使華北問題不能解決。美國方面從未發表宣言或聲明，來反對英國與日本單獨解決華北問題。相反的，在天津封鎖和東京談判開始的時期中，美國也曾表示她並非不關切英日對於華北問題的解決。然而，當英國「讓步太多」之後，美國政府却出來阻止這種解決辦法了，因為這種解決辦法以中國領土的完整為犧牲，而對蘇聯的威脅還要在造成對美國在遠東和太平洋利益的更嚴重的威脅之後。

英國準備在東京談判中對日讓步的是什麼？英國在日本的唯一報紙，日本紀事報，曾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七月間的社論中說起過。據它所說，英國準備同意的是天津的英租界，「可以作為日本佔領區域的一個單位。」這就是說，英國當局可使他們在天津的義務，「比嚴格的中立更受拘束，」並且願意承認「主權暫時交給佔領的軍隊。」英國又準備在中國其他的英租界中「對日本要求作很大的退讓。」英國也承認（在有田克萊琪協定中）她「有不妨礙日本在佔領區中採取安全措施之義務。」據該報所解釋，那「安全措施」也許包括禁止中國國幣在「佔領區」中的流通。在英國下院的辯論中，有人主張支持中國的法幣，因為日本正在破壞中國通貨，以破壞華北廣大遊擊區中農民對於中國法幣的信任。日本紀事報反駁這種意見，認為這將影響「佔領區域」中的一「安全措施」。關於這種一切日本在「佔領區」中「主權」的問題，英國租界當局基於對日「安全措施」的合作，是準備同意的，甚至即使「放棄了英國的天津租界以及她在華北所有的利益。」談判中唯一「真正的障礙」是「更

廣泛的要求，即對於國民政府的一切支持，都應停止。」

日美商約廢止的宣布，就是爲了阻止英國對這一更廣泛的要求，「再作讓步。在這關頭，美國拿行動來反對英國談判華北以外的問題。美國對於這方面的見解，曾由美國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C. Grew）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東京日美協會席上演說中加以說明，據路透社電傳這次演詞的要點如下：

「對於日本軍隊今天在中國所做的有幾件事情，如破壞美國在華的權利和合法利益等，美國是感到強烈憤激的。」

東亞的新秩序「顯將剝奪美國人在華長久建立的權利，這是美國人民所反對的。」

「美國人對於日本在華軍隊的破壞和干涉美國的利益，以及不顧各國和日本所簽訂的條約，已日益認爲嚴重。」

美國的人民感到「現行遠東的趨向如果繼續下去，必將破壞他們所切盼的一個有秩序世界的發展的希望。」

美國知道，「日本爲了她自己的利益，正竭力在亞洲大陸的廣大區域中，建立統治，並在那裏樹起一種封鎖經濟的制度。」

「這是我的信條，也就是美國政府和人民信條，即日本代理人所做損害美國的許多事情，是全然不需要

的。我們相信，遠東的真正安全和穩定，只有不反對美國的任何利益，纔能達到。」

同盟社認爲美國大使的演說，不啻表示「促成現行日美關係的因素，是可以建設的步驟來加以改善。」還有，大使又否認「美國對於中日事件採取一種「遵法主義」的態度。最後，同盟的報告又摘引格魯的一段演詞如下：

「在民族的家庭中……爭執是不能免的，但美國却會在困難的時期和關頭，一而再的向日本表示了實際的同情和援助的願望。」

在日本對華不宣而戰的第三年，格魯大使發表了這樣關於美國政策的聲明，這自然是很重要的。把它概括起來，我們就可以看出美國大使在這裏提醒着日本，美國對於「日本軍隊在中國所做的有幾件事，」感到強烈的憤激。這些「事情」特別是：（一）在日本對華軍事行動中，破壞美國的利益，而在「東亞新秩序」中剝奪了美國人在華長期建立的權利；（二）日本竭力在「亞洲大陸的廣大區域中」建立統治，並在那裏樹立一種封鎖經濟的制度。「美國大使可沒有說起「日本軍隊今天在中國所做的」其他的「事情」，因爲對於這些，美國是並不憤激的。

這個聲明是美國對日本企圖與英國妥協「解決中國事情」而排斥美國的答覆。這說明了美國自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以來所採取的「中立」政策，並沒有重要的改變。它沒有講到中華民族英勇的抗戰，它正爲着保障九

國公約而戰，爲着迫使日本「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行政的完整」而戰。這個聲明，事實上說明美國願意與侵略者談判美國權益在「東亞新秩序」中的保障問題，只要日本不在「亞洲大陸的廣大區域中」建立獨霸的統治和封鎖經濟。這就是美國支持日本造成「遠東真正的安全和穩定」的條件，那是以中國北方的領土爲犧牲，並使日本在反蘇方向上有更大的行動自由。

#### 第四章 「中立」國家的兩面性政策

在一九三一年至三二年，以及由一九三七年到現在的日本侵華戰爭中，「國聯盟約」與「九國公約」都不是日本的敵手。國聯的創立，以及國聯政策的形成，都是爲着英法的利益，他們以這來保持歐洲的均勢，和劃分歐洲以外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利益範圍。因此，國聯的目的主要是保持協約國在大戰中獲得的權利，而不是保障弱小國家的真正的安全。根據日本紀事報的徵引，英國首相張伯倫，在保守黨會議中，駁斥當時外相艾登的主張時，曾說集體安全者，乃是「仲夏的癡狂症」。

當日本一九三一年進佔滿洲時，英國政府曾勸告南京政府和滿洲的中國當局，不要以武力抗拒日本的侵略，而聽任英國在國聯與美國協助之下，出任調停。在英國佈置之下，這種調停一方面是要使中國承認日本在滿的特殊利益，包括容許日本有在當地建立反蘇「防務」的權利，另一方面又要求日本承認中國在滿的「宗主權」。英

國這種政策，以及依據着這種政策的國聯的「行動」和「調查」，其直接的結果，就是國聯不唯不以集體的行動制裁日本，甚且不願鼓勵中國抗拒日本的侵略；同時，英國又以國聯的「調查」爲口實，拒絕美國一九三二年對之提出的共同維護九國公約的要求。這些都是舉世週知的事實。

在一九三一年，英國的遠東政策是利用國聯，避免維護九國公約反對日本等牽累。在一九三七年，英國的歐洲政策，則主張不承認歐洲危機與遠東戰爭相互間的關聯，這就是說，英國現在又害怕因國聯處理遠東戰爭而受到牽累了。在這時候，英國的政策是把整個事件由國聯卸給美國，也就是把這事件由歐洲推至太平洋。在這時候，英國才記起美國是最關心九國公約的國家。然而英國並不願意和美國充分合作，以共同強迫日本尊重公約，牠只是把保護在華利益的重担推給美國而已。此外，英國又請求中國不要抵抗日本在華北的侵略，藉以限制美國任何依據九國公約的行動。一九三一年英國會要求中國信賴國聯，現在情形已不相同，所以英國不唯勸告中國不要訴之國聯，甚至公開警告中國，不要希望國聯的任何援助，也不要希望英國會干涉日本的侵略華北，理由就是歐洲和地中海的危機，已使英國無暇考慮牠在遠東的義務。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的處境比一九三一年還要困難。中國會希望以九國公約來制裁日本，但英國既不願意與美國合作，這希望就沒有實現的可能。英國的有事於歐洲的藉口，現在已進一步成爲牠不敢觸犯日本的理由了。

因此，英國反對國聯有所行動，也反對維護九國公約。中國對國聯的申請，如譴責侵略和援助抗戰等，英國首先

要看這些申請能夠怎樣處置，然後才能有所決定。此外，英國最就心的就是如何阻止國聯的決定，不至使英國受累。因為，日內瓦中國代表的代表團，每次都得到蘇聯代表團的極大的支持。

國聯爲什麼不能有效地援助中國呢？有人說，國聯本質上既是一個歐洲國家的組織，牠要在遠東組成一個有效的列強反日陣線，就特別困難；又有人說，這是因爲日本一九三七年已退出國聯的緣故。前一說根本不合事實，後一說更加滑稽，因爲國聯早就在一九三一年失敗了，當時日本還是牠的盟國之一。老實說，不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被侵略國之能否得到國聯的援助，時常要看主要會員國願否厲行決議，以確保盟約的尊嚴。一九三一年國聯之所以失敗，是由於在華擁有最大利益的歐洲強國，也即國聯的領袖會員國的英法，在日本侵略中國時，拒絕將盟約付之實施的緣故。假如牠們當時忠於盟約，他們一定可以得到美國方面的幫助。一九三一年美國已表示願意在遠東衝突中支持國聯的行動，一九三二年又會直接向英國提議，共同反對日本，以維護九國公約的完整。再次，假如國聯在一九三七年不受英法兩國的阻撓，那麼，在美國同時也在蘇聯支持之下的中國的申請，一定也可以實現。其中特別是蘇聯，牠之加入國聯，爲的就是推進集體安全，主張以集體的行動制裁侵略者。但英法却反對任何這種行動，這就是國聯失敗的理由。

英法所採取的遠東政策，比之歐洲的還要更加違反集體安全，更加反對與被侵略者組成一反侵略的聯合戰線。英法一向都與日本合作，把中國當作一個半殖民地，同時又屢屢表示願意遵循他們傳統的遠東政策。假如日本

能尊重他們在華的權益，他們就可以與日本妥協，而以中國為犧牲，只有在他們覺得中國的抗戰，對他們是有利的，足以保護他們那被威脅的利益時，他們才會加以贊助，例如當日本的軍事行動由華北移至華南——他們擁有重大利益的所在——時，他們才贊助和鼓勵中國的抗戰，並給予有限度的幫助。國聯至此也成爲一個有用的機構，在英法默許之下，牠會籲請各會員國，在救濟工作和物資等方面援助中國。英國也設立中英匯兌平準基金，以支持中國的法幣。然而，無論如何，英法還是沒有放棄中立的和干涉的政策。因此，英法這種舉動，雖然大有助於中國的抗戰，但牠與推行集體安全制裁侵略以幫助中國的方式，也即國聯盟約向一切的會員國保證的方式，還有極大的距離。

英法在國聯，和通過國聯而實現的此項政策，並不是保證國聯援華諾言的履行，相反，他們倒以中國的抗戰作爲他們與侵略者討價還價，藉以迫使日本尊重他們的權益的張本。他們把國聯當作一個便利的機關，可以爲他們本身的利益而相當援助中國。這援助是使中國的抗戰繼續到與英法的利益不相違背時爲止，繼續到與他們的中立政策和干涉政策不相抵觸時爲止。因此他們對被侵略者的援助，可以隨時變爲對侵略者的援助，這就是說，當這種政策的目的業已達到時，當侵略國家終於尊重列強的權益時，當侵略國家準備對有關列強讓步，以引誘他們放棄援華政策而與他們沆瀣一氣時，他們就可以由援助被侵略者一變而援助侵略者。在這時候，英法就重新與日本合作，（這合作過去會時常地或部分地爲日本的軍事行動所阻撓，）而以中國爲他們的犧牲。這合作的第一步，

就是運用他們的勢力與侵略者共同促成「和平」。如果這一企圖被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決心所挫抑，他們就會悍然承認既成事實，而與侵略者協力創立「和平與秩序」。自一九三一年來，國聯的一再失敗，侵略國的一再勝利，先後佔領了——依時間先後說——滿洲、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國的一部份、奧地利、捷克、阿爾巴尼亞以及波蘭，其主要原因，就是英法背棄集體安全的制度。假如一九三七年以後中國政府未曾採取獨立的政策，中國人民未曾建立抗戰的統一戰線，那麼英法的政策和國聯的失敗，就可能使中國付出若干弱小國家所已付出的慘重的代價，即由失敗和降服而召致國家的滅亡。自然，中國今後如若放棄其獨立的政策，而聽任英法支配中國的政策的話，那麼中國還是有亡國滅種的危險的。

在形式上，國聯盟約承認一切會員國，不分強弱，其國家的主權與獨立一律平等，於是以牠為工具的強國，時常感到困憊，因為弱國居然也跟強國一樣的要求國聯考慮他們切身的利益。然而英法這些強國，只有在他們本身的支配勢力與安全需要利用國聯時，才使國聯有所行動。被侵略國應否抵抗，要看英法的政策如何而定，假如應該抵抗，也應該以英法的政策為歸趨，即使這政策與被侵略國的利益相違背，還是如此。在英法等強國把持之下，國聯本身已越來越發空虛，越來越發無用，甚至從保護強國本身的利益的立場上說，也是如此。

至於九國公約，從草創的時候起，就與國聯的盟約不同，牠根本不承認中國有與該約的各簽字國相等的地位。中國在該約的簽署，實際上是承認其他簽字國——主要是美英法日四國——加之於中國的共同保護國的地位。

這公約的締結，含有兩個政治上的目的：第一，以美國領導的海軍列強（包括美國及英法）的聯合勢力，以他們巨大的金融上的勢力，來抑止日本在遠東更廣泛一點說，在太平洋的擴展；第二，以聯合各個有關列強，而由美國領導的中國保護制，來代替英法日的劃分在華勢力範圍的政策。此項勢力範圍的劃分，（日本在滿洲，英法在華，中華南，）華盛頓公約並未加以廢除。這公約的形成，僅是，而且僅在名義上是有關各國的約束，牠包含若干除中國外其他各簽字國應當「遵守」的政治條件，並共同強迫中國履行牠對各簽字國的義務，俾中國成爲一個統一而完整的投資市場，以接受美國領導下的財政「銀行團」給予中國政府的大規模的借款。

因此，這個所謂「新銀行團」（New Consortium），是美國用來代替前英國所領導的「銀行團」，藉以阻撓日本給予華北軍閥的祕密借款，並使美國資本對華的投資，能與美國戰後在世界金融市場的領導地位相適合的。美國經濟學家C·F·李麥在所著各國在華的投資（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一書中，就曾強調華盛頓九國會議與新銀行團相互間的密切關係，他說：

「當時的趨勢，在政治上既產生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九國會議，在金融上，也就形成了「新銀行團」。在這兩種情形下，美國的新地位使美國人捷足先登；在這兩種情形下，日本的新地位造成了重大的問題。」（註）

（註）見一九三三年紐約出版 C·F·Remer 所作各國在華投資第三三〇頁。

事實上，華盛頓的遠東政策在金融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所以均遭失敗，其主要原因倒不是由於「重大的問題」，由於而是「次要的問題」，即英國的兩面合作政策所促成。英國一面與日本共同反對美國，一面又和美國共同反對日本，而前者比後者還要着重。「新銀行團」就是因為英日兩方的怠工才流產的。在一九三〇年年底，英日兩國各佔中國政府債權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一點八和百分之三十一點五。法國佔百分之十三點七，再次是比利時和義大利兩國，美國則屈居第六位，僅佔百分之五點九。自一九三〇年以後，英國爲着繼續操縱中國的關稅和鹽稅，以及在金融上控制大部分的鐵路特權，又應允中國政府動用流通內債的餘款，因此，牠的百分比就越發增加，而美國領導下的銀行團的放款可能性，也就越發減少。

在中國方面，牠當然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反對華盛頓的銀行團，因爲牠跟前時英國的銀行團一樣，都是世界最大的金融國家對中國施行半殖民地剝削的工具。中國簡直就是這些強國（如英法與日本）的殖民帝國的一部份。根據「新銀行團」規定的條文，給予中國政府而由中國稅收担保的外債，必須由英法日四國共同參加。中國的主權與獨立既受了不平等條約的蹂躪，而帝國主義各國在華的利益又復根深蒂固，那麼，這新銀行團如果能够成功，也不外是世界各帝國主義列強，在剝削中國和壓抑中國的民族獨立運動上取得一致而已。

九國公約本身，也必然要遭遇與新銀行團相同的命運。牠從未在實際上有效地制止帝國主義的更進一步侵入中國，更未能制止日本勢力在華北的擴張，而最後，又只有聽任日本對整個中國進行侵略。華盛頓公約也從未會

幫助中國恢復主權，和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這一方面的若干成就，完全得力於國共統一戰線領導下的中國民族的民族革命鬥爭。）甚至協定中所作的諾言，如海關稅率的提高，關稅的自主，和各國治外法權的修正等，也要經過好幾年的耽擱，方才加以設定。而法國政府甚至還以簽署協定作為勒索的工具，強迫中國政府接受牠的要求，將法國對華借款票面總額，依照金法郎計算。這種事實，說明了華盛頓協定雖然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簽署，但要到一九二五年夏天，方才生效。

一九二五年，北京政府因為恐畏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漲，曾以節略致送華盛頓條約各簽字國，要求迅速修正不平等條約。英國在覆文中，當即表示：各國對修正條約所採取的延擱方法，英國未便加以干涉，同時又警告中國，不要忘記他在華盛頓所擔承的義務，覆文中這樣說：

「……敝國政府深信，處理是項問題（即關於修改條約之各項問題）的最恰當的方法，即為忠實地週密地遵行在大會中所擔承的義務。」（註）

當時，即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時期中，英國對華政策最拿手的，就是要中國「忠實地週密地遵行在大會中所擔承的義務。」這種利用九國公約的陰謀，在一九二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所發表的聲明中，會有這樣的敘述：

（註）引自一九一六——二七年中國年鑑第九三七頁。

「英國及其他各國的對華政策的一切聲明，其主要假定，即爲中國無法照顧牠本身的利益，同時，爲實踐「華盛頓會議的精神」以「保護牠的主權與獨立，促進政治的與經濟的發展以及財政的重建」起見，英國及其他各國，不能不參加尊重中國的自制的規例。」（註）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由上海發至倫敦的備忘錄，更具體地說明了英國對中國的假定。這備忘錄抗議英國不應對中國的要求過分妥協，並指出在英國特權之下，「中國不唯未遭損害，相反，牠在商業上，財政上以及安全上，業已獲得了極大的利益。」依照英日兩國的政策，九國公約的唯一作用，就是用以提醒中國勿忘信託「各有關友邦」以促進牠的「政治的與經濟的發展以及財政的重建」此一義務。然而，其他各國在華盛頓會中所坦承的義務，也即各國對於中國的義務，事實上却全未受到尊重，日本的悍然侵華，以及其他各簽字國的未能應用條約制裁日本，就是一例。

華盛頓協定的主要背景，是美國運用牠的制先權，以保證牠在遠東的利益。美國的目的是開放中國門戶，在華機會均等。因爲牠在華的商業和貿易，特別是金融的投資，一方面爲日本在華北的特殊勢力範圍和日本的隨海軍擴張政策所封鎖；另一方面，英國又是中國政府的主要債主，並控制了中國各項主要的稅源。在華盛頓會議時，與遠東及中國問題最有密切關係的，是美國限制日本海軍力的計劃。這計劃目的在使美國成爲太平洋最強大的海軍

（註）一九二六年中國年鑑第七六二頁。

國家，用以確保美國的地位。爲着促進這些利益，美國決定在遠東取得英國的好感，結果，美國的政策實際上成了英國政策的附庸，成爲保護遠東的以及整個東亞的英國利益的工具。

老實說，只有英國在華的特權，受到中國民族獨立鬥爭的威脅時，英國才堅持尊重九國公約。她始終反對以九國公約來阻制日本在華的侵略以及與日本海軍在中國海的擴張。然而後一威脅，無論如何，却是美國企圖實現華盛頓協定的一個主要原因。由於英國的政策承認日本有侵略滿洲、華北和內蒙的「特殊權利」——這只是牠鼓勵日本作反蘇的帝國主義冒險的政策的一部份——於是牠阻止以九國公約作爲遠東並包括中蘇兩國的集體安全協定的一個環節。但另一方面，如果美國願意在日本進行軍事侵略時，憑藉牠的海軍，負起遠東警察的職務，以保護美英兩國在華的利益和投資（英國的要比美國的大得多），從而引起了美日的軍事衝突的話，英國也不會加以反對。在美日發生衝突時，美國從英國處所能得到的援助，大概只有調停，而這調停也是出之自私的目的，即利用美國對日的壓力，以犧牲別國的利益來促成英日的妥協。在英國這種遠東政策以及在美國追求英美合作的政策之下，九國公約必然遇到死滅的命運。

現在，在英法兩國看來，九國公約已同國聯盟約差不多，與其說是對外政策的有用的工具，不如說是他們行動的絆腳石。當他們準備承認日本新的征服而與日本妥協時，這公約假如不能完全推翻，至少也須修正。九國公約和國聯盟約都已是「過時」的東西。日本目下之未敢貿然在形式上退出九國公約，只是害怕美國的報復。事實上，日

本的目的是以英日協定來對抗美國，迫美國同意「改正」九國公約。依照日本的計劃，這「改正」一「只」須刪去尊重「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及行政的完整」一句而已，而這「一修正」的報價，就是日本將與英、美金融資本家討論協助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機會」的問題。

日本這種「修正」九國公約的宣傳，在美國之內，也獲得各反動派包括所設「孤立派」的贊助。這些「孤立派」以「商業和金融」的名義，要求與日本妥協。例如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東京出版的當代日本月刊（Contemporary Japan）中年野尾間（Toshiya Ohama）已利用紐約商業時報（Journal of Commerce）對於美國在滿商業前途的如下的評論，作為他的論據：

「因為美國是一個比較高度發展的產業國家，特別注意於擴展海外貿易；又因為美國遲早必有大量資本再輸出，所以美國的商業與金融，都有意參加在商業的發達與金融的發展兩方面都擴張如此迅速的國家……假如當前沒有什麼不可超越的障礙，那麼在現制度下，為什麼美國對「滿洲國」的貿易不應大大增加，這是沒有根本的理由的。」

該文作者引用紐約商業時報這一段話，是用來證明美國與「滿洲國」間興盛的戰時貿易，已怎樣地使美國人認清了日軍在華的軍事佔領，對於日美貿易和美國投資，正是一極好的事件。在當代日本的下一期中，又引用

（註）年野尾間是日本中外商業新報的總編輯，該文題為「美國在華的冒險」譯者

了美國耶魯大學教授 A. W. 格里斯華德 (A. W. Griswold) 的近作美國的遠東政策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United States) 作爲進一步的證明，特別是作者所得如下的結論：

「由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三六年，美國一再不斷爲維持中國的完整而努力，但每一次都遭失敗，由此得到什麼結果呢？危害了美國本身的領土的完整安全（因爲牠跟那個最可能進攻菲律賓的國家敵對），鼓勵了中國愛國份子希望——假如不是倚賴——美國的援助，但這援助却從未實現過；阻礙了美國商業和投資在遠東的最有利的趨向，因爲這趨向自一九三〇年之後是傾於日本而不是趨於中國；此外，牠又在美日兩國之間，挑起了海軍的敵對，使美國經過東亞的後門而陷入歐洲的政治糾紛中。」

美國對日的貿易和日本近年來在佔領區內的獨佔，其真正的特徵，在美國駐華商業參贊安諾德 (Julian Arnold) 所作中國的命運與美國的未來一文中，就有詳細的說明。作者依據如下的事實，質問美國是否是一「日本的盟國」

- 「一近數年來我國對日的巨量輸出，都是軍火或是日本軍需工業所需的物品。
- 「二近兩年來，我國對滿輸出的增加……依據滿洲官方的報告，這些輸出品差不多都是軍火。
- 「三我國向日軍佔領區的日本商行購買中國物品，正進一步幫助日本多置軍火。日本用不能贖回的而不能交換的軍用票，或不能兌現的紙幣購買這些生產品，而我們却不能不以美國錢付給他們，因此又幫助他

們得到外匯。」

作者又在文中駁斥那些以「商業與金融」的名義贊成與日本妥協的美國人的詭論：

「有人正在欺瞞美國，叫美國相信日本化的中國，將有很好的覺悟可做……我們將被邀請供給資本和配備，幫同日本破壞我們工資的數量和生活的水準。其次，日本將來最關心的，是在亞洲大陸建立起他們的軍需工業，因此，也將邀請我們投資，就像我們向來幫助日本在滿洲建立起軍需工業一樣……」

「在日本化的中國之下，美國在華的二萬萬五千萬美金的投資，將不絕如縷。由於在華的一切輸出輸入，必須經過日本商行之手，我們的銀行，保險公司，郵船公司，以及其他的服務組織，這些目前在我們的無形貿易中成爲重要部門的事業，必然要跟我們在滿洲的公司一樣，這就是說，掃數被人逐出。

「美國利益在這方面所受的直接間接的損失，合起來要比我們跟日本作許多年的貿易的總額還要多。」

這篇文章，是日本武力侵華以來論述美國地位的最主要的文件之一，而他提出的主要問題是這樣的：

「我們將貸款給中國，促進建設的發展，從而保存了我們在太平洋的未來呢，還是繼續給予日本如上種種幫助，增進了日本的過量的軍事負擔的野心，從而危害了我們在太平洋的整個未來呢？」

（註）該文發表於一九三九年六月紐約出版的雜誌美亞月刊原題爲：「China's Fate and America's Future」。

在中國擁有治外法權的各有關強國中，只有美國在華沒有租界和所謂租借地。英國領導下的上海公共租界，美國人則分有一部份行政權，駐有保護美僑的海軍陸戰隊，並有各國海軍戰隊託付給他們的一個特殊「防區」。但美國的政策却反對其他各國所採取的劃分在華勢力範圍的政策，因此一般說來，牠也反對設立外國租界。美國在華所採取的政策，依照一九二六年華盛頓國務院所發表的宣言說來，是保證美僑與「其他各國僑居於中國的

外人有機會均等的，同時在「不需特權，獨佔或特殊的利益範圍與勢力範圍的情形下，獲得合法的業務」的權利。依照前述安諾德所作一文，在一九三七年前五年中，美國在華貿易，不論輸出或輸入，都佔居第一位。其中輸出約佔百分之三十，輸入則為百分之二十，輸出的主要是製造品和農業物品，輸入的大半是原料或半製造品，都是美國製造工業所必需的東西。此外，尚有若干無形的對華貿易的部門，如銀行，輪船，保險，旅行的用費，傳道的和政府的用費，維持四百家在華的工商業機關的用費，以及對華的投資等，單末後一項，其總額為二萬萬五千萬美元。

美國在華的投資，跟英國的和日本的比起來，自然比較的小。這的確是「獨佔」和「特殊利益範圍」的制度所造成的，而美國就正想用「機會均等」來代替牠。美國投資的最大部份集中於上海，而上海也是美國對華貿易的中心。在日本開始武力侵華以前，上海的條件保證美國可以和英、德、日等國「機會均等」；除開與中國政府的借款和大規模的鐵路經營而外。這一事實有力地說明了美國商務企業在上海的堅強地位及其不斷發展的可能。此外，這一事實又指出，假如中國能統一獨立，沒有外國的「特權，獨佔，或是特殊的利益範圍與勢力範圍」，那麼，巨大

的中國市場將給與美國的商務和投資以極大的發展前途。

美國對華的商務和投資，其巨大前途，自一九三七年起，已爲日本的軍事行動所摧毀，而且由於各有關「中立」國家的政策屢屢幫助了日本，日軍摧毀的範圍也就日見廣大。關於這一點，安諾德在該文中曾指出：

「在一九三七年年初，中國建設工作的進行已十分順手，假如牠有機會繼續執行其近代化的建設計劃，那麼隨之而至的巨大貿易，必然要使全世界震驚。這計劃預示牠對於資金有極大的需要，因爲這是進行建設所必需的……」

「在華的四百家美國商行，在一九三七年初，都異口同聲的揚言中國已現出前所未有的最有希望的景象，這將是一個記錄的年頭，而且往後各年還要有更好的機會。」

「一個自由地創造牠本身的命運的中國，在二二十年之內，無疑地將給予極大的，超過日本以及大多數其他各國所能給予的機會，牠可能使我們對華的出口貿易，十倍於一九三六年。」

「這樣，一九三七年年初，就是美國剛剛正要大規模地獲得中國巨大的近代化建設計劃的潛能力的時候。」

美國要實現牠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政策，除開積極援助中國抗戰，使牠獲得決定勝利——即擊退日本侵略，收復全部失地，獲得充分獨立——別無他法。中國的這種勝利，必然抑止了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

而這正是美蘇和中國都極關切的共同目的實現至於抑止日本海軍力在太平洋的擴張（這對於美國同樣也對於英法兩國，仍然是直接的和最關切的事情），中國的打退日本侵略，獲得最後勝利，不惟是美國在遠東不會陷於孤立的必要條件，而且是重要的保障。要把英法逐出遠東，事實上並不如何困難，假如英法繼續採取「綏靖」日本的政策的話。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只有憑藉內地的人民與其陸軍從事持久戰爭，以擊退日本的侵略，而在海上及沿海各地，各有關國家——主要的當然是美國——必須以充分的壓力和行動來援助中國。如果這種援助未能實現，中國在目下戰爭中，也許將被迫把牠的軍事任務限於陸地的收復，如牠目前的戰略所作的一樣。當有關的各國「中立」國家，應允日本佔領他們前時會強迫中國放棄的沿海各地時，中國自然只好將主要的防禦移至內地，特別因為牠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自從被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海軍擊敗了和「開放了」之後，完全剝奪了牠建立海軍，和在海口設防，以鞏衛牠的主要港口的可能。

然而，中國目前雖然沒有海軍，而且受到各有關的「中立」國家的政策的阻礙，未能防衛牠的領海及沿岸，但牠還不是薄弱到只好任隨各個「中立」國家擺佈，被他們作為與侵略者謀妥協的禮物。中國有堅定地建立在愛國主義之上的統一，有軍隊與人民武裝隊伍的復興民族的精神，有統一的陸軍以及進行持久抗戰，以對抗巨大軍事國家如日本的能力。中國還很能夠運用牠外交的和經濟的手段，使企圖陰謀出賣中國本身重要民族利益的有關各列強，感到極大的不安。認識了本身的力量，的新中國的興起，已使牠成為遠東勢力均衡中一個重要的因素。蘇

聯的堅強地位和牠在遠東的堅強的防務，也是一個完全有利於中國的抗戰的重要因素。就牠目下國內的和國際的情況而論，中國已不再是被迫聽任遠東的政治均衡完全操在各帝國主義國家手裏的中國了。中國的立場究竟是友邦與盟國，是對立的力量與敵人，對於未來遠東勢力均衡將有着極大的影響——這一事實，那些有關的「中立」國家，似乎還沒有瞭解。中國對美國、英國、法國的立場，將為這些國家和他們的利益在中國反侵略鬥爭中所取的態度所決定。

英法兩國的遠東政策，一向都以犧牲中國和蘇聯的領土，來補償日本，藉以保存他們在遠東的利益和領土。這荒唐的幻想，不只威脅了中國，並且威脅美國在遠東的和整個太平洋的利益，而最後也必然威脅英法兩國本身。在這幻想之後，又有着避免遠東和太平洋殖民地再分割的計劃，他們企圖以中國「綏靖」日本，由英法承認日本是個控制東亞的遠東部份的帝國主義國家，以交換日本承認英法對東亞的其他部份的控制，並把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完全加以排除。但牠們之採取此一幻想的政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理由：英法雖然害怕日本的擴張，但他們更怕中國的民族獨立戰爭獲得勝利。他們恐怕這種勝利鼓舞了亞洲的民族解放的浪潮，他們目下正在各自的殖民地中竭力抑壓這一運動。此外還有一個理由，這就是他們一方面對日本作為東方保護者的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使命，非常同情關心，另一方面又私自希望日蘇兩國引起戰爭，使兩方都弄得精疲力盡。就這一點言，在英法以及美國的反動的和帝國主義的利益中是一致的。

各有關的「中立」國家，在遠東戰爭中之所以採取兩重政策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們認為日本是蘇聯在亞洲的強敵。假如日本可以有資格進行嚴重的反蘇戰爭，那麼，就不應當叫牠在侵華戰爭遭到失敗。日本當局是充分認識他們的國外鼓勵者對這種思想的重視的，因此日本軍閥就時時在蘇蒙邊境進行「戰爭」。這些「事件」都是有力的提醒，其用意是在警告英法美等國的保守的政治家們說：「記着吧，我們是可能和布爾塞維克開戰的。當你們正在考慮幫助中國時，要當心，別叫你們自己也幫助了布爾塞維克。」

這裏有一個有趣的例子，可以證明日本在敵對各國——特別是美國——的反動階層中所傳播的那種理由，是多麼容易提供，又是多麼容易叫人相信。這就是一九三九年五月紐約時報的東京訪員的一篇報告。那訪員在文中說，當日本差不多已把整個中國海變為日本的內海時，牠却忘記了距離日本咫尺的日本海。他說：「在日本人看來，海參崴是一支瞄向日本的俄國手槍。」而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就是「必須保護本身，免受蘇聯的干涉，因為蘇聯是在地理上唯一能够直接對華行動的強國。」於是作者進而相信侵華戰爭的主要目的，是使日本「獲得牠在戰爭中所欲獲得的保證——經濟上的保證，如獲得中國的資源與市場，軍事上的保證，如能深入俄國戰線，俾日本將帥得以切斷俄國那支威脅的手臂——以使牠的大陸政策合理化。」作者的結論是很明顯的：爲着使日本有與蘇聯作戰的可能與「保證」，讓牠佔有「中國的資源與市場」吧！

總括說來，有關各「中立」國家這種兩面政策，即一面企圖阻抑日本，同時又想以限制和孤立中國的抗戰，和

反對集體安全制度來幫助和鼓勵日本的侵略的政策，其結果與「成就」就是使日本現在已在中國的世界貿易中，佔了最主要的地位。中國的持久抗戰，已大大地削弱了日本的實力，但與日本敵對的各國的兩面政策，却使日本能够給英法在遠東的利益一個沉重的打擊。

各國之採取這一政策，是企圖挽救他們在華的利益和租界的。但是結果怎樣呢？純靠自力的中國抗戰，事實上並非是防衛各國在華特權的戰爭，因為那些特權的作用是在束縛和剝奪中國的民族獨立，使牠永淪於半殖民地的狀態。但中國的抗戰却給予各國極好的機會和極大的便利以保衛他們在華的利益與特權。各國的利益對侵略者的抗拒，配合着中國本身的民族解放戰爭，結果當能以善意的中國自願的新協定，來代替前此那剝奪中國的獨立的特權。然而有關各國却一面要中國保護他們的特權與條約權利，一面又允許日本侵略軍將通商口岸與外國租界視爲他的「佔領區」。他們又承認日本製造的傀儡政權與市政組織是「事實上的當局」，並答應他們僭奪海關行政與稅款。最後他們竟公然承認日本享有交戰國的權利，以及牠的軍隊有在佔領區建立「和平與秩序」的使命。這種政策只有損毀各有關「中立」國家的地位，而他們的特權與利益恰正在這地位上面。因此，不管日本侵略的最後結果爲如何，他們事實上只在危害本身的特殊地位與特殊權利而已。

這政策的最荒謬的臆想之一，就是以爲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日本在華北的侵略，並不像對日本在中國其他各處的侵略那麼重視。日本的進攻華北與內蒙，猶如牠對滿洲的侵略一樣，被解釋爲「防禦」蘇聯的「威脅」的手

段，因此中國政府應應當交出華北與內蒙，作爲「綏靖」整個東亞的代價。結果怎麼樣呢？中國當然不會承認在華北與本國其他部份間有着這樣的差別，牠公開表示，抗戰的目的在收回一切失地，和維護本國領土的完整。現在華北前綫的抗戰，是中國抗戰中最英勇的部份。日本侵略軍在華北各省中，已遇到中國部隊的統一戰線——其中有中國最善作游擊戰的著名的八路軍——的打擊，而遭受了最慘重的損失。一切想把華北作爲第二個「滿洲國」的妄想，都已給當地英勇的鬥爭粉碎了。

日本自稱進攻中國爲進攻蘇聯的先聲，此種說法跟上述的兩面政策是十分吻合的。照他們所說的看來，中國的抗戰已變成了在中國領土上以中國士兵作戰的蘇日戰爭。那麼，這戰爭的第二階段，必然是蘇聯遠東軍的出面干涉，或是日本的進攻蘇聯。「中立國」對這戰爭雖然知道得很清楚，但他們仍然希望有一天，可怕的布爾塞維克與「矮鬼」兩方在遠東會做到這一看，叫他們開心滿意。然而，蘇聯可不願意攔進他們事先精心佈成的這個圈套。牠的政策是在中國抗戰中援助中國，增進蘇兩國的友誼，並給予物質與技術的幫助。同時，蘇聯又採取一切預防的方策，以擊退日本在蘇邊界的各種挑釁，防禦可能的進攻，和保護本國的和平。最後，在張鼓峯和諾蒙亨衝突中，蘇聯又給予日本以慘重的打擊，使牠認識蘇聯的決心，而結束這爲外交詭謀所策動的挑釁的把戲。因此，企圖促使蘇日作戰的一切妄想，又招致了可恥的失敗。

事實上，這兩面政策的唯一的成就，就是日本已陷於消耗戰爭中而無法自拔。但這不只是由於各「中立國」

所抱的臆想，考實說，大半是由於中國持久戰戰略的成功。這戰略證明中國之不可征服，同時也告訴中國民衆，建在民族革命基礎上的抗日統一戰線，能使他們得到何種的成就。「中立」國家對後一結果是極不滿意的，現在他們正以幫助日本安定佔領區，並強迫中國與侵略者成立「和平」等手段來解救日本。他們希望日本對這些幫助會表示感激，希望牠準備着再來一次反蘇挑戰。然而，在這一點上，結果又將害了他們自己，而且這次可能是最大一次的傷害，因為這兩面政策的整個對象——日本、中國和蘇聯——都拆穿了這把戲而看透了他們的用心。

由英法兩國在侵華戰爭的第三年中所採取的政策看來，承認「佔領區」與擁護建在這基礎上的「和平」可使日本軍閥借助漢奸「新中央政權」的建立而迅速「解決中國事件」。但日本輿論界可沒有這種信心，他們覺得，甚至即使獲得英法的幫助，恐怕也沒有解決的希望。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都新聞會警告過，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他本身就是一個世界，「要由民衆不加信任的傀儡政府加以統治，很難有成功的希望。」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中外商業新報也這樣說：「希望日本政府解決中國事件上，不要過分借重新中央政權的合作，否則一定要感到失望。」

日本軍閥已領受了張鼓峯與諾蒙亨「事件」的教訓，而在華的長期戰爭，也已把他們征服中國的「事件」的失敗，清楚地告訴他們。但他們還要受到一些教訓，這就是說，只有爲中國的軍隊與民衆所信任的，並負有抗拒日本的侵略與收復一切失地的責任的國民政府，才是唯一有權替中國說話和決定和戰的政府。無論如何，日本方面

的失敗，並不是遠東戰爭逐漸促成的唯一的結果，牠還有另一個結果，那就是各有關「中立」國家所採取的兩面政策的完全失敗。

## 第五章 蘇聯與遠東戰爭

在創建革命的俄羅斯的初年，蘇聯遠東的領土，便已受到日本的侵略的威脅與直接的侵犯了。當時日本以「反共陣線」領導者的資格，在參與侵犯及封鎖的「大民主國」英法美積極援助之下，曾經進兵東西伯利亞。在日本，這為恢復新俄羅斯的「和平與秩序」的侵犯，以及協約國給與牠的援助，正是也從事大陸擴張，把西伯利亞東部與中國的東北部一道併入他的征服範圍的大好機會；而在英國，這侵犯不僅是反蘇的干涉戰爭，而且給了日本一條進到西伯利亞的出路。然而侵略者的西伯利亞冒險完全失敗，終於被逐出了蘇聯的領土。

因此蘇聯的政府和人民，遠在遠東侵略者先以「反共陣線」鞏固「自身，然後決定開始牠的征服中國的戰爭之前，就已警惕着了。第一個「反共同盟」包括日英法美四國，這不僅是宣傳的東西，而且作了認真的行動。第二個「反共同盟」則包括日德義三國，是為着向英法美勒索巨大的價錢，以作未來進行「反共」的「定洋」而組成的。歐洲與遠東的侵略者，年來掠奪英法美利益範圍的經過，已證實後者全都願意讓出價錢，只要這代價不礙及他們本身對世界的統治。

在這種國際形勢之下，我們就可以明白蘇聯共產黨的如下的見解：

「顯然，蘇聯不能對國際形勢的這一變動，閉着眼睛，也不能忽視這嚴重的事變。侵略者所發動的任何戰爭，不管牠是如何的小，對於和平國家總是一種威脅。已那麼「悄悄地」侵襲了許多國家，並波及了五萬萬人以上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對於一切國家，而首先就是對於蘇聯，必然是一個最重大的危險。德義日組成的「反共集團」已確鑿地證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國除一面繼續秉持和平政策外，並開始增強邊境的防務與紅陸海軍的戰鬥力。」（註）

爲着認識蘇聯外交政策的目的，原則與方法，我們必須了解已毀壞了沙皇制度，封建——資本帝國主義，以及舊俄政治建築所依賴的經濟制度的，俄國革命的特質與歷史過程。在一九〇四——〇五年，沙俄曾在滿洲與日本開戰，結果俄軍完全敗北。這失敗，以及遠征軍殘部退出滿洲時的叛變，完全由於沙俄制度本身內部的弱點與腐敗，而這正是一九〇五年崛起的革命大眾所欲掃除的東西。這革命的目的，是推翻當時的封建專制，建立民主的政府，但牠終爲沙俄制度所壓平。在一九一四——一七年，沙俄又聽從沙俄制度的債主法英兩國的囑咐，站在協約國方面，參予了另一個帝國主義戰爭，即爲爭奪巴爾幹的霸權，擊破奧匈與土耳其等帝國，和阻遏德國的向東擴張的戰爭。沙俄制度本來希望借這帝國主義的冒險，來避免另一次革命，但牠完全失敗了；事實上，這戰爭反而加速了崩潰。

（註）引自聯共黨史第十二章第一節

與革命的到來，當新的俄羅斯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權，會同前沙俄的將軍們，想繼續從事帝國主義戰爭，拒絕將土地自由與和平給予農民，工人和被壓迫大眾時，布爾塞維克黨便領導工人、農民與士兵，把革命推進至社會主義的階段，並建立了蘇維埃的政權。蘇維埃政府的初步工作之一，就是號召各交戰國的全體民衆，以強迫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由民衆的自決與各國間的友誼促成的和平，來結束帝國主義的屠殺戰爭。其次，又發表了俄羅斯民衆權利宣言，宣佈（一）俄羅斯民衆的平等與獨立；（二）自決的權利，包括分離的權利；（三）全體民衆，包括了少數民族的文化發展的自由。

自從一八二五年，第卡勃里叛變揭開了俄國革命民主行動的序幕爲後，沙俄制度會作過五次帝國主義戰爭，差不多跟牠在歐亞兩洲的一切鄰國交戰過，至於出兵掠奪鄰國（如中國）和壓服民族的與民主的革命（如一八四九年應奧匈帝國之請，派兵至匈牙利，協同專制政權的部隊勦平革命）都未計及。沙俄的野蠻制度，是歐洲最殘暴的反動的支柱，又是西方帝國主義者壓迫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工具與同盟，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聯合了俄國的工人、貧勞大眾和弱小民族的勝利的革命，不唯摧毀了封建的剝削與虐政，而且推翻了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的資本帝國主義。牠改變了一個抱着征服的和帝國主義冒險的外交政策的國家，而這政策正是爲沙俄君主專制和自由主義的帝制派的資產階級所珍愛的，用作爲排除更大的與更迫切的革命威脅的最後手段的政策。這新的革命國家在外交關係上的第一步動作，就是建立和平，而且自此之後，維持和平與反對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與

干涉，仍然是蘇維埃外交政策的最主要的目標。

侵略成性的日本軍閥，一向都把蘇聯這種外交政策，當作力量薄弱的表徵，而企圖向之進行包圍與侵略。但蘇聯却以嚴厲的打擊與堅強的邊境防務，叫他們曉得這大國雖對各國採取和平與友誼的政策，但牠還擁有充分的足以擊退和處罰侵略者的軍事力量。

關於蘇聯外交政策的原則與方法，史太林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在莫斯科聯共第十八次大會的報告中，曾作如下的說明：

「一、我們堅持和平，堅持與一切國家發生事務的聯繫；我們堅持着而且繼續堅持着這樣的立場，如果這些國家對蘇聯也保持同樣的態度，如果他們不企圖破壞我們的權益。

「二、對於同蘇聯有共同國境的一切鄰邦，我們堅持和平的，親近的，和睦的關係；我們堅持着而且繼續堅持着這樣的立場，如果這些國家對蘇聯也保持同樣的態度，如果他們不企圖直接或間接地破壞蘇聯國境的完整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利益。

「三、我們幫助那些被侵略者所侵略及爲他們自己祖國的獨立而鬥爭的國家。

「四、我們不怕侵略者的恐嚇，並準備以雙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企圖破壞蘇聯邊疆之安全的戰爭挑釁者。」

自從日本的西伯利亞冒險失敗之後，蘇聯的外交政策即不斷企圖與日本保持和平的關係。跟敵對的宣傳所虛構的情形完全相反，蘇聯從未存心進攻日本，牠的對日政策，倒時常是阻止和粉碎日本對蘇維埃領土的進攻。因為蘇聯已排棄了沙俄的帝國主義遠東政策，所以牠對華的關係，完全依據平等與友誼的原則，對日則要求牠尊重「蘇維埃國境的完整與不可侵犯」。只有在日本侵佔了中國東北鄰接蘇聯的數省，並且公然對蘇表示敵對形勢，日偽部隊屢次侵犯蘇聯邊境之後，蘇聯才集中力量，鞏固遠東邊防，保證牠免受日本的侵犯。此外，蘇聯政府又按照此一政策，向日本提議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但日本每次都加拒絕。爲了日本已與德義成立了一反共集團，並企圖壓迫中國加入反蘇「同盟」，使日本有在中國境內建立反蘇戰爭根據地的權利，於是蘇聯在與外蒙古締結互助公約之後，又和中國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

下面徵引的固若金湯的海參崴（安夫三島（Yosuo Mishima）作，登於東京的現代月刊上，以下係根據一九三八年九月紐約出版之現代月刊譯文）就是蘇聯用以驚醒日本軍閥的最有力的論據的記錄：

「單遠東一地，蘇維埃空軍共有飛機一千二百至一千三百架；而自中國事變爆發之後，蘇聯政府又已計劃作大量的增加……據估計，在海參崴及其周圍，至少集中蘇維埃遠東空軍的百分之三十的實力，即由四百至五百架。其中，約有一百架爲海軍機，二百架爲輕重轟炸機。這些用以轟炸日本的飛機，主要是「L.B.-3式」的，速率每小時一百七十五哩，航程達一千五百六十哩的四引擎重轟炸機。就我們所知道的說，這樣的飛機在

遼東至少有一百架……而前此集中於海參崴和伯力(Khabarovsk)的飛機，現在已分停在許多根據地與海參崴的地下機場中。

「(在海軍的準備方面)……蘇維埃遼東艦隊只有五隻驅逐艦，五〇至六〇隻潛水艇，六〇至七〇隻高速度的小水雷艇，和三十隻潛水驅逐艦，但沒有主力艦與巡洋艦。直至最近，始增加海防戰艦，砲艦和其他的特務艦。這些高速度的小水雷艇，實在很像馬蠅，只能殺害畜牲。至於潛水艇呢，六十隻的確是很多。依照最近的情報，一隻屬於黑海航隊的戰艦和二十隻以上的潛水艇，又已調至海參崴……」

「能够使蘇維埃海軍與蘇維埃空軍發揚其充分的戰鬥力的，是海空軍根據地與爲此護他們而設的砲台的建立。這些砲台裝有極大口徑的重砲，並有足以抗拒大砲與炸彈的鋼鐵與士敏土築成的砲壘，而其周圍更築有許多「托齊卡」(Точки 卽俄語的「據點」之謂)……防衛海參崴的重砲，其口徑在十六英吋以上，其威力之強大，足以抗拒日本的艦隊……其中必定還有二十英吋口徑的或甚至還要大的大砲……」

「所謂「托齊卡」是細小的砲壘，用厚由三呎至十呎以士敏土壁築成，能抗拒大砲與炸彈。其中配備着機關槍以抵抗步兵，又有大砲與地雷以拒坦克，同時並有防毒的設備。每隔一千五百或一千呎，就築有一個「托齊卡」，在整個戰線中，這些小砲壘密接相連，有如星羅棋佈。而第二線的「托齊卡」的配置，在使牠們足以補填第一線的缺口。一線之後，又有一線，有時甚至還有第四線。最後，在所有這些「托齊卡」戰線之後，就是

大砲的砲臺。後方與「托齊卡」間的交通是用電話，無線電與地道。

「設有「托齊卡」的，並不是海參崴一地。由與凱湖（Lake Hanka）南岸起，經斯巴斯克（Spassk）和齊涅古夫斯克（Chernigovsk）至尼古拉斯克（Nikolsk）間，也建有一條永久的「托齊卡」防線，最後，牠又與海參崴和牠附近的「托齊卡」相連。牠沿着蘇維埃與「滿洲國」的邊境伸展約一百哩。此外，不管有着這些防備，牠還準備尼古拉斯克與海參崴萬一有被圍的可能。除開軍用倉庫之外，戰事的準備，由軍需工業、電器工業以至食物的供給，全都準備停當，有條不紊。

「顯然，海參崴現在比我們所知道的還要堅強得多。據說，甚至連市內也築有「托齊卡」與其他類似的防禦工事。海參崴的確是很難用陸軍和海軍攻陷的事實上，牠已是固若金湯，無法攻陷的了。」

日本軍閥想試驗蘇聯是否認真保衛國境的機會，在一九三八年七八兩月遇到了，這就是張鼓峯「事件」。依照日本的說法，蘇聯部隊爲着對日「挑釁」，佔據了蘇「滿」邊界的一座小山，日本部隊當即逐出紅軍，克服那座小山並加以固守——依照慣例，他們是從未進入蘇聯領土的，據上海英商出版的一九三八年九月的遠東事件月刊（Oriental Affairs）東京通訊員H·Y·勒曼（註）的報告，蘇聯以「濫炸滿洲及朝鮮農村」的方式進攻日

（註）根據上海密勒士評論報的記載，這位勒曼先生曾經由日本出資招待遊歷日軍佔領區，代日方作了不少宣傳工作。而最近又已榮任英國駐遠東的情報專員。——譯者

軍，會引起極大的不安，因為「蘇聯要不是準備作激烈的戰爭，就不會開始轟炸。」但是，最後，因為日本方面已表示「抑制」，所以這事件沒有擴大而告結束。

實際上蘇聯從沒有向日本軍閥挑釁的企圖，何況當時恰是歐洲危機因捷克事件而迅速達到頂點的時候，牠只是被迫擊退日本在蘇維埃邊境的攻擊而已。A·斯卡夫（A. Schoof）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的中國評論報上的一篇文章裏，曾有很好的說明：

「蘇聯邊境防務異常鞏固，這已是公開的祕密；日本人自己稱呼由與凱湖到太平洋的防線為「蘇維埃馬其諾防線」。但爲了某種理由，兩個俯瞰蘇聯轄下的波西特灣（Posset Bay）的無關重要的小山，却落在設防系統之外。在這兩山之後不及一哩，就是與山平列的卑狹的哈桑湖。既知道蘇方這技術上的弱點，日本就以至少一整師團的兵力，斷然進攻，強迫邊境哨隊放棄陣地，而進攻的日軍立刻就加以固防，蘇聯步兵都遵照不得越過邊境的命令，因此只能沿着介於兩山與湖之間的兩條狹隘的湖沼地帶，冒着猛烈的砲火進行反攻。」

情形雖然如此，蘇聯方面並不就此干休，爲着逐出山上的侵略者，牠一面顯示了重轟炸機、砲隊、坦克以及集體刺刀的威力，一面由當時的蘇維埃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告知莫斯科的日本大使說，如果不停止在蘇邊的挑釁行動，日方將受到更嚴重的處罰，並且不僅限於張鼓峯區一帶。就在蘇維埃部隊業已逐出界內侵犯者之後，莫斯科也

就答應東京方面提出的「停戰」請求。

一九三九年夏天，日本軍閥又在滿蒙邊境的諾蒙亨「事件」中獲得另一個更慘酷更驚心動魄的教訓。日本軍閥付想，進攻外蒙也許不會引起蘇聯方面堅決的，像直接進攻蘇聯領土張鼓峯時一樣的報復。此外，他又選擇一個處於對日有利和處於對蘇方不利的進攻地點。A·斯卡夫在上引一文裏，曾敘述在蒙古沙漠中此一戰線的交通條件，說明了日本軍閥之所以選取這地方，以證實防共計劃仍然有效的理由。

「就所能證實的說，此一戰線由西北趨出東南，約在哈爾哈河（Khalida River）之東二十至五十哩；……儘管條件極其困難，蘇蒙軍似乎已堅守着這條線（一九三九年八月）作戰部隊所有唯一的和最近的鐵路線，即外貝加爾區的鐵路，約在戰場之北五百哩，這是作戰時極大的障礙。此外，運輸還得經過外貝加爾的崎嶇而多山的地區，而蒙古境內，又到處是半沙漠的狀態……；另一方面，經過海拉爾——日軍在滿洲西部的主要根據地——的舊中東鐵路，却予日軍以極大的便利。鐵路的最遠一點，距日軍的左翼和後方，還不及一百五十哩，左翼的交通更加方便，有一條鐵路橫過整個戰線的後方。最後，日軍還有另一個優點，牠還可以由戰場西南的察哈爾，威脅蘇蒙軍的右翼和後方。」

作者接着認為，莫斯科方面，把這沙漠上的戰爭，當作是滿洲日本將軍們私下的劫掠，這見解是正確的。他說：

「整個事件，很像是關東軍私人的劫掠行爲，他們企圖給意見不同的國內當局，造成一個既成事實。莫斯

利之所以索性不向東京提出交涉，大概就是這個理由，因為交涉是毫無用處的。在當時的情境下，唯一的辦法就是打退他們，直到他們自己覺得厭倦。」

然而，蘇聯同時還採取一切必要的方法，以加速這「厭倦」時候的到來。據蘇聯方面的報告，諾蒙亨前綫最後一戰，即一九三九年九月，曾擊潰兩個日本師團——這是跟「邊境衝突」的戰鬥很不配稱的結果——迫得日本不得不再度請求「息戰」。當戰鬥結束的時候，依據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日的日本紀事週報（Japan Weekly Chronicle）所說：「日本各報對之自然異口同聲地加以熱烈的祝賀。」東京朝日新聞說，雖然「無法正確估計雙方的損失，但由幾個日本指揮官的戰死一事看來，這衝突一定具極大的規模，而雙方的損失也必重大。」朝日接着又指出：「張鼓峯區自從邊界繞在協定中清楚地劃定（！）之後，業已平靜無事。」都新聞則指出諾蒙亨「事件」的戰鬥規模之大，「比目下西線法德兩軍的戰鬥要大得多。」又說當時的確很怕這衝突會發展成爲正式的日蘇戰爭，因此牠能突然停止，結束戰鬥，真是極可慶幸的事。

張鼓峯與諾蒙亨兩「事件」的結果，都使日本國內認清了這一事實：即日本軍閥以所謂邊境的「事件」或「事變」向蘇聯挑釁，不管是爲着外交的理由，爲着滿足滿洲的日本佔有者的特殊需要，或爲着日本侵華戰爭的需要，抑僅爲着對蘇的敵意，結果只有引起災難而已。爲着顯示牠決以反攻與報復，來對待破壞本國領土的完整的敵人，蘇聯不怕一切的犧牲，同時牠也充份準備着，如果所有別的各种手段都已失敗，牠將以全部的戰鬥力進擊敵

人，使牠完全粉碎。這兩個「事件」以及蘇聯在遠東的大規模的軍事準備，已指出這樣的戰爭，結果必是侵略者的崩潰，而牠對蘇聯西方面的防務，則毫無損害。但另一方面，蘇聯還是願意停止戰爭，只要對方尊重「蘇聯邊界」與外蒙邊界的「完整與不可侵犯」。這一點，又再度表示出蘇聯並無意進攻日本。由日本已深陷侵華戰爭的泥沼，和牠排除有關列強之利益而未遇到反抗從這一事實看來，足見蘇聯的確不斷企圖與各國（包括日本）保持正常的與和平的關係，同時又絕不害怕侵略者的威脅，這已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蘇聯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在蘇維埃最高議會上的演說，對滿蒙邊境的敵對，曾作如下的敘述：

「現在，有關各國似已認清蘇維埃政府不能忍受日滿軍隊在某邊境所作的任何挑釁行爲。我們應該提醒他們尊重蘇聯的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境。依照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間的互助協定，我們視為幫助該國保衛其國境，乃是我們的義務。我們對蘇維埃政府簽署的互助協定，非常重視。爲着信賴上述協定，我們應當提出如下的警告：我們將以保衛我國國境的一樣決心，來保衛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境。」

莫洛托夫在指出日方所謂會受蒙軍攻擊的虛構，是「荒謬的與無恥的」，並再度警告日本「停止此項荒謬舉動」之後，又說：

「今日的蘇聯已不是以前的蘇聯，譬如是一九三一年（即日本征服滿洲的那一年）那時候牠的和平

的建設工作剛剛開始。現在已是應該認清蘇聯決不是五十年以前的蘇聯，和蘇聯的力量已經增强的時候了。我們應當提醒這一點，因為甚至在今天，我們的一些鄰邦顯然還不能認清這一真理。還有一個事實也是應該認清的那就是一切的忍耐都有限度。因此，最好是及時結束那些不斷發生的挑釁以及破壞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境的行爲，我們已提出一個大意如是的警告，送給莫斯科的日本大使。

在距上述演說五個整月之後，即同年的十月三十一日，莫洛托夫又在蘇維埃最高會議發表同一題目的演說，對此種政策的結果，及他在隨後日軍的敗北中所作的實際說明，已能作出如下的結論：

「最近蘇日邦交已有某種改進。這改進的徵兆，可以由最近在莫斯科簽訂的協定中見之，由這協定，蒙古邊境的衝突業已結束。

「由本年五月起至九月中旬這幾個月來，日滿軍與蘇蒙軍屢在諾蒙亨區發生衝突，當時各項武器都會使用，包括重砲與飛機。戰事有時非常劇烈。這絕對不需要的衝突，會勒索我方相當重大的損害，但日滿方面的損傷，却比我方超過數倍。最後，日本提議結束衝突，我們也願意答應日方的請求。

「有如大家所知道，衝突起因是日本企圖佔據蒙古人民共和國之一部份領土，因而以武方隨意改變邊界。這種片面行動的方法，必然引起斷然的反抗，於是又再度證明以這方法施之蘇聯及其盟國的完全無效。不幸的波蘭的命運，雖證明歐洲某某強國簽定的互助公約，是多麼的不可靠，但蒙邊發生的事實，則已證明蘇聯

所簽之互助公約，其價值爲如何。

「在莫斯科簽訂的恢復和平的停戰協定，是走向日蘇關係改善的第一步，其第二步即爲組織共同委員會……此外，蘇日商約談判也有開始之可能。」

「因此，我們有理由宣言吾國與日本邦交之改善，業已開始。這傾向發展的迅速程度如何，實在很難斷言。我們還不能確定日本所已準備的程度究竟怎樣。」

「就我們方面說，我們對日方這一類的接洽，頗表贊同，我們將根據本國基本的政治立場，和對和平的關心，以與他們接近。」

在上述的演說裏，莫洛托夫已把史太林所規定的蘇聯對各鄰國的一般的外交政策：即蘇聯「願與一切鄰邦堅持和平的，親近的與陸鄰的關係，」並且願意「堅持這一立場，如果這些國度不企圖直接地或間接地破壞蘇聯國境的完整和不可侵犯的利益，」作了個具體的說明。例如，這種關係在中蘇兩國間是存在的。同時，這關係更因蘇聯外交政策的「堅持援助一切已成爲侵略行爲的犧牲品，與正在爲爭取祖國獨立而戰鬥的民族」的原則而更加堅定。日本，這中國的侵略者，自然堅決反對對牠的侵略的犧牲者作任何援助，正如牠一樣反對中蘇兩國間「和平的，親近的和陸鄰的關係」一樣。日本侵略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中國境內沿着中蘇邊境設立一個反蘇的戰爭根據地，使中國不再成爲蘇聯的鄰邦。這表示日本對華的侵略，其本身就是「企圖直接地或間接地破壞蘇聯邊

界的完整與不可侵犯性。」蘇聯的外交政策，並不是適應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目的，而是保護蘇聯邊界的完整與不可侵犯性，並堅持地與牠的鄰邦的和平的與友誼的關係。張鼓峯與諾蒙亨兩「事件」的結果，已顯示了蘇聯一向所採取的對華友好和援助中國抗戰的政策，毫未受日本軍閥的恫嚇與進攻的影響。因此，蘇聯唯一合理的結論，也是最合於日本及日本人民大眾的真正利益的結論，就是在蘇日間「和平的，親近的和睦的關係」的建立，在日本方面，應該拋棄一切「直接或間接地破壞蘇聯邊界的完整與不可侵犯性」的企圖。再次，日本軍閥的侵華戰爭，以及利用中國作爲進攻蘇聯的戰略軍事地點的目的（從中國民族革命的歷史的不可侵犯性看來，這是一個消耗的和徒然的軍事行動）也必須放棄。

在上述莫洛托夫的第一個演說裏，他在警告日本軍閥之後，接着這樣說：

「我們對中國的態度，是無須我來說明的。諸位對史太林同志關於援助一切已成爲侵略行爲的犧牲品及正在爲爭取祖國的獨立而戰鬥的國家的聲明，當然知道得很清楚。這聲明對於中國及其爲民族獨立而作的鬥爭，完全可以適用。在實際上，我們是堅決地執行這個政策的。這與我們在歐洲的立場完全一致。這一任務就是建立一個和平國家的統一戰線以及反對侵略的繼續擴展。」

因爲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已進入由社會主義至共產主義的轉化階段，所以在經濟上說，牠完全致力於國內力量的增長，以完成牠的發展。因爲是這樣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蘇聯並不需要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也不需

要輸出資本的市場，抑或倚賴外界的幫助。因此，在中國的爲民族獨立自由的抗戰中，牠的援華政策，與有限度地援助中國以對抗日本獨佔整個中國市場的外交政策，即與日本對立的歐美各國所採取的政策，有着根本上差異。蘇聯的援華政策的目的，是幫助中國擊退日本的侵略，和求得本身的獨立解放，擺脫資本主義世界加之於牠的帝國主義的和金融的羈絆。蘇聯絕對相信自由與獨立的中國的偉大前程，正如牠相信日本企圖征服中國的必然失敗，以及如果日本不放棄這奴役中華民衆的行動，必然要遇到不堪設想的後果一樣。蘇聯這種自信，是基於蘇聯共產黨對中國的歷史鬥爭及對中國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如下的見解的：

「……中國人民及其軍隊反對日本寇賊的英勇鬥爭，中國巨大的民族運動的高潮，牠的人力的和領土的豐富資源，最後，中國國民政府爲解放鬥爭而抗戰到底，直至侵略者完全被逐出中國領土的決心，——這一切，無疑的說明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是沒有，而且永不會有前途的。」（註）

蘇聯援助中國抵抗侵略的政策，跟蘇聯整個的外交政策，爲保衛邊界，保衛和平，促進集體安全等，是有機地配合着的。這政策沿着如下幾個方向發展：

第一：推進所有因某種理由而有意保衛和平和阻遏日本的侵略的國家，對中國作集體的或單獨的援助。爲着實現此一目的，蘇聯派赴國聯的代表團，對中國要求援助的申請，總予以最積極的支持，並介紹種種實際的和國聯

（註）見蘇聯共黨史第十二章第一節

及其會員國在英法（他們支配着國聯）的「中立」與「不干涉」的兩面性政策之下，所能給予中國的援助的方法。關於國聯，蘇聯的行動是按照史太林在前述報告中所敘述的理由：

「在一九三四年末，我們蘇聯加入了國際聯盟。我們是從這樣的觀點出發的：雖則國聯很軟弱，但是牠總還可以當作一個揭露侵略者的地點，多少還可以當作抑止（即使很微弱地）戰爭爆發的和平工具。蘇聯認為在這樣危急的時代，就是像國聯這樣軟弱的國際組織，也是不應輕視的。」

第二：依交換的貿易協定和信用貸款的基礎，以物品的供給和技術的協助給予中國。其中包括大部份中國最需要的軍用品，同時為配合這種援助起見，蘇聯還發展了橫穿中亞細亞至新疆的供給路線。由於這供給路線的不斷發展，中蘇貿易關係大為增進，因此兩國間在一九三九年已有重訂新商約的必要。

第三：蘇聯的政策在迫使日本軍閥畏懼並尊重遠東的蘇維埃領土與蘇聯外蒙間的互助協定，而保證這一政策，是蘇聯遠東紅軍的力量、準備及決心。日本一向以防共計劃作為牠侵略中國與威脅蘇聯的各項陰謀的中心，而蘇聯的這一政策，又是破壞這陰謀的最有效的工具。蘇聯在遠東的不可摧毀的強大力量，保證了中蘇的友誼和蘇聯對華的援助；蘇聯之不顧日方一切的挑釁與威脅，仍然繼續援助中國的民族抗戰，也使英法美用以封鎖西班牙人民政府的方法，無法在中國重演。

蘇聯同時也是英法美妥協政策的最嚴酷的批評者，牠指出這政策實際上是鼓勵侵略的政策，並警告他們：這

「不干涉政策」所孕育的幻想與陰謀，必然引起與他們所企圖的完全相反的結果。史太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所作的報告中，就會指出這一政策的若干特點。他認為這一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數的非侵略國，特別是英法兩國，拒絕了集體安全的政策，拒絕了集體反抗侵略者的政策。」他們的態度是：

「讓每一個國家各自照牠的願望和能力去抵禦侵略者；這是不關我們的事。我們要同侵略者做買賣，也要同被侵略者做買賣。」

史太林認為這一政策，事實上就是「放任侵略者，慫恿戰爭，因而也就把戰爭變成了世界大戰的政策。」在遠東方面，這一政策就是，譬如說：「不要妨礙日本同中國打仗，而且最好是讓牠同蘇聯去打。」這樣讓牠們互相消耗，直到牠們已經充分疲憊了時，「就挾着生力軍出場，當然，這是「爲了和平的利益」的，於是便以自己的條件命令那些筋疲力盡的參戰國。」

關於日本在中國沿海獲得容易的勝利，而始終沒有受到九國公約簽字國中各海軍列強的阻撓的原因，史太林認為是：

「很值得注意的，便是當日本開始侵入華北的時候，一切有地位的英法報紙，都揚言中國的衰弱和中國的無力抵抗；他們宣言日本可以用牠的陸軍在三個月內併吞中國。於是歐美的政治家就開始注視和等待。後來，當日本開始展開軍事行動之後，牠們就讓牠佔了上海，這在華的外國投資的主要中心；又讓牠佔了廣州，這

英國在華南的獨佔勢力的中心，再讓牠佔了海南島，並讓牠包圍了香港。這一切豈不是很像鼓勵了侵略者嗎？這好像是說：「儘管打下去好了，到那時再說吧。」

史大林接着批評說：這政策看起來似乎是「便宜又討好」的，但實際上都是「危險的政治把戲」，結果將給「不干涉政策的支持者」帶來了「悲慘的潰敗。」

依照聯共黨史所說，支持這一政策最積極的，是「英國保守的統治階層」。他們因為害怕和憎恨「歐洲的工人階級的運動與亞洲的民族解放的運動」，所以採取應允法西斯統治者與侵略者破壞進步的民族運動與民衆運動（後一運動同時也是反侵略者的運動）的政策，盡力和他們妥協。英法兩國統治階級直接或間接地幫助德義的西班牙干涉戰爭和幫助德國的併吞捷克，就是這個理由。在上述一書中，曾將俄羅斯資產階級對沙俄專制（使資產階級毀滅的就是這一專制）的妥協態度和這一政策作個比較：

「在這一方面，英國統治集團所採取的政策，差不多跟俄羅斯自由主義的帝制派的資產階級在沙俄制度之下所採取的一樣，他們雖然害怕沙俄政策的「極端性」，但他們更加害怕民衆，因此他們只好憑藉勸說沙皇的結果，也就是與沙皇勾結共同壓迫民衆的政策。就我們所知道，這兩面性政策會使俄羅斯的資產階級付出絕大的代價。那麼，我們可以相信歷史也將向英國的統治階層，及牠在法美兩國的朋友們勒索同樣的酬

報。」

蘇聯共產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同時又於一九三八年「經過中央委員會的審定」因此這是蘇聯政治見解的最權威的本源，而上引各節，就代表蘇聯當局對德義英法四國政府領袖希特勒、墨索里尼、張伯倫和達拉第（一九三八年九月所訂的慕尼黑協定）所作的結論。這協定給德國帝國主義打開了併吞捷克的門路，同時也強迫捷克政府（他們甚至不許牠參加會議）投降德國，放棄一切抵抗的企圖，而在法國方面，這是對一九三五年簽訂的法捷蘇三國互助公約的罪惡昭彰的背叛。目的在與德義成立協定而排斥蘇聯的張伯倫，業已大功告成，給國內帶回了一張由他本人和希特勒簽署的，說明兩國政府決不兵戎相見的紙片。不久，德法兩國又簽訂了類似的協定。英法兩國政府在這一方面用意，已成了公開的祕密，甚至當時法國外長龐萊（George Bonnet）覺得已可以當眾聲明，法蘇間的互助協定，只有在蘇聯受到「無故的侵略」時方才有有效。國報紙在解說這一聲明時，曾主張說：烏克蘭為求「自決」的「背叛」所引起的德國干涉，乃是「有故的侵略」。蘇聯在西方的外交政策的原則，跟在遠東的完全相同。都企圖保證「蘇維埃邊界的完整與不可侵犯，並在相互的基礎上，與各國「堅持和平的與事務的聯繫，」與鄰邦「堅持和平的，親近的和睦鄰的關係，」蘇聯的政府與人民，全部絕對明白：僅蘇聯單方面主張和平，並不能保證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各侵略國家，會同樣對蘇聯保持和平。蘇聯國防委員長伏洛希羅夫元帥，一九三九年九月在莫斯科最高議會席上演說時，曾說：

「我們的國家是個特別的，而且是世界上僅有的國家。牠被敵視我們的資本主義世界各國所包圍。此所

以我們只能倚賴我們自身的力量來保衛這社會主義的國家。」

伏洛希羅夫元帥繼而報告紅陸軍、紅海軍和紅空軍力量在自一九三〇年起這一時期內的增長——坦克增加了四十三倍，飛機增加了六倍半，重砲，中砲與輕砲將近七倍，小口徑平射砲（即打坦克砲）與坦克增加了七十倍，輕重機關槍增加了將近五倍半。接着，他總括的說：

「一九三〇年我們每個兵士，就當時兵員的數量說，有三·〇七匹機械馬力。而現在呢，兵員數量已增加了三倍半，但每人仍有足十三匹的馬力。在同期間內，海軍噸數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

這是蘇聯外交政策所倚靠的主要支柱。史太林在上述的報告中，對蘇聯外交政策所依靠的各項列舉如下：

1. 我們日益增長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力量；
2. 我們蘇維埃社會的道德的和政治的統一；
3. 我們各民族相互的友誼；
4. 我們的紅陸軍和紅海軍；
5. 我們的和平政策；
6. 與和平的維持有切身利害關係的各國勞動大眾的道德上的援助；
7. 因此種或彼種原因而不願破壞和平的那些國家的理智。

爲着保護蘇聯（牠的外交政策就是達到這一目的的工具），歐洲的問題比遠東的防務問題還要重要得多。歐洲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的中心，歐洲各國也佔有帝國主義殖民地的絕大部份，獨佔了非洲、澳洲，以及亞洲印度洋沿岸各國與太平洋的大部份。歐洲列強的戰爭機構與反蘇觀念，給予蘇聯的威脅比日本要嚴重得多。世界市場爲合法佔有物的倫敦、巴黎以及紐約的金融資本家與帝國主義者，早已懷着反蘇的觀念，而幻想着集合一切的破壞力量以進攻蘇聯，而以德國爲其劍鋒。英法政府之所以拒絕蘇聯所主張的，也爲被威脅被進攻之各國及其民衆要求集體抗拒侵略者這巨大運動所贊同的集體安全政策，主要的就是這觀念在作祟。不用說，當侵略者貪得無饜時，利用集體安全這一觀念，來保護他們在歐洲及其殖民地的統治權，他們自然不會反對，只要他們進攻蘇聯的，和出賣某些國家及其人民以促進「反共」十字軍的陰謀，不致因此而受阻。但無論如何，他們是在欺騙自己，因爲他們忽視了如下三個事實——首先是忽視蘇聯日見增強的防衛力量，已足以阻止侵略者的進攻，而英法此種不干涉政策只有鼓勵侵略者掠奪他們的勢力範圍與利益；其次，他們叫自己相信，「反共」同盟可以把侵略轉到於他們有利的方面，而忽視了這同盟只是爲着公然搶奪他們的地位才用反共公約加以偽裝；最後，他們又忽視了蘇聯本身的力量已日見強大，假如他們將陰謀或正陰謀損害牠的和平與領土的完整及國家的安全時，牠已不是只能消極地睜着眼睛，聽別人擺佈，而是能夠給他們，給一切只把蘇聯當作一個便於侵略的目標的人們，以重大的打擊的國家。

蘇聯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在對蘇聯最高蘇維埃發表的某一演講中，對英法一九三九年五月至八月（即慕尼黑協定毀壞了之後）在莫斯科談判中所用的策略，曾作簡要的說明。他這樣說到英法兩政府的「隨便的和假裝的談判」

「英法在最初談判時的提案，對此類談判所必需的先決條件，加以忽視，對於互惠原則和機會均等，也置之不顧。」

「英法政府一方面要求蘇聯應以軍事援助給予波蘭……另一方面，英法又唆使波蘭堅決拒絕蘇聯的援助，以為這是不必要的和荒唐的……」

「英法政府一方面保證給蘇聯軍事援助以抵抗侵略，要求蘇聯也給予同樣的援助。而另一方面，牠們對於發生間接侵略時所肯給予的援助，却加以種種的保留，以致使這種援助成了神話，而替他們製造了合法的口實以逃避援助。他們想用這樣的方法，使蘇聯在侵略者之前，處於孤立的地位。」

「還有，英法政府一方面力說締結互助協定談判的重要，要求蘇聯認真處理這一事情，並迅速解決協定中的一切問題。而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對談判就表現了極端的延宕與絕對的輕率態度，把談判委給第二流的人物，而又不給他們以適當的權限。我們只須說明如下一點就夠了：那就是英法軍事代表團到莫斯科來並不賦有一定權限，也沒有權力訂立軍事條約，而且英國軍事代表團到莫斯科來，却連委任狀也沒有帶……」

「英法政府的這些矛盾，其根源是什麼呢？可以用這樣幾句話來說明：一方面，英法政府害怕侵略，因此他們想和蘇聯訂立互助協定，只要這協定能加強他們的力量。但在另一方面，英法政府又恐怕和蘇聯訂立了真正的互助協定，會加強了蘇聯的力量。後面這一部份似乎不能滿足他們的目的，必須承認，他們這些恐懼勝過了其他的考慮。」

英人主辦的日本紀事報（Japan Chronicle）（註）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一篇社評中，曾斥責張伯倫的英國政府，應負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的責任。牠認為蘇聯之簽訂此一協定，目的在防禦這種不義與陰謀。那社評這樣說：

「當德國在波希米的三月政變開始後廿四小時，蘇維埃政府就已採取與英法政府進行談判——這後來證明為悠長的與聾的，而現在大抵已失敗了的談判——的步驟。這談判的最大意義，就是不管張伯倫在慕尼黑會議怎樣抹煞了與捷克訂有互助協定，而且願意隨時遵行協定的蘇聯，但大家終算已經接近。俄國始終堅持談判應繼續進行，雖然牠甚至明知張伯倫的外交政策，已澈底地表現出牠對蘇聯的猜疑與憎厭，而這憎厭又是如此顯明。好像英國首相只把俄羅斯當作一個可以消耗德國軍事力量與資源的適當戰場，直到來

（註）這裏應當指出的，是日本紀事報對蘇聯絲毫沒有好感。牠屢次惡罵日本進攻蘇聯，是一張十足代表英國統治階級的報紙——譯者

院的反對派使用了重大的壓力之後，並且在他本黨之內已現出強烈的不安，英國輿論也竭力主張組織包括蘇聯的新和平陣線之後，張伯倫方才不得已與克林姆宮商討俄國參加的最有效的方式。這裏用不着追述隨後各次談判的可憐的經過，不過牠之終於停頓，似乎完全是由於英國不願把蘇聯當作一個平等的對手，或把英國政府所堅決要求的同樣的保證，給與蘇聯。

「假如竟因此而促成俄國的中立，把和平陣線對抗軸心力量的整個計劃完全推翻，那麼這只能說是英國嚴重的錯誤。最近英國外交政策的路線，是過去三年來許許多多古怪的和不幸的事件的主因，但這次似乎已經登峯造極了。」

還有一點，是張伯倫和達拉第兩個人都忽略了，這就是德國方面，已被迫認清了，在國際事件中，蘇聯強大的力量，是應該尊重的和萬不可忽略的一個因素。蘇聯的外交政策一向就懷着這樣的目的，不管是對日本和德國，或是對英法，和各個大小的國家。在納粹奪得政權之前，蘇德間的邦交是敦睦的。蘇聯從未承認凡爾賽條約，而且對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戰勝國對德國所施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扼殺政策，一向都不贊同。這大戰是在革命中長成的布爾塞維克黨所領導的工農兵所反對的戰爭。在一九二六年，蘇德間會訂立中立的條約（Treaty of Neutrality），而且在一九三三年之後，納粹政府還會簽字將牠延長。蘇聯本國的內政，決不容許任何外國的干涉，同樣，在外交關係上，牠也不過問別國的政治體系，不管該國的領袖是所謂民主戰士如張伯倫與達拉第，或是法西斯的領袖希特

勒與莫索里尼，以至波蘭、匈牙利以及羅馬尼亞等國的半法西斯主義者。蘇聯在外交上所要求的，是友誼的與睦鄰的關係。因此，舉例說，蘇聯和法西斯義大利就會在一九三三年訂立了中立的和互不侵犯的條約。至於蘇聯與這些「大民主國」如英國和美國等的關係，誰都可以看出，他們從不肯像德義兩國一樣的降低身價來和蘇聯訂立中立的條約，除開如下這特殊的事實：美國在蘇俄戰勝俄羅斯舊制度十五年之後，方才承認蘇聯。

蘇聯在歐洲和在遠東，都擁護反侵略的集體安全制度，只有在英法拒絕之後（在遠東方面，英國對這甚至連想也沒有想過），蘇聯才如莫洛托夫在八月三十一日（一九三九）蘇維埃最高議會上所說的一樣，「只好找尋別的足以保證和平，和掃除蘇德間戰爭危險的各種可能性。」自然，這並不能充分確保這一目的，德國方面「必須在外交政策上改變態度，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否則兩國間戰爭的危險還是沒有掃除。

在一九三九年春天，德國政府曾向蘇聯建議，舉行新商務信用貸款協定的談判。這協定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簽訂，牠跟一九三五年的和以前蘇德間各商務協定完全不同，對於蘇聯極爲有利。這協定規定蘇聯可依七年爲期的信用放款，在德國購買大量的必需的裝置，此外蘇聯又以其「一定數量之剩餘原料」售予德國。莫洛托夫曾指出這是「那些根本不願蘇聯與其他各國簽訂有利經濟協定者的失敗，——更用不着提到，我們事實上與英法及其他國家，都沒有過對雙方皆爲有利的經濟協定。」

當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簽訂之後，莫洛托夫不久即這樣宣佈道：

「此條約（有如未成功的英法蘇談判）證明國際關係中的重大問題，即不甚重要的東歐問題，如無蘇聯積極參加，決不能解決。證明妄想將蘇聯關在門外，在蘇聯背後秘密決定此類問題之一切企圖，均必然趨於失敗。」

這協定是蘇聯外交政策極重大的成功，牠不僅保證了蘇聯在歐洲的和平，而且也保證了遠東的和平，因為牠結束了日德的反共合作。由於歐洲兩大國的接近，蘇聯獲得了增強力量，鞏固東歐防務和擴大其國際影響的新的可能。正如莫洛托夫所說，牠已形成爲「歐洲歷史中之轉換點，而其影響所及，又豈僅歐洲歷史而已。」

正因爲各國及人民間的和平與友誼，是蘇聯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因此蘇聯國際勢力的增長，對這些原則是有利的，牠由是可成爲更強大的更有影響的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因素，並將阻抑侵略者，限制戰爭的範圍。在半法西斯的波蘭政府及其軍隊，於對德戰爭中崩潰了之後，蘇聯的佔領前波蘭政府所佔有的烏克蘭與白俄羅斯，將牠們與蘇維埃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共和國合併，已阻止了德國的侵入這些區域。蘇聯與波羅的海三小國的協定，保證了牠們的海岸與島嶼，不會成爲侵略蘇聯的根據地，因此，也限制了戰爭，促進了反侵略的集體安全。蘇聯對土耳其的政策，同樣，也只求保證達坦尼爾海峽與黑海，阻絕英法海軍的威脅蘇聯，而這也與蘇聯的阻止德國經由羅馬尼亞以控制黑海的政策密切相符。最後，蘇聯阻抑日本的大陸侵略的政策，其目的也在維持蘇聯的和平，保證牠的遠東領土的安全，以及中蘇間的友誼與乎對中國民族獨立抗戰的援助。

自然，單靠蘇聯的力量，並不能阻止帝國主義國家的互相殘殺，以及以工人階級與被壓迫民衆的生命與物質享受爲其犧牲，但牠本身的政策，不論是對內的或是對外的，都是絕對地非帝國主義的和反帝國主義的，因爲牠的政治，經濟組織根本上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各國不同，就是牠的擁護各國間的和平與友好的外交政策，也跟牠們的完全相反。一九三九年三月，莫洛托夫以蘇聯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資格，在聯共第十八次大會上會這樣說：

「我們在適當的機會下，已和資產階級國家進行過合作，我們覺得這麼做，是完全適合於事業的利益。我們就是在將來，也不打算拒絕這樣做，而且將力謀儘可能擴大我們與我國各鄰邦和其他各國間的這種合作。但是我們是按着我們自己的道路走，而資本主義則是按着資本主義自己的道路走。歷史在蘇聯面前，不僅提出了關於牠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的問題，而且也提出了關於兩個經濟體系——新體系和舊體系——的競賽的問題，關於蘇聯與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方面競賽的問題。」

蘇聯所走的路不是搶奪殖民地，也不是爭奪國外市場，而是專一地依賴自己內部力量的長成，以完成社會主義而達到共產主義。因此，這國家不僅無意於戰爭，事實上，牠而且是堅決反對戰爭，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與資本主義干涉者的進攻與陰謀，以求保護牠的領土，人民，社會主義國家，和達到共產主義的目的。

但資本主義和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所走的路呢，莫洛托夫進一步加以如下的敘述：

「資本主義營壘中的情形，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了。在那裏，早已失掉對於內部發展力量的自信心，在

那裏，貪慾正爲着從新瓜分世界而在燃燒。在那裏，這一夥人臂下懷着刀，那一夥人手裏拿着劍，爲殖民地問題，爲重新劃分國界以利於強國的問題，而進行着爭鬥。在那裏，長言滔滔，說什麼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後分劃殖民地領土時誰沒有給誰充分；說什麼在這次分劃中，當最後重新劃分殖民地時以及當戰後在歐洲分配土地時，誰會搶劫別人，誰會遭人搶劫。在那裏，事情已不僅僅限於簡單的戰爭威脅了。籠罩歐洲許多國家的帝國主義戰爭正在進行着，並且業已具有龐大的規模。新的世界歷史上的大屠殺危險，特別是從法西斯蒂及其保護人方面來的這種危險，正在增長着。

蘇聯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競賽，還有另一個特點，即蘇聯國內所有的一切資源與力量，完全獻給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以促其實現。同時也建立了愈見強大的軍備，以保護牠們和平政策。牠的競賽是和平建設，反對戰爭與毀滅的競賽；而後一威脅，是在資本主義各國間，由於經濟的危機與帝國主義的敵對因而日見嚴重的國際形勢中見到的。這競賽的目的是在證明社會主義的勝過資本主義，自由民衆的自決與團結勝過帝國主義的集團與其爲爭奪世界霸權的戰爭。莫洛托夫在其演辭的結論中，曾這樣說：

「在我國已經找着了發展國民經濟的，和促進各民族的文化的大道。這不是由這族人民強迫別族人民，而是由許多民族人民爲自己的共同事業而友誼合作。就在我們這裏，在工業方面和農業方面，也還不是所有各共和國都是一樣發展的。有些是在這方面較爲發展，而其他的則在別的各方面比較發展。但是，我們已經找

到很好的方法來把整個各民族的蘇聯裏的工農的努力統一成爲一個整體，把各民族人民底努力統一起來。改善這一族人民對於那一族人民的幫助，並向着一個共同目的來進行事業。我國人民可以朝着西方——例如——說道：「就是你們也未嘗不可以利用這個不壞的經驗。須知道「軸心」，只要碰到一個大坑，就會發生裂痕，以至於碰得粉碎哩。而在我們這裏，是多麼好的各族人民的聯盟。這並不是一個什麼隨便的「軸心」，而是一件大事哩！」這個呼聲，在那裏當然有許多人是不願聽聞，但是，這個呼聲，終究是能傳入人們意識的，而當牠已遠遠深入人叢時，牠還會化成雄壯的無產階級的回聲而回轉過來。」

## 第六章 中國的抗戰與反共協定

在日本此次的侵華戰爭之前，就主權與獨立而言，中國的國際地位是半殖民地的地位。不論在政治上或在經濟上，南京中央政府與南北統治當局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主要是倚賴各個擁有通商口岸的省份。在日本征服滿洲之前，「保護」中國的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與行政獨立的——這些簡直已被各帝國主義國家剝奪淨盡——是各項關於中國的和太平洋勢力均衡的國際條約，而這些條約就是圍繞國際在華利益的實際狀態的合法外衣。至於所謂國際在華的利益，包括日本在滿洲的一般說來，是英國在華南和長江流域的特殊範圍，國際的（主要英日兩國）投資，和各國的貿易利益等，這些全都在英美保持太平洋現狀的聯合力量監督之下。

這聯合力量的美國部份，是企圖確保「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的，因此，他也企圖確保中國領土的完整，反對瓜分與劃分勢力範圍的政策，特別反對那些有利於日本的大陸擴張與海軍擴張的政策。但英國方面，却只有在能够利用美國的政策以保護英國在華的利益及其統制地位時，這就是說，能够保護牠在東亞與西太平洋的金融投資、特權貿易等殖民地的佔有與勢力範圍時，也就是說，只有在反對日本海軍向華南擴張時，牠方才與美國合作。另一方面，英國對「門戶開放」政策的支持，只限於保持牠的在華地位（也即作為中國政府的主要債主的地位），和對中國海關與鹽稅的控制，保護牠的治外法權，以及阻止有利於日方的特殊稅率。至於美國之反對日本向大陸擴張，英國方面不唯不願與之合作，反而願意與日本妥協，使牠在滿洲、蒙古與華北北部等中國領土，建立牠的大陸根據地，更不用說牠還存心給日本一條侵略蘇聯的「出路」，讓牠以上述的根據地，作為反蘇戰爭的戰略的跳板。英國對美國遠東政策的這些制限，使後者實際上只成為英國政策的工具——當英國利益受日本威脅時用以反日的，和當中國企圖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是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担保）時用以壓迫中國的工具；而當英國以中國為犧牲，而與日本妥協時，美國實際上就完全陷於孤立的地位。因此，遠東的主要因素是英國和日本，也就是英國與日本聯合，以維持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英國又與美國聯合，以保護中國的所謂「主權，完整與獨立」的殘餘。這就是當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想把半殖民地的中國變成為日本軍事控制下的獨佔殖民地時中國的實際情勢。

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是列強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年，在中國奪得了利益範圍，治外法權與特殊地位，貿易的特惠與金融的控制等的結果。這掠奪的目的，顯然是帝國主義的浸透，和中國的殖民地化與瓜分。中國在這一時期內之所以沒有變成殖民地，這是主要的外部的原因，但太平天國的叛亂，義和團的暴動，和一九一一年革命，都顯示出民族的與民主的革命大眾的力量，已起來挽救中國的危亡了。但當時主要的原因，是列強間的敵對阻撓了他們把中國殖民地化的目的，阻撓了他們的分割中國或某一國的獨自征服中國。一八九四——九五年中日戰爭之後，俄德兩國的干涉，使日本無法吞併遼東半島，日俄兩國互相阻止一方把中國部份的領土歸入自己的版圖。英國隨後就與日本成立同盟來阻止俄國，而美國之出任樸資茅斯會議的調人，爲的也是阻止日俄兩方的併吞滿洲。遠在一八九九年，美國早已由當時的國務卿約翰·海（John Hay）通知列強，表示美國政府「決不承認任何國家在中國帝國之內的獨佔權利，或控制中國任何部份。」這一行動終算結束了一連串搶奪中國領土，建立特殊範圍，勒索鐵路建造讓與權的暴行（這些是由英法領頭，隨後就是帝俄，日本與德國），但另一方面，却使列強帝國主義活動因金融投資而深化。當時的特點就是英美金融資本家的搶奪「銀行團」——這就是代表帝國主義銀行侵略中國的國際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孫逸仙博士就會經說到，中國之成爲半殖民地，比別的殖民地更要壞，因爲事實上牠已成了列強的殖民地。

中國這種半殖民地的地位，反映在中國前後各政府的對內和對外政策中。中國政府的獨立的外交政策，即代

表中國民衆的民族革命利益的政策，只有在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所領導的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的革命的統一戰線這條件下，才能够運用，才能够保持。當時英國就被迫改正牠那公開敵視中國民族革命的政策，同時也作了某種的讓步。中國收回了數處的租界，並收回了關稅的自主權，雖然後者因爲列強強施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沒有廢除，仍然受着限制。但由於統一戰線的破裂，中國民族革命的挫退和分裂局面的形成，以及隨後不斷的內戰，使這方面的一切進步突然中斷。而更加不幸的結果，却是日本利用了這種挫退以攫奪滿洲和進攻上海（一九三一——三二），這是日本爲着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變爲日本獨佔殖民地的大陸的與海軍的侵略的第一階段。

沒有統一戰線和革命的羣衆運動，使中國政府甚至無法獲得獨立的外交政策的基礎。爲了受到各帝國主義利益的影響與壓迫，中國政府有時親英，有時親日，或因兩種利益互相合作，抑或兩方因犧牲了中國而獲得了均衡，因而同時親英親日。此外，還有親美的派系，但他們只能決定暫時的行動，而無法決定政府的性質，因爲美國的影響大半附屬於英國的，因而也被利用來加強英國的影響。在這一點上，關於蘇聯對中國政府的影響的問題，根本上是有着差異的，蘇聯既無半殖民地的，也無帝國主義的利益，牠對華的援助，是以中國的民族抗戰爲前提；所以親蘇的傾向，事實上已等於反對半殖民地的羈絆，和要求民族革命的政策了。

事實上，歷來中國政府之屈服在帝國主義利益之下，等於把本國出賣給帝國主義利益，而且也使直接的或間接的帝國主義的賄賂，得以風行。不管怎樣藉口說，不需革命羣衆的壓力，單利用各帝國利益與集團間的強烈的矛

盾，就有採取某種獨立立場的可能，但這絲毫不能改變出賣民族利益這一事實。只有基於民族革命利益與運動的外交政策，也即基於民衆的，和由民衆負責的反帝抗戰的獨立的外交政策，才能利用各帝國主義利益間的矛盾。不然所謂「利用」云云，只是服侍帝國主義的利益，服侍帝國主義買辦階級的派系，和反動的，半殖民的以及半封建的官僚，從而把一國的政府，降爲那些能够使役最大的金融勢力，或應用最強的政權壓力的帝國主義利益的代理機關罷了。前北京政府，就是帝國主義的和受賄的代理人，他們也長時期地「利用」列強，把中國利益賣給那些能給他們以最大的酬勞費的主顧。在這所謂「政府」傾覆之前十年間，日本實際上就是北京的主人，牠做了安福系與滿洲軍閥間的居間人，而牠賄賂北京官員的最具成效的手段之一，就是有名的「西原借款」。

中國民族革命的最大的特質，就是牠是一個在國外帝國主義阻礙、干涉和進犯等條件下進行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西班牙的民主革命，假如沒有國外帝國主義的干涉——德義的武裝干涉，與英法在「不干涉」名義下對西班牙共和國的封鎖——無疑可以得到成功；而在被干涉這一點上，牠跟有關列強對中國革命的干涉作用，倒是頗爲相似的。然而這兩國革命相似的地方，僅此一點而已。中國的革命，在亞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國謀求民族解放的巨大歷史鬥爭中，是比較典型的範例。這革命的任務，在使中國脫去半殖民地的束縛，清除分裂、壓迫和奴役中華民族的，同時也作爲國外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的半封建勢力。這革命的推進力，是國共兩黨領導下的人民大衆，包括智識階級，無產階級，農民和絕大多數的資產階級。

中國民族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可以由他對各國人民革命的學習，得到特別的證明。他的三民主義便會指出：中國民族的解放，只有在民族的自決，即獨立；人民的自決，即民主；和人民的生活，即特別是中國佔大多數的農民大眾的痛苦得以解除這三項任務完成之後，才能充分實現。孫中山先生有一次會說：

「我的計劃（即三民主義）是建立在堅固的基礎之上的；因為我研究了各國革命的歷史達三十年。」  
（大意）

在這種精神上，他也與當代的俄國革命相接近。他向之學習，並指示中國民眾說，革命的推動力，乃是落後的人民大眾的行動，而依照這一法則進行的革命，必能克除國內國外各種障礙，而獲得最後的勝利。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遵照孫中山先生這一政策，根據統一戰線的原則改組該黨，並容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後，他就能够領導勝利的北伐，以統一全國和推翻北京政府。當時孫中山先生所邀請的蘇維埃顧問，對國民政府、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準備工作，會給予極大的幫助。孫中山先生之主張「親俄政策」，完全是基於他對蘇聯的認識。他認為蘇聯本身是一個推翻沙皇專制和帝俄的資產階級而獲得勝利的革命國家，所以在中國為爭取民族的解放與平等，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作的鬥爭中，他必然是中國的盟國。在這一方面，孫中山先生的政策跟他的遺教——即中國的民族革命的外交政策，就是與願意援助中國的民族獨立戰爭的各國締盟——是完全吻合的。

在這一革命時期中，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將軍在華南建立中央的國民革命軍的工作，也予以最積極的支持，又組織民衆以援助在前線作戰的北伐軍，只有在國共統一戰線分裂，危害了中國民主革命的繼續，阻礙了統一與民族自由任務的完成時，共產黨才反對國民黨。稍後，共產黨又爲自衛，爲民主的權利，爲工農的政黨的存在而戰，因爲沒有民衆的民主組織，就沒有革命。這要求的正確以及這要求的力量，已由他們組織人民武裝部隊（這部隊在目前的反日戰鬥中，已那麼巨大地增強了國防的力量）的才能所證明。當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和團結了中國的民衆，而民衆運動所要求的統一戰線的再建，也終於實現了時，共產黨的一切活動，都是爲着加強國民政府，和加強蔣介石將軍最高指揮下的統一的戰鬥部隊。在目前的反日戰爭中，共產黨政策的唯一目的，就是加強抗戰，特別是在被佔領區域組織游擊部隊。爲着達到這一目的，共產黨集中一切力量以鞏固統一戰線，也即鞏固國共兩黨的合作，以保證持久抗戰繼續到擊退侵略者收復一切失地包括東三省爲止。

各階層各黨派爲着實現三民主義而堅強團結的中國，無疑是帝國主義最可怕的敵人，也是創建新中國的最強的保障。一九三九年三月，在日本「粉碎了」蔣政權「達十九個月之後，當代日本的一位作者，已被迫承認日本粉碎新中國的「勝利」業已失敗，他說：

「新中國的精神，是無法從中國古代先賢中看到的，而中國古代經典的學識，也絲毫不能增進我們對新中國的認識。目前中國的青年，已不再向夫子廟，而向中山陵頂禮了。中國傳統的民族英雄岳飛，已經不再爲人

提起，而蔣介石却已成爲新的偶像了。因此，假如不能分別新舊的中國，就不能認識今日的反日心理。

「日本今日所對付的，不是孔孟的中國，而是蔣介石、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新中國，當這些成份因當前戰爭結束而終被排除時，大概一個新的政體將在新的指導原則之下出現。」

蔣介石將軍在中國之昇至民族領袖的地位，跟日本的侵略中國，有着密切的關係。這領導表示中國民衆一致抗拒日本的侵略和征服，因爲蔣將軍在民族抗戰中的領導，是中國各省各軍，各進步的和革命的組織所承認的，上引該文正確地指出，「蔣介石已成新的偶像」這一事實之根源，是新中國一致信奉孫中山先生的精神。但當代中國之信奉孫中山，跟舊中國之信奉孔子不同。在蔣將軍領導下的保衛本國反抗侵略的戰爭中，中國民衆正爲着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遺志，爲實現他畢生在喚醒落後民衆起來建設一個統一獨立和自由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中所指示的政策與目的而戰鬥。

日本軍閥爲着破壞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就是爲着破壞蔣介石將軍的民族領袖的基礎，已要求「中國的領袖」起來反對蔣將軍。在一九三九年四月當代日本的一篇題爲吳佩孚與汪精衛的活動的文章中，就曾詳細地說明了日本軍閥的這一方法。作者穗積尾崎 (Hosumai Ozaki) 首先暴露了日本初時對於北平「臨時政府」的幻想。這「政府」的主要人物，是「在前北京政府時代握有極大權力的直皖要人，」因爲他們的下野爲時甚暫，所以他們仍然有着建立反對蔣政權的政府所必需的各種資格。依作者所說，這「資格」的特點，就是他

們「包含殘餘的封建份子，也即華北的軍閥與官僚。」又因為這些份子以前是與佩孚的部屬，「他們之要求與佩孚上台，乃是必然的事。」

日本進而希望那些也因中央政府的強大而「失去勢力」的「各省地方有力人物，」組成一反對派。作者接着說：

「各省地方軍人的力量，不唯毫無消滅，相反，這反對蔣介石統一運動的力量，在未來且有更加強大的可能。報傳吳佩孚和內地各軍閥間仍保有密切的連絡。他們甚至斷言汪精衛及其黨徒之活動，與各地地方軍人間，也有某種聯繫。這些報告多少可以指出這種反對的可能性。」

至於汪精衛，這位日本作者會竭力捧場，說他是「中國革命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至於他的「資格，」就是「曾經多次參加各種反蔣的運動。」自一九二六年之後，汪之反蔣行動，其重要者至少有六次，一九二六年他與共產黨一致反蔣；此後多年，又不斷與各地地方軍閥聯絡，進行倒蔣工作；而最近幾年來，他又是反共親日派的領袖，並且始終未曾放棄其反蔣的行爲。汪精衛的出身，雖然跟吳佩孚不同，跟「臨時政府」「維新政府」各傀儡也兩樣，然而「這兩種運動，縱然相互間顯有不同，其實質却無兩致，所以終極必將匯合爲一。」

最後，一如該文作者所希望，汪精衛不僅是日德義的「意中人，」就是英法對他也頗中意。作者這樣說：

「在汪系中，如陳公博等要人，跟德義統治階級都保有密切的關係，這是衆所週知的事。汪與法國的關係，

也並非始自今日……至於與英國的關係，一向從未聽說英國對他有過任何不滿。

關於這些「運動」的特殊任務，一九三九年一月日本軍部機關報國民新聞的一篇社評，曾作如下的規定：

「日軍年來已不惜巨大犧牲，負起肅清中國共匪之任務；此一任務，如以協定的方式，在經過某一時期之後，委託給新中央政府的陸軍，我們當然歡迎。但我們不應希望華軍迅速完成剷除赤匪的行動。在蔣介石領導之下，中國民衆業已堅信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思想。」

該報結論認為「新中央政府」首先應「肅清中國人的這種思想」，然後才能希望「動員軍隊，順利進行肅清中國共匪的戰鬥。」

爲着與日本一九三一年以後對華的侵略，與羅馬柏林軸心的建立，和聯合歐洲遠東的侵略勢力的「三角反共」的組成相呼應，在中國國內，在國民黨和南京政府的核心間，也成立了一個親日反共派。遠在日本於一九三七年再度掀起侵華浪潮之前，這親日反共派在汪精衛領導之下，已和華北腐朽的反動派（日本曾用他們充當傀儡，組織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後來又命他們在北平成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維新政府」）爭奪主人的恩寵了。這親日派有過像是「綱領」這樣的東西，目的在使中國參加反共協定，爲侵略者服務以求得德義日對這一派的支持。

這一派的人物，對法西斯主義——特別是德國牌的法西斯主義——異常同情贊美，但他們的觀念的形成，主要還

是由於他們對日本在遠東的優勝地位的屈服。他們嘲笑武裝抗拒日本的大陸擴展的主張，說這主張是非「現實主義」的，和違反「社會科學」的。在他們心目中，中國唯一應走的「現實主義」的途徑，是與日本妥協，並和共集團「合作」。他們幻想在「反共」各國的支持庇護之下，這「綱領」可以使他們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獲得領袖的地位。他們堅持着不抵抗政策，一面又說中國「應靠自力」，而所謂「依靠自力」云云，就是說中國不能倚賴英美的援助以抗日，至於希望蘇聯的援助，更犯着使中國「赤化」的罪惡。他們認為中國政府的主要義務，是剿滅中國紅軍，這一點，使他們特別得到日本與德義的好感。而唯一能够援助中國的國家，在他們看來，就是德國與義大利。他們幻想以如下的手段，即在遠東負起「反共」的國際義務，並以英法美在華的利益與英美對南京政府的優越地位為犧牲，給德義日三國種種特權，來保存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

然而，日本軍閥並不贊成這種半殖民地的計劃，他們對防共公約在遠東的應用，也抱着完全不同的見解。他們不唯要求中國加入反共公約，而且要求中國與日「滿」成立「反共同盟」。只允日本向內蒙擴張，日本軍閥決不滿足，他們要求華北五省——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和山東——實行「自治」計劃，並禁止國民黨在此一區域內的活動。他們甚至還要求以日本顧問代替德義的軍事的和航空的顧問，並答應日本有權在中國大陸與沿海各個可能受到「共產主義」與「布爾塞維克侵略」的威脅的地方，常年駐紮海陸軍。這樣，日本軍閥本身已毀壞了親自反共派的基礎，使他們失去任何發展的可能，使他們甚至在國民黨中陷於孤立，使反對他們的，已不僅是中國的

民衆，而且是國民黨軍隊中——特別是中央軍——的軍官與士兵。

親日反共派永遠不能成爲一個嚴重的獲得廣汎的援助的運動。擁護他們的，始終只限於某些野心勃勃的老官僚與軍人，也就是不爲蔣介石將軍所重視而佔居次要地位的人物，同時也是追殺共產黨員與民族革命份子的專家。他們甚至不能捲起法西斯式的獨裁運動，因爲他們當中根本就沒有一個較有希望的人物。因此他們反而裝出贊同民主的姿態，藉以增重他們本身的身價和抑壓蔣介石將軍的地位的提高。此外，他們的計劃也得不到外國的援助，因爲德義不唯不想搶奪日本決定中國反共路線的霸權，還盼望日本軍閥能作充分迅速的行動。

西安事變的結果，給這親日反共派一個嚴重的打擊；而由於日本大規模的軍事侵略，中國民衆已一致要求抗戰，各軍各黨的統一戰線也逐漸形成，這更迫得他們暫時沉默，但他們並沒有放棄其一貫的主張。當戰事延長，蔓延內地，日本軍閥急想使這一派復活，以分裂中國和促成內戰時，於是汪精衛便再度露面，嚮應近衛邀請中國共同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聲明。然而日本只是多了幾個傀儡而已，這些傀儡如留在重慶，對他們還比較有點用處，但他們却逃了出來，在日本庇護之下，當了公開的漢奸。

當汪精衛離開重慶不久，他的老板會決定他的任務如下，這是日本各相在一九三九年一二兩月的議會中所說明的：

當時的首相平沼這樣說：

「雖然三民主義是業已在中國發展的主義，日本仍應加以適當的修正，因為牠對於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政策，頗有防害，特別是共產主義今日似已滲入了三民主義之中，所以修正更覺必要。」

外相有田說：

「戰事爆發以來，中國共產黨已迅速擴大了牠的毒惡的影響，而最後復進入國民黨政府的內部，在軍事和政治兩方面獲得控制的地。位所謂「持久戰」與游擊戰的策略，都是由共產黨首先推薦的。」

陸相坂垣更說得明白：

「假如蔣政權仍堅持其抗戰的政策，國共兩黨間合作的現狀，大概不會有顯著的改變……」

「在佔領區內各地，除主要城市與主要交通線附近區域之外，均為無數大小的匪幫所蹂躪。彼輩均聽從共產黨的或蔣政權的命令，其總數，華北約由三十萬人至四十萬人，華中及其他各地約為十萬人……為着肅清佔領區內此等匪幫，確需加倍的努力……」

「日本軍隊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須駐紮於中國，俾與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工作相配合。而為着防禦第三國際，也必須留駐相當數量的日本部隊，這是在反共協定之下所當然的。」

「日本陸軍正準備在必要時半長期的駐兵於中國。因此必需供給容納日本士兵的營房，目下，若干地方業已開始建造。同時日本駐屯軍也必需在當地取得糧食。陸軍當局現正研究將當地生產物作為日軍衣食住

等之用的方法。

「自然，利用華軍一舉，是迫切需要的和合理的辦法，假如牠的組成是爲着維持和平與秩序，同時牠又與日軍合作的話。」

一九三九年九月六日，在接待許多日本軍人與某些被挑選邀請的外籍新聞記者席上，汪精衛發出了他的應聲。根據上海遠東評論報（Shanghai Far Eastern Review 一九三九年十月份）的記載，「新中央政府」的使命，就是「結束抗日戰爭」，依他所說，這戰爭乃是「無益的和無意義的戰爭」。至於對內的政策，他的目的就是聯合全國以「達到傾覆目前的重慶政權的目的」。至於爲「自衛」以防游擊隊的民團，和公開擁護「和平」與「反共政策」的軍隊，則「一仍其舊」。至日軍之撤離中國，只有在「達到傾覆目前的政權的目的，和平再建，舉國統一」之後始能實現。關於對外政策，「中國將與日本合作，維持東亞之秩序」。而關於各國承認「新中央政府」的問題，汪以爲「可說毫無問題」。因爲他的「政府」是「真正合法的國民政府，不過清除共產黨的和爲共產黨所控制的分子，而代替以愛好和平的和反共的分子罷了」。最後，他又確言「中國與日本合作保護東亞，並不損害各國的利益。」

強迫中國放棄抗戰的唯一理由，就是反共——而所謂「反共」，就是承認日本獨佔中國大陸，切斷中蘇關係，以及伸展日本海軍的控制至南中國海，同時也就是破壞中國政治上最大的成就，即抗日的民族統一陣線。中國共

產黨領袖之一王明，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發表的文章中，曾說：

「爲着民族抗戰，中國已把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一切抗日黨派團結成爲一個巨大的集團。中國政府已經統一，中國的陸軍已經統一，幾千萬的人民大眾已走向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大道。」

日本口口聲聲喊着「反共」的理由，就是共產黨的第八路軍與新四軍在華北與長江下游組織抗日戰爭。平津秦晤士報編輯平奈爾 (W. V. Pennell) 在一篇題爲爭取腹地的鬥爭的通信中，對八路軍的光榮的戰鬥，有着動人的描寫，下面就是該文的節錄（見一九三八年七月上海出版的遠東事件 Oriental Affairs）

「在日軍佔領區中，新的抗戰運動的發展，已在晉北達到了牠的最高峯……共產黨所領導的華方軍民，現在實際上已控制了由原平（太原之北）至大同的整個地區，以及同蒲路兩邊的鄉村。在……此處以北，鐵路業已完全毀壞……著名之雁門關，以及關內整個地區俱爲華軍所控制。他們可以隨意在此地進出。

「實際上，整個農村均爲一組織嚴密的行政機構所控制，與此類似的機構，稍後又在冀中成立……一般人以爲華方防禦晉北的大軍，業已退至太原以南，其實這是錯誤的，其中大部（如數月後在晉南所爲）撤離日軍的進攻的正面戰線……開至同蒲路兩旁羣山之中。當戰事南移之後，他們便着手建立一行政機構；農民也開始農作，其唯一不同之點，就是在新軍官指導之下，接受緊張的軍事訓練。這些軍官都是青年，大都是北平等地的大學學生……中國游擊隊的武裝頗爲完備，甚至擁有大砲，不過在此戰區中，少能使用而已。

「強大而且非常有效的新中國行政機構的侵入內地，實在是最神奇而出乎意外的事情……日軍對這些機構毫無辦法，而在進攻之時，也只有使軍官與百姓認清互相幫助與互相合作的需要而已。這的確是個非常嶄新的現象……假如日軍只在某一省中遇到此種問題，那還不是不能解決的事情，但牠却蔓延及整個華北，遼山東也在內。」

在同一篇通訊裏，作者又引用了傀儡的告示：

「我冀省民衆，因缺乏生計流而爲匪，因受蠱惑，而爲赤匪。冀省青年因抗日而犧牲者，實難數計，幾有完全滅絕之危險。」

「你等冀省人民，今後決不應爲宣傳所蠱惑。務農者應即歸田，爲匪者應即贖誠，請求保安長官之統率。目下悔過，尙非過晚。但如你等一再蹉跎，則友軍由前線回兵之後，定將你等一體救平，其無後悔。」

最後，日本在華北此一區域中，使用「親善政府」的結果是如此：

「日本雖竭力組織親日政權，仍毫無結果。維持會不敢越出日軍哨兵保護之外……日本要獲得充分的幹練的，和親善的人員之輔助的，確難乎其難。日軍雖亟欲在民衆間宣傳親善與好意，但這些使命的宣揚者，因爲跟在日軍後頭，所以毫無成就。在駐有日兵的城鎮之外，到處進行着有組織的抗戰，這使他們的工作大受阻礙，假如他們冒險進入這些區域，馬上就有殺身的危險。」

因此，「友軍」要在遠東「加強反共集團」，似乎再也不能得到中國民衆的參加，相反，「友軍」且不能不保護那些在「反共」旗幟下組織起來的漢奸與傀儡。日本的侵華戰爭，結果只有引起強大的保衛中國的力量，並教訓中國民衆，使他們認清了革命的統一、民主的行動，與夫擊退侵略解放本國的決心，乃是實現三民主義，建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的基礎。

**第二編**

**中國民族革命和抗戰——抗日統一戰線**

## 第一章 蔣介石——抗日國防領袖

日本對中國的戰爭爲的是要分裂和征服中國民族，要獨佔中國市場，要把中國的領土和領海用作戰略根據地，使日本得以控制東亞和西太平洋。因此，這必然是一個對中國民族革命的戰爭，而這民族革命是以求得民族的統一和獨立，並且是從帝國主義的侵略，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束縛求得解放爲目標的。

領導着對中國民族革命的戰爭的是日本半封建的軍閥，他們指揮着海陸軍，是日本半封建國家的實際統治者。日本軍人要維持這一種優越的地位，只有阻止中國變成一個獨立國家，和繼續他的侵略政策，這一政策現在正打擊着中國民族的生存，威脅着整個的太平洋。它跟歐洲法西斯帝國主義集團的同盟只不過加強了日本軍人的獨裁制度，骨子上可沒有使那些既是帝國主義者，又是半法西斯主義者的日本軍人，改變了所採取的舊政策和舊方法。那些政策還在歐洲法西斯主義出現以前，在日本就已完備了，而歐洲的法西斯主義，也是封建的和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方法的集合體。

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在日本內閣裏有着控制一切的地位，因爲這兩大臣是元帥府（軍事上最高顧問機關）從海陸軍現役將領本身中間委派出來，而只對那些以天皇爲直接首腦的元帥府負責的。如果那些尊貴的元帥們把陸軍大臣或是海軍大臣撤回了，內閣非辭職不可；於是天皇所親任的內閣總理大臣只有等到元帥府指派

好他們的大臣的時候，才能够組成新內閣。在日本的國民信仰中間，天皇是「高高在上」的神明，是地上活着的上帝，是全日本民族崇拜的至高權威，他的統治權由他所信任的代表者們行使着，其間最主要的是海陸軍元帥們，這是本身具有絕對權威的組織，因而事實上決定着，代表着天皇的「真正意志」。他們當然又是天皇崇拜——以天皇爲「顯現的神道」的日本「帝國主義宗教」（註）的最忠實分子，他們便自以爲所負的最大責任是把這國民信仰推行於全帝國，務使日本國民人人認爲服從這信仰就是盡其宗教的及公民的天職。這一來，他們又少不得對人民的「教育」負責了，於是文部省的政策非和陸軍省的宣傳聯成一氣不可。當帝國學士院博士，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美濃部達吉在著作上確立了「天皇機關說」的定義，構成「文字獄」的時候，陸軍大臣領導着「美濃部事件」運動，決定了他的懲戒，革免了他學士院和本職，並且在貴族院把他除了名。

這「帝國主義宗教」只不過是日本的法西斯的政治哲學，和國社黨所謂真正的德國“Weltanschauung”（世界觀）相同。日本的軍人在其「帝國主義宗教」中間所崇拜的，是他們自身和他們征服世界的目標。爲要認識各政黨和選民保衛憲法權利的任何舉動是反對天皇和日本一切神祇的宗教的褻瀆行爲，他們把全國的神社和「國民信仰」的信徒們動員起來。這個宗教所包含的特殊信念就是：日本必須像「神國」似的完成其在地球

（註）B·H·張伯倫（Chamberlain）一九一二年在他探討着日本的天皇崇拜的新宗教的發明（在倫敦出版）上，引着當時日本閣員大浦男爵的話說，教日本人民信仰天皇崇拜就是教日本人民信「帝國主義宗教」。

上的使命，因此她必須爲本國造成地球上最大的帝國。而且這個宗教「證明」了日本民族的優越性，所依據的就是關於日本民族的神聖起源，及其具有最古的歷史以及最古的文化和文明的一種說法。依照這種信仰，天皇是日本民族的神聖領袖——他那最可貴的「珍寶」，則是海陸軍的現役士官，天皇是現役士官的首領，而後者則又是「天皇崇拜」的最可靠的保衛者。

依照着這種信仰，日本政府無非是天皇的最高權力的執行者；或則照前平沼男爵所說，「天道是日本國家行政的秘訣。」像人民有決定國家政策的權利那樣的思想已經是褻瀆的思想了，因爲只有天皇及其權力的執行者才能够曉得「天道」而有釐定它的路線的資格。天皇可以把憲政和法律作爲他的恩惠賞賜給人民，然而利用了這些恩惠來干涉天皇所信任的官僚政治，尤其是來干涉天皇的直接工具而用以進行地上「神國」的天道使命的現役士官，這卻是絕對使不得的。由此可見天皇和官僚政治之間，或是天皇和軍隊之間，決不容許民意機關插入一個地位呢。

這宗教本身，事實上就是一個工具，用以阻止那些具有民主權利的形式的進一步的「恩惠」給予人民。這是神社、學校和報紙製造出來傳播於日本人民的，爲的是要造成一個堤防，抵禦民主理想的澎湃，要把先前作爲「對人民的恩惠」而賜與的民主的權利和制度清算一番。這等民主的權利和制度被認爲有害於日本特有的國民性的外來思想，打擊着日本傳統精神的東西。萬世一系的皇室，據說由於從本國神祇創造着初則日本，後則我們地

球上「其餘地方」的神權時代流傳下來的威權，是從太古時候就統治着日本臣民的——關於這皇室的主義，又稱國民的宗教，一意要證明古代日本有德的君主操着專制權力的制度是完滿而無可改變的，遠優於任何「西方」的「政府形式」。據說由於顯明的理由，日本歷代天皇的主要德性是在他們戰鬥的勇氣，因而把這當作他們神聖性上的主要點了。凡是軍事的勝利都被歸功於尊貴的天皇及其皇室的神明的祖先（即日本歷代的天皇和神祇）的神異的影響。日本民族遵循着神們給他們所決定的途徑，也就漸漸變成了一種國，——這是爲要征略那些被稱爲低劣的別的國家而創造的。

這個「帝國主義宗教」，這個有「神聖的」軍人居着獨裁地位（他們在軍事上，經濟上及「教育」政策和運動上決定着日本國家行政的天道）的「民族的體制」全都傾向於征略，實際上是包含着和納粹主義一樣的成份。唯一的差別是「種族」和「民族觀點」上，這說明着下一事實：即在日本人看來，那「命定着要求統治的」是他們而不是希特勒有一次所說的「白種人」，而征服世界的起點則是「亞洲新秩序」，並非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說「歐洲的改造」。

一本日本的宣傳冊子二十世紀的奇跡（註）用了「近代的」法西斯術語把這些觀念全都表達出來。那冊子告訴我們：日本民族是神明指派爲他們的代理人來完成重大的職責的；首先呢，神明懲戒她，使她挨餓，而且威嚇

（註）二十世紀的奇跡一個日本人所作，一九三九年東京出版。

她，使她可以「滌除一切世間的污濁，堅強起來，而担当神聖的使命。」這時候現在是到了，新傳道師的衛道的熱誠，「一種求新生命求大陸上的擴展的熱誠」激動着日本新興的一代了。「今日的日本民族可以被認為世界上最適於生存的一個民族，經過若干世紀的選擇，洗滌和提鍊而形成的一個民族。」日本人民力量的因素就是：種族的純粹；父權的家族制度；全體人民在對於天皇的「完全的信仰，絕對的服從，和自發的尊敬心」上聯合成一家的，這種獨一無二的組織，以及軍事的力量，和道德的刺激，即願意承受亞洲的神聖戰爭的負擔這一種意志。

這一「神聖戰爭」拿中國做第一個目標。中國是日本達到別的一切征略和世界統治的唯一橋梁。就這種野心來說，日本半法西斯的軍人獨裁儘够和德國的納粹主義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比敵一下。根據日本的間諜的作者范士柏 (Amleto Vespa) 的報告，在「獨立的滿洲國」的日本特務機關的首腦是這樣地對他自定着日本人征服亞洲的事業（註）

「東亞全部是我們的勢力範圍，必須落到我們的控制之下。朝鮮，滿洲，蒙古和不久以後的中國及遠及伊爾庫次克的西比利亞都可以形成一個單一的帝國，即我們大皇帝所統治的日本帝國；這唯一的皇帝所以確實能够稱為天皇，因為他是天照大神的後裔，而日本人則都是神明的子孫。這不過是神明交付我國國民的任務程序的第一部分。其第二階段則要求着征服印度和太平洋的一切島嶼，還有遼及烏拉爾區域的西比利

（註）范士柏著日本的間諜，一九三八年倫敦出版。（該書已有中文譯本，譯者附註。）

亞。」

日本特務機關的首腦又補充着說：

「不要笑着這些宣告呵！神們決不說謊。日本的命運是神們所定的。日本要變成地球上最大的帝國，什麼都止不住它。」

在日本帝國主義看來，征服了中國就是對於西方帝國主義強敵，尤其是英美兩國最初的大勝利。日本半封建的軍閥只曉得一個大帝國的意義恰就是數量衆多的軍事殖民地。他們在亞洲大陸和太平洋的沿岸和島嶼上愈能割取而且征服這些殖民地，他們對於本國政府和日本人民的控制力也就愈強。在這一切征略的進行上唯一嚴重的阻礙在他們看來，就是列強在亞洲和太平洋的地位。據他們的估計，如果他們在遠東完全排除了列強的勢力，那麼中國的征服就已經可以拿得穩了。當然，他們同時未始不覺得，在本國以及他們所要征略的那些民族中間，少不得也會見到反對這種程序的情勢。這方面最重要的是國內陣線。日本軍人使資產階級各政黨屈服於軍事的壓力和獨裁之下，而不忘記使用一切直接及間接的卑劣手段。他們組織了嚴厲的警察權力來控制日本人民，阻止而且鎮壓工農大衆的組織，取締大學學校和新聞界的危險思想等。同時靠着「帝國主義宗教」靠着征服大陸以後富強的前景，尤其是靠着「一種使日本人民相信中國和中國人民容易爲日本所征服的手段，他們有計劃地拉住了人民。」

日本的軍人們確乎自信着：只要他們在國內方面繼續照原有那樣維持勝利，中國當然阻止不住他們的。在先前和目前的帝國主義戰爭中間，他們從英日同盟從歐洲法西斯列強，而一般地說來，則從一切關心於日本對蘇聯的進攻的帝國主義列強所獲得的助力也是用以摧毀，鎮壓國內一切反對派，用以抬高日本軍人的帝國主義野心的巨大的助力。他們用了畏懼和憎恨所產生的輕蔑心理，用了半封建思想的典型的無知態度，注視着中國民族革命的進展，一面猜想着中國的落後勢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動勢力會幫助他們來破壞這革命。

一九三八年春間中國大本營政治部所發表的，一九三四年蔣委員長對廬山軍官訓練團的訓話中，他這樣地指出日本在中國的目標：

「大家必都知道日本現在強佔了我們東四省；第二步，定要進佔我們河北，綏遠，察哈爾甚至山東，山西這些地方；他們要併吞整個中國，是不分東北和西南的。」

蔣又在那裏把日本軍人對中國民族革命所抱的態度敘述如下：

「現在日本的軍人先抱定一種併吞中國的野心，和一種極端輕視的成見來考察中國，研究中國；所以其結果只見到中國的壞處和弱點，絕未見中國的長處和強點。只曉得物質，特別是武器的重要，不知道精神，特別是主義的力量，只明瞭中國人失敗的原因和亡國的歷史，不認識中國人自強的精神和革命復興的事實與趨勢；也可以說，只明瞭過去的中國，不認識現在的中國，更沒有看清中國的將來。」

「日本有一本書說『現在中國的軍隊只知道從事國內的戰爭；國家的觀念和民族的意識一點也沒有。非在廿年以後，中國的軍隊不僅不能和外國打仗，而且不願和外國打仗。』日本人現在看我們的軍隊是這樣的，可是他那裏知道他看錯了！

「這一本書是一個『支那通』做的……現在日本人著這本書，說我們中國的軍隊，非過廿年以後絕對不能和外國作戰；這同他在民國十五年以前，說我們中國軍人沒有國家思想，沒有統一國家的觀念，是一樣的出於惡意來逆料我們。他們一般所謂支那通，因為根本的偏見太深，也並不見得會有怎麼一個『通』法。」

在同一訓話中，蔣委員長講到日本的佔領台灣和琉球爲的是要進攻華南，而其佔領朝鮮和東四省則爲的是要從北面進攻中國全部，接着他喚起他的軍官的注意來！

「我們既然沒有國防，日本人也不許我們有國防。如果日本人有一天的武力，他決不許我們有整頓國防的一天，亦決不許我們中國有統一的一天。」

「日本的軍人確是愚妄驕橫到無以復加。他們在中國無論那一個地方，都布滿了偵探；無論什麼事業，他們都很注意調查。所有中國的軍事政治如何腐敗，社會如何紛亂離離，經濟如何貧困崩解，以及人心如何卑劣自私，國家如何不統一無組織，這種種情形可以說他都已看透。因此他敢大胆來侵略中國。」

「他們對於中國的歷史也有研究，他們看到中國在歷史上有幾次都是自己軍人和國民不爭氣，結果國

家被外國人滅亡了。比方元朝和滿清都會挾強大之武力侵略中原，統治了中國；他們以為現在的中華民國也與宋季明末完全一樣，逃不了歷史上亡國的覆轍。還有他們格外知道清楚的，就是中國的軍人中間會有一個最惡劣的國賊就是袁世凱。日本人認我們現在還是同袁世凱沒有死的時代一樣。因為他所造成的自民元以來中國軍人一切爭權奪利，貪污卑劣，驕奢淫佚，自私自利的惡習頹風，依然存在。

「日本人無論如何，不許我們革命的力量來統一中國，不願意我們中國有一個統一的政府，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如此他就可以從旁操縱一切，使我們內亂不已，自己來消滅自己的國家民族。」

「日本一看見我們革命軍到了山東，張宗昌失敗的時候，他馬上派兵來佔濟南，出動軍隊，要擋住我們國民革命軍，不許我們革命的力量到黃河以北。」

日本的封建軍人的心理委實是很難了解今日的中國的。日本軍人們已經教清朝末代的溥儀做了「滿洲國皇帝」，他們久想把他簡直搬到北平去，以爲這該可以叫中國人確信「天子」復了聖位罷，這聖位是革命迫得他離去的。究竟蔣介石跟溥儀比較起來怎麼樣呢？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大連出版的滿洲雜誌上載有日本作家井上的論文中國事變，其中說到蔣道：「僅僅是一個軍事冒險家，就其出身，甚而就其先世來說，都沒有什麼尊貴的威望，他對中國大眾的控制力是一向並不強固並不深切的。」

蔣委員長的確沒有尊貴出身這一種威望——他有着的威望是由於他現在的地位，即那決意抵抗日本的侵

略的全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這一個地位。日本的侵略使他獨特地顯耀出來，他便從國民黨的領導地位來領導全中國軍民擔當驅逐侵略者出中國領土這一項任務了。

蔣委員長的反日抗戰政策就是中國民族要擊敗日本侵略這一個意志。他做着全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和中國國民政府實際的元首，正是中國人民最所信任的領導民族戰爭的人物。中國還不是民主的國家，因此中國人民並不享有那些公民權，使他們能够經由民選的代議機關來選舉國民政府及其元首，並且決定其政策的。然而明確地朝這方面前進的革命，中國卻正要經過。蔣介石的生涯正依附於中國當代的革命史。由於這一革命，他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才做了當時在南方成立的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又做了北伐的一個領袖，來推翻封建的軍閥，建立國民政府，又由於這一革命，才造成了，爲當前的反日抗戰而內戰停止全國統一的局面，而蔣介石這才被托付了一個使命，這就是遵依了民意所決定的政策，做着最高統帥來領導這鬥爭。他的任命狀實際是革命所頒授的，這革命在民族存亡之秋及未來，是始終有方法和手段來表現人民的意志，來保證這意志的被尊重被實行的。

在一九三四年的訓話中，蔣委員長叫苦道：

「我們中國有幾個跋扈的軍人，的確有意找着機會要來搞亂國家……所謂不愛國家不愛民族割據稱雄，自私自利的跳梁小丑，不過是國民的公敵，民族的罪人。

「所以我們中國的軍人，尤其是我們中國一般有覺悟的將領格外的苦痛，因爲他認識自己所負救國責

任之重大，而痛恨軍閥據坐大之不能覺悟。」

接着，蔣要求各省的軍人承認他是忠黨忠國大公無私的最高統帥，便說道：「如果我要自私自利不忠於主義，不忠於黨國，那麼無論那一個部下都可唾棄我仇視我。」他對國民的許願是：

「今後中國的軍隊要做公的軍隊，國家的軍隊，真正保國衛民的軍隊；不要做私的軍隊，禍國殃民的軍隊。」

他要求着指揮統一，使全國軍隊能够完成其任務：

「只要大家能絕對服從革命軍的統帥。在一個最高命令之下，要我們守就守，要我們攻就攻，要我們退就退，要我們進就進，要我們生就生，要我們死就死，服從命令的話，我們相信革命的統帥一定可以有革命的戰術戰略，可以戰勝一切，達到我們最後的目的。」

「我可以自信，如果有六十萬以上真正的革命軍，能够絕對服從我的命令，指揮統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敗這小小的倭寇。老實講，他們那一般驕妄愚蠢的軍人，完全不在我的眼中；我一定有辦法可以戰勝他們；而必要的條件就是要指揮統一。」

一九三六年六月，國民黨西南政務委員會，實際上就是當時廣東、廣西兩省軍事統率者陳濟棠和李宗仁兩將軍會經發出通電稱：他們決率師北伐，担任抵抗日本侵略的前驅，同時嚴責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們責怪

蔣不能盡中國總司令的責任來抗禦日本的威脅，也就不應當要求他們來服從，他們所以有這一種反抗態度，無非企圖利用了要求反日抗戰輿情來證明他們不服從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正當。蔣介石回答着說，軍事和政治的統一正是抗戰的先決條件，接着還責斥那些破壞統一助長內戰的軍人們實際上正幫助着日本軍隊。

在這種衝突中，雙方都不得不考量人民對於停止內戰和武裝抵抗日本侵略這一種日益滋長的高潮，要抓住民族的力量；那救國運動發端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北平學生反日示威運動，當時雖時有領袖們被迫害被監禁的情形，這運動還是全國蔓延着。然而這種企圖卻全然失敗了，因為代表着求統一求抗日自衛的人民呼聲的救國運動是不能用以培養不統一和軍人的野心的。雙方面所碰到的民衆的要求就是把這衝突和平解決，而主張南方的省軍服從蔣的最高指揮。廣東省軍的大部分接奉了對蔣作戰的命令就轉向來反對陳濟棠了。最後的結局是跟北方日本的軍事壓力所喚起的國民的公斷一致的。這公斷就是：停止內戰，在蔣的最高指揮之下，南方跟國內其餘部分聯合起來，並要求國民政府不再繼續不抵抗政策，而領導全國武裝抵抗侵略者。

對南方的內戰這樣地挽回了又一個具有更大意義的衝突則在中國西北醞釀着。就南方的衝突說，人民的關心是在阻止南方軍隊和蔣的部隊間內戰的爆發，使雙方聯合於政府之下，以遏阻日本的侵略，至於在西北呢，則人民的關心是在終止國民黨軍隊對中國紅軍的內戰，終止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大衆運動的「清剿」戰爭，並且

結成統一戰綫來抵禦外敵。遠在南方的衝突以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領袖毛澤東向南京政府和國民黨呼籲道：「爲了對日本的鬥爭和我國的解放，全國各黨各派應當建立統一戰綫，願意用盡我們一切力量來實現這偉大的目的。」政府的答覆是命令西北張學良將軍部下的軍隊來進行對紅軍的「清剿」戰爭。這命令是跟全國洶湧的人民反日運動，尤其是跟奉調繼續內戰的中國西北部隊大不對勁的，這些部隊大半是因日本的侵略而被逐出家鄉的前東北軍。張學良眼見得強迫他的士兵和軍官去打中國紅軍的抗日隊伍，無非落得他的軍隊潰散喪失的結果罷了。他要保持軍隊的統率權和部下的信任，他自己便漸漸的同情於求謀抗日統一戰綫的人民運動；由於同樣的理由，楊虎城所統率的陝西省軍也抱着同一的情緒和同一的政策。在這個情勢之下，發生了異常嚴重的危機，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張學良和楊虎城對蔣委員長長的叛變。當蔣委員長在西安的時候，他們把他扣留了。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期間的情形和這個危機的解決又復顯示着：中國人民大眾是把抗日問題看做中國當前最緊急的問題的。中國人民，連軍隊的各級人員在內，日益堅決地想定：如果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對於實現抗日統一戰綫這一種人民的要求堅執地加以拒絕，那就要用革命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了。對中國紅軍戰爭的繼續成爲全不可能的事，西安事變就是其最後的證明。在另一方面，張學良和楊虎城所用的那樣對委員長長的非常手段造成了全般的內戰的危險，這就抗日統一戰綫的利害觀念上看來是非消弭不可的。中國紅軍的領導者和共產黨抱着這一種精

神，要求立即釋放委員長，這一點蔣夫人所作的西安事變回憶錄（註）上（和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合冊出版）也證明着。蔣夫人在那書上說：

「我等此次到陝，尙未聞赤禍之威脅，有如外間所傳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黨無劫持委員長之意，且主張立即恢復其自由。」

這危機中間又偶然地顯露了一個事實，就是內戰的威脅與其說在西安，遠不如說是在南京，尤其發生於接近汪精衛的軍人方面——全不由於挽救他的生命或是他那全國領袖的地位，他們覺得更重要的倒還是在挽救不抵抗政策，這是跟國民黨要繼續動共戰爭，鎮壓人民反日運動這一種政策，有機地相配合的。蔣夫人在她所說「余已陷入甲冑森嚴與戰鬥意識瀰漫之重圍中矣」這番話裏描出了這一點。接着蔣夫人提醒他們，威脅着國民政府的存在的就是他們那種態度，她說：

「今日國難至此，若無委員長，即不能有任何統一之政府，今令委員長外，更有孰能領導全國者乎？」

最後的結果是：經過了集中的努力，尤其經過了中國紅軍發言人在西安的一番力爭，蔣的生命和安全上所受的威脅迅速地消弭了，而全國統一的主張則面對着日本的侵略獲得了最大的勝利。蔣的終於恢復自由，內戰的消弭以及西北方面對中國紅軍戰爭的終止，全中國的人民是用反日的羣衆示威運動來加以慶祝的。這一危機的結

（註）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蔣夫人西安事變回憶錄一九三七年上海出版。

局，蔣委員長出現爲中國抗日統一戰綫的領袖，這是中國人民認爲本身的勝利而值得慶祝的事。這樣，又同南方衝突的時候一樣，中國人民的公斷是停止內戰，爲了對日的防禦，全中國在蔣委員長最高的指揮之下統一起來。然而這時候，覺醒的中國人民卻不但阻止了中央軍和各省軍隊之間的內戰，而且使那一種對付共產黨和對付中國民族革命左翼的反革命運動也終止了，同時則又導引中國採取了蔣中山所定的人民聯合陣綫的革命政策來保衛其民族的生存。

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所代表的中國上層階級見着日本日益擴張的對中國的侵略，不得不重回到民族革命政策，和廣大的人民大眾相聯合。然而爲抗日計的國共合作卻並不像一九二四年的情形那樣，出於國民黨方面的發動。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改組了國民黨，爲的是要喚起民衆動員民衆，以求國民革命的實現。現在統一戰綫的建立則出於民衆本身和共產黨連同國民黨內進步分子的發動；大家協力來消除內戰，爲的是要實行統一中國。這個最緊要的任務來對付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蔣委員長做了中央軍總司令而有志於實現軍事的統一，他自己正受着日本侵略目標的最直接的威脅。蔣又明白跟侵略者戰鬥的必然性，而戰鬥只有靠着中國的統一才能够勝利。然而過去那些鎮壓人民革命力量的方法卻曾犯了團結抗日的目標，這目標只有靠着革命的人民大眾的直接參與才能够實現，因爲革命的人民大眾才是抗禦帝國主義侵略和國內半封建的腐敗狀態最重要的民族力量。這些力量要求着抗日的真正的統一，這種統一所憑藉的唯一可能的廣大基礎廣泛地說是在全民族，而特殊地說，則是

在革命人民大眾爲了決定的抗日鬭爭，他們又澈底明白蔣介石在中央軍、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地位的重要。事實上他們是不問一九二七年以來動亂的十年間所遭遇的一切苦難和委屈而準備向委員長退讓的，這所退讓的就是蔣和更甚於蔣的國民黨右翼並不準備退讓的，換句話說就是：爲抗日的統一而消滅國內的衝突。外來的威脅和要救中國，求民族的生存，並且爭取民族自由這一種人民的革命意志，兩者終於在最後關頭確定了唯一可能的行動路線。毛澤東所籲求的「爲抗日的鬥爭和我國的解放計，全中國各黨各派統一戰綫的建立」經由一個革命過程而實現了。這革命過程使人民大眾運動和全國軍隊聯合起來對付侵略的威脅。又由於同一的過程，大家確實地體會到抗戰不好再延宕下去了。一方面有着全國統一的局勢來對付日本，另一方面中國則又遭遇着侵略者的野蠻的攻擊，蔣委員長的決意領導抗戰和全國的熱烈擁護，便愈益顯出非統一戰綫無以救中國的道理了。

在一九三四年的訓話中，蔣就中國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可能性表示了如下的見解：

「我們中國沒有現代作戰的條件，不够和現代國家的軍隊作戰。如果不待時而動，貿然作戰，那只有敗亡而已。」

「日本人是三四十年的準備工夫，來佔領我們東四省；現在佔領之後還無可奈何……現在如果再要將我們內蒙和華北諸省整個的吞下去，至少也得要用二十年十年工夫罷。何況我們關內一般民衆，反抗他侵略的力量和民族的觀念，一定要比關外的民衆強大；而且華北各地與列強的歷史和利害關係，更要比東四省復

雜；日本人如再要來侵佔我們內蒙華北比東四省一定更難過數倍。」

蔣委員長進一步告知他的軍官們只要中國運用「外交策略」那麼「所需要的軍事費用就不會怎麼嚴重。」我們在這裏不要忘記這番話是一九三四年南京政府繼續其不抵抗政策的時候所作的，如果我們讀他的訓話中如下的幾節，那麼蔣心中所懷抱的「外交策略」也澈底明白了。

「日本現在的目標已轉到蘇俄，將來在和蘇俄作戰之前，一定先要佔領我們內蒙和華北各地；然後他在戰爭中才可居於穩固有利的地位，才容易戰勝蘇俄……他現在最大的一個敵人就是蘇俄。」

「我們中國是日本所要打的正面，但是他主要的軍事力量如果用在正面，一定要失敗；所以我們看得很清楚，美國在後方，俄國在他右側面，英國在他左側面。大西洋最大最強的敵人都在他的側背，他有什麼方法可以拿全力來征服我們中國。」

「在這種長久的時間和複雜情形之下，我們無論如何也可以有方法來抵抗他，收復我們的失地……只要我們全國軍人能够覺悟，共同一致來保國衛民，國家能真正統一起來的時候，不僅可以發揮我們的武力來戰勝他，而且不必一定要用多大的武力，只須運用相當的戰略和外交的國策就可以使他屈服在我們面前。」

在東三省和熱河被佔領時候的不抵抗政策的後面以及在塘沽停戰協定和何梅協定的締結的後面的那些考量，推論，和辯解，我們在這裏得着一篇清單了。這樣的政策的堅持在意義上就是以實際的不抵抗來對付華北和

內蒙所受的征略，而惹起更進一步的征略來——正如對東三省的侵佔的不抵抗無非鼓勵了侵略者一樣。一九三五至三七年間要求抗戰的民衆運動的勃興在意義上就是人民對這政策的憤慨日甚。那些阻止中國動員其全國力量來抵禦侵略者的主要障礙並不在「中國沒有作戰的迫切需要」也並不在東三省人民的「民族主義觀念」比華北的人民薄弱，這一層中國人民日益看得分明了。只要中國人民和中國武裝軍隊結成了民族革命統一戰綫，那麼，抵抗東三省的侵略就恰和抵抗華北及國內其餘地方的侵略一樣地是可能的事了。這等抵抗的「恰當時機」是因實際的侵略而定的；只有在對侵略者的戰爭的基礎之上，「外交策略」才有助於中國。然而要是沒有統一戰綫，即革命的抗戰政策，那麼，除卻依賴「外交策略」而落到領土日削的結果以外，就一無辦法了。

蔣委員長自己把這兩個矛盾的觀點都在同一訓話中表白出來，他又指出革命的抵抗政策和統一戰綫的策略的各種優點。這些部份顯然含有着一種以反日統一戰綫作為論據的政策，蔣說道：

「我們的軍隊是革命軍，日本的軍隊則是反革命軍……我們革命軍和反革命軍鬥爭，被侵略國與侵略國的軍隊作戰，一定要有革命軍特別的戰術，要有特別的革命精神，來抵抗外敵橫暴的武力與優裕的物質……我們要戰勝敵人，不在武器，不在物質而在我們的精神。無論古今中外，那一個國家皆遭有寇患，而且這外寇一定挾有強大的武力；如果被侵略者僅僅靠軍隊靠武力抵抗他，一定抵抗不了的……各位將領可以知道，並不是日本有大砲來，我們一定要以大砲去對他；日本有飛機來，我們一定要以飛機去抗他，決不能說日本有新

的東西，我們一定要拿新的東西去對付他。如果說敵人拿飛機大炮和一切新的東西來攻我們，而我們亦除了飛機大炮和同樣新的東西之外再沒有法子可以對付；那麼這些新的東西，我們不僅三年五年趕他不上，恐怕三十年五十年也趕他不上。

「蘇俄在西伯利亞，當民國八九年的時候，不僅是日本人拿武力侵略他，美法英國的軍隊也都要聯合進攻，封鎖他們。當時他們並沒有強大的武力可以對付這些外敵，他們只是拿革命的方法，革命的戰略來抵抗外寇，居然幾年工夫，就衝破難關，達到完全自由平等的地步。」

自從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進攻蘆溝橋以後，蔣委員長歷次所發表的宣言給他要為中國民族的獨立，在抗禦侵略者的戰爭中領導統一的全國這一種決心提供了充分的證據。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在牯嶺所發表的演詞中，蔣說道：

「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

「至於戰端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在一九三七年雙十節的前夕從南京的廣播中，蔣說道：

「我們國家這二十幾年來分岐散漫，從來沒有一個時候像今天這樣具有舉國一致的團結精神的，更沒有像今天這樣能够整個的對外抗戰。現在我們是意志統一，精誠團結了。由於我國統一團結，使將士們的犧牲，發生加倍的力量；由於我們統一團結，使世界各國對我們生出無限的同情和贊助。」

「國際的同情足使我們興奮，但決不可以有所依賴。我們必先自助，他人始能助我。」

「……我們要繼續鞏固團結。我們已經在抗戰開始時證明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力量偉大……：只要全國同胞齊心一志，照着三民主義的目標努力邁進，相信沒有不能達到成功的。我個人既受中央的付託和國民的屬望；必定始終追隨着全國同胞，領導全體將士矢忠矢勇，雖僅餘一兵一卒亦必奮鬥到底。」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從行營對國民的廣播中間，蔣宣告道：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此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瞭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堡壘，以制敵之死命。」

「敵人此次侵略中國，其最大目的固不僅欲佔我土地，屠我人民，滅我文化，而尤在消滅我三民主義與革命之精神……誠使我全國同胞不屈不撓，前仆後繼，隨時隨地皆能發動堅強之抵抗力；敵武力終有窮時，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統一戰綫政策在國民黨中間還須遭逢種種的困難，從下一事實可以看出來。日本進攻蘆溝橋以後經過了三個月，直至一九三七年九月底，蔣介石的文告方才發表了，其中告知全國說，中國共產黨和前中國的紅軍是抗日統一戰綫的緊要部分。蔣的文告是答覆數個月前中國共產黨所發表的宣言的，該黨在那宣言中，把它所抱的決心重申一番，說是決意把它軍事上及政治上的一切力量置於蔣介石的領導之下，効力於全國對侵略的抗戰。而且當蔣的文告發表的時候，那改稱第八路軍的前紅軍在北方前線跟日軍作戰已經有一個月了，他們所駐紮的陣地是蔣介石的命令所指定的。蔣對共產黨宣言的答覆一部分這樣說：

「此數年間，中央政府無日不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相號召。凡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効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之下，而一致努力。

「中國共產黨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供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在西安事變以後，只有進攻西北方面中國紅軍的軍事行動是不繼續了，接着這紅軍便改編為第八路軍。他們提議着把這解決辦法推行於留在南方的那一部分紅軍，這原是為要掩護紅軍大部分從江西向西北的長征而留

在那裏的。共產黨請求着：或則准許華南的全體紅軍和第八路軍編成一氣，或則把他們改編爲南方的抗日部隊。國民黨時把這兩種提議都拒絕了，直至日本進攻蘆溝橋以後，凡是在南方跟共產黨隊伍作戰的政府軍方才完全撤回了。在西安事變以後，這最後一次國民黨對中國紅軍的戰功中間，南方的紅軍已喪失了很多的實力。等到政府軍把這戰役停止了，地方當局便和共產黨部隊成立了武裝和平的局勢。北伐時代曾任第四路軍師長的葉挺在日本進攻上海的期間，向蔣提出了一個建議，主張把南部及中部各省分散的紅軍合編成一支新軍來進行中國中部抗日的游擊戰爭。這項建議蔣委員長加以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者當然也同意着這種改編，事實上這就是該黨自從爲統一抗日門爭編制第八路軍以來一直所主張的要求。蔣雖有了這樣的決定，而這些共產黨部隊卻竟延宕至中國軍退出南京以後方才改編起來，改稱爲新四軍，以葉挺爲軍長，而前紅軍領袖項英則爲副軍長，至於這些改編的部隊終於能够在長江下游前線佔得陣地則還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的事。

我們這才見到：中國民族革命的基礎上，經由這種革命的政策，終於不顧一切的阻礙而實現了中國一切軍事力量的統一，這實際上就是中國統一的國軍的創造，連蔣介石的領導抗戰上所體現的指揮統一。只有以中國民族革命的種種進步爲基礎的統一戰線重新建立起來，才能够應付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民族生存的危害。換句話說，只有在孫中山所計畫的中國民族革命的基礎和政策之上，統一的中國的實現，及其廣大的民衆力量的動員才是可能而有把握的。中國革命的推進力量是中國人民大衆，也就是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農民等社會各階級的集

合體，他們的利益和前途要有着落，只有等到中國從外來的帝國主義及其同盟者——即那些使民族匱敗下去削弱下去的半封建的剝削勢力和壓迫勢力——解放出來。代表着中國社會這些階級的利益的主要政黨是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黨的共同鵠的則是中國民族的統一和獨立，只有經由民族革命的鬥爭才能够達到，而這種鬥爭是以民主政治的實現於自由的新中國爲目標。而在民主的基礎上發展的。統一戰綫在這裏的意義就是革命的各黨以及一切革命勢力的合作，爲的是要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關於動員中國民衆來開闢中國解放的道路那些政策實現出來。獻身於抗日鬥爭各前線的中國大衆的結合所憑藉的最堅實的基礎就是這一種統一戰綫；使抗日鬥爭在性質上顯得是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法西斯的奴役制的真正民族革命及民主的戰爭的也就是這一種統一戰綫。爭取統一戰綫的鬥爭因而也就是爭取自由中國的民主構造的鬥爭。中國人民不顧一切的阻難而產生了對日抗戰的民族政策，造成了停止內戰結束勳共的局面，這才鋪好了道路，使抗禦侵略者的民族統一戰綫得以建立——中國人民這一種所盡的偉大的任務，決定了國防的方向和途徑，也就充分地證明了中國對於革命的民主政治的需要和成熟。

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在共產黨所統轄的特區的首都延安和我會見時，這樣地闡釋着統一戰綫的使命。

「我們把近十五年來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的各種關係研究一番，就可以了解中國在民族革命的進展

中間維持生存的種種條件。我們可以把這些關係的歷史分爲三個時期，即一九二四至二七的統一戰綫時期，一九二七至三六的內戰時期，以及目下抗戰中又一統一戰綫時期。

「中國五十年來的主要教訓是什麼呢？」

「在一九二四至二七第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既沒有它自身所統轄的什麼特區，又沒有奉委員長的命令在前線捍衛祖國的第八路軍和新四軍。然而我們的黨和青年組織，結合着數十萬黨員，却在中國革命的前線行伍中間，正同現在一樣地盡着最積極的任務。共產黨在這時期，參與了國民黨的組織和民衆工作，這是有着極重要的意義的，因爲由此引起了民族革命和國民黨本身急劇的進步。我黨領導着組織着人民大衆運動；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之下，動員着人民來贊助南方的統一，在反英罷工和抵制日貨運動中，盡着我們領導的任務，協助着改編南方軍隊爲國民革命軍，動員着人民來贊助國民革命軍和北伐，在這勝利的戰役期間早期的行伍裏作着戰，這一切證明了我黨對於革命的忠實和犧牲。這一時期要是沒有統一戰綫就不會有什麼偉大的革命勝利，也不會有北伐，甚至於南方的統一局面。

「在一九二七至三六第二時期，國民黨所領導的統一戰綫的破裂，對革命者的迫害以及對我們紅軍的內戰使國民革命可怕地退步了，其結果威脅着中國的存在。共產黨能够守住本身的精神。作着工人和貧苦農民的黨，又能够在政治上軍事上加強其組織，繼續其爭取民族獨立爭取民主政治爭取受半封建的束縛的農

民的解放這一種鬥爭。國民黨的清共使我們受了許多的苦難，使革命者喪失了幾千幾萬。然而新的革命分子卻加入了我們的隊伍和軍隊，爲的是我們的黨及其所定的目標總是會存留下去，而繼續其救國救民的鬥爭的。可是由於內戰，民族革命是創巨痛深了，因此國民黨和我黨在這時期都是不能獲致勝利的。兩黨都只有靠着統一戰綫才能够致力於謀求中國的解放，而這統一戰綫直至我國大塊的土地受了侵略，我國的生存受了威脅之後重新建立起來了。

「在目前的對日抗戰中間，統一戰綫的意義又復是我國的軍隊和人民，政府和人民，工廠主和工人，手工業師傅和學徒，農民，佃戶和地主之間反日的結合了。日本軍人們製定了他們征服中國的計劃，可不會考慮到中國人民大眾有百分之九十，由國民政府領導下的抗日鬥爭統一戰綫動員起來一定會惹得侵略者的慘敗的。人民是統一戰綫的基礎，黨是其一般的幹部，軍隊是其工具，同時國民政府則是指導全國對外族侵略者作戰，以求民族獨立的勝利的機關。對於抗戰的勝利，對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着基礎的新中國的建設，國共兩黨的合作是有決定性的。」

## 第二章 中國的國軍和抗日戰爭的戰略

一九一一年前清帝國崩潰的原因是在它不能抵禦外來帝國主義的侵入。由於它的封建性，它不由得助長着

帝國主義所進行的分化中國的工作。在另一方面，它的腐敗狀態及其內部的極度虛弱又使它日益無法控制國內革命的各種運動在全中國的發展。等到它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中間覆亡了，立即又有一個新的反革命抬起頭來；由於腐敗的軍人勢力跟帝國主義和買辦勢力的結合，這反革命比清帝國顯得更兇險更有力得多。據有着地盤的中國封建軍閥的雇傭軍隊於是變成了帝國主義的主要工具。因此當時潛伏着的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剷除中國的軍閥。和這任務最密切地相關的目標則是創立國民革命軍以作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工具，並且在革命的國民政府之下把中國統一起來。

軍閥的軍隊因爲本身的機能是在特殊的地盤以內，對於人民的壓迫機關和剝削機關，以及用戰爭作工具來謀求本身的擴張，所以他們是絕對不能保衛國家，甚而至於保衛本身的地盤以免外國的侵略。這些軍隊不是彼此的互相交戰，就是保持着武裝中立的狀態。任何軍閥都不容許別省的軍隊踏進他們的防區，除非這是在共同對付敵對集團的內戰中間的同盟者。即使在這樣的時候，各個軍閥的部隊也少不得有些互相猜忌。直到一九二七年爲止，國際所承認的北京政府沒有集權中央的軍隊，只好依賴這等各省軍閥的軍隊。因此北京政府本身就是各省軍閥用以把持中央稅收擴充軍閥地盤的代理人，且不說它那充當着外來帝國主義的僕人的機能。這樣地生根於軍閥的軍隊的整個體系就是那使中國人民遭受犧牲的不斷的內戰的禍胎。大家把兵士看作禍殃了，窮人們尤其是如此，他們對於兵士往往比土匪還害怕，這也是有着理由的。這樣的軍隊只在攻打同樣的中國軍隊的戰役上才

中用。北方的軍閥尤其可以說是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土地上用以給它們作戰的工具。

在軍閥制度本身沒有遭遇到那一種足以影響其武力的強盛的革命大眾運動的期間，凡是爭取各省軍閥來參加國民革命的主義的種種嘗試是勢必至於落到失敗的。孫中山用聯合陣綫的諸政策改組了國民黨，號召了民眾組織來參加民主的合作和革命的義務，從而使救國工作堅穩地確立於人民利益的基礎，並且給民眾運動開闢了途徑。從此以後，他在南方的救國工作方才漸漸有着成效了。國民革命軍的核心有了這種基礎得以建立起來，又由於這種基礎，它對北方軍閥和北京政府的討伐得以勝利，而國民政府則得以成立。因此，蔣介石所領導的這國民革命軍本身就是革命的創作，它那民族統一的目標只有靠着革命大眾運動的支持和中國民主政治的進步才能夠成爲堅定的現實，因爲這種運動在本質上真正是全國的、省際的、向心的；這是堅實的集合體，具着抵禦帝國主義的干涉和侵略的巨大的動力，同時又是國內封建勢力及其黨派所造成的封建政治和腐敗狀態的最猛烈的敵人。那志在統一全國的領土，把全國軍隊改編爲現代的國軍而使其在統一指揮和國民政府的權力之下衝圍衛民的中央軍拋開了民主的大眾運動，是物色不到更好更強大的「同盟者」的。

一九二六至二七的北伐促成了全中國最反動的頑強的軍閥們的失敗，就是這一革命的內戰給國軍的統一編制打定了根基。而打定了北伐本身的根基的本是南方革命大眾運動的勃興，乃至華中和華北各地國民革命運動的高漲。北伐所以獲致迅速的軍事勝利的主要理由是在它的武裝軍隊和廣大的人民大眾之間有機的聯繫。

北伐在事實上有着兩個各別的階段，由一九二七年的甯漢分裂分開來。在第一階段，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勝利都是迅速而不間斷的，同時民衆運動則配合着軍事活動。在統一戰綫破裂後的第二階段，國民革命勢力中的兩個集團分離開來，便愈益互相敵對了，結果是北伐必然地歸結於僅僅北方軍閥名義上的歸順，軍閥勢力跟南京政府軍事力量的一般的妥協罷了。國民黨事實上變成了這些不統一的軍事陣營及其利益的政治表現；他們的利益是互相衝突的，只靠着他們那一種對抗民衆方面民主革命運動的鬥爭才聯合在一起。

在北伐時代作過戰的葉挺將軍現在統率着新四軍，這支軍隊則正在長江下游的淪陷區域領導着抗日的游擊戰爭。一九三九年春季，在我訪問這一區域的時間，蒙葉挺將軍接見，當時他把中國革命的那一光榮時代追敘了一番。

「我們開始北伐的時候，一共只有五萬兵，而我們的敵人，吳佩孚和孫傳芳手下的軍隊則有三十萬人以上，裝備和武器都比我們的隊伍強得多。我們的隊伍所以通過了湖南、江西和湖北而神速地前進，以及軍閥們所以慘敗都由於我們軍官和士兵的勇敢的革命精神，又由於人民的統一陣綫和熱烈贊助。當我們終於奪取了武昌的時候，單是我所統率的一團人，算來就有百分之七十死傷了。我們是張發奎將軍手下第四軍作戰部隊的一部份，由於我們隊伍的異常勇敢，這整個第四軍以北伐的「鐵軍」出名了。這跟北伐軍的其他部分其實是有什麼不同的。」

接着葉挺將軍說到共產黨參加北伐的情形：

「在北伐期間，那些和國民黨共同工作並且做着國民黨員的共產黨員勇敢地盡着本責。蔣介石將軍改組黃埔軍官學校之後，共產黨員有不少人擔任着該校主要的政治宣傳工作人員，政治部主任則是現在八路軍的高級長官之一，周恩來。第四軍裏最優秀的戰士有許多也是共產黨員。中國紅軍及現八路軍的著名領袖朱德，葉劍英，林彪，彭得懷，賀龍等人都曾在求謀實現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統一戰線和國民黨的旗幟之下，參加過北伐。要是北伐開始的前後，沒有統一戰綫，沒有共產黨員幹着民衆的教育和組織，及軍隊的政治訓練之類最切實的工作，那北伐是不會勝利的。」

葉挺將軍把這番經歷的報告這樣地歸結起來：

「我要申明一下，中國紅軍的編成，並非如有些人所說，由於共產黨決計來發動農民革命或是共產主義的暴動。當我們見到統一戰綫破裂的時候，我們爲了繼續北伐，竭力想保衛統一戰綫，抵抗這一種國民黨政策的改變。那些在統一戰綫破裂後編成紅軍的中堅分子原都是在北伐期間，爲了國民黨之下中國革命統一的目的作着戰的。當汪精衛運動張發奎率兵退回廣東去，使武漢政府背後受到打擊的時候，我做着武昌防守司令，就用我手下的部隊連同別些軍官和軍隊竭力來阻止這一個陰謀。我們向南昌進兵，便在這南昌暴動中，我們對統一戰綫的破裂及國民黨對付共產黨的恐怖政策示了威。我同着賀龍共帶一萬人向廣東進兵，爲的是

要阻止第四軍裏統一戰綫的破裂。然而我們卻只能開到汕頭，在我們的企圖失敗之後，這軍隊便移交了朱德，他後來在江西聯合了毛澤東來繼續鬥爭。這就是中國紅軍的起原。這也就是它的基礎。因此我可以說，這軍隊不但是共產主義工作者所創造，而且也是國民黨所創造的。」

反對統一戰綫這一個轉向破壞了北伐的內在力量及其發揚的威力。大都盤據於北方諸省的地方軍閥勢力依然是那些阻止着統一的進展的障礙之一。此外的障礙就是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當時反民主政策以及日本的干涉和侵略。然而北伐結束之後，地方軍閥的攻勢力量卻殘破了。他們進行着守勢的鬥爭。雖是在河北，察哈爾，綏遠和山東這北方幾省，情形也的確如此，這幾省只有形式上承認着國民政府的中央權威罷了。然而這情形卻不再由於北方軍閥的軍事力量，而主要地由於日本直接的干涉了。在北伐的最後階段，在一九二八年，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對閻錫山和馮玉祥的戰役期間，南京的軍隊踏進了華北。這是重要的。他們使較大的軍閥所統率的部隊分裂了，在河南，安徽和陝西建立了新的根據地，便把北方諸軍閥局限在黃河以北本身發跡的諸省。一九二八年，日本就會用直接的軍事行動（在山東）干涉過南京軍隊在北方的戰役，後來又是日本用了軍事的壓力來強迫中央軍退出河北。北方軍閥的勢力雖在其本身的地域之內也逐漸地衰退了。日本帝國主義所以認為這是順利地進攻滿洲，內蒙和華北的最好時機，這就是其理由之一。當軍閥勢力這樣地衰退下去的時候，來阻止統一，而使帝國主義侵略者獲得幾個據點以便他的進攻，這還是十分現實的事。在另一方面，軍閥勢力當然也還是國防準備上所遭遇的阻

礙和「延誤」的根源。

同時南方的軍閥勢力則竭力要恢復統一戰綫時期所損失的地位和力量。南方的革命任務在一九二七年突然地終結了。南方的地方軍人這才成了國家統一的障礙，成了內戰的經常的威脅。他們在國民黨以內，反對着國民政府，而實際上則冒着南京政府在西南全部的威權，甚而至於發動着分立主義的運動。這種運動如果不會加以制止，是容易投合日本分裂中國的計劃的。由於從十九世紀太平天國時代發展下來的南方人民的民族革命精神，由於孫中山所留傳的思想和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的統一戰綫，南方軍人的計謀這才不至於釀成無可補救的全國的災禍。南方的中國人民又會做過反日運動的先鋒，促成目前的抗戰，因此到一九三六年，南方各省的政府終於確然地歸附了南京政府，接着是在蔣介石所領導的抗日戰爭中間，南方的軍隊和人民充分地團結起來了。

一九三六年廣西和廣東既然隸屬於南京，兩省的軍隊，第五路軍和第四路軍也就不得不放棄了他們的聯盟。此外，又有福建，貴州，雲南和四川——結成一個集團，其主要的用意是要保護他們本省的軍事根據地，免得南京政府勢力的侵入或是受它的干涉。這個集團的分立主義性質並不在要使西南和中國其餘部分相分離的明確的目標上表現出來。這所表現的形式可以說是一種特殊化運動，要求着中央不干涉各省事件，當然連軍事在內。因此提出了一個理論，說是中國的統一，與其在中央的基礎還是在聯省——即孫中山早就斥為反動的「聯省自治」的基礎上能夠實現。孫中山所要求的是中央集權的民主共和國，他對於各省的勢力，則甯可主張着予以消滅。

而不主張分省造成地方軍隊的根據地和軍閥的地盤，惹得全國分崩離析，給半封建及帝國主義的勢力助長了內戰和侵略。他又堅決地反對着所謂聯省自治。他的計劃是在使縣成爲人民地方自治的基本單位，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的單位，而國民大會則做着人民代議制度的最高機關。南方各省的軍人主張着聯省自治這個理論，與其說因爲他們要造成自治省的聯邦，倒不如說因爲要造成西南全部的聯邦而以廣西和廣東爲中心。在華南尤其是在廣東的英帝國主義勢力，爲了顯明的理由，曾經很同情於這一種聯邦的意見，準備協助其實現。只是爲了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對南方的侵略的威脅日益增加，英國的政策才轉而支持蔣介石那一種要使南方歸附南京的計劃了。因此，日本人非常關心於西南方面這樣的發展是不足爲奇的。然而由於反日運動的進展，尤其是由於統一戰綫的建立，他們在這方面的一切企圖卻都失敗了。

在北方，「自治運動」開展的情勢又因日本侵略的進展而日益惡化了。日本人甚至在那裏找得出幾個反對統一的軍閥，敢於公然地支持日本的「自治」計劃。日本人進一步迫得南京締結了何梅協定，爲的是要使前東北軍和中央軍從北方撤盡，並且要推進他們的「自治運動」。然而雖有這一種成功，陰謀的實現卻還是限於他們在冀東和察北的傀儡政府以及平津區域，換句話說，就是日軍所直接佔領，或是日本軍事力量集中的各地。

南方和北方的各省軍人一味要保持其手下部隊的獨立及其地盤的自守。然而南方的局勢有許多方面卻不同於北方，因爲南方早就經過了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民衆運動革命時期。這種差別迫得南方各省的軍人採取

較複雜的政策，來證明他們拒不從南京政府是正當的。他們要找出辯解來，說是他們所以遠抗中央當局，出於「民族政策」上的種種理由，於是看着時機，有時從「右邊」有時則從「左邊」來攻擊南京。他們不時在南方組織着國民黨中間反蔣派，又支持着汪精衛派及其在南京的陰謀。他們勾結了那些沒有軍隊或是有軍隊而沒有地盤的失意軍人玩着這一套把戲。他們責備着蔣，說他沒有決心又沒有能力來消滅共產黨，或是來摧毀中國的紅軍。同時他又沒有用他的軍隊來抵抗日本。但後來，他們在南方鎮壓着革命大眾的救國運動，取消着人民的公民權利，恰同南京一樣的嚴厲。實際的差別就是在蔣介石則竭力要使各省軍人服從他的指揮和國民政府，而在南方的各省軍人則竭力要在他們的軍隊所統治的地域，保持其自身的權力。蔣介石所抱的軍事統一的目標要有成功的指望，不得不根據於抗日的國防和統一戰綫才能够達到。在另一方面，南方的軍人只有到了全民族的利害關頭，才不得不放棄了分立主義的野心，服從中央當局，謀求全國國防的調整以禦日本的侵略。

這時期，中國紅軍對於各省軍閥一直是最大的恐怖，他們從南方到西北的長征是經過了好幾省的。這歷史的事實又是軍閥內戰所以受限制而不再繼續的主要理由之一，因為這又間接地便利着蔣介石的中央軍侵入到各省軍閥的防地裏去，使他們不得不服從南京政府。中國紅軍的主要業績就是人民的軍隊剷除中國封建的軍閥勢力這一種業績。中國紅軍在本質上一點沒有地方性，而且從各方面看來，恰跟軍閥的軍隊全然相反。這是真正人民的軍隊，為重建孫中山的統一戰綫政策，使民族革命得以繼續而作戰，為使農民和工人從封建軍閥的壓迫和半封

建的剝削獲得解放而作戰，爲基於軍民自決的政府而作戰——就此看來，這軍隊在性質上真正是民族革命的軍隊。

前紅軍的部隊有着最豐富的實際戰爭的經驗，有着卓越的游擊戰的聲譽，也就以中國最優秀的軍隊出名了。他們那些高明的作戰能力，奮勇的精神和大大的流動性，這同他們領袖的戰略的雄才是甚至他們的敵人也加以證實的。這都是刻苦的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的結果，這等訓練不但在防地上進行着，而且在那些爲民族革命，爲農民解放爲人民政府而作戰，而組織而宣傳的年代也進行着。這軍隊是人民建立起來，而跟人民保持着最密切的有機的連繫的，這就是它的祕訣。

要消滅這樣的軍隊，當然是不能達到目標的，然而正惟靠着反赤戰役，蔣介石卻甚至使遠處的四川省——這大約就是全中國給軍閥蹂躪得最厲害的一省罷——也歸附南京了。起初是在一九三五年討伐紅軍的戰役期間，中央軍踏進了這一省，後來是南京方面聯成一氣的政府銀行在那裏活躍起來，求謀着省財政的整理和國家貨幣的流通。四川的各軍閥先前本是自身有着各種派別的軍事同盟，和省內的內戰的，這時候只得在他們本省集權的政府之下大家聯合起來，一則要抵禦紅軍，二則要防止紅黨以及給予他們迫切的援助的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救民工作。從江西向四川前進的紅軍及其跟遭受軍閥的蹂躪，苦於苛捐雜稅的這一省的農民大眾的聯合是威脅着四川軍閥的最可怕的憂患。在這等環境之下，地方軍閥「自治」的理論和制度是站不住的，於是他們等待中央方

面的援助極其殷切了。

這樣的時機又有一個，就是一九三六年紅軍在山西對閻錫山的戰役，閻錫山當時依賴着他那強固的半獨立地位，正想繼續他那對日妥協的老政策。然而等到中國紅軍發動了攻擊他的統治的戰役的時候，他卻立即自覺到迫切地需要着南京方面直接的軍事援助了，那時候，要是不會因南京的軍事援助而得救，他是少不得要失去他的地盤的。就在這戰役期間，堅強的中央軍得以進入山西，於是由於紅黨戰役和中央軍的深入山西，閻錫山喪失了行動上的自由，不能違抗南京的諸政策，而獨立地跟日本談判了。

使對日抗戰中間，有中國紅軍那樣具備着戰鬥素質和流動性的中國紅軍參加，這在凡是關心於中國國防的成功的人們看來顯然是最好的打算了。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兼中國銀行總裁宋子文在其對倫敦每日導報記者斯諾的會談中曾經表示了這個意見。據斯諾的記述，「他把中國南部共產黨所維持的長久的反抗局勢指引為中國人民力能應付重大禍變的實例。『共產黨只靠江西半省作根據地而對五十萬的政府軍作戰』他說這足以表示臨到動員起來而只有單一的目的標的時候，全民族的潛在力。」只有那些意在阻止反日抗戰的好徒才會繼續維持着對這支軍隊的內戰。西安事變解決之後，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的文電說：

「西安事變的圓滿解決是全國人民所欣幸的。從此和平統一，而團結抗敵的種種計劃也得以實現，這是國家和民族之福。」

中國的統一在意義上就是革命地創造一個新國，在中國半殖民地及半封建的情勢之下，要實現這一種創造，只有先把中國的人民大眾喚醒。緊要的事不是剿共戰役而是抗日統一戰綫，不是紅軍的消滅而是中國土地上侵略者的消滅——因此抗日統一戰綫的重建真正是「國家和民族之福」。這使南京政府變成了真正的國民政府，這把全中國的軍隊結合成一個抗日軍。日本的威脅本身就是足以喚醒中國的人民大眾，足以排除統一戰綫的障礙的一個有力的因素。當華北戰爭開始的時候，北平的日本軍事當局在公布的文告上宣稱：

「我們的敵人是不法的中國軍隊。謀求建立遠東的永久和平的第一步就在摧毀這等軍隊。」

日本軍閥的封建心理當然不會明白：正惟他們對中國的野蠻侵略及其所引起的中國人民抗日統一戰綫的報答才使「不法的中國軍隊」變成了一個革命統一的民族的前鋒和鎗尖。他們現在再也無須對付中國的軍閥勢力，卻終於要對付空前無敵而沒有窮盡的中國民族革命的力量了，這在他們是見識不到的。

日本的軍人預料着：在日本的機械化師團、海軍和空軍的「神速」戰爭的打擊之下，蔣介石所領導的剛才獲致的政治軍事的統一是要陷於破碎的。他們猜度着：華北的戰役無非是足使地方軍閥趕速屈服的一種軍事示威罷了。而且他們以為在奪取上海的戰役中，把蔣介石所統率的各師摧毀是容易的事，此後蔣在南京以及在中國軍隊間的領導勢力就少不得要崩潰了。這一切推測是落空了。恰恰相反，「不法的中國軍隊」就是在華北也沒有投降，那些參加着上海戰爭的蔣介石手下最優秀的各師沒有離開了其餘的中國軍隊而陷於孤立；而且他們的犧牲

沒有使得他的統帥地位削弱，反而使這地位大大地加強了。在軍閥勢力最強盛而且受着日軍直接的保護的華北，日軍要把軍閥部隊接收下來，交給他們的傀儡組織來運用，這一種企圖是失敗了。日軍好容易侵略了華北大部分地方，然而晉北一帶朱德和彭德懷所統率的第八路軍卻既不逃避又不退卻，反而從側面前進，深入到侵略軍的後方，一面則把人民喚醒起來，動員起來，阻擋日軍向中國西北的突進。日軍要把橫貫新疆的公路上的軍運封鎖起來，切斷中國和蘇聯的交通，這一種計劃在萌芽時就被摘掉了；一種可怕的新「堡壘」堅實地建立起來，這使人民的武裝抵抗伸展到華北淪陷區域的內部了。同時，那些從國內各方面派到上海來作戰的各師旅因其對於日軍的坦克，重砲隊和天空轟炸英勇地抵禦了三個月，已經代表着全中國的國軍博得了全世界的聲譽。還在一九三七年秋天間，日本人就不得不承認自己怎樣地估計錯了「不法的中國軍隊」所具有的戰鬥力，例如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的東京報知新聞就發表着如下的一段文字：

「現今中國的中央軍是裝備精良的，他們唯一的弱點就在缺乏重砲隊。看輕上海區域中國軍隊的戰鬥能力是錯誤的，那些軍隊，除卻抱有強烈的對日敵懷心之外，又是配備着國外輸入的新銳的武器的，現在上海方面進行着的戰爭是典型的現代戰爭。那些看着那邊戰局進展的濡緩覺得不耐煩的人們最好回想一下：前在大戰期間，一公里的推進總須經過數月的戰鬥。

「不消說，再沒有比犧牲很小的勝利更好的事了，然而……國民必須準備重大的犧牲才好。看到了長篇

的死傷名單是不應當驚訝或是失望的。」

然而上海的三個月戰爭卻不過是中國抗戰的開端。據日本的估計，上海方面中國軍的退卻本該落到了聯合的國軍分裂的結局，使侵略者不至於遇到比分散的局部抵抗更嚴重的情勢。然而實際情形卻並不如此。恰正相反，戰爭的局勢迫得日軍跟隨了「不法的中國軍隊」進到中國的內地，竟至於難以自拔，難以守住他們的侵略區域，難以保護長距離的交通綫，又難以阻遏他們後方的武裝抵抗的發展了。這樣，要用「神速的致命的打擊」打得中國屈膝這一種估計早在戰爭的最初數月間證明是一個夢想了。中國的陸軍現在是民族的軍隊，是以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團結力為後盾的軍隊了。當戰爭開始的時候，軍隊和人民都是缺少組織，缺少政治訓練的。然而恰就是這為民族獨立而對帝國主義侵略者作戰的全體人民的抗戰使軍事的統一得以加強，使其組織得以逐漸適應現代戰爭的種種需要，又使軍隊和人民在抵抗侵略的戰鬥中間日益親密起來。日本軍人信賴着侵略部隊的優越的組織，尤其是信賴着他們在進攻的技術工具上大大的優越性——然而這僅足以便於領土和戰略據點的暫時佔領罷了。野蠻的暴力的表演對於民族革命的深廣的歷史過程，是不能加以破壞，甚而至於加以阻遏的。卻正相反，這使民族革命的精神鞏固起來，發揚起來，這催促着民族革命的發展，這激發着日益廣大的民衆運動，使全民族得以排除陳腐的障礙，而把一切的人力和資源投放到戰鬥中間。這一種為中國自衛而造成的統一局面已經使中國全部變成了國民政府的根據地，並且使這政府可以把首都遷移到它認為適於領導民族鬥爭的內地任何地方了。日

本人思量着，對中央軍的攻擊是可以使「蔣介石的政權」摧毀的，他們可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蔣介石變成了中國民族抗戰的信托者，因而有全中國的軍隊和全中國的團結人民聽受他的調度了。中國暫時喪失了多少部分的領土，但也博得了她的民族精神；這就是廣大的民眾基礎，從那裏儘着可以把新的軍隊帶到戰場上去，把淪陷區內的游擊戰展開，而為祖國跟侵略者相搏鬥。

有一篇專家的文章記述着日本戰略的完全失敗，這就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個德國作家葉爾夫·宣克（Wolf Schenke）在漢口所寫的論文，一九三八年九月刊載於國社黨政治雜誌。宣克在那論文上說，日本的陸軍當局犯了一個無可補救的致命的錯誤，這由於：

「預料日軍的速勝；這種預料所根據的就是跟敵方的對照上日軍自身應付廣大區域的力量估計過當，也就是在對中國軍的比較上日軍的估計過當。關於一向未經考查的中國人民的心理狀態和政治組織的評價也如此。」

這位作家又就日軍的作戰計劃說道，「中國本是被構想為僅僅從北平擴展到黃河，從上海擴展到南京的，這是「基本的錯誤」。事實上，「戰爭已經遠越過了這一線，而進到中國的內地去了。」日軍在戰爭的初期，就以爲十五個師團（每一日本師團計有二萬光景人）足以「結束中國事變」了，這是估計錯誤的。

「一師團又一師團開出去增援不充足的軍事力量；一師團又一師團消耗掉，沒有表顯出相當的價值來

……中國儘管遭受着上海、南京和徐州這些地方嚴重的損失，她的戰鬥力可一點也沒有被摧毀，相反的，無論大家相信不相信，中國總是比戰爭開始時更強了。」

在上海戰爭期間，日本的一般見解，據該作者所推想，是在「阻止上海以後的戰爭，在華北劃一條確定的界線而談判和平。」然而中國軍從上海退卻之後，日本人的呼聲卻是「打到南京。」日本人確信着南京的陷落就是蔣介石政府的顛覆。日本軍事領袖們滿以為除此以外不會發生其他局勢的，他們也就「沒有佔領南京以外的什麼計劃了。」在中國軍退出南京之後，日軍顯然等着這一種「顛覆」準備好征服者的「和平」，可是接着的卻是一個「長久的休息時期」——這時期對於中國軍真是必要，而對於日軍則真是危險。於是中國軍「忽然體會到他們自然地位的優越了，」「從此以後，中國的領袖們及其內地組織者漸漸胸有成竹而意識到他們的目標了。」

後來費了五個月的時間才把徐州佔領下來，這又由於日軍「對於地域的因素估計過低」而用「太少的軍隊」進行他們的攻勢。同時日軍因為不能把那些威脅着他們側背的山西方面二十五萬中國軍排除的緣故，要從北方展開攻勢也不够力量。在山西的日軍有時多至六師團，全被牽制在那裏，因為「中國軍隊雖然被趕退了，卻還留在該省，不住地從荒涼的山區，威脅着漫長的日軍交通線。」日軍有十一師團調出去在徐州作戰，可是要完成「殲滅戰爭的計劃」卻需要着兩倍的兵數。當徐州落到日軍之手的時候，「中國軍一師也沒有被消滅，一尊有價值的火炮也沒有被征略者奪去。」不但如此，等到佔領了漢口，也期望不到什麼決定的局面，因為「戰爭逐漸地深

入到中國的內地，竟至決定的結果成爲不可能的事了。」

退出漢口以後，該作者說中國抗戰的區域天然是在下列這些地方：

「甘肅，山西，甯夏等西北地帶；雲南，廣西，貴州，廣東和湖南等西南地帶。其間橫着四川是商業和運輸的中心——從南面打進該省去是困難的，從北面打進去尤其困難。」

該作者在結論中，用如下的關於中日戰爭前途的預測把他的研究歸納起來：

「如果日軍現在想發動一個急速殲滅中國軍的政策罷，他們該不得不體會到時間是太遲了。平漢鐵路的中段有一個地域，這地域由於交通和運輸問題，沒有必要的大量部隊是不能作戰的。必要的兵數該遠大於直到現在爲止所消耗的罷，而其後果怎樣還是可疑。中國的地區保障着她的永存，因這理由，在日本人最好是造成和平。」

在這番軍事研究上，華爾夫·宣克注重着中國地域廣大這因素之利於全民族對侵略者的抗戰。然而確保中國最後勝利的決定因素卻不在她的地域而在她那巨大的人力依照着長期革命戰爭的計劃充分地動員起來，投向民族獨立的戰爭。在宣克看來，這戰爭是某一區域以內雙方軍隊及其動作所決定的，日本軍取着攻勢，而中國軍則取着守勢。他正確地指出從日軍戰略的觀點，迫得中國軍隊來應付「完全破壞性的戰役」是重要的。可是他也說明着：日本在這方面所以得不到決定的結果，因爲他們聽任了中國軍逃脫，這項說明是淺狹到抓不住實際問題

的。日軍失敗的根源就在雖強而數量較小的侵略軍（即使其兵數增加到一倍，數量還是小）在廣大的地域以內面對着一個偉大的民族，這一民族因其統一和決心是在民族革命的路上進步的。中國軍方面既用正確的革命戰略發揮着民族統一戰線所給予的一切潛在能力，日軍也就決不能迫得中國軍來應付「完全破壞性的戰役」了。在另一方面，如果在日軍因其實力的消耗而感到本身的失敗以前，或是在日本民衆方面反對着耗竭國力的征略中國的冒險以前，日軍不肯放棄其在中國的侵略，那麼，日軍的遭際一定也是如此的。

持久戰的戰略實際上並非僅僅出於中國軍隊的決定，而且出於整個統一陣綫的決定，這又是足以證明中國抗戰的革命性的一個事實。宣克在他的論文上說到南京陷落之後中國的抵抗戰略起了一個變化，這是極對的。這一變化由於中國軍體驗到陣地戰和純粹軍事守勢的戰術會惹得本身破滅。就在那時候，國民黨方面也漸漸承認了持久戰的戰略以及淪陷區域展開游擊戰的重要，而部分地加以實行了。漢口陷落以後，這方面更有了不少的進步。

抗日戰爭中間，中國方面聯合的軍事力量所臨到的種種問題使戰鬥聯絡和指揮統一都加強了，而一般地說來，則使大家認識了一個原則，就是每一軍人的第一義務就在保衛國家。由於抗日統一戰綫的擁護，蔣委員長能夠把他的軍事統一推展到北方了。日本要運用華北地方軍閥的部隊這一種計劃是完全失敗了。蔣對全中國軍隊的最高指揮權，最高國防會議和參謀本部對於一切軍事的指導權都在戰爭期間日益堅定起來。

中國共產黨以及八路軍和新四軍都盡心竭力地幫助着這統一工作。這兩軍始終不懈地在蔣委員長給他們指定的前綫上盡力作戰。共產黨的領導者同時向蔣委員長、國民黨和中國人民全體提出了建議，主張加強而且展開統一戰綫，尤其是貫徹一種軍事戰略，這是足以適應反日抗戰的一切需要，並且確保對侵略者的最後勝利的。

關於中國方面最好的戰略，照他們的出版物上所提示，簡要地說來，他們的態度是如下：

中國是廣大的國家，然而就用以保護本國領土的國防的現代設備來看，卻也是很弱的國家。她受着一個雖小而很強的侵略的鄰國的攻擊，這鄰國在中國領土和水道以內已經建立了現代的戰略根據地，而且爲着現在的征略戰爭已經準備布置了四十餘年，如今把它那組織完備的戰爭機構拿出來表演了。然而中國卻並不弱到可以說她是一盤散沙的國家；恰正相反，她沿着統一的現代國家的途徑正在進步，而且民族革命的精神和爭取民族獨立的決心使中國人民統一起來了。她那廣大的領土和足以自給的農業經濟使她得以從事持久的守禦，進行內地的建設，而長期戰爭對於資源貧弱而對外貿易極不平衡的日本的工業經濟則一定是大有損害的。

侵略者固然能够佔領中國交通幹綫所在的領土，他不能征服中國的人民，打消他們的抗戰意志，而控制遠離交通綫的鄉野。他面對着日益增長的民衆自衛戰和游擊戰，是用盡了軍事力量也無法鞏固其對於佔領區域的控制的，因爲中國方面指揮着這等戰事的是選在內地安全的根據地的國軍以及全國革命的民衆組織。

中國在戰爭期間儘管受着戰事的損失，卻保有着大量的陸軍和浩大的人力可以加強其力量。由於重砲隊，

機械化裝備和雄厚的空軍的缺少，她不能靠長期的陣地戰來抵禦侵略者，這種陣地戰的意義只不過是日本戰爭機構對中國守軍的大量屠殺。只有當有組織的人民自衛隊和鄉區的游擊隊集中攻擊着侵略者的交通線和輜重隊，阻絕着敵軍的增援，包圍着各城市和沿幹路的敵軍據點的時候，她才能够選取陣地戰來配合運動戰。保衛上海的戰事是唯一的陣地戰。長期的徐州戰役已經是運動戰和游擊戰相配合的戰爭，只是還不會用大規模的民衆自衛戰和游擊戰來補充罷了。一九三八年台兒莊的勝利證明了中國陸軍有着進行運動戰以及從單純的守勢改變爲有計劃的攻勢的重要性和能力，然而因爲沒有大規模的游擊戰來補充的緣故，這場勝利還不過是一時的勝利。要是當時滬浦前綫配合了游擊戰，這場勝利也許會使得這一前綫的日軍潰敗的。八路軍一直進行着運動戰，跟人民自衛團和游擊隊的動員和組織配合起來，一面規避着陣地戰。因此，它能够兼取守勢和攻勢，守住晉北，阻斷敵人的交通路綫，而深進到侵略軍的後方建立新根據地變後方爲前方。八路軍的死傷較之侵略者死傷和被俘的種種損失，是很少的，同時，八路軍及其所指揮的游擊戰士的裝備則有大部分是從日軍方面奪得的。

這方面全國性的戰略的進步連同前方和後方一切武裝部隊和人民的動員可以確保軍隊和人民間最密切的聯絡，也就可以把正規戰爭和民衆戰爭配合起來，發揮大大的流動性，主動性，攻勢性，而在被佔領區的後方創立新的前綫了。

要確保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及其對中國民族的反革命戰爭的最後失敗，只有使這征略的軍隊不得面對全

中國人民大眾的武裝抵抗，這是在國軍及其參謀本部指導之下，用抗日統一戰綫的策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的。因此中國的戰略必須以此爲目標。中國軍只有靠着這種有組織的民衆抵抗的輔助，才能够克服日軍方面具有坦克和重砲隊而以海軍和空軍爲輔助的機械化師團的優勢。抗日統一戰綫必須獲致了這個目標，才可以使中國的戰略完成。要是上述的戰略從戰爭開始時就如八路軍的作戰那樣運用得當，那麼日軍一定不能僅僅在陣地戰中間，使那裝備簡陋的中國軍蒙受了重大的損失不得不退卻，就佔領到中國大塊的領土的。他們每進一步，該不得不付重大的代價，同時因爲自衛的民衆和日軍佔領區域和交通綫上的展開的游擊戰使日軍前後受敵的緣故，日軍的前進該也不得不遲緩下去而且被阻止呢。

北方的軍事局勢跟華中和華南比較起來，是遠不利於中國的防軍的。戰爭開始以前，日軍就已在北方控制了幾個堅強的進攻根據地。那邊的地方軍閥部隊直至日軍進攻期間，直至統率者的怠忽行爲被克除了之後，而且往往直至他們在本省站不住腳的時候，方才聽受了中央的指揮效忠於國防。山東的軍閥韓復榘在漢口受了軍事法庭的審問而且被鎗決了，這就是不忠於國家者的徽戒。八路軍雖然處於特別不利的環境，時常在孤立的陣地作戰，可是它不但能够在山西北部，這華北前綫最重要的戰略區域守住它本身的陣地，而且能够擴展到被佔領區的後方。八路軍在那裏建立了一個紀錄，就是日軍的死傷十倍於中國軍。屢挫着日軍攻勢的該軍堅強的地位使日軍無法來征服山西，而且跟別省和中央的軍隊配合起來，足以阻止日軍從北方向河南山西和內蒙前進。八路軍所以能

够如此，無非因爲該軍用人民自衛的力量和游擊戰大規模地配合着正規戰事罷了。

在中央和各省軍隊集中的中部和南部前線，就人民方面民族革命的教育來說，所存在的條件遠優於北方，如果把同樣的戰略和戰術應用起來，當然可以收到更好的結果的。這就是說，可以使淪陷的內地有許多地方免於侵略，可以使敵人的進攻早日停止，可以創造一切反攻的條件來收復失地。

爲什麼這個戰略在戰爭的第一時期沒有普遍地加以應用，而在其後各時期，還只應用得不完全不充分的呢？這理由當然不是軍事性而是政治性的。這理由是和先前抗日統一戰綫所以遲遲建立的理由性質相同的。正同先前中國軍事上和政治上對侵略者的國防利害關係促成了抗日統一戰綫一樣，戰爭期間中國所遭遇的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局勢要求着這種戰略的應用。要排除種種障礙，使這一戰略普遍地應用起來，只有先從統一戰綫的鞏固和擴大入手，而共產黨的一切活動就集中於此。

抗日統一戰綫的戰略是隨着持久戰的發展而發展到完成的，這持久戰要經過三個階段，即防守階段，準備反攻階段和反攻階段。重慶全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周應來，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在安徽新四軍總部向該軍軍官和士兵發表一篇講演，把這三階段中間中國的戰略解釋得十分精到，大意如下：（我當時在場，就這篇講演筆記了要點。）

「在戰爭的第一階段，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於侵略者的弱點，要在他們向我國內地前進的期間削弱而且

消耗他們。在上海戰爭中間和華北，敵軍約有二十萬——傷的病的和陣亡的——因戰鬥而消滅了。在奪取徐州的歷次戰役中間又消滅了十萬人，至於奪取漢口的歷次戰役中間，則消滅的兵數約近三十萬人。每逢敵人對我們的主力再來一下那種正面攻擊的策路的時候，我們總要繼續這個策路。

「在這階段中間，由於中國方面以統一戰線為基礎的有組織的國防，日本所抱的「神速戰爭」的目標和策路完全無效。中國迫得侵略者從事於持久戰了。

「日本軍人，照他們原來的計劃，估計着十五個師團足以摧毀中國的抵抗力而迫其屈服了。然而單是要佔領上海就必須十三個師團。日本已經不得不加調了許多師團來進行這帝國主義的冒險，如果要守住它的交通線，把中國征服還得再調許多師團來。日本的兵士連陣亡和傷病的合計起來，已經犧牲了七十萬光景，可是日本軍人還不能迫使中國反日的國防政策發生什麼變化。他們害怕着持久戰，因為且不说絕對不能破壞中國的主力，就是要佔據我們的根據地，切斷我們的運輸線和軍運也不是他們的能力所及的。

「日本軍人的主要策路是在用急速的進攻和急速的和平來迎合第一階段的需要。直到佔領漢口為止，他們從不計劃應付第二階段。在第一階段中間，他們沒有時間來準備這一層，他們又沒有充分的軍隊可以阻止我們實現第二階段的策路。

「日本軍人不能在我國展開侵略，摧毀我們的主力並且逼得我們屈服，這是第二階段的特徵。我們已經

到了僵持的局面。正惟由於持久戰的諸政策及其有計劃的實現戰爭的延長和我們的犧牲都不足以削弱我們的軍力。我們愈戰愈強。我們把正規戰和游擊戰配合起來。我們把我們的戰線擴展到被佔領的地域，在那裏建設抗日的新根據地。

「我們在第二階段所採取的各種政策的特徵是在我們必須阻止侵略的繼續擴展；我們必須阻止侵略者爲退卻時保全實力起見，組織中國的內奸勢力，鞏固他們的傀儡組織。我們把游擊戰加強起來，擴大起來，這足以迫得敵人把大量的軍隊留在後方，來保護其被阻擾的交通線，保衛其根據地。我們的活動集中在打銷敵人方面要統制佔領地域的一切企圖，並且破壞敵人方面進行經濟開發的一切可能性和一切設施。蔣委員長確定了第二階段的目標，這就是從防守到反攻的轉變。我們必須準備反攻，入手的途徑就在加強各黨的合作，維持而且建設我們的根據地，提高戰鬥力和我們軍隊的民族紀律，發展全體人民的活動，加強游擊隊，創造新的游擊隊在日軍後方來展開我們的前線。

「敵人和內奸要用征服的和平來結束侵略戰爭，如果我們把他們這等陰謀打破了，那麼，在第三階段，也就是在可以把侵略者趕出佔領地域（連沿海和東北各省在內）的反攻階段，日軍的最後失敗一定是免不了的。日本的軍人對於這次戰爭日益感到驚慌了。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上，他們從不會碰到過這麼浩大的戰爭。如果我們把中國戰爭和一九一四至一八年的大戰比較起來，我們覺得現在各戰線長得多了，事實上這

些戰線是無限的，外加着那些有組織的游擊戰的前線，擴展得很廣大。在歐洲大戰中間，陣地戰是進攻或是防守的主要手段，各前線的推進就是佔領地域的擴大，使後方落到佔領者的手裏去。在現今的中國戰爭中間，日軍的陣地戰所收到的結果則無非是侵略部隊的無益的犧牲，實際上並不能使他們控制了佔領地域而且在侵略的後方，防止了抗戰的繼續的。在中國的許多前線上，敵人的武力廣泛地散開着，而且彼此分離着，決不能把中國的主力部隊圍困在一隅而加以消滅。在被佔領的後方的中國人民的敵愾心和游擊戰使各佔領地帶非駐守大量的軍隊不可。侵略者在中國這樣廣大的陸地上要應付戰爭的情勢總是覺着軍隊不夠的，同時中國的軍隊和人民則憑着民族革命的精神，齊心一致地在抵抗侵略。他們利用了人力的充足，國土的廣大，以及河流和山脈，這些天然的要塞來阻擋敵人的前進，來消耗來破壞敵人很有限的武力。日本的陸軍並不是爲這樣的戰爭而建立。日本的兵力也不足以克服這等障礙。在這種情勢之下，日軍所配備的充盛的軍火不再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了。在這種戰爭中間，日本海軍是絕對地沒有用處的。那些本是敵人強點的種種在這次征略中國的戰爭中間已經變成弱點了。

### 第三章 游擊戰和抗日人民的國防根據地

中國最高軍事當局所統屬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像鐵鉗一般夾住了中國北半部的日軍前方和後方的兩側，一

軍從西北的高原和山區伸向北平和天津，又一軍則從東南的連山伸向南京——杭州——上海，這一個三角形都市地帶。

在戰略上及政治上具有着最大重要性的是西北及華北方面廣泛的游擊戰爭的根據地，也就是朱德和彭德懷兩將軍所統率的八路軍的許多前線和後方。他們構造着廣泛的要塞，保衛陝西的南部，而以西安為戰略的中心。西安這陝西省會是重要的鐵路交叉點，在那裏幅輳的幹路通達鄰接陝西的河南，山西，甘肅和四川各省的鐵道交叉點。而且，現在很熱鬧的從蘇俄經由新疆和甘肅的軍火運輸汽車公路即古代通商大道，終點也是在西安。

從西安到陝北——八路軍的「陝甘寧邊區」一名特區的存在——的公路好像步梯一般，一步高似一步地通到廣漠的黃土的鄉野，這條公路只有在旱燥的天氣，只有在那邊許多天不下雨而路面又復乾硬起來之後，才可以通行。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我旅行中國內地後方和各前線的期間，我訪問過這八路軍的地區。沿着這條通到特區首都延安的公路前進，我們一直來到著名的西北黃土一地帶，浩大的山巒，黃土的岩壁和窟洞，黏土似的地面，這底下是積在岩層上的幾千英尺厚的地層，是從中亞的荒原，蒙古和新疆的沙漠和半沙漠吹過來的塵沙堆積而成的地層。遠遠地看去，那些山好像是石巖，其實這些不過是硬結的砂巖。這黃土是華北好些地方都有的，那些地方只要從雨量從黃河或是河渠得着充分的水利，即使比不上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也着實算得沃饒了。

然而在這陝北的高原和山區，在八路軍前方根據地，晉北的山區，由於從戈壁沙漠吹來的塵沙的積壓和河渠

的缺少，正常的農業却難以發展，收成也就荒歉了。這是歷來的飢荒區域，只有逢到雨量充沛的時候，當地的出產才足以供給比較稀少的人口。我們逐日逐日地走上這些山嶺和沙層地中間去，我們一路經過着那些隱藏在黃土的山間，還築着城牆的小小的城鎮，市集和村莊；我們又見着大都是鄉民所住，也常有富人住着的窯洞。這些窯洞往往好像山裏挖成的大廳堂，有着許多暖夏涼的房間；農民所居住的窯洞恰好在他的耕地下面也是常有的情形。我們的路是在高原上忽高忽低地盤旋着；有時路面從幾千英尺高的嶺端忽然低下去，隨即又成着螺旋形盤旋而上，兩旁的山脊和峯巒彷彿用利刃割過似的，呈現着北極區域冰雪世界的線條。一簇簇的村莊集而成縣，至於縣城則不過是一個最大的村莊，這些村莊大半坐落在山谷中間，跟鄰縣相隔的就是岡槽起伏高插雲霄的荒涼的連山，經過這連山，我們到得又一山谷了。這種景物逐漸逐漸地高上去，愈益寥廓而清幽，等到我們最後到了更近「世界屋梁」的地帶，就是做着陝甘寧三省天險的分界的地帶——我們就在八路軍的後方根據地了。然而我們卻並不停留在這「頂端」，我們從這裏又復走下到各山谷和各縣去，又復走上山嶺地帶，或則沿着山嶺地帶行進。

這八路軍後方根據地，人口並不多，大約共有一百萬人。然而這是可作軍隊大本營的多麼驚人的要塞區，這又是多麼堅固的抗日根據地。

在到延安去的路上，時常遇着成羣的學生，我會經問過遇到的一個學生：他從安徽到陝北來遊歷的目的是什麼？他的回答是「抗日救國」。特區不過是中國的小部分，是人口很少的窮苦區域。可是這也是抵禦日本侵略的雄

偉的障壁，民族統一戰線的堡壘；這地方的全體人民就是一支國防軍，這地方正有數千革命的學生受着教育和訓練，要在侵略軍的各前線和後方，負責組織民衆來幫助中國國防軍並且積極地來參加戰爭。這是精神的及戰鬥的抗日中心，北方前線軍事的及政治的武備庫，又是要用統一的中國人民的抵抗力來迎敵的預備工作的先鋒營。

八路軍和共產黨是特區的當局。他們工作的基礎和原則是統一戰線，也就是全民族在國共合作之下，集合了一切軍隊，一切人民大眾，一切階級和一切種族來抵禦侵略者這一個理想。共產黨組織人民大眾的才略早就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統一戰線的第一時期，尤其是在北伐期間表顯出來。在紅軍時代，這項工作變成了基本工作，爲的是要依照革命的民主基礎來組織人民，要發展游擊戰術，這種戰術只有從革命基礎上的人民組織入手，先把人民的利益考慮周詳，把人民的活動力和犧牲精神激發起來提高起來，方才能够實行。這些戰術現在特區和北方前線的共產黨用以保衛統一的民族了。共產黨應用着這些戰術，還把它步步改進，同時在統一戰線以內則守着很可欽佩的紀律，他們用奮有的精神和方法配合了新政策，這新政策他們是依照着全國性抗日統一戰線的情勢和目標隨時加以調整的。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延安舉行着民衆大會，各階級的人民，農民，工人，學生，士兵，壯丁，男女老幼到場的共有一萬餘人，大家聽了會場上的演說，不由得熱烈地喝着彩，這些演說的唯一內容就是中國抗戰精神，民族統一戰線，爲自由與和平而反對侵略與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演說者中間有一個是國民黨的參觀員，我聽得他讚揚着他在特

區所見到的抗戰中的民族革命犧牲精神，他又鄭重地稱道着特區對於全中國的模範性。閉會時候，大家高叫着「擁護國共兩黨統一戰線」，爭取抗戰勝利中國解放。這些口號。五一節的無產階級精神，和共產黨對於這種示威的領導全然站在領導民族抵抗侵略者的國民政府的後面，致力於全民統一的團結。我會見過共產黨領袖兼特區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會見過民衆團體和工會的，人民義勇軍和自衛團的領袖們，又會見過政府各部長，軍事的和社會的領袖們——我所得到的關於特區內的情況和政策的各項報告都證明着他們對於統一戰線和抗戰的忠誠並不是僅僅一種策略，倒還是他們在統一戰線以內自覺的使命的實踐，爲的是確保對民族敵人的勝利。我注意着這整個政治組織要使特區變成堅不可摧的抗日鬥爭根據地，是用怎麼一種意識形態的膠結性，齊一的信念，鐵的紀律和嚴整的方法來從事於工作的呵！毛澤東就這種工作所定的標語是：「刻苦的工作態度，堅決的政治方針！」

特區和被侵略的地域是很近的，現在則和通到山西前線的主要的給養交通線也很近。當我游歷延安的時候，特區一點沒有遭受直接侵略的危險，因爲八路軍和山西，河北，察哈爾綏遠的游擊隊跟山西軍和中央軍合作起來，不住地阻擾着敵軍，破壞着他們的交通線，使他們蒙受着重大的死傷，一面則又在敵人後方，維持着強固的根據地。然而特區本身卻也準備好用其「刻苦的工作態度」對付敵人了！除卻少數的留守部隊以外，八路軍全體上了前線。然而特區的人口卻差不多有半數爲國防而組織起來；他們受了壯丁少年先鋒隊和自衛團等等的軍事訓練，臨

到危險時候，單在特區就可以造成三十萬人以上的一支軍隊，憑着險峻的山嶺和戰略的地勢來迎擊敵人。全體居民從教育和訓練上所體認的就是對侵略者作戰，決不放棄一寸國土。農民在田地上工作，由當地的兵士幫助着，同時又受着游擊戰的訓練，組成志願原則的自衛團。這地方是用不着強徵軍役的——因為人民有了意識有了組織，所以志願原則就儘够了。特區並不是後方，這是前方的直接根據地，存放着一切的資源和人力，隨時可以效力於國防。我覺得要全體人民起來抗日這一種精神動員的工作在特區是完全實現了。這種工作的成效就在一個又小又窮的區域在唯一的目標上充分地統一起來，而全體居民是一支國防軍了。怪不得特區的精神和工作激發起西北全部的民心來，嚇壞了北部前線的敵人呢！

這一種完全的動員和政治的教育所以有着成效，就因為所採取的方法是真正民主的方法，也就是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制的方法。記得孫中山說過一句話：「中國需要着民治，好比兒童需要着教育。」人民的組織，人民的選舉權，縣和鄉村的人民自治，人民的裁判權，義勇軍和自衛團——這一切在這裏就是整一的有機體，這的確可以說是啓發着人民的意識，提高着人民的獨創力和活動性的一個優良的政治訓練學校了。這是在特區實現着孫中山對於中國所抱的理想，即人民直接參政的民主理想。全部軍隊是在前線，而且也用不着軍隊來治理人民。軍隊的職志只在保衛國家抵禦侵略者，至於人民的治理權，則人民自身很能够加以組織加以維持的。特區政府的機能不是在治理人民，卻是在教育人民幫助人民來完成民主的機能，並且在目前的民族危機中間指導人民的活動。

選舉權是（除卻漢奸以外）十八歲以上男女國民普遍地享有着的。投票採取着不記名式；候選人則由各黨各人民團體以及投票人的集團提出。地方的政權以一個行政委員會的主席爲中心，這行政委員會和主席都由縣和次等縣，各鄉村選舉出來，任期三個月六個月和一年不等。每五十個投票人選舉一個行政委員會委員。選區有着依照投票人三分之一的要求把代表撤回的權力。行政委員會的主席須得政府和選區代表雙方的認許。行政委員會選舉着各處處長：如行政處財政處教育處等。

全體居民都爲了自衛組織在義勇軍，抗日少年先鋒隊和自衛團中間。後備兵的募集則靠着黨所領導的宣傳運動的幫助辦得很有條理。政府負責贍養着前線軍人的家屬，這些家屬團體也參加募集新兵的宣傳。給政府劬勞的軍人家屬約有一萬五千人。

在統一戰線沒有成立以前，籌措軍費的主要來源就在沒收地主和土豪劣紳的財產。自從統一戰線重新建立以來，八路軍的軍費由中央政府發給了。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央政府所發給的數額還只依據着當初商定的這一軍六萬人爲度的實力，這人數不得不隨着抗日軍事而擴大起來。因爲居民窮苦的緣故，特區的捐稅是豁免的。可是每一個收穫季節也依據着自願的原則徵收些民族解放儲蓄金，這大抵得助於一種春耕運動。組織着推行着春耕運動使軍隊和游擊隊獲得糧食接濟的就是各人民團體和農民大眾。

教育政策是在「大眾的國防教育」這一標語之下進行着。教育的原則就在訓練兒童，青年和成年，使其養成

集體的民主活動的能力。各中小學校，各高等學校，各學院和各大學的學費連同膳宿都是免費的。每週的課程是討論一週間的政治問題的週會；爲前線軍人家屬勤力的工作；向人民解釋政治形勢，並且謀求人民爲國防盡力的民衆宣傳日；生產上的實際工作，如耕種之類；兩項課目的軍事訓練，即關於軍事的組織和紀律以及關於戰鬥。一切課程都以指授關於國防各項問題爲宗旨，例如，自然科學教育化學戰爭的危險，怎樣防避毒氣以及人們怎樣製造武器等等，歷史和地理供給着關於帝國主義侵略史，侵略者所威脅的地域，中國民族解放鬥爭史，戰區地圖繪製法，淪陷區域等等的知識；音樂科則學習着各種民族革命的歌曲，公共場所的大衆歌唱以及怎樣教導人民歌唱等。尤其重要的是那些戰時的大學和學院，代替着日本佔領地帶被毀的各大學，使全國愛國青年都可以入學，養成日後教導民衆組織游擊戰的人才。從全國連東三省在內的各地來的，從朝鮮，甚至於老遠地從暹羅來的學生們大家參加着這些戰時學程。研究的主要問題是：一般的社會科學，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實踐；游擊戰術和民衆組織，中山關於中國民族革命的遺教；列寧關於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遺教等。講師中間有黨政軍的領袖們。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爲止，學生畢業的有二千四百人，其中有多數被派到前線各地去了。

人民充分地信任濟政府，遵循着它的領導，因爲這政府的存在爲的是要幫助要保護人民，尤其是最需要保護的窮苦的勞動人民，又爲的是要幫助要保護，正在需要人民大衆有組織的自衛的全民族。自從抗日統一戰線成立以來，從沒收地主產業入手的土地分配政策是放棄了。然而在那些已經實行分配制度的地方，農民還是保留着自

已的土地，政府所關心的就是要在統一戰線的條件以內，確保人民的生活。貧民和農民受着自身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的保護，又受着政府和各民衆團體的保護，得免於高利的剝削和無可忍受的土地租率；同時軍隊、官吏、司法機關和警察則給人民服務。貪污是受着嚴厲的處罰的。政府使人民確信着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以漢奸除外的一切人民政治上的平等爲基礎，決不至於落空或是被壓制的，而且由於新墾地的重行登記，集體耕種運動，農業改良，生產合作和消費合作，使人民的生活在原則上也正在進步。尤其是在那些土地未經重新分配的縣份，這個政策對於人民和農民，是莫大的幫助。因此，孫中山所應許的「耕者有其田」這句話還是特區方面主導的原則之一，可是現今使這個原則逐漸推進的主要手段與其說是土地的重分配，還不如說是國家對於貧農的協助。這一政策的目標也在從人民的利益着想使國防加強。民主政治和人民生活改進上所獲得的國家的協助又是爲國防而動員人民的直接方法，事實上要使大多數的民衆甘願效命於爭取中國民族生存的鬥爭，這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八路軍在特區和晉北前線以及在華北各處所以都獲得了大勝利，其主要的理由就在此。特區的軍隊，政府，各種組織和全體人民，這才可以說，統一於一個目標了——這就是抗日戰爭中間中國的勝利！這並不是純粹共產主義的區域，卻是人民的抗日根據地，而共產黨呢，則用了統一戰線和民主政治這些方法，在那裏組織人民來應付戰爭，以盡其對於民族的責任。

\*

\*

\*

八路軍的前方根據地是山西北部險要的山區，以五台山脈爲中心。中國的中央當局從戰爭開始時就指派了八路軍來防守這據點。該軍不但在戰鬥的數年間儘守着這據點，而且還把游擊戰順利地從山西擴展到河北、察哈爾、熱河和山東，換句話說就是被佔領的華北全部。日軍向五台山八路軍的主要根據地發動了十次光景的進攻，這幾次戰事代價很高，卻都落到了失敗。八路軍終於把山西的游擊戰展開到該省沿鐵路線日軍佔領區的後方和兩側，結果是他們征略山西的戰役變成爲無盡期的事了。多山的山西省據有着要點，足以控制平津周圍的區域，進而更可以控制以東的東三省地方。要是不把山西征服，日軍就必須在平津周圍駐守大量的軍隊，防範中國軍隊的重來。日軍不住地對山西各前綫的中國軍作戰，這就是說他們不得不幾次三番地爲佔領華北，爲控制佔領區域而作戰。總而言之，在日軍無法掃蕩山西的中國軍隊，掃蕩他們背後的八路軍中央軍和省軍以前，日軍是不能冒險向西北最重要的戰略中心，西安進攻的。

八路軍的偉大的功蹟，怎樣有利於華中和華北方面作戰的一切中國軍隊，由下一事實上明顯地表顯出來：日軍在中國作戰以及駐防的四十二師團中，足有十七師團被牽制在華北一帶，當地的中國軍隊在一九三七年秋間就已被逐退了。這就是說日本在中國的遠征軍有三分之一被牽制在八路軍從事活動的區域。八路軍的分遣隊出沒於平津的郊野，伸展到山東和蘇北。八路軍的正規部隊以外，又有無數的農民義勇軍遍布於華北全部，就是他們控制着華北全部的軍事形勢，除卻日軍所防守的幾個口岸和荒涼的城市，以及幾條防刀單薄的交通線。這八路軍

在華北侵略軍的後方，組織了幾個抗日人民自衛根據地。那些最重要的就在沿山西、河北、察哈爾邊界的山區，地面擴充到二十六縣以上，此外則在河北中部又有十七縣，合計共有四十三縣，一千五百萬人口。

有一個我在旅程上遇到的軍官把八路軍的戰略向我這樣地解釋了一番：

「當日軍佔領河北的時候，我們剛在山西、河北北部佈置着戰線的據點。等到他們繼續向山西前進，我們便進攻着他們的側面，並且派遣了幾個挺進隊進到河北省內日軍的後方。一而我們的正規軍和游擊隊日益深入了日軍的後方，把人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在軍民代表的領導之下，造成防守嚴密的人民自衛根據地，一面日軍則幾次三番進攻我們五台山的根據地了。我們破壞着道路，攻擊着他們的交通，卻沒有死守什麼城鎮，抵禦敵人的機械化部隊。我們把那些城鎮的男女居民，一切食糧和貨物完全搬空了，把一切東西破壞得於侵略者一無用處了，方才讓着敵人進去。我們靠着人民的幫助，破壞了敵人正面和背後的道路，每途他們因缺乏糧食和軍隊只得打開一條路沿鐵路線退回他們根據地去的時候，我們就進攻他們。這樣的策略使他們不能用坦克和大砲來進攻我們，正同他們又不能用飛機來破壞我們那些掩蔽得很好的根據地一樣。我軍的武器不過是步槍，手榴彈和機關槍，這些武器往往還是剛從敵人方面奪來的，我們的游擊武器也用刀和長槍。然而我們卻能夠進攻敵人，使敵人的部隊遭受重大的死傷，又能夠用武裝人民的集體運動來包圍他們，迫得他們退卻。這集體運動就是我們的坦克、砲隊和空軍。要是中國的一切軍隊——其中有許多裝備比我們好得多——用

着同我們一樣的方法，那麼，中國一定是不但能够防守，而且還能够進攻敵人，驅逐敵人的。」

一九三九年秋間，中國軍在日本進攻長沙一役所獲得的勝利使上面的談話中所包含的淺顯的真理愈益有力了。——這番談話足以代表我們從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軍官和士兵方面所可聽到的一致的意見。據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美聯社電訊，中國中央軍有一個外籍軍事顧問講着這次勝利的情形說，日軍用五個師團進攻長沙，沒有得到砲隊和坦克的援助。他們一面必須防守那條從洞庭湖展延至南昌長二百五十英里的前線，一面則派遣了四個縱隊向長沙作突進運動。中國軍方面有十六師（中國軍每師人數大約相當於日軍每師團的一半，日軍每師團則是二萬餘人）守着各戰線。當日軍進攻的時候，中國軍一面撤退，一面將其處於日軍推進的主要路線左右兩側的各據點，加強起來。長沙的民衆全都撤退了，凡是於侵略者有用的東西不是撤掉就是破壞了，爲的是要使侵略者看看荒涼的空城。然而日軍卻連長沙都不能到。當他們距長沙城不足二十英里的時候，他們已經要打開出路，不得不向後轉了。美聯社的電訊上說：

「要免得殲滅，退卻是要的。中國軍的正規部隊已經包圍了日軍方面前進的各縱隊。游擊隊則又攻擊着給養根據地，切斷着一切交通線。前進的各縱隊失去了彼此的接觸，而艱險的地勢又使交通和增援都成了不可能的事。」

這位外籍顧問，據電訊上說，接着「評論中國軍不能在其原來的防線以外繼續勝利的情形。」他認爲這「主

要是缺少作戰用具的結果，「因爲步槍機關槍和手榴彈是不能摧毀防禦工事的。他得到了一個結論，一個英法美的「軍事觀察家」和通信員之流認爲合意，而且一向流行於他們中間的一個結論，就是說日軍固然不能獲勝，中國軍也是不能獲勝的，因爲中國軍沒有反攻的武器。

「中國沒有充分的力量——或者不如說充分的軍備——可以把日軍逐出他們的設防區，日本也沒有足使這場戰爭獲得軍事結局的力量，即使有，也不願把這力量消耗掉。國際局勢的突變或是日軍中間的內訌——這想來還遠得很——該是解決目前僵局的唯一可能的因素罷；除非是靠着——一個什麼機會，兩國可以接近的談判基礎是不能從目前衝突的欲望中間產生的。」

於是提出了一種救濟辦法，就是「友好的關係列強」的調停，不消說，這也得等到對於「調停者」有利的時候。然而困難的所在卻是中國軍日益意識到自身的力量以及他們寄托於人民革命統一戰線的足以攻擊日軍一切設防區的雄厚的軍備了。因此他們自信着儘有方法來反攻，來圍困來隔絕那些據守設防地帶的日軍，使他們不能從他們長江和沿海各根據地確實獲得源源不絕的接濟和增援。日軍該不得不把留駐在後方的部隊大大地增加起來。在中國佔領區域和各前線的日軍人數——一九三九年已經到了一百萬——不但不足以發動新攻勢，而且還守不住兩千英里長的防線，以防衛六十五萬方英里以上的地區。用以準備制勝的反攻的手段就是靠着人民大眾，尤其是其在敵人後方的防禦根據地的幫助，展開游擊戰和軍隊方面革命的運動戰！

華北方面日軍後方抗日人民自衛根據地在「保衛我們家鄉」這一句大衆口號之下建立起來，包括着有組織有警衛的自治的各縣，統一於地方政府之下。W·V·潘內爾（Parnell）在一九三八年七月的《東方事情雜誌》上，寫有一篇論文，爭取內地的鬥爭，其中描述着這些根據地，說是：

「有限制的勢力圈，類似着國共分裂以後，江西和湖南所設立的共產主義核心。這些勢力圈雖在許多方面流露着本身的根原和背景，可是比之一九二四年廣州國民黨大會所議定的半共產主義的政制，更近於三民主義而不近於共產主義。」

把性質說得簡明些，這些根據地，是在統一戰線和人民自治之下，八路軍和動員自衛的人民所組織的。這些地方政府的組織及其政策決定於一個會議，就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至十六日八路軍，它的各行政單位，人民和各團體代表數百人在冀察晉邊區政府首都阜平舉行的會議。出席這個會議的代表是從三十九縣，從包括二十餘萬人的各民衆團體，從蒙族和回族，從軍隊（八路軍）和人民自衛團，從國民黨和共產黨派來的。這個會議的宣言上宣布着地方政府的組織法，這後來獲得了中央當局的核准，包含着下列這些口號：

（一）擁護着服從着中央政府，蔣委員長閻錫山將軍和程潛將軍的領導（程潛指揮着山西陝西和河南各前線的軍事。）

（二）要求各黨各階級各種族的精誠團結；

(三) 武裝全體民衆，動員人民來參加抗戰；

(四) 要求改善人民生活，確保人民的民主權利；

(五) 肅清漢奸；

(六) 統一財政和經濟，使軍隊得到穩定的給養；

(七) 使邊區成爲華北抗戰的堅強根據地，長期防守至最後勝利。

會議結束時各代表呼喊着：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爲了抗戰，人人效力於統一戰線！一切從統一戰線着手！

這些自衛根據地的政治制度的原則規定如下：確保民衆結社、集會、言論和出版的自由；協助民衆運動，承認一切民衆團體的獨立；由政府扶助各種組織的發展；承認民衆團體有權監察政府的活動，卻無權接管行政；組織人民自衛團；組織縣法院，最高法院以及懲處漢奸的特別法院；頒布就階級、性別和種族的利益着想的特種法律。（勞動法，結婚法，商法，以及關於蒙族和回族的幾種法律。）

關於財政和經濟政策的決議案是：各區行政費、糧餉和自衛團經費都應自籌；行政委員的薪俸不得超過每月十八元，實行戰時經濟改進人民生活以利動員和抗戰；廢除苛捐雜稅，舉辦新直接稅，如所得稅遺產稅等；沒收漢奸的財產；厲行邊境稅（關稅）；進行以農產品作担保的地方貨幣，禁止當地濫發的紙幣；發放農業救濟金和商業信用貸款。

爲獎勵農業，扶助農民起見，通過了如下的土地政策：在政府協助之下，組織農民，重新辦理土地登記；組織民衆幫助軍人家屬代耕他們的土地，把逃到日軍佔領的城市的那些離鄉的地主們的土地分給農民免租耕種（作爲臨時辦法，並不廢除原來的營業權）；減低租稅，規定最高租率，並且減低借款利息；組織而且幫助農民合作社，把牲畜勞動，工具和物料補助農民；以很低的利率發放鄉村建築貸款；設立糧食棧儲備糧食以應不時之需。

爲保衛人民自衛區起見，通過了軍民組織政策，包含着下列各要點：每村動員了從十八歲至五十歲的全體男女，組織抗日自衛團，分爲男子隊和婦女隊；人民自衛軍以縣和全區爲單位，守衛道路，保護人民，防避天空轟炸和毒氣等等；組織游擊隊破壞敵人的交通；組織農民救國會，青年救國會，工會，前線服務團和先鋒隊。人民自衛團是爲保衛本鄉而設的，他們的口號是：保衛我們的生活，我們的鄉土！保衛我們的祖國！我們決不做亡國奴！

在上面所引的，載於東方事情的論文上，W·V·潘內爾說到這些區域民衆方面的態度：

「我深知這些鄉民附着他們的幾個新領袖；這些領袖在簡直同當地貧民一樣的環境之下過着生活，其刻苦精神，跟紅黨不相上下。人民窮到那麼田地，依理是不高興向新的行政機關報效的了，然而據我所聽到，他們卻盡量地拿出錢來，並不像從前常有的情形那樣，抱怨着「受壓迫」，至於從前呢，他們一聽見要有中國軍隊來駐紮，就覺得大禍臨頭了。現在一方面農人們安心地操作着，一方面則年青的人們和兒童忙忙着受訓練。」

侵略軍後方這等抗日根據地的成立就是八路軍的鄉村組織工作的結果。八路軍的主要活動中間，有一項是組織別動隊，建立跟民衆的直接聯繫；等到經過了相當的準備時期，則組織上述似的根據地。戰略上最利於創立這等根據地的條件，是在多山區，或是在湖沼和河流構成特殊屏障的地區。然而這等根據地的最重要的屏障卻是廣大民衆的活動和支持；而且靠着這種支持，平原上也能夠設立起自衛根據地來，河北中部就是一個實例。「人民大衆是我們平原上的高山，」——八路軍方面流動的戰鬥隊和組織隊裏就有着這一句標語。

八路軍得着中央政府的核准，在統一戰線之下把這些區域的人民自治組織起來——而並不把這些區域當作八路軍或是共產黨的地域——這一種政策並不是共產黨要展開八路軍勢力範圍的掩護策略。八路軍的出動爲的是保衛國家抵抗侵略者，並不是地域。中國的軍隊現在聽受着派遣都不是要在本國之內造成他們本身的地盤，卻是要抵抗侵略，收復失地。因此，一九三八年五月七日中國評論報所載合衆社通信員哈爾陀爾·漢生 (Haldore Hanson) 的論文河北中部的現勢，其中有一句話也是錯誤的：「蔣委員長似乎願意把本身的軍隊所喪失的任何領土讓與紅黨了。」中國共產黨並不爭論着地域；在陝甘寧邊區以及在晉北前線的八路軍防地是抗日國防根據地，是在統一戰線之下用作民族抗戰和人民動員的據點。華北腹地的抗日人民根據地也只是爲抗戰爲動員爲統一戰線而成立的罷了。

遠在中國西北的新疆省，西北鄰接蘇聯，西南鄰接英屬印度，東北鄰接外蒙，現正担當着又一抗日國防根據地的任務，這根據地是具有戰略上最大的重要性的。這是中蘇兩國間唯一的邊界區域和交通要道，沒有因日本的侵略而被封鎖。中國這一個很遼闊的邊省，面積約計五十萬方英里，人口約計三百萬，有一個特徵，就是那邊的漢人只是數量頗小的少數民族。居民的大多數是所謂羌族，即信仰回教，承受中亞細亞文化的突厥部落，跟現今住在蘇聯土耳其斯坦和烏茲培克共和國的民族是同一種族。大沙漠和山嶺間雜着少數的水草區域，居民就疏朗地散居其間。全省可耕的土地不過十分之一光景罷了。

前上海救國刊物新生週刊編者杜重遠，曾於一九三七年遊歷該省，以數月的時間作了一番廣泛的考察，一九三八年他發表了一個裝成書本的報告，其中記述着該省的內部情形。在他的記述中尤其惹起興味的就是講到現由盛世才將軍任主席的新疆省政府的政策。盛將軍，東三省遼寧人，北伐結束以後才來到新疆。他在日本研習過政治學和經濟學，在廣東韶州軍官學校會被開除，後來轉到日本去，便在日本畢了業。在反叛張作霖的郭松齡的部下，他當過東北軍的軍官，在北伐期間則任職於蔣介石的總司令部。他做着新疆省政府主席所施行的政策就依據着他就職時所宣布八項施政方針，就是實現種族平等（新疆人口只有百分之十是漢人而百分之八十則是回教徒），保障宗教自由；辦理鄉村救濟；推進人民自治；改革司法制度；整理省財政；澄清吏治；發展教育。每一種族都許其設立本族的「文化促進會」，這種組織具有自動創立學校的權利，而政府則頒給這等學校補助費。在這種組織之

下設立的學校研習着他們自己的語言，同時則把中國語作爲必修科之一。政府每年派送學生到蘇聯去繼續求學。盛將軍又把先前政府機關專用漢人這一種限制廢除了，現在各族的人們都是可以充任公務人員的。

盛世才將軍向剛才所引的那本書的作者鄭重地講到新疆在中國國防上的重要：

「爲了要長期抵抗日本的侵略，我們的政府和人民對於新疆是特別注意的。然而我們卻須知道：十年或是二十年以前，我們的敵人早就特別注意這一省了……近數年中，日本匯了大宗的款項到新疆來賄賂官吏和軍隊。企圖造成亂子，繼續他們在本省的破壞活動……新近我們發見有國幣三百萬元一注款項已經從天津匯到本省，又有一注一千萬元以上的款項就要匯來。敵人知道目前抗戰的勝利寄托於中蘇兩國的合作。要實現這一種合作，新疆是重要的交通中心。一旦新疆被封鎖了，中蘇交通就切斷了。因此敵人願意爲這目的花費巨額的款項。然而日本的款項卻全被沒收了，參加着這等活動的人們也被逮捕了。我們竭力要粉碎這等活動，要搜索漢奸。」

近數年來，盛將軍遵循着跟蘇聯密切合作的政策；爲實行「三年建設計劃」起見，新疆政府已經聘用了蘇聯的技術專家。在這些專家中間，有各醫院的醫生，藥劑師，軍官學校和航空學校的教育等。該作者評論着這一點說，「如果以爲這些顧問有着支配省政的權力這是完全錯誤的。蘇聯本國雇用了幾百的外國專家在推行建設計劃，可是我們不能說權力操在那些被雇用的外籍專家之手了。」該作者說：最近兩三年間，該省交通工具有了大大的

發展，他便舉行了一長列的公路以及工廠、醫院等等的表單。三年建設計劃的第二年已經完成了。蘇聯又有總額五百萬盧布的一項借款給新疆，協助着這建設計劃，年息是四釐和二釐。中國政府對於這種建設以及蘇聯在這方面各種可能的幫助，是極其關心的，因為要改進交通工具謀求該省內部的安定使這條聯絡中蘇的大陸路線的發展得以確保，非進行這種建設不可。

在中國往昔的帝制時代，東部海岸還未為世界貿易而開放以前，新疆原是中國和中央亞細亞重要的商業轉運的中心。穿過新疆的幾條道路，所謂「絲綢路」又使中國聯絡着近東和地中海，不但把絲綢而且把絲綢工業傳布到中亞細亞，再從那裏流傳到歐洲。古代中國的主要地域是在黃河上游，即現今甘肅，陝西，山西和河南諸省。現在新疆則把這個地域跟外蒙和蘇聯的中亞部分，又跟英屬印度聯絡起來。尤其是由於蘇聯中亞部分工業的急速的發展，包括着該區重要工業（金屬工業和化學工業）的興立，由於土西（土耳其斯坦——西比利亞）鐵道的建設，一面連接着西比利亞鐵道，一面則又連接着塔什干鐵道以及蘇聯歐洲部分鐵道和水道系統的聯絡中心，新疆這才成為中國和歐洲之間形勢重要的門戶了。因此可以說，在日本海軍打算切斷中國沿海的世界貿易的時候，歷史重演了一番，使中國西北的地勢又復變成了一個障壁，保護着中國的西南部抵擋着日本的侵略。

現在新疆對於中國的幫助只不過是在極端困難的交通條件之下，把軍用的供給品帶到中國來。然而素來大家漠不關心的閉塞的西北和西南現在是急速地建設起中國自衛的新根據地來了，中國的內地從新為統一和建

設而開放了，四川和新疆省內開闢現代的公路了。這一來新的交通線是開通了，在不久的將來就不但可用以輸入中國國防上的軍用供給品，而且還可以使中國開展臨時的世界貿易，繼續抗戰到最後勝利為止。目前中國西北的發展是有極大的重要性的，因為這確保着中國市場的出路，以及中國經由蘇聯對歐洲大陸的交通；假如臨到太平洋大戰的時候，尤其見得重要了，因為這一種大戰中間，日本海軍少不得要控制中國海而把中國海岸關閉起來。日本要從封鎖中國海岸入手強迫中國屈服這一種計劃即使在英日諒解的情勢之下也勢必至於失敗。中國廣大的陸地統一於爭取獨立的鬥爭了，海軍的列強決不能控制它；中國對其大陸鄰國蘇聯的友誼也決不是太平洋上的海軍所能加以干涉的。

西北方面漢回蒙各族的關係建立在各族平等友好的基礎之上，這也是抗日統一戰線首要的原則之一。太平洋事件編輯奧文·拉底摩亞（Owen Lattimore）寫着物和頭帕（*The Kinono and Turban*）一文，發表於一九三八年亞細亞雜誌，其中說到中國這些種族關係的重要，強調着一個事實，就是中國西北的回族跟漢族的差別不僅限於宗教方面：

「中國西北的回教徒雖然由於歷史的傳統和通婚在文化上語言上很廣泛地中國化了，但也毫無疑義地該說是一個不同的民族。我想造成着這種差別的並不是宗教。宗教不過把那一種深伏着的差別加強一番罷了。」

奧文·拉底摩亞在這裏所想着的是中國內地各省如甘肅、寧夏、陝西、山西以及四川的回教徒、新疆的回族則在語言和文化以及種族根原上也還是中亞細亞式的，因此新疆素昔的中國當局要維持其對於這些民衆的統治，只得多少表示些忍耐，雖然他們政治上的壓迫性質並不因而發生根本的改變。奧文·拉底摩亞在他的論文中，把昔中國西北回族所遭遇的實際情勢以及近數年間陝西、山西及周圍各省中國共產黨和前紅軍的政策而引起的改變，都記述得十分精到。拉底摩亞就這方面說：

「從近代的歷史看來，每逢漢族佔了上風的時候，他們總是屠殺回族的。如果回族得勢了，則他們就殺戮漢人，擄掠漢人的婦女。現在歷來第一次，舊日的嫌隙消釋了；漢族不但聽任着回族治理他們自身的事務（在紅區）而且幫助着他們。」

「雖然這一政策首先是共產黨所試辦的，可並不是「共產主義」。這是對弱小民族，回族（以及蒙族）的呼籲，要他們和漢族聯合起來，用和協的公平的辦法造成一種能夠抵抗日本的唯一力量。而且漢族和邊境少數民族之間這一種新關係已經逐步地發展了，因為這是基於謀求互利的建設的原則的。」

拉底摩亞在這論文中進而把共產黨在中國西北所創導的這項政策的民族革命性發揮了一番，他說共產黨在來到西北的時候，不會打算跟南京方面爭取回族的統治權。

「中國真是有幸，他們不會如此。他們倒反實施了孫中山所倡導而後來國民黨加以背棄的原則：就是謀

求中國少數民族的公平待遇和自決這一項單純的原則。」

就新疆本省來說，這方面的成就主要是出於蘇聯所照射的影響，這就是說蘇聯的鄰誼，以及蘇聯在本國領土之內確保着各個民族的自由平等和自決，這一種政策上所顯示的榜樣。這種榜樣，新疆的中國當局是不能加以漠視的，因為當地的回、族眼見着隔境的中、亞、細、亞諸民族的社會和文化復興起來，而這些民族在種族上和文化上本是他們的同胞。然而蘇聯卻並不利用這局勢以謀領土的擴大；相反的，她以和平的陸誼幫助新疆的漢人來聯合回、族推行必要的改革，使新疆走上了建設之路而不改其為中國的一省，正在抵抗侵略爭取獨立的中國的一省。

盛世才將軍所主持的新疆省政府遵循着對蘇聯的友好政策，運用着蘇聯的技術援助進行本省的建設，並且培養着本省抵抗日本侵略的力量。盛將軍在對杜重遠所作的談話上把新疆對蘇聯的政策解釋為和平的，反帝國主義的中蘇合作政策。盛將軍又說：

「今日的俄國跟沙皇時代不同了。她並沒有侵略的野心，這一層在蘇聯現今所實行的經濟制度上表現得明明白白，因為這種制度已經把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消滅了。蘇聯侵略我們幹麼？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中，分明地告訴我們：要聯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要建設中國，我們首先應當打破帝國主義的鎖鏈，尤其是應當摧毀日本帝國主義。」

新疆是漢、回兩族抵抗日本侵略的國防根據地，正同外蒙是蒙族的國防根據地一樣；這兩塊地方都是中國的

一部分，都跟全中國抵抗民族敵人的鬥爭，抵抗侵略爭取獨立的鬥爭配合着。新疆（還有外蒙）跟蘇聯相聯絡的特殊關係由於該省的邊境地位，又由於爲對付共同的帝國主義侵略者起見，國防上和安全的利害關係。西北和華北（遼內蒙在內）的抗日根據地現在已經跟新疆的抗日國防根據地相聯絡了，它們都努力要使侵略者落到最後失敗，而被驅逐出去。總之，爲了遠東的和平，爲了關係各國相互的利益，中國民族力量在西北和西南建立起新的中心來，一定可以使西北方面中蘇兩國間的集體安全和互助獲得了充分的實現的。這一種對於中國切實有助的政策是蘇聯的主張所遵循，而中國加以響應的，因爲中國是在統一戰線之下了，——依照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政策中間所規定，這是中國民族的統一戰線，又是全世界凡以平等對待中國的一切民族的統一戰線。

\*

\*

\*

在長江下游作戰的新四軍是跟八路軍同一式型的軍隊，也採取着相同的方法，如倡導游擊戰，動員民衆指導民衆抵抗日本的侵略和佔領等等。由於八路軍在北方的戰蹟，及其盡忠於統一戰線，蔣委員長這才發動了決心，要在長江下游重要的戰略區域日軍的側面，配置一支對於流動的游擊戰訓練得同樣有成效的軍隊。新四軍的軍師長，軍官和士兵大半是華南方面前中國紅軍以及該軍所領導的游擊隊出身的。軍長葉挺將軍在南方國共統一戰線的初期就以革命軍官和革命領袖的身分活躍着，在北伐期間，則以担任鐵軍（第四軍）的師長而出名。前南方的紅軍領袖項英現今做着新四軍副軍長，其下還有一批紅軍的幹部士官領導着新四軍的前線各縱隊。這一軍因

爲負着破壞日軍後方和交通的特殊任務，所以現在附屬於中國軍的一個集團，其中有中央的四川的和湖南的各師旅，他們的防地在長江下游構成着所謂第三戰區，司令是顧祝同將軍。

因爲統一戰線的實現中間有些困難是慢慢地逐漸地加以克復的，所以新四軍在中國軍退出南京以後方才成立，直至一九三八年夏間方才能够開始作戰。然而雖在已經對日軍戰鬥的時候，新四軍在它所附屬的軍團中間要把那些足以妨害對日作戰的前途的內戰的傳統精神，階級的偏見和猜忌心理加以克服，而從事於喚醒提高而且鞏固合作精神的工作，也遭遇着大大的困難。我們從一個事實上可以見到這些困難的程度以及克服這些困難的英勇精神，這就是新四軍的武裝有一大部分只得靠那些從日軍方面奪來的軍用品來補充。該軍有着宣傳和激勵民衆的權利，然而民衆組織對於大規模流動的游擊戰是必不可少的，這權利却由省當局保留着。又一個阻礙則是戰區司令給該軍所指定的防地極其狹仄，而廣大的活動空間則是運動戰上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最後呢，該軍的兵數又被限於一個最小的限度，這一種數量只可以進行小規模的軍事活動罷了。

然而新四軍却抱着自信心來面對這一切困難，它認爲一方面由於對抗強敵的情勢之下，鞏固而且擴大統一戰線的需要，另一方面則又由於本身的英勇精神，合作精神和紀律，一定可以把一切阻難及時克復的。一九三九年春間，在我訪問安徽該軍總部的期間，葉挺將軍在會談中間指出這一點來：

「雖有各種特殊的困難，新四軍却順利地發展着，加強着對其他軍隊的合作。那些軍隊起初從一個特殊

的角度看着我們。他們見到我們方面共產黨的領導和工作方法，往往是疑忌我們的。然而我們却證明着：凡是我們所幹的事都依據於政府的命令，爲的是要完成我們軍事的任務。我們對日軍戰鬥着，我們養了人民的幫助深入到日軍的交通地帶和日軍的後方，這等成績就是我們用以證明我們工作得當的方法。我軍和八路軍雖都依照同一的原則在工作，我軍却比八路軍還更盡力遵守統一戰線的條件。我們差不多跟第三戰區其他軍隊受着同等的生活待遇，而我們的部隊比之本戰區的其他軍隊，是很小的。八路軍則是龐大得多的軍事組織，有一個特區在其本身的治理之下，它又在晉北和華北的戰爭區域以內担当着主要的任務。」

新四軍的標語是：「用抗日戰鬥來克服一切困難！」人民是統一戰線的基礎，新四軍那樣的人民軍隊在其對於人民的義務上，不能不盡力於統一戰線。葉挺將軍把那些交給他們軍官和士兵的工作列舉如下：

「自從我們到這區域以來，人民看着本軍的勇敢精神和紀律發生了很好的印象，他們日益熱烈地幫助我們了。在我們一切的活動和政策上，我們無論怎樣幹，他們總覺得我們是站在普通的人民方面，專心致力於提高人民的力量及其抗日的活動。雖然人民的武裝簡陋，我們却教育他們，組織他們，使他們中間造成堅強的抗戰團體。就這一點來說，我們是跟旁的軍隊兩樣的，那些軍隊小慮着窮苦的人民，有時甚而還要把他們本地的組織解除武裝。然而我們却也教育着我們的士兵和軍官不要忽視本區的許多地主和當地領袖，還須跟他們有密切的友好的聯絡，以求抗戰力量和民族統一戰線的加強。我們不能僅僅站在一方面，就是僅僅普通人

民方面。我們必須獲得對各階級的聯繫和良好關係，我們必須用切當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的軍官有的還缺少着這種能力。他們單是側重着關於普通人民的種種問題，並不注意到地主和地方領袖。這足以引起誤會，我們要改進這項工作，現在教育着我們的幹部了。」

於是葉將軍補充着說道：

「當然舊時的官僚中間還有許多貪污分子。他們永遠不會了解我們，還常常要阻擋我們的路。然而我們却打算用武力來打倒他們。人民的政治教育受得愈多，人民對於抗戰和民族革命愈有認識，人民自己也愈能够把他們打倒。因此抗日戰爭一定會在這種舊官僚的地位上發生幾分效果的……」敵人愈是向我們壓迫着，進攻着，我們的民族國防也就愈是統一起來堅強起來。我們愈是把合作精神，也就是民主精神發展開來，統一戰線也就愈強了。」

新四軍的作戰根據地跟上海很近。上海杭州南京這三大都市造成着一個三角形，在戰略上控制着長江下游區域，從長江口的淞滬起經鎮江南京而至蕪湖。那條跟通到北方去的津浦路相接的南京上海杭州鐵路也是在這一區域。這三角地帶是新四軍游擊隊行動的目標。就地形上和交通上看來，這三角形以內的地域是有許多公路，鐵道，和寬闊的水道縱橫交錯的平原地帶，這種配置可以說是全中國最完備的交通系統了。這一交通區域的安全對於華中方面日軍的侵略，對於日軍聯絡華北的軍事運輸都是極其切要的。

這三角形的西部邊緣，即浙江、安徽和江蘇三省交界的地方有一個深邃的山區，新四軍的根據地就在此。這根據地的背後是著名的黃山——有着阿爾卑士山似的明媚的峯巒和峽谷，遠遠地望去，那景色是黃裏帶紫的。黃山脚下是阡陌縱橫的肥沃的原野，由羣山環抱着，山上所產的竹和茶是全中國出名的。歷史的傳統早就承認着這條山脈的險要，而把它作為沿海的江蘇和浙江內地的安徽和江西這四省共有的邊界了。在這山嶺地帶側面，沿福建和浙江的大部分的海岸本身就是一道雄厚的巖壁，布滿着危險的陷穽；繞着這些山巖通到各口岸的窄狹的水道只適於小火輪的通航，而這等小火輪還須由熟悉水道的當地的水手來開行，現在繞着埋水雷區域和特別封鎖線駛行的船隻，就是這等水手駕駛的。這些靠着山巖的水道和港汊在往昔時代當然是海盜屢居的地方。現在這些地方充當着天然的要塞，抵禦大海盜的艦隊上的大砲和陸戰隊了。

有經驗的游擊隊在這些山區以內是安全的；軍隊獲得了人民方面積極的幫助來進行運動戰，可以使冒險侵入這地帶的日軍一敗塗地。這等軍隊又可以經由山嶺保持其對內地和沿海的別省的聯絡。他們能夠衝到平原來破壞交通攻擊敵人的營寨，把作戰地帶擴展到敵人的後方。最後呢，這等游擊隊還能夠把日軍方面以長江口通到內地的一切交通的總脈扼住。因這理由共產黨領袖們才建議着把他們在南方的部隊，具有着這些地區的運動戰和游擊戰的經驗的，給中國軍最高當局來調度。因這理由，蔣委員長才在中國軍退出南京之後接受了這個建議，決定把新四軍安放在這個戰略的聯絡點。

跟八路軍相比較，新四軍只是小小的軍事組織罷了。然而這兩軍既然都在淪陷區域作着戰，在政治上軍事上又都切實地遵循着同樣的流動戰和人民動員的方法，也就可以被認為一體，被認為機能上密切相聯的同樣的軍隊的。我記得葉挺將軍曾經告訴我，在他的軍中有一支縱隊向着安徽北部前進，所負的任務就是切斷津浦路。葉挺將軍當時還說過一句話：「如果我的部隊成功了，他們也許恰巧在那裏會合了八路軍的游擊隊和人民義勇軍，那些從山西和河北的八路軍根據地投向山東來的。」

新四軍以黃山及其附近那一個漸漸傾斜到大江流域的高原為背景，在那兒設立着總部，訓練營，醫院，軍需站，軍器修理部，政治部，印刷部——一句話就是凡是人民的軍隊所需要的一切。總部人員，後方留守隊和訓練團都是在天然的要塞區域，這就是層層疊疊的山嶺，湖泊，和溪流，——這等溪流匯注於長江。這一軍的基幹分成四師，在這裏稱為縱隊，都是在前方，有的距離總部約八十里或一百里，有的靠近着長江南岸的蕪湖，南京和鎮江的周圍；又有一個縱隊在長江北岸，不管長江中日本海軍巡艇經常地在梭巡，還是獲得着對岸總部的接濟。

在卡車呀，長途汽車呀，行進的兵士呀，小件的貨運呀，絡繹不絕的山間狹隘的汽車公路上，我乘着卡車奔馳了好幾天才到新四軍的第一個駐防所，一路受着空襲的威脅，往往為要避離空襲地帶少不得開足了速率沒命地在山明水秀的勝景中間前進。這等美國式的巨大的重卡車約有十輛，光景是新加坡和馬尼拉的愛國華僑捐助給該軍的。這些卡車現在經常地在滬游擊根據地要口通到沿海及腹地的貨運中心的公路上行駛着，所裝載的是汽油，

服裝，軍械，彈藥，往來游擊區域的旅客，沿路還接載着那些從南邊諸省遠道迢迢地來投新四軍的志願兵，學生，農民和工人等等。這些都是出於至誠地來投勁的青年，他們離開了淪陷區域，到這自由之鄉來，爲的是他們在這裏可以自由在地學習着，生活着，又可以爲民族的自由而戰鬥了。

我進了駐防軍的總部，那地方正開着軍民大會。這是一個市集日，農民和男女青年約有一千人站在廣場上聽着演講。他們是來看兩個從前方運到的日本俘虜的。這兩個日本步兵，有一個本是農夫，又一個本是漁人，都穿着中國裝站在講台上。他們是數月前在蕪湖附近，跟游擊隊發生小接觸的期間被捉住的，從那時候起一直住在游擊隊中間。照這前線上一切日本俘虜一樣，他們隸屬政治部抗敵工作處，該處所担任的工作就是在淪陷區日軍中間從事宣傳，使他們自己明白這番來侵略一個決意保衛國家的民族實在是受了日本軍閥的播弄。從兩個日本俘虜和羣衆大會的聽衆身上，都可以看出這項工作的顯著的效果來。俘虜之一應了邀約，在到場來參觀他們的民衆之前說道：「我也同你們一樣是一個農人，我不由得來到這個國度做着你們的敵人，我只有覺得慚愧罷了。我的唯一願望就是回到我的家鄉去。我盼望着和平，如果我回國去，我少不得要告訴我國的一切人們，凡是說到你們是我國人民的敵人的都扯謊。然而我們的軍閥和帝國主義者一天沒有被擊敗，我也一天不能回去呢。」又一個俘虜眼淚汪汪地講着道：「我們的軍官對我們說過：我們一被俘，就要受虐待遭殺害了；我們落到了你們的手裏，就應當自殺，而且被俘的士兵永遠不能再見日本了。我拚死命地打仗，要免得被俘，可是我受傷倒地便被運走了。我被送到你們的

醫院的時候，我所受的待遇正同一切中國兵一樣，於是有人說給我聽：我是你們的弟兄；中國和日本的窮苦人民的共同敵人逼得我來送死來受苦。這戰爭使我閉了眼了。我沒有充分的話來答謝你們。」聽衆興奮地聽了這些話，便大家歌唱道：「起來！中國的人民起來！我們不要做亡國奴！」

過後我們和兩個俘虜同吃着茶點。他們坦白地回答了種種問話，請求寫信給自己的家屬說，他們現在活着，這被俘的數月間，跟友好的中國人在一起，過的是自由的光陰。我在這後方根據地之外，還旅行過前方附近的游擊區，在我旅行的期間，我又幾次遇到這樣的俘虜羣。大半是我在醫院裏見到的，他們差不多全都經過了醫院，因為他們只有當無力抵抗陷於困境的時候，方才被捉住了。在新四軍總部裏，我看見他們跟中國兵做着同志似的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沒有被拘禁，也沒有什麼看守。這些俘虜教着日語，跟該軍的士兵和軍官一塊兒學習着玩耍着。經過了相當的準備期間，他們用日語寫着小冊子，傳單和口號以作前線的宣傳，又給該軍所召集的民衆大會編製反戰反法西斯的劇本。他們告訴我們，要籲請國外友善的人們給他們寄些日語的書籍，以及別的贈物來，慰藉他們在這很窮苦的軍中所過的生活。以下便是我們離開新四軍總部的時候，交給我們旅行團的一個團員的，總部抗敵工作處的日本人所寫的一封信：

「松井女士和反戰反法西斯的旅美日僑：

我們彼此還未相識，可是我們現在不揣冒昧，寫信給諸位了。我們只知道諸位在美國進行着反侵略

運動。我們則爲了同一的目標，在這裏的新四軍中間工作着。

我們希望中日戰爭早日結束，使中國和日本的人民可以獲得和平和自由。在這裏的我們日本士兵中間我們做着宣傳和勸導工作，要使日軍儘早從中國撤退。然而這却是嚴重的問題。這是很困難的工作。我們在這裏能力都很薄弱，尤其覺得困難了。然而我們却打定了主意，要爲世界和平而鬥爭，要促成這一個目標的實現。

希望給我們指教，跟我們合作。祝諸位健康。

簽名 橫川岩吉

後藤勇

田畑作造

香河正男

濱中正志

無論那一個日本兵一經新四軍俘獲，政治部就通知這個俘虜的家屬，說是他活着，而且很安全；要是受傷的話，則除報告傷勢之外，還懇切地說一定毫不歧視地好好兒照料他。如果他在醫院裏或是被俘期間因病死了，家族方面也得着音信。這等信是俘虜寫的，寄發到中國以外的口岸，再從那裏轉遞到日本去，使這等信保得住收到。臨到有

一個日本俘虜死去的時候，同伴的俘虜們就依照着日本的習慣和儀式來安排埋葬。受傷的日本人也由這種日人團體幫同照料着。我有一次參觀着陸軍醫院的時候，一個剛從前方送到的受傷的日本兵叫我「俄國人」，要使他相信那些來參觀中國軍隊的外國人不一定都是俄國人，雖有另一個同伴的日俘幫着解釋，也還是困難得很。

新四軍的醫務處，在現代有經驗的中國醫生的指導之下，正如中國紅十字會所稱道，是中國一切軍隊的模範。就在這既無公路又無市鎮的山鄉，我見到兩個近代的野戰醫院，在中國前方一切區域中間，可說是最優良的了。這兩個醫院都擠得連一張病床也沒得剩下來；一共六百光景的傷病者當中，重傷的有三分之一，都是給子彈和手榴彈打傷的，傷勢較輕的受傷者則在較近前線的師屬醫院受着治療。醫院裏大部份是病人，兵和當地的農民都有。醫藥材料大半是捐來的。X光站連同着最新式的器械和發動機是中國一個著名銀行家的捐助品。當初從香港或沿海地方，分成了零件，經由腹地和山鄉，好容易轉運到這裏來。我又眼見着醫院方面給士兵施行手術，依照一切近代的衛生標準。主任醫生盛博士告訴我，他們每月的開支超過着他們從軍事當局領到的本醫院一年的經費，他們主要是依靠着愛國同胞和國際救濟團體的捐助的。各種的捐助，如醫藥材料，罐頭食物以及現金之類，大半來自上海，香港，新加坡，馬尼拉，美國，加拿大和印度。醫務處專給軍隊和當地的人民服務。醫生，看護，僕人必須選着那些對於本身工作有着專門的資格，受過專門的訓練的，才加以進用。他們的服務都出於志願，薪水很微薄，醫生所得到的最高薪額也只有每月國幣五十元左右。醫務幹部的飯食費同病人一樣是每天兩角，比士兵每天一角的口糧加倍了。

可是也只好吃些蔬菜，白飯，豆糕，以及每星期一兩次的肉食。該軍總部設有兩個大醫院，此外在各隊部設有幾個分院，在前方設有許多第一綫救助站。這種醫務機關是爲軍隊爲人民而設立的，醫院裏的醫藥，到病人家裏的出診一律是免費。該軍對於這一區域以內的病人，兒童和戰時難民，幹着廣大的救濟工作，而醫務工作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罷了。

時常在這一軍區上空偵察的日本飛機無法找出他們的目標來。這些山嶺地帶的成百的小村落中間，每一個農家，每一個祠堂或是廟宇全都有着充當軍站，兵營，司令部，貨站或是軍火庫的可能性。田野間的農家呢，樹林中的祠堂呢，山中什麼地方的房舍呢，什麼地方日本飛機找得着目標呢？是市集日呢，還是游擊隊和人民志願隊的集會，這他們怎麼辨別得清楚呢？而且大家一聽得飛機迫近的聲響，也容易散開在山林中間的。因此，正同日軍不能用坦克和大砲向這一地區前進一樣，日本的空軍在這裏是毫不中用的，在另一方面，則新四軍只要派出尋常的步兵隊去，就有良好的機會來進攻日軍，拿日軍的軍用品來補助他們自己。日軍如果向這一區域總攻擊了，那麼，他們就只不過離開了長江，鐵路和公路，進到這黃山區域，使他們的給養路綫遭受着游擊隊和有組織的人民自衛團的攻擊，如果他們在鐵路地帶後面經常的游擊活動之下，再不退却，他們就立時要遇到飢荒了。在三四十里光景的地域以內，設置着總部，中央醫院，參謀部，政治部，特別守衛團，稱作訓練營的軍政學校，無線電站和電報站，軍需部，彼此相隔各有許多公里，用電話或是騎馬的步行的信差傳達命令。

距總部約十里是陸軍訓練營。那邊一個鄉村裏，有來自前線的戰士，前進的工人和農民，男女學生約一千五百人，住在農家或是木造的營房，學習着游擊戰的理論和實踐，統一戰線的政策和方法，民眾組織，淪陷區域佔領軍中間的宣傳，正規戰和游擊戰的戰略等。訓練期間是三個月至五個月。這訓練營約有半數是前線派送回來求高級教育的士兵，其他半數則是從南方諸省，各口岸和沿長江的淪陷區域來的志願兵。訓練完畢之後，各畢業生都成羣結隊地被派送到前方各地或是淪陷區的各鄉村去做民眾組織的工作。高級的將領，參謀長，前方的司令，大學教授和學生則任着教員。這一軍的軍官和士兵一見就可知其跟旁的中國軍隊不同了。這些士兵和軍官都比別的軍隊幾年青得多，他們武裝更簡陋，而且士兵和軍官之間，在外表上又沒有什麼看得見的辨別。有許多軍官，政治工作人員和担任着守衛的兵士穿的是日軍的大衣，或則在戰役上奪來，或則得自截獲的日軍輜重隊。他們的武裝，步槍，手槍，刺刀和大刀，手榴彈和機關槍顯着多種多樣的式型，其中有一批是日軍的東西，這足以說明日軍不得不把大批的武器借給這些戰士呢。因此他們時常說，這個區域的日軍就是「我們的軍需部」。在這軍區以內用以乘騎和運輸的馬匹有大半也是日軍方面於心不甘地供給着的。我曾經聽得會見到的一個軍官代表有一次說：「我們必須再從日軍方面和政府方面多弄到些軍器才好。」

「我們不是游擊隊，」有一個軍官對我說道，「我們是性質特殊的正規軍，担任着日軍佔領區以內游擊戰的組織和領導。我們跟別的正規軍，也可以說「友軍」不同，因此我們的募兵制度完全根據於志願的原則而不是強

據於強迫的原則的。正同跟着軍有別的中央軍一樣，我們的軍隊是從中國各省——長江流域和華南各省居多——募集的。我們無法使那些熱心來投我軍的人們悉數入伍。我軍士兵和軍官之間的關係在軍役問題上根據於紀律，可是除此以外，我們從最高級到最低級，却都是平等的同志。我軍中間有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跟着受有政治訓練的工人和農民在一塊兒，因為我們必須把普通的人民，無論男女老少，教育起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方才可以進行積極的抵抗，如果沒有積極的抵抗，那就在淪陷區以內也不能順利地展開游擊戰了。我們這一軍的訓練目標是在直接的戰鬥，特別是在後方和日軍佔領區的交通綫上的游擊戰的條件之下。然而，除此以外，人民中間的政治工作和社會工作，如進行宣傳，激動人民來參加民族戰爭，參加貧民、難民和兒童的救濟和醫藥工作之類也是我們特殊的任務。」

「游擊隊或是別動隊。」他繼續說道，「是非正規軍。他們是有組織的武裝的人民；由於我們的幫助，勸告和指導，他們抵抗着侵略者，保衛着他們自身，他們的家屬，他們生活着工作着的村莊和地區。我們幫助着他們來組織他們自己，差不多用了我們同樣的方法來獲得武器，這就是經過了戰鬥，從敵人手裏奪下來。他們有許多現在有着步槍了，有許多則只有着大刀和長槍，或是只有着手榴彈。他們偵察着自己區域以內的敵人，把他們的運動和弱點告知我們。他們幫助我們，在我們進攻敵人運輸隊的時候，他們保護那些住在鄉村上的我們便衣的士兵和政治工作人員，照料我們的傷兵，他們依照了我們的指示，從許多鄉村聚集了成千的隊伍破壞着好幾里長的公路和橋梁。這

些別動隊有許多加入了我們的軍隊，便在那裏受正規的軍事訓練，以便日後從事於有組織的游擊戰和流動戰。軍中一切政治工作由政治部主管着，而這政治部則隸屬於軍事當局。政治宣傳都是跟該軍依照着統一戰線的原則和政策來實行抗日戰鬥的工作相關的。葉挺將軍就這方面解釋着新四軍所處的地位道：「就政治方面看來，這新四軍是共產黨所領導的。組成這一軍的是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同情者，在後者中間又有純粹的國民黨員或是有國民黨傾向的。由共產黨負責的宣傳限於抗日的任務。共產黨又教育着他們的黨員，而這一種教育工作也集中於抗日工作以及爲實現三民主義而鬥爭的統一戰線。」

宣傳工作有一個特殊現象就是士兵、游擊隊和村民的羣衆大會。參加這等大會的兵士都帶着步槍和刺刀。別動隊呢，則都肩上擱着長槍或是大刀。特別的點綴是從日軍方面奪來擺在大會前端的重機關槍和輕機關槍。大會一開幕，總就是追悼陣亡的民族英雄，向孫中山遺像致敬，同時主席恭讀孫中山遺囑。接着大家唱合作歌，這歌是紀念着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的合作的。所謂前綫服務團則幫助着軍隊在淪陷區後方組織羣衆大會和戲劇表演。在我旅行這個區域的期間，我見過這等羣衆大會許多次。這種大都以戲劇表演來結束的大會是有計劃地用以融洽軍民的感情，用以教育農民，組織農民並且用以報告凡是和中國抗戰有關的國內外重要時事的。這等大會有許多是要歡迎那些來自淪陷區域的代表團。這些代表團往往路上耽擱了幾星期，乘夜間通過了日軍的防地，才行進到這游擊軍的總部，還帶着獻給民族英雄們的禮物，因爲這些英雄們的戰蹟，證明着中國政府沒有放棄了淪陷的土

地，却還由於國共合作的幫助，正在領導着組織着鬥爭，要收復那些失地。最常見的禮物是村民所捐助的被單，布鞋，士兵穿的草鞋，醫院裏用的鵝蛋和茶葉，特種的旗幟，繡有讚揚新四軍的字句的綢掛幅。

指揮着第二縱隊在南京區域作戰的陳毅將軍，在給我的一次會見中，這樣地敘述着這部分前線的軍事形勢：

「現在我們只是在夜間作戰。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我們開始行動的時候，敵人還沒有防備。那時候，鐵路運輸是容易阻斷的，我們炸燬了橋梁，破壞了公路，奪獲了裝軍需品的卡車，襲擊了肅清了好幾處日軍的駐防隊，甚至還攻擊過南京郊外日軍的飛機場。然而，不到幾個月工夫，日軍被迫調來了強勁的援軍之後，戰鬥條件却就根本本地改變了。現在日軍控制着防守嚴密的交通地帶，他們沿交通線建立了彌壘網和堅強的防禦工事。我軍的活動空間變得狹小到極度了。然而我們的成功却也十分明顯，日軍在這些小小的交通區域，足足留駐着四個師團，較之我們還未開始作戰的時候，兵數是加多到五倍了。而且我們還有着更明顯的成功，就是日軍雖然增加了，我們還是乘着黑夜繼續進攻，不過我們往往得把駐紮地點變動罷了。敵人無法破壞我們在敵人防軍之間的各據點，因為在敵人戰略的設防地點的四周，我們已經獲得農民大眾的協助了。」

「現在日本的運輸隊只有伴同着裝載二三百名軍隊的許多卡車，後跟着坦克，方才敢在本軍前方區域以內冒險通過他們的交通地帶，至於在我軍未到以前呢，則他們甚至用了一輛到三輛的卡車就經過這些公路了。他們必須常設一個特種工程處經常地修理那些被破壞的公路和橋梁，又得備有特種的車輛經常地在

鐵路上保護每班火車，把那些被游擊隊拆掉的路軌修好。我們已經使交通地帶全部成爲交戰地帶了。先前日軍的駐防營彼此相隔有三四十里遠，現在這種距離則縮到了三里五里，還靠着外層警戒地帶防守點的補助，這等防守點配置在交通地帶的周圍，相隔是十里。他們結集着他們的兵力，加強着他們的防禦工事，而我們呢，則結集着武裝着人民，把我們的戰鬥隊伍一天深似一天地進展到日軍後方去。我們這才在久經敵人佔領的地區以內建立着新前綫了。」

陳將軍指出所講的是五縣區域以內的成績之後，歸納起來說道：

「日軍已經佔領了中國五百縣光景的地方。可是如果被佔領的各縣都存在着他們維持佔領的條件，正同我們在極不利於游擊戰的環境之下所創造的條件一樣，那就怎麼樣呢？我想日本全國的陸軍，連後備兵在內，還是不夠在佔領區域駐守而且保護的。只要從統一戰線以及應用我們的民衆動員和流動戰的方法入手，我們在這裏所得到的成就一定是中國到處都能够得到的。」

游擊軍的進攻所遇到的上述的困難條件使新四軍在策略上以及對第三戰區其他軍隊的密切合作上都不得不有相當的修正。新四軍組織着所謂突擊隊，這就是受過特別訓練的老練的游擊隊的擴大幹部；牠聯絡了別的軍隊和中央各師旅可以配成廣大的牽制戰路，而向敵人方面較弱較孤立的各防守點迅疾地攻擊。這種戰略已經順利地試過多次了，足使那些較弱的防守點在援軍不及開到以前就被消滅。日軍這才只得集中防守那些相距更

遷的較大的駐防所，這一來也就使交通地帶以內的游擊空間擴大了。日軍正在煞費苦心，要把淪陷區域的駐軍人數減到守備上必要的最小量，而游擊隊則儘着迫得日軍集中了大量軍隊來守衛交通線而在那裏作戰，同時設法重佔交通地帶外邊的區域。進攻交通線以內設防點這一項新四軍的新策略是謀求着把游擊活動跟流戰配合起來的重要的步驟；而新四軍就在淪陷區域以內和日軍前綫的後面，給第三戰區所屬的大量正規軍，打着先鋒。要實行這種策略，游擊軍必須具有着較精良的裝備，而打游擊的突擊隊也必須跟這樣的正規軍聯絡着作戰。

在結末，讓我把訪問新四軍總部的期間，新四軍兩軍長所作的談話節要載在這裏。這兩篇談話都是同鞏固統一戰線這一項無上重要的問題相關的。葉挺將軍說道：

「國共兩黨有着各別的軍隊，這是現在統一戰線時期之前十年間的，內部矛盾的結果。然而這等各別的軍隊的存在，却並不跟抗日統一戰線相抵觸。其實，統一戰線依賴着各別的軍隊的合作，這種合作的目標是在成立完全統一的全國的陸軍，來爭取三民主義的實現。要確保兩黨的聯合抵抗侵略者及其民主的面目，從未來完成民族革命，創造獨立的中國，這是現在唯一切實的方式。國共兩黨順應了抵抗日本侵略的種種要求，大家聯合起來。兩黨連同着各別的軍隊之間這一種合作確保着全國的統一抗戰，又給自由的中國的民主建設奠定了鞏固統一的人民基礎。

「在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十年間，共產黨遭遇着國民黨的進攻，這種進攻的目標是在消滅共產黨，剷除共

產黨的信徒。在這內爭的十年間，共產黨所保衛的實在是本身的民主權利，即在政治上作為窮苦人民的黨而存在這一種權利。

「中國還是一個半封建國家，其中絕大多數的人民很窮苦，而且人民是沒有什麼權力的。這個國家還不是民主國家，人民在政治上沒有發言權，也沒有確定的政治地位。人民的呼籲，上層階級是不加以聽納的。因此關心於改變這些條件的農民和工人日益增多了。共產黨的合法的存在又憑藉着民主原則的實現。民主的權利確立了，方才可以使作着工人和貧農的政黨的共產黨獲得了法理上存在的保障。

「然而單是民主政治却也不能確保中國抵抗外國的進攻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現在因日本的侵略而受了完全落到奴隸狀態的威脅。國內有着侵略者，人民不能僅僅為民主政治而鬥爭，却必須為抵禦外敵而戰鬥。因此我們的工作目標不但是在民主政治和人民生活，而且又在確保全中國連東三省的領土以內，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免得日本的侵略。就爲了這些任務，共產黨指導着自身的整個政治組織，自身在人民中間的勢力，自身組織民衆和進行游擊戰的廣大經驗，在統一戰線之下，投効於受攻擊的祖國，特別是在日軍的佔領區域。新四軍和八路軍的存在由於共產黨在我們民族革命，北伐以及現今的抗日戰爭中間，積極參加以及犧牲的結果；共產黨在這些軍隊裏起着意識力的作用，要經由統一戰線，經由爭取民族解放，爭取民主政治和人民利益的鬥爭，謀求民族統一的持久和鞏固。」

副軍長項英在統一戰線的第一次大革命時代，從工人變成了上海一個工會的領袖，現在呢，担任着抗日鬥爭中間的一個領袖，這一支人民軍隊的司令了，他的聲名是傳遍於長江下游的。項將軍在他總部跟我會見時，他說道：

「新四軍和八路軍的歷史的起原是相同的，然而我們的背景我們的環境却各有很多的差別。在內戰時代，我們都是紅軍，我們會經在南方一同作過戰。等到現在的八路軍大部分向西北長征的時候，新四軍留駐在南方，後來爲自衛起見又復分爲好些小單位，散在八省的邊區。八路軍則依然是集中的整一的大軍，便在西北方面爭取統一戰線的鬥爭中起了極大的影響。八路軍不得不主要地爲對付省軍而自衛，而我們呢，則面對着中央軍。西北方面內戰已經終了以後，我們在南方還是受着攻擊。當八路軍的地位已經在西安事變後獲得了政府的承認的時候，我們在南方重新遭受了攻擊，這目標是要消滅我們的隊伍。等到抗日戰爭開始了，八路軍立即參加了戰鬥，雖然武裝很簡陋，却接連幾次造成了勝利的戰績，這使八路軍在國內的聲譽提高起來，而且給北方抗日統一戰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基礎就是它做着先鋒隊領導人民抗日，這一種無敵的地位，以及人民大眾方面對它的熱烈的支持。然而只是由於日軍的進攻上海，我軍所受的攻擊也停止了。這是我們不能够參加戰爭的第一階段。一九三七年十月底蔣委員長發出了一道命令，要我軍實行統一戰線，過了三個月方才把新四軍成立了。一九三八年春間，我們得以會集於我們現在的防地。到現在爲止，我們沒有取得正規軍的法理地位。我們的法理地位是附屬於長江前綫的正規軍的特殊軍隊。」

「因此，我們不顧一切阻礙，一切極其困苦的条件和限制，憑着真正革命的犧牲精神和統一戰線，在抗日前線作戰，從作戰開始，我們在前方區域的工作就集中於增進對其他軍隊的合作。我們在這方面所定的目標是克除舊時怨恨的敵對的態度。我們從奪得的日軍的軍用品改進了我們的軍備，我們獲得了人民的擁護，在我們的戰鬥上造成了幾次大勝利，於是我們給這一戰區的統一戰線僅僅確保了一個基礎。」

「我們的行動和企圖全都根據於統一戰線的原則。我們求謀着我們軍事標準的改善，求謀着更好的戰鬥條件。當我們碰到各方面對於我們的偏見，以及種種阻難的時候，我們信賴着日後聯合戰線的改善，顯示着極度的忍耐。無論我們的財政狀況怎麼苦，我們的活動空間怎麼狹小，我們如要動員人民來參加抗日鬥爭，所遭遇的阻難怎麼艱苦——我們總是用到了可用的手段耐心地工作着，要使戰鬥力更有效，更足以制勝。我們知道要鞏固統一戰線，我們必須接連取得對侵略者的勝利。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加強統一戰線；只有如此，我們才可以證明統一戰線的方法一定可以保障人民方面統一抗敵的要求，從而救中國的。」

「我們的目標是在效力於統一戰線，恰同八路軍一樣地有效率，使侵略者對我們害怕得正同他們害怕北方的八路軍一樣。因此，我們的忍耐就是對統一戰線的忠誠，這並不是說，如果本軍的存在，要用軍民的力量驅逐侵略者這一種本軍的目標，接着是為効命於國家和民族起見，本軍前途的發展，這種種受了威脅受了侵害，我們也是不以為意的。統一戰線的基本條件就是發展一切手段和力量來保障抗日勝利。長江下游和全中

國的人民都知道我們的工作和戰鬥就爲此，我們是決不放棄這種任務的。」

#### 第四章 統一戰線——中國的革命統一和民主政治的基礎

日本征略中國的威脅所喚起的中國人民已經使中國各種軍隊共同歸納於國軍，而保衛國家了。中國人民促成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政策的改變，促成了內戰的停止，使國民黨跟共產黨及其他爭取抗日統一戰線的各種組織聯合起來。現在的重要問題是這一種具有革命性的抗日統一戰線，使日本的侵略遭遇到謀求自衛的民族革命的統一局面了，這可是足以長久保障中國民族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勝利的麼？根除了省的及地方的軍閥勢力，把全國全民族的統一的國軍建立起來，這一種機能，統一戰線可會繼續加以發揮的麼？用基於民主自決的真正全國的統一來接替半封建的各省特殊勢力和區域的分立勢力，這一種機能，統一戰線可會繼續加以發揮的麼？從收復一切失地和基於人民生活的真正的國家建設着手，破壞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據有的地域的及經濟的地位，這一種機能，統一戰線可會繼續加以發揮的麼？總而言之，重要的問題是：喚起中國民衆來實行三民主義的孫中山的國共合作政策，可會堅定地建立起來，使一九二七至三六年的內戰覆轍根本不至於再蹈的麼？對於這個問題的決定不但寄托於各黨，而且尤其是寄托於中國人民本身。

由於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日本方面在用兵華北的時候，要利用華北軍閥來阻遏中國民族的抵抗的一切企

圖都落到失敗了。就是有幾個軍閥願意對日軍妥協的那些地方，日本這一種企圖也因中國的士兵、軍官和人民站在劇烈抗日的立場而成爲泡影，因爲那些軍閥是不敢公然反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公然反對那些中央集權的國防計劃的。然而除陝西以外，還有好些人實際阻撓着違抗中央的計劃和命令。蔣委員長的策略這才把北方的省軍逐漸歸屬了中央的指揮，編在統一的國軍中間，而把他們先前的地方性剝奪了。一方面日軍對於他們的地盤的侵略，另一方面則抗日統一戰線都便利着這項策略的運用，而軍隊和人民的支持，又確保了這項策略的成功。

蔣介石命令着各省將領把所率的軍隊，除保衛本省以外，還開調出來，加入了預備隊，沿着中央當局給他們指定的路線，開到北方和東方去。正在天津失陷，宋哲元將軍從北平撤退到保定的時候——在他跟日軍談判「地方解決」而部下的士兵用自動的抵抗加以答覆之後，河北和察哈爾的二十九軍變得隸屬於中央的指揮了。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央通信社所發的電訊中，蔣宣布着說：

「在軍事上說，宋早應到保定，不宜駐在平津……」

「日軍既蓄意侵略中國，不惜用盡種種手段，則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過其侵略戰爭之開始，而決非其戰爭之結局。國民只有一致決心共赴國難，至宋個人責任問題，不必重視。」

「政府有保衛領土主權與人民之責……此後決無局部解決之可能……不能喪失任何領土與主權。」  
韓復榘將軍所部的山東省軍，直至這個軍閥違抗中央命令已有數月的時候方才歸屬中央，後來他就因此而

被槍決了。他的舊部正同二十九軍一樣，後來是和別的中國軍隊共同作戰，保衛徐州的。

先前閻錫山將軍的軍隊所治理的山西省可就不會發生這樣的困難，因為八路軍保衛着山西北部，和山西軍及中央軍正在作戰之該省其他部分，各軍在指定的防區上，是依照着全般的作戰計劃大家互相聯絡的。這種局勢中間最堅強的因素就是靠着動員起來的人民的支持，在實現統一戰線，並且實際抵抗侵略者的工作上，八路軍的領導作用。

前面已經說過，蔣介石是利用了反赤戰役，向四川、陝西和山西等中國中部和南部諸省，推進其軍事集權的計劃。剷除中國紅軍依然是一個夢想，然而中國紅軍向軍閥地域的進攻對於中國封建的軍閥勢力卻也是最真切的威脅。蔣介石利用了這情勢把他的軍隊開進先前閉塞的各省去，借着中央的防赤政策，使各省軍部分地歸順中央。然而這種統一雖然加強了蔣介石的國內地位，加強了中央軍在省軍間的權威，與其說是軍事集權的勝利，卻不如說是保護各省軍人政策的勝利。事實上，他們只不過結合起來，成爲反共產黨反革命大衆運動的內戰軍事集團罷了。在陝西和西北方面雖是這樣的統一工作也不能成功，因爲這個區域因華北方面日軍的侵略而日益感受着直接的威脅了。恰正相反，不管南京方面的各種命令，張學良和楊虎城部下的軍隊卻不願意繼續內戰，而切望着跟紅軍妥協，以防免日本的威脅了。

真正的全國集權只有靠着人民的支持才能够進展；抗日統一戰線便號召了中國的軍隊和人民來抵抗日本。

又逼得各省當局來服從軍事的統一。各省的軍隊，北部的，南部的，和遠在西部的軍隊現在是在民族戰線上跟中央軍共同作戰了。廣西已經派遣了大部分軍到各前線去，而李宗仁和白崇禧這兩位廣西五路軍的司令則各變成了一個個前方和參謀本部的領袖了。在前線的以及國民政府退出南京和漢口之後所憑藉的各省全都直屬於中央軍事當局的代表者了。西北的西安，南方廣東的韶關，以及南昌，武漢和成都先後設立了「委員長行營」、「行營」是為集中各軍及各戰區間軍需的供給和分配，並且監察省軍而組織的。中央的軍需品在各省之間和內地各處自由地轉運着，任何省的軍人不能擅自加以動用，或是加以阻難。最高軍事委員會設有政治部，以陳誠為部長，八路軍的周恩來為副部長。軍官訓練團和軍官學校都是在中央管理之下。一切省軍都改稱國民革命軍的某幾路軍，其基本的任務就是守衛國土。中央軍和省軍都奉最高軍事委員會的命令調至前方效命。

然而除卻因抗日統一戰線而得以完成的軍事統一上這一種進步，各省行政本質上的改善卻一點也沒有實現。省政府依然是在省軍之下，在統率着省和中央部隊的中央軍長官之下。國民政府調動省軍到前線作戰的權利是省政府，各統治勢力所承認的。然而後者卻也要求着一種交換條件，這就是除國民政府的補助費以外，還得對省政不加以干涉。

這方面可以作為顯著的例子的是四川。在剿共戰役的期間，蔣介石改組着劉湘將軍的四川省政府的時候，省軍的完整及其對本省的統治權是保留條件。劉湘依然做着四川的首要軍人，統率着五個以上的軍團和保安隊，共

有十萬人。據官方報告，一九三七年省預算上的軍費支出，在支出總數八千五百萬中間共佔四千五百萬，又有二千八百萬是償付債息的；這大部分也是軍費項下的債息，總數中間只剩百分之十四光景作行政費了。

一九三八年一月劉湘將軍在漢口逝世後，蔣向國民政府提出，任命國民黨領袖之一，做過外交部長的張羣將軍爲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羣是四川人，也就奉命兼任四川保安司令。省政府主席連同保安司令這才從省權中間劃分出來，而這省權則當時操在前劉湘將軍部下一個軍團長鄧錫侯將軍手裏。然而國民政府的直接代表張羣將軍的任命卻引起了該省統治者們的反對。據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上海出版的中國評論週報上的一篇論文，四川軍的發言人解釋着反對的理由說，原有的四川省政府：

「希望獲得中央當局的保障，就是省政府改組的時候，在政策和人選方面不會有什麼不適當的改變……故劉湘將軍的僚屬要繼續請求中央當局儘可能地維持四川省政的現狀。」

跟這種要求相呼应，有一個電報打給蔣介石，其中「四川省會成都的軍政領袖重申着他充分的信仰和忠誠，表示着願把本省的人力和經濟資源聽受他的調度。」從四川商業中心，現今國民政府所在地重慶，「總商會及其他主要團體則致電成都，提議着立即把四川留守的軍隊調到前方去，解救日軍繼續侵略陝西、山西和華北的危險，尤其注意於跟四川接壤的陝西。」這種爭論的最後結果是國民政府只得任命四川軍長之一王縉爲代理省主席，而張羣則不能接任。一九三九年國民政府決議，蔣委員長親自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這番任命足以保障四川

的省軍，恰同廣西、貴州、雲南、廣東等省的軍隊一樣，依然聽受蔣的調度，效力於抗戰。然而四川的內部情勢在骨子上卻並不因此而改變，因為國民政府之下各省統一的問題，不是僅僅用了軍事的行政的計劃所能解決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靠着人民動員的幫助，從統一戰線和民主政治入手。一九三八年四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鄭重說着：自由和統一，民主和集中不僅相容而且是互相補充的。其實，也只有包含着自由的統一才是堅實的統一，而民主則是中國民族革命實現的過程中間集權的條件。四川的事例不過是又一證明罷了。

在克除封建勢力和國家分裂狀態，謀求現代的統一，而最後則謀求國事的集中處理，這一種歷史的鬥爭中間，主要的推進力總是民衆方面對於民主活動的覺醒，換句話說就是革命的民主自決。由於中國的半封建條件和弱點，強大的帝國主義勢力不由得把中國的獨立削滅到了半殖民地的地位，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在侵略亞洲大陸的當兒，則又想把這個地位轉變到完全殖民地的奴隸狀態了。外來的帝國主義一向時常利用着支持着中國半封建的軍閥，使中國分裂削弱，又干涉着中國的內政，直接間接地阻礙着全國的統一以及有利於中國人民的中央政府的發展。因此，爲保衛國家，爭取統一和進步起見，廣大的人民大眾對於民主意識和民主活動的覺醒在中國比其他各國更其是民族生存的保障。然而民主活動卻也只有在爭取人民自由權利的鬥爭中間才能够有着發展；而這種鬥爭又必須由人民所建立的組織來進行，從它們領導人民的行動入手。國共合作在中國的意義就是走向民主政治的一個過渡階段，就是中國人民方面謀求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進步的主要代表團體的聯合；

就是以教育人民動員人民，而在爭取國家的自由和建設的戰鬥中間組織民衆爲方針的，代表着國民絕大多數的政黨集團。

中國的革命，同任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樣，是有着歷史的目標的，這就是要把各種反動的暴力，各種分裂着殘害着國家的權力制度克服。在中國今日的情勢之下，最強盛的反動的暴力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有着破壞中國的民族生存，而把中國的資源和人力強制地歸併於日本帝國主義體系的傾向。因此抵抗這一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爭取中國的獨立是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務。要完成這一任務，中國必須有統一的國民政府，統一的國軍和統一的人民。中國既然有着半封建及半殖民地的種種條件，也就只有當民衆覺醒到民主活動的時候才能够得真正的永久的統一。只有在這一基礎之上，國民政府才會成爲各省的最高機關，而全國軍隊才會歸屬於統一的國軍。這就是說，國民政府和國軍這兩種國家統一的體制，都是人民的革命行動所安排的，必須本身表現着統一戰線，策勵着，支持着國共兩主要政黨所領導的民主活動。

中國的資產階級，同別國的資產階級一樣，在無法可想的時候，並不是無意運用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行動來鋪設民治的道路的。然而它同時卻也明瞭着它所不喜歡的一個事實，這就是：人民大衆所以爭取民族和民生的自決爲的是反對壓迫和奴隸狀態，保障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謀求社會的福利，而在他們大多數的心上則要有很安穩的生活保障。孫中山知道，要不是喚醒了中國的人民大衆，民族革命是不能實現的，因爲沒有民主和民生的基礎就

不能有自由而且堅強的中國。孫中山創立了國民黨爲的是要聯合革命分子給與中國革命一個清楚的確定的領導。然而同時孫也主張國民黨跟其他革命黨的代表合作，而且容納他們，不僅使本黨加強，還使本黨經過了對其他革命大衆組織的統一戰線確保其革命性。孫中山知道，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條件之下，像國民黨這樣的黨一定可以發展，只是還須靠着本身跟人民方面一切進步的革命的勢力和組織儘大地相合作，來促進這一種發展。在一九一八年出版的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建國方略上，孫中山嘆著道：「我黨黨員反對我的意見因爲他們以爲我的目標是太理想而辦不到的，」同時提醒着那些黨員說，他的目標並不是推翻了滿清，可以使別的專制暴君來接替。這又決定着他對於後來組成共產黨的中國馬克思列甯主義無產階級運動的態度，因爲他知道在一切爭取民族的統一和獨立，爭取公民自由，反帝國主義侵略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中間，工人和貧民的運動是担任着最積極的任務的。爲要採取他們那些在農民和工人大衆中間工作的方法，爲要加強民衆的支持，保障國民黨的革命的發展，他才在一九二三年改組了國民黨，准許共產黨員加入其組織，謀求兩黨爲民族革命的合作。同樣，他主張國民革命的中國跟國外一切民主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合作，主張中國跟一切以平等待遇中國而同情中國國民革命的民族訂結同盟。孫中山就根據了這理由，請求蘇聯的領導者給予他支持和切實的援助，而在其後一九二三至二七年間，實行中蘇兩國的合作。孫中山在生前沒有見到革命的北伐掃蕩了最頑強最反動的軍閥，促成了北京政府的崩潰。然而使國民黨在中國的地位加強到那麼轟轟烈烈的，卻是孫中山的精神的領導和他的革命政策，尤其是他

## 的國共合作政策。

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性質上都不是地方的或省區的，而是全國的，雖然兩黨就其所代表的社會的階層和利益來說，各不相同，現在兩黨卻聯合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以求中國的解放了。有些人也許詆毀着中國共產黨，說是該黨對於國際無產階級團結主義的效忠，是使愛國精神和民族革命的熱誠洩氣的根原，這等詆毀的話是不值計較的。說這種話的人自己也不相信這種話，而且他們一定還得好好兒學習一番，才同中國共產黨員一樣，够得到做爭取中國民族獨立的戰士。中國國民革命的熱情的老戰士，在國共兩黨中間都有許多人，他們從反帝國主義侵略，反滿清反軍閥而為民國的共同鬥爭的最早時代起，就彼此相識，他們很知道共產黨雖然以勞動階級的解放為目標，可也始終是把中國民族解放看做中國人民，連工人和農民在內，所面對的最迫切的任務的。大家又知道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准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這一個主意，使最積極的反帝革命者和民衆組織者流入到國民黨去，而且使統一戰線得以實現，從而也是足以保障革命的勝利的。有這些國民黨的老戰士在反共的內戰時代，看見國民黨變成了怎麼光景，不由得十分失望了，而且他們中間又有幾個先前本是反對孫中山的國共合作政策的，在那時候可就不由得佩服孫中山的智慧和識見了。

中國共產黨跟國民黨的差別就在這是以工人和貧農為主體的政黨，所抱的目標一則是使這些社會階級自覺地參加民族革命從而確保革命的勝利，二則是竭力使中國到達這些大衆切膚相關的民主政治，三則是給這些

大眾安排好他們未來的社會主義的使命。然而這並不牴觸中國共產黨所取的抵抗帝國主義，謀求民族獨立，民主和民生的立場，也就是三民主義的立場。卻正相反，就在上述目標的實現上，中國共產黨表明了這一種立場。在勞動階級爭取政治的及社會的平等的鬥爭上，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是基本條件；這兩者又是保障勞動階級的經濟利益減輕人民的愁苦的重要條件。因為民族革命的一切問題在勞動階級都是跟打破苦境謀求生活的鬥爭關係最密切的；所以這一階級當然是民族革命的最忠實最至誠的發動者和保衛者了。自從馬克斯主義的工人運動開始以來，剷除封建勢力，爭取民主自由及對外來侵略者的國防這一種鬥爭是在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運動的所謂「最低要求」中間的。根據着這些利害關係，工人和貧民在一切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及一切謀求民族獨立的革命戰爭中間，是擔負着最積極的任務的。共產黨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與實際，以及歷史地屬於這種革命的範疇的反帝的民族解放都探究得十分透徹，他們這才十分明白：這種革命跟社會主義革命有別，只有等到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之後，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够實際地發生。

因此中國共產黨員把他們的一切活動集中於謀求中國的民族解放。他們同一切愛國的中國人一樣，覺得在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前面保衛祖國就是中國日後各種進步的基礎。他們用了最徹底的方法要完全達到一個目標。這就是：從人民大眾的動員，尤其是中國農民和工人的絕大多數的動員入手，來保衛來收復國土。中國共產黨關心着人民的利益，從而取得了對人民的最密切的聯絡，這才得以充分發展其民眾抵抗和游擊戰的戰略，使這變成了

全國的戰略，即中國全體人民跟侵略者對抗這一種策略。共產黨發動着抗日統一戰線，最積極地把它建立起來，而這以後則一直是最認真最忠實地致力於這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持久。共產黨深知沒有統一戰線，中國這一次自衛戰爭是不能勝利的，因此鄭重宣布着在當前的危機之下，凡是足以破壞足以分化國家的階級問題或是行政問題都不應當提出。他們主張着一切抗日的政黨和勢力在一個統一政策之下聯合起來；主張着一切政黨在統一戰線中間盡着忠誠，守着紀律。現在提出階級問題來的並不是他們；恰正相反，他們倒要求着上層階級和國民黨不要使階級利益來阻撓一種切要的政策，即動員全體人民來參加國防，從而爭取戰爭的勝利，因為這是中國全體人民所面對的無上重要的生死相關的問題。在這立場上，中國共產黨跟國民黨相接近相會合了，他們不但準備着抗戰期間的聯合，還準備着永久的聯合，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中國民族建設的整個過程中間。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的時期，國民黨進行着鎮壓共產黨的戰爭，而且不許中國有別的什麼政黨或是政治組織。國民黨在這一時代的政策是壓迫的而且反民主的。這一種針對着民衆運動和他黨的存在而壓迫又開展到抑制國民黨本身的民主的發展了。國民黨退化而成爲官僚組織，在其領導的黨政委員會中間則又有着幾個派別。各省軍人對其轄境以內國民黨組織的控制勢力使國民黨的中央性全國性感受了嚴重的窒礙。國民黨以內形成了許多省際的聯盟，而南方的國民黨則有許多年跟中央組織相分離而依附於南方的軍人統治者。在蔣介石對各省軍人的矛盾，蔣要統一軍權的行動對政府的矛盾中間，國民黨的任務與其說是謀求統一和中央集權，不如說是

調停，有時則也可以說干涉。最後是，國民黨對抗人民大眾的立場使黨的內部削弱下去，不由得趨向腐化，損害其國內的威信。國民黨本身所包含的這一種日益加重的危機，其主要的根源就是它跟帝國主義和各省軍閥的妥協政策，這發展而為對日本侵略的退讓政策。隨着日本侵略的擴張，汪精衛爲首的公開的親日派在國民黨的領導組織中間，結合起來，主張加入日本的反共陣營，依法西斯的路線「革新」國民黨而實際地投降日本帝國主義。

反日的人民運動促成了內戰的終止，給政治的及軍事的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就挽救了國民黨，給它鋪成了更生的路。抗日統一戰線使國民黨大大地加強起來，一面迫得國民黨內的親日派退卻，而把領導的全權交給了蔣介石，這表現於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重慶召集的國民黨第六屆全國大會的決議案，以及蔣的被選爲國民黨總裁，即從前孫中山所居的地位。蔣在這次大會所盡的任務後來在四月四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慶發表的演說中間顯露出來：「在本黨六屆大會期間，蔣委員長坦率地檢討過國民黨過去的種種缺點，提示了日後改革計劃的綱領。」在寫給那請求和國民黨合作的國家社會黨領袖張君勱的信中，蔣說道：

「本黨同人念國難之方殷，責任之未盡，在國民大會召集以前，自當竭其心力，勉負責任；更望全國賢智之士，加入本黨共同負荷，或秉持共信一致努力。」

大會全體一致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包含着要點如下：

(一) 全國的建設和抗戰相配合；

(二) 全國人民戮力同心，共同負責；

(三) 組織國民參政會；

(四) 擴大國民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

(五) 嚴懲漢奸並沒收其財產；

(六) 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為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

(七) 加緊軍隊之政治訓練，充實民衆武力，指導及援助各地武裝人民，發動普遍游擊戰，使軍隊改進，抗戰力

量加強；

(八) 改善各級政治機構，實行以縣為民治單位，整肅官吏的風紀，改善社會團體，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實現自由和統一的聯繫，使民主政治就在戰時推進；

(九) 實行經濟建設，嚴禁高抬物價，優待抗戰人員之家屬，使人民生活就在戰時改善。

這些決議尤其是國民黨全國大會通過這些決議的事實受了全中國熱烈的贊許。各報的評論希望着國民黨從此停止了黨內的紛爭，希望着紀律嚴明起來，希望着這些決議趕速實行，不要擱下去。在統一戰線時期之前，以嚴厲地批評國民黨政策著名的孫中山夫人和廖仲愷夫人在報上所發表的宣言中說：

「捧讀本黨臨時代表大會宣言與抗戰建國綱領後，不覺感奮交集……今代表大會復詳訂抗戰建國綱

領，以示本黨領導抗戰之目的，至爲適當與必需；除向領導代表大會之蔣中正同志致敬以外，並爲我全黨賀！

「九·一八」至「一·二八」後，我等即向本黨建議，必須繼續秉承總理十年改組精神，號召全國同胞一致團結，積極進行禦侮救亡。」

這一宣言上講到抗戰以來國民黨政策的改變之後，鄭重地說現在主要的任務就是執行這些決議，因爲抗戰「能否最後完成任務與達到最終之目的，不在空言而在力行；不僅號召，而重實現。」宣言中因此特別提出了幾點：

「重振黨紀，嚴厲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負責黨員。

「尊重民意，實現民權，澈底取消一切有形或無形壓制民意妨礙民權之法令。

「以民族國家利益爲先，撲除一切不利民族國家之私見，停止任何方式之黨派鬥爭，務使全國人民，一致精誠團結。」

宣言上接着籲請繼續抗日鬥爭，完成最後勝利，並且嚴防敵人陰謀，勿中其一切挑撥利誘之伎倆，在結末說：

「過去十年國內分裂，互爲紛爭，或作割據，有利於敵寇之進攻；抗戰以來，統一局面逐漸形成，猶望一致努力，免遭覆轍，求我中華民族之澈底解放。」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國民參政會全體一致通過決議案的時候，共產黨代表對於國民黨全國大會的決議案充分地表示贊同，而要求其實行。國民參政會的決議案如下：

「國民參政會成立於抗戰周年之日，目擊全國軍民浴血抗戰，壯烈犧牲，忠憤滿腔，如焚如裂，深感未來民族存亡繫於目前之奮鬥，成則俱生，敗則俱亡。吾整個民族，不分黨派，不分職業，唯有精誠團結，堅強奮鬥，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始能免淪於奴隸滅亡之境，而躋於自由平等之域。爲此鄭重決議。」

「擁護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之抗戰建國綱領，切望國民政府製定實施辦法，督促切實施行。同人當隨全國國民之後，依據此項綱領，在最高統帥蔣委員長領導下，努力奮鬥，以取得抗戰最後之勝利，而達到建國之成功。」

然而在中國抗戰的基礎，反日統一戰線所面對的最重要的各問題有一個卻還是國民黨對於他黨——其實也可以說對於人民方面組織而且發展抗日運動的權利——所抱的態度，而人民方面這種權利則是中國在抗日戰爭中勝利的必要條件。第六屆國民黨全國大會的真正意義是在國民黨正式地統一於蔣介石的領導之下，而蔣的持久抗戰和統一抗日政策一般地被認爲國民黨的使命和法律了。在國民黨中間，尤其是對於當時假充着「和平派」的汪精衛的親日派，蔣所獲得的勝利使抗日統一戰線得以擁護蔣爲領袖了。然而汪和他的一派爲要阻礙和破壞統一戰線，卻還留在國民黨的領導地位；他們所以在口頭上擁護蔣的「最高領導」無非是要利用了他的地位，使他們對於統一戰線之下的民衆運動，可以厲行壓迫手段罷了。當人民反日運動要求國民黨領導當局採取統一戰線政策的時候，這一派反對着統一戰線。從此以後，他們就打算用各種陰謀和反動計劃來葬送統一戰線，把

它轉變爲國民黨對他黨的官僚獨裁。這一政策在他們不過是除滅他黨，打倒蔣介石的公開鬥爭的序幕，不過是要發動對人民反日勢力和共產黨的內戰，而強行對「侵略者」的和平。這一種對共產黨和人民統一戰線的鬥爭是汪派用以進行其爭取各省軍閥和中央軍一部分將領的陰謀的。爲了這種目的，他們鼓勵各省和中央的官員用壓迫手段，用暗殺八路軍和新四軍代表，虐殺那些從抗日前線歸來的共產黨傷兵的行爲來激怒共產黨員。

蔣委員長對於這等政治機構的態度上有最可注意的一個特徵，就是不干涉國民黨方面企圖壓伏他黨的種種手段。蔣委員長一面堅決地要求着全國贊助抗日統一政策，一面也很不願意爲了那些於共產黨有妨害的破壞統一戰線的行爲惹起對國民黨官員和地方統治者的紛紛來。然而蔣自己對於這等行爲卻保持着超然的地位，有時也設法限制這些政治機構，尤其是防止其開展到足以影響統一戰線以內基本的軍事問題。在另一方面，則蔣又盡力設法破除汪派在地方軍人和反動分子中間所進行的宣傳。

共產黨在其爲統一戰線的鬥爭中間，始終保持着「一個明確的立場，主張各黨不但協力來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且協力來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爲基礎的建國程序。他們卻也聲明着：統一戰線的意義是各黨合作，並不是一黨廢除各黨，又不是各黨隸屬一黨。這問題是國民黨在六屆大會以前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這一口號提出的。毛澤東的答覆是：這完全算不得什麼新見解，因爲這在一九二七至三六的十年間，國民黨一直試行着，結果是不但有害於國家，而且有害於國民黨本身。他說，爲保衛國家起見，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真正有效的革命統一只有

根據於抗日各黨的統一戰線才能够實現。中國各黨的存在是不能加以無視的。國民黨固然居着特權的地位，而且是國民政府的黨；然而國民政府卻也只有在全國人民及其各黨的統一戰線加以擁護的時候，才能够完盡他的使命。然而其他的黨，連那用其所可調度的一切部隊保衛國家的共產黨在內，卻也必須有權來協助組織獨立的中國。在這番爭議期間，蔣所取的態度如上海大晚報的報告如下：

「蔣介石非常坦率地告訴政府人員說，中國的軍隊中間，唯有山西和河北的八路軍才是成就「滿意結果」的軍隊。

「從他這一番話中間，可以察知他日益明白前紅黨是信守着他們「統一戰線」的提議的，他們有着政府必須加以利用的能力，而且這並不是國民黨或其他任何團體玩弄政治手段的時候。

「他們的軍隊的價值是明顯的，這一軍的戰略的價值在身受着艱苦經驗的教訓的蔣委員長這樣的人看來，也是一樣地明顯的。因此蔣委員長——他本人遠不是共產主義者，而且還可說是中國最不容易沾染共產主義思想的一個人物——成就了「統一戰線」的工作，不要讓抱着妒意的國民黨領袖們用策略來解散這種團結的維繫了。」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的中國評論週報也載着蔣對著名美國作家愛特伽·斯諾的談話，蔣委員長在這次談話上否認着外間所傳他不滿意於中國游擊隊活動的謠言。他說敵人的後方不久就會變成前方的。蔣委員長

對於八路軍的軍事成績特別表示滿意，還說該軍的軍事行動是嚴守着中央政府的命令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國國家社會黨和中國青年黨這羣衆不多的兩黨致函國民黨領導當局聲明他們在抗戰中間擁護國民政府，他們的政策完全跟孫中山的遺教相符合的時候，也發生過國民黨對他黨的態度這一問題。青年黨領袖左舜生在他的函中所表示的就是希望第六屆國民黨全國大會的決議「逐一見諸實行」，尤其注意於國民黨現在決定「使中國走上憲政之路」。汪精衛所作的答覆（蔣也簽名）在文句上特別表明國民黨接受着兩黨所貢獻的合作，不僅根據於正式承認他黨的原則，而且由於兩黨對國民黨的支持。覆函上說「本黨念職責之艱巨，惟望集中全國賢智之心思才力，以共濟此日之艱危。」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漢口的中國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在評論上說到這一回事：

「抗戰開始以來，全國的統一進一步地加強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遵照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們所發表的保證相互合作的宣言，組織抵禦侵略者的統一戰線。過去九個月間的事實顯示着兩黨真正合作的精神，現在正如中國國家社會黨和青年黨各別的決議所表現，這種精神也推及於其他的黨了。」

接着說「黨是不可能把其他一切的黨合併的，於是該報要求一切抱定抗日政策的中國政黨進一步地合作，使抗戰的力量集中。統一政策之下革命的聯合應當由各黨來組織。」我們要組織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該報結論說，「必須加強各政黨間的合作，引導一切人民團體來參加這工作，並且組織民衆。」

據國民黨第六屆全國大會的宣言上所說，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只要這等活動並不妨礙抗戰建國綱領所包含的原則和政策。宣言上又說，「政府並應設置國民參政機關，俾集中全國賢智之士，以參與大計。」這機關叫做國民參政會，據規定是為「集思廣益，團結全國力量起見」而設立的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國民政府所公布的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中說，「在抗戰期間，政府對內對外之重要施政方針，於實施前，應提交國民參政會決議。」

國民參政會置參政員總額一百五十名，即各省市（連日軍佔領的中國領土在內）的代表八十八名，蒙古西藏的代表六名，海外僑民的代表六名，各重要文化團體或經濟團體的代表五十名；國民黨以外的政黨沒有說到；然而，大家却都知道他們是在「全國賢智之士」和「文化團體或經濟團體」中間。一切參政員連別黨代表在內，是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所指定的，後者還保留着選任參政會正副議長之權。提出的參政員候選人一共是三百名。日軍完全佔領的各省市以及「文化團體或經濟團體」的參政員候選人由蔣介石任主席的最高國防會議提出。各省市的參政員候選人由各省市政府及國民黨各省市黨部的聯合會議提出。至於蒙古西藏和海外僑民的參政員候選人則由國民黨蒙藏委員會和僑務委員會分別提出。重要的一點就是政府的現任官吏不得為參政會參政員。後來因蔣的建議，參政會的員額決定增加到二百名，增加的員額完全留給「文化團體和經濟團體」。從候選人中間最後選定參政員之權屬於國民黨中央。

國民黨讓給國民參政會的權限就是附屬於抗戰期間最高政府機關，即國防最高會議的諮議機關的權限。國民參政會的決議案由國防最高會議通過之後，才可以交付政府機關去制定法律或則去公布施行。政府把一切行政政策提交國民參政會決議，但這些決議也得經國防會議通過，方才成爲有效。國民參政會又有請求政府報告事件，加以質詢，並且向政府提出建議之權。這也就是說國民參政會對於政府的行政政策有用否決手續予以調整之權，然而這樣的否決，卻須經國防最高會議之核准，方才成爲有效。

國民參政會的主要作用就在它加強了國防最高會議的威權。這是對於政府和國民黨的約束——在「抗戰期間」應把內政和外交上一切行政政策提交國民參政會決議，而這決議應經國防會議許可方才有效。舉個例，這就是說抗戰必須繼續下去，直至國防最高會議和國民參政會議決定終止戰爭的時候爲止。國防會議本身又保留着指派參政會中淪陷區域以及文化團體和經濟團體的代表候選人之權。這一批代表的人數照規定跟國民黨直接代表的人數相等。政府現任官吏不得被任爲參政員，省市政府和國民黨省市黨部的聯席會議產生國民黨參政員候選人，這兩點的意義就是在參政員中間國民黨省屬和地方的分子可較多於中央方面的。總之，國民參政會的主要目的是在安排一條法理的途徑，這就是使國防最高會議和國民黨的低級組織發生了直接的聯繫，而加強其力量，並且使國民黨以外的各政黨和人民團體得以陳述對於國政的意見。蔣委員長本人要確保其在全國的地位，和各項政策在國民黨和中央及各省政府中間受着尊重，少不得需要着一個並非官吏方面而是人民方面的代表。

組織在他的左右。國防最高會議既然在統一戰線之下領導着抗日抗戰，國民參政會及其機能的意義也就是中國民主憲政上進步的發端。然而絆脚石卻依然是國民黨對於他黨，也可以說對於統一戰線的態度。只有根據於統一戰線的精神，民主政治才會在中國進步呢。

汪精衛乘着一九三八年七月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致開會詞的機會，指出這參政會的範圍怎麼樣以及應當怎樣。照汪的意見，握着政權的國民黨就是中國的民主政治。只有國民黨決定着中國應當到什麼時候「進入憲政時期」。據他的意見，這時期應當延宕到抗戰以後。汪在他的開會詞中說，「照例，任何民主國家的國會臨到對外戰爭的時候，往往是把非常的權力放在政府方面的。」因此，國民黨決定把憲法的制立和公布及其施行日期的指定展延到抗戰結束以後，一面則把應付非常時局的權力交給了蔣委員長。但是「在進行抗戰建國的期間，卻也需要着人民的援助，」這才創立了國民參政會。

據汪的見解，統一戰線只不過是國民黨在戰時所容忍的權宜處置，可給國民黨用以強制他黨「放棄其政治的異見，」（對國民黨而言）使「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主張得以實行。「各參政員的政治見解，」汪說，「是並不一致的。我們中間有國民黨員，非國民黨員，以及無政黨關係者。然而抗戰發生以來，精神的團結卻漸漸地增進了……每逢國家臨到對外戰爭的時候，政黨間往往是捐棄異見的。」

在抗日統一戰線的進展中間，國民黨甚至在公然的決議案上也始終避免着確定其對於統一戰線以及對於

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國民黨的正式刊物上從未用過「統一戰線」這名稱。凡是屬於統一戰線的一切議定書和宣言都是委員長（他的各代表）以國民政府及國防最高會議首腦的資格所締訂所發表的，國民黨堅持着：只有當他黨接受着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而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工作的時候，方才准許他黨的存在。國民黨往往用了很「高明」的「巧妙」的外交手段來限制他黨的存在及其同國民黨的合作。在理論上在實行（每途見於實行的時候）上，這就是說，只有國民黨是「黨」，而他黨則是依附於國民黨而在國民黨權威之下的一文化的和經濟的「團體」。

民主政治的意義，首先第一，是人民的，並非什麼黨的特權，也就是基於民衆方面的公民自由和自治的民權。任何一黨或是各黨必須完全站在這一種基礎之上，才能够保持其領導民主政治的權利。孫中山把民主政治看做這樣的民權，同時又看做一種革命手段，用以聯合中國人民，求中國國民革命的貫徹——當然漢奸帝國主義間諜及人民之敵是例外。在他那著名的建國方略上，他表明着：只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是和真正的民主政治共存的。在一九二四年廣州國民黨大會——即依照孫中山所創立的聯合政策而改組國民黨的一次大會——的宣言上規定着：

「中華民國的公民權是爲中華民國人民大眾而制定的。凡是真正敵對帝國主義的一切個人和團體都可以享有一切公民權；至於背叛國家或是效力於帝國主義者和軍閥的個人和團體則就不得享有這種權

利。」

孫中山的理想是國民黨本身應當具有這等革命的民主精神，使它可以在鬥爭中，領導中國人民求謀民主自由的中國的實現。因此孫又堅持着，國民黨只有跟中國一切革命勢力合作，才能完盡這一項使命。在對付着反動分子及人民之敵的時候，尤其是覺得他們混在本黨以內的時候，孫中山額求着人民的活動和援助。在上述的書中，孫中山對那些要跟軍閥和帝國主義者妥協的國民黨員說，他要和人民共同行動，來糾正他們的心理。孫指出「全國人民一定站在我這方面；我們要爲改革中國而奮鬥，我們要建立民治，也就是說要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在這書中，他又說：

「自由平等的理想已經流傳到中國了。要達到這些理想，中國立刻需要着民治，好比兒童需要着教育一樣。」

因此，如果有人想要假借孫中山的大名來遮蓋其阻滯中國民主政治的政策，這只是對孫中山遺教的誣蔑和攻擊罷。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第六屆中央執委會全會的決議案中，重申其國共合作的立場，號召全中國人民來實現下列的切要工作。

「誠心誠意地擁護蔣委員長，國民政府，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更進一步的親密團結；反對一切挑撥

離開的陰謀，反對一切賣國的傀儡組織。

「發展國民黨，共產黨及一切抗日黨派，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擁護長期抗戰。」

上述的決議中，又鄭重說到，中國現在對內對外的種種條件顯得中國不能建立一黨獨裁，或是蘇維埃國家，或是社會主義制度。國共兩黨必須在民族自衛戰爭中間相合作。共產黨要求着它的黨員把熱血和能力集中起來，確保民族的勝利。決議案上就這一點說道：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先進的兒女，以滿腔熱忱和無限英勇，參加反抗日寇，保衛祖國的事業。是真正無產階級先鋒隊和國際主義戰士應有的態度和必需的工作，共產黨員必須在民族自衛戰爭和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偉大戰爭中，起模範戰士的作用。共產黨員的崗位首先應該是在最能打擊日寇的地方前線和敵後方。共產黨員應該成爲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模範戰士，根據一切服從抗戰利益，一切爲着抗戰勝利，一切爲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戰線高於一切的原則立場。共產黨應該根據民權主義的精神，在政治上組織上尊重各黨派的獨立性，應該成爲尊重國民黨和抗日黨派的獨立性的模範，同時，應該堅持保證共產黨本身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共產黨員在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武裝部隊中應該成爲智勇善戰，執行命令，服從紀律，建立優良的官兵一體，軍民一體與爭取敵軍的政治工作的模範。關於這一點，全會特別指出八路軍新四軍中的共產黨員全體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及戰鬥員，在抗戰中已經起了極光榮的作用，以後應

該更加發揚這種作用，共產黨員在行政工作中應該成爲廉潔奉公，不貪污，不腐化的模範，在民衆運動中，應該成爲不僅教育羣衆，而且向羣衆學習，不包辦，不獨斷，與他人友誼的民主合作的模範，在對待一切非共產黨員的態度上，應該是真誠和藹，尊重合作的模範。」

共產黨關心着國共兩黨合作的改善，作了如下的提議：

「爲了完成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爲了順利進行抗日持久戰，就必須國共兩黨長期合作，國共兩黨合作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是抗戰建國大業完成與勝利的保證。因此，建立國共兩黨的長期合作，不僅是國共兩黨同志的熱望，而且是我全中國人民和一切中國朋友的希望。抗戰建國是長期的事業，抗戰時期的合作，造成戰後合作的基礎。強敵的存在，三民主義之成爲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兩黨十餘年來的相互關係所給兩黨黨員及全國人民的深刻的教訓，全國軍民對於兩黨長期合作的切望，以及爲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的共同目標，所有這一切，就使兩黨長期合作的事業，具有堅定的科學基礎和理論根據，因此就能够由希望變成事實。爲此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正式決定，不在國民黨中及其軍隊中建立共產黨的祕密組織。再一次正式宣言，中國共產黨對於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的誠心誠意，再一次懇切的責成所有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以互助互讓，和同生死共患難的精神，以尊重合作中各政黨獨立性的同志。這不僅是爲了消除國共兩黨間的磨擦，不僅是爲了改善和加強兩黨合作的關係，而且是爲了達到兩黨長期合作的目的。

擴大的六中全會謹向國民黨總裁蔣先生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宣稱，中國共產黨認為國共兩黨合作的最好組織方式，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種形式則是由兩黨組織各級共同委員會來進行兩黨合作的事宜。六中全會認為兩黨合作組織形式的適當解決，對於親密兩黨關係，保證兩黨長期合作，有極重大的意義。

共產黨在這次議案中又鄭重說到爭取獨立的民族戰爭，民主政治的推進和人民的生活是互相依賴的。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基礎放在艱苦的長期抗戰之間，到勝利之後，還得繼續加以發展。決議案上說到：

「抗戰建國綱領的公布，國民參政會的召集，省市參政會召集的實現，各抗日黨派合法權利的取得，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權利的逐漸實現，陝甘甯邊區，晉冀察邊區及敵後抗日根據地中民主之實現，民生之改善，所有這一切都是抗戰以來國家制度走向民主化道路的具體證明。」

然而在汪精衛和他的一派看來，這一切民主進步的表徵正是他們賣國計劃受着重重挫折的表徵。因此汪對上述的共產黨建議的答覆就是：如果共產黨自願把黨解散，這些提議也許是可以局部地接受的。在中國軍退出漢口以後，傳說汪要求蔣委員長一逮捕在重慶的共產黨員，發動可怖的清共運動，作「和平」的準備。當然，蔣委員長對於這一種徒使漢奸快意的自殺主張是不會贊同的，然而他卻還不肯懲治這個漢奸以應得之罪。不久以後，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本當時的首相近衛宣布了日本的「東亞新秩序」的綱領，於是汪精衛應了這位主人的邀

約，從自由的中國逃出來，在日本佔領區繼續其漢奸活動。

國民黨中央方面有這一派籌謀着對侵略者的和平久已是公開的祕密了。汪精衛爲首的這一派在漢口和重慶佔據了重要的職位，因而得以阻撓人民的動員，控制而且檢查人民的「思想」。他們的工作和陰謀的目標是在斷送蔣的領導全國的地位，破壞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反動分子用卑劣手段來攻擊共產黨所領導的游擊隊，阻止民主政治的進展。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孫中山夫人就在香港遠東鏡報上發表一篇論文說：

「我們不能否認，當今中國有一批政客，他們在要對付侵略者的時候是卑怯的，可是議論到國內的事情，卻『勇敢』了。抗戰開始以來，這批人一直是失敗主義者。這些政客只要一聽到一點兒『和平』的聲息，就像爭啄屍肉的烏鴉一般，來來去去，忙個不停。跟口頭所說『擁護領袖』深刻地相對照，這批僞君子心頭抱着全不相同的目標，而且背棄着蔣介石同志再四所聲明的『中途妥協就是亡國』這句話。還有更奇怪的，漢口方面新近有一個政治要人響應着日本方面所發出，而其傀儡組織加以附和的關於談判時機的宣告，甚至不怕麻煩地写一篇贊成和議的論文，用電報發給上海泰晤士報（一家受日本津貼的報紙）去發表……爲抗戰計，首先應當實行一般的政治動員，斫去敵人的又一隻魔手——即其誘致我們接受『和平』的政治陰謀。」

在這論文上，孫中山夫人又要求着國民黨嚴格地維持其紀律。她鄭重說「全國應當擁護遵守蔣委員長的命令。」但是也不應當使這一點成爲國民黨員破壞紀律的掩護，讓他們進行其反對折戰國策的陰謀。她說上海方面

有着這等「只在口頭擁護領袖服從領袖的黨員」接着又說

「據最近報上的消息，他們中間已有幾個做着偽組織的高級官員了。在上海戰爭沒有終止之前，這些分子大聲疾呼地要求着絕對地擁護領袖，服從領袖。現在他們是在什麼地方呢？他們只求着自私自利，對於黨的主義和紀律觀念是毫不動心的。他們在過去擁護領袖而今日做敵人的走狗無非爲的是私利。要免得「服從領袖擁護領袖」這句口號成爲笑柄，黨的中央機關應當立即整肅紀律，再不容許黨內有一個投機分子貪污分子。」

國民黨第六屆大會曾經通過了戰時政治動員的程序。孫中山夫人提到了該屆大會的決議案說，「我們不由得焦慮着：不知這項程序是否會趕快實行呢？」組織民衆的工作，尤其是組織各省農民大衆的工作，因爲沒有具體組織辦法的緣故，也就沒有什麼成就。孫夫人主張使農民大衆有民主的組織，使農民可以自願地組成堅強的團體，如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北伐時代的農會之類，因爲這一來才可以貫徹鄉村的政治動員，而使協助軍事行動的力量擴大和鞏固。

中國共產黨的六中全會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發表了告全國民衆書，其中針對着國民黨方面所抱的成見說道：

「中國國民黨及一切抗日黨派的同志們！日寇所怕的更沒有比中國人民的團結統一更厲害了。當此戰

局轉向新的階段之際，日寇一定加緊其挑撥離間的陰謀，這就要求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更進一步的親密團結。我黨六中全會再一次的說明：三民主義爲國共兩黨合作及整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政治基礎，本黨願爲其澈底實現而奮鬥。六中全會再一次表明：本黨對於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的誠心誠意的擁護，並更明確指出，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在抗戰中及抗戰勝利後所奮鬥的共同目標，乃是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同時，六中全會又決定不在國民黨中央及其軍隊中成立共產黨的祕密組織，並主張共產黨採用公開的交名單的方式，加入國民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這一切都是爲着鞏固團結，避免誤會與磨擦，建立國共長期合作與長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關於對日本的「和平條件」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同認爲只有等到日本的侵略完全失敗，而中國的領土完全收復，才可以得着和平。共產黨六中全會致東三省軍民的電文中說，統一戰線建立之後，不抵抗政策是終止了，這也就是說，內戰和國家分裂的局勢終止了。電文的結論如下：

「東北各省是我們的領土，這些地方的三千萬人民是我們的同胞。要建立領土完整政治統一的獨立自由而且繁榮的新中國，我們不但應當逐出中部及南部諸省的日軍，還須逐出東北各省的日軍。我們決不能忘記我們三千萬同胞還是受着敵人鐵蹄的蹂躪。同樣，我們也決不能忘記他們在最困難的條件之下所進行的對我們民族敵人的長期鬥爭。同志們，八路軍的一個隊伍以冀東爲根據地進行着游擊戰了。我們希望東北各

省及淪陷區後方的一切戰士和同胞徹底擁護對日的長期抗戰，並且加強各黨的统一戰線，準備我們未來的反攻，這可以使我們收復東北的各省，把日本帝國主義逐出我們的領土。」

共產黨所要求的爭取抗戰勝利的戰略根據於中日兩國內外局勢的科學分析。在這種分析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獲得了結論，這就是只要憑着決心和團結來運用持久戰的戰略，中國是一定獲得最後勝利的。日本是帝國主義的強國，其工業及軍事技術有着較高的發展，可是日本究竟也是小國，軍隊也有限，現在發動着野蠻的侵略戰爭，一面違反了其本國人民的利益，一面則徒然引起了世界其餘部分的怨尤。中國則是半殖民地國家，工業及軍事技術比較的落後。然而這是一個大國，有着廣大的人口，廣大的軍隊和廣大的領土。中國為民族自衛的抗日戰爭是進步的，因為這使民族的利益有着進一步的發展，而且這又日益得着國際的同情和援助。

因此在持久戰中間，日本所遭遇的條件一定日益困難；它又一定逐漸地削弱下去，落到最後的失敗；至於中國則會轉弱為強，轉敗為勝，而獲得最後的勝利。抗戰期間的戰爭過程將發展為三個階段。這在日本是：（一）進攻（二）保守（三）退卻。在中國則是：防禦、準備反攻和反攻。在第一階段，中國民族統一的鞏固和進步已經給持久戰奠定了必要的基礎。因為軍事力量的比率於中國不利的緣故，中國只得在前方採取運動戰防禦戰而在敵後則採取廣大的游擊戰，這才可以延長敵人的戰線，分散而且消耗敵人的兵力。

因此，要保障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持久戰的勝利，基本條件就是：抱定適應第一階段的需要的決心，使日本不得

不放棄其戰略攻勢。戰爭這才進到了保守階段。等到改進中國戰鬥力的工作完成，乘着敵人方面發生困難，而國際局勢發展到於中國有利的時機，戰爭就可以發展到於中國有利了。要把侵略者逐出了中國的領土，獲致最後的勝利，中國民族必須艱苦地鬥爭下去，國民黨、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黨派必須也密切地合作下去。這統一戰線可以使中國四萬五千萬人民團結起來，組成一個統一的強國。

這一種「共產黨的信條」獲得了中國人民的贊助，因為這顯示着中國的解放和真正和平的途徑。中國共產黨請求日本人民共同為反對日本法西斯軍人而奮鬥。共產黨六中全會致日本共產黨的電文中宣布道：

「侵略中國的戰爭是違反日本人民的利益的。因此日本的法西斯軍人不但是中國人民而且是日本人民的野蠻敵人。中日兩國的民衆必須積極地聯合起來，組織反抗日本法西斯軍人的共同陣線，來消滅共同敵人。我黨六中全會深信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鬥爭一定能够把我們的共同敵人，日本法西斯軍人消滅，從而把遠東的真正和平建立起來，使兩國人民得以同享自由和民治。我們兩國人民素來只有深厚的同情而無任何的仇怨。我們對於共同敵人的共同鬥爭，誓必加以支持，以求達到我們最後的目標。」

靠着統一戰線，中國已經獲得了持久抗戰的基礎。靠着統一戰線，中國一定可以克服那些妨礙着民衆的動員和民力的發展的阻難，達到對日帝國主義的最後勝利。最後，靠着統一戰線，中國民族革命一定可以達到它的目標。這就是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基礎的統一獨立而且自由的中國。

## 第三編

### 經濟的侵略與防禦

## 第一章 侵華戰爭的破壞與掠奪：華北之部

中國的武裝抗拒侵略，已揭穿了日本軍閥之所謂「中國事件」，原來不僅是征服華北而且是征服整個中國的帝國主義冒險。在戰事開頭，日本的戰略目的，就是壓迫南京政府投降，並在短期的速決戰中，粉碎牠的武裝部隊。但中國的統一戰線的形成，却使日本遇到一個空前的難題，牠必須擊敗和解消中國統一的國軍，毀滅中國民族革命進程中的軍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基礎。日本軍閥幻想以其嚴密的軍事機構，機械化的陸軍師團，和強大的海空兩軍，一定可以迅速迫使中國屈服。牠打算只動用一部份的常備軍，經過幾個月的征戰，就可以獲得便捷的勝利，使他們在日本國內壓服了議會的反對派，清除了憲法的障礙，奪得了永遠的獨裁的優勢地位。爲着自由進行侵略，並充分地毫無限制地控制全國的和遠東勢力範圍內各殖民地的資源，征服中國乃是必要的一舉。

但當中國全體民衆決定抗戰到底以求得民族的生存，而此項決心又因日本侵略的進展而愈見堅強時，就是日本軍閥也認清了：這持久的消耗戰爭，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威脅。他們授意日本輿論界，說這意外的局面，乃由蘇聯英法美等國的干涉和援助中國所促成；因此要求民衆毫無限制地支持在華的戰爭，俾將整個中國事件澈底解決。他們宣言現在是日本要向中國進行消耗戰爭，並將使中國付出長期抗戰的代價。當中國「事件」剛一開始，他們便已着手對中國的工業（連各國的利益也包括在內）作有組織的，有系統的破壞，並沒收中國的企業與財

產，獨佔領區內所有的資源。他們邀請日本的資本家，特別是那些與他們直接聯合的大資本托辣斯，如南滿鐵道會社，三井，三菱等托辣斯，共同向日軍佔領區作有系統的掠奪，沒收中國的貨物與原料，並接收中國的工廠。因某種理由而未能接收的工廠企業，則加破壞，而被拆毀的機器，時常被運至日本或移交中日專營的工廠。他們又獨佔了中國國內所有的航運，鼓勵大規模的走私，協助日貨經由中國沿岸各個日本海軍統治地免稅運入內地，而且盡量利用日本侵略軍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使日本人成爲每一種有利的買賣的獨佔者。

這不僅是因軍事行動與佔領而起的戰爭的蹂躪與經濟的破壞；也不僅是爲軍事行動的需要，爲在華的駐屯軍的給養，爲滿足日本軍需工業的要求，而向被佔領區進行剝奪；尤其重要的，這是以征服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武力，打開一個獨佔貿易與投資的新範圍，並進行有組織的劫掠。特別是日本軍閥的政策，容許日本資本家的組織（日本軍人本身也是股東）進行大規模的掠奪，而以佔領區的中國人民與產業，以及各國的利益作爲犧牲。這政策同時也保證日本國內的資本家，不至反對長期的侵華戰爭，因爲這戰爭耗竭了日本的金融，阻絕了日本對華的大部分正常的貿易，又復損害了日本在其他世界市場上的貿易利益。

日本軍閥以在華的軍事行動，來保衛牠在國內的獨裁，來保衛牠的以陸海軍征服中國，使之成爲日軍的殖民地，並由陸軍本身聯合殖民地的營利機關共同掠奪搶劫中國的計劃。日本陸軍不僅爲着帝國主義的征服與殖民地的掠奪，而以武力打開中國，而且由牠本身組織着，指揮着並監督着這巨大的劫掠。牠本身設有經濟機關和所謂

「S. S. S. S.」（即日軍特務部 The Special Service Section of the Japanese Army）這些組織完全在各個特殊地盤內按照個別日軍的命令與計劃行事。這就是侵華期間內的「經濟政策」也是半封建的軍閥與強大的金融資本及殖民、地商行等共享利益的特有的政策；同時，牠也是日本軍閥以在華的帝國主義侵略之手段，用以控制日本國內外的政策並促成充分的法西斯獨裁的政策。

這政策是日本總參謀部和軍部所發明的，牠的目的，依日本報上的評論來說，是適當處理「日本在華摘得的經濟果實。」一九三八年三月，日本首相與陸相，曾在議會中說到這一政策，近衛的話是這樣的：

「日本決定利用日軍所佔據的每一吋土地，並計劃開發佔領區一切工業的與經濟的資源。」

杉山陸相更把這聲明加以推衍：

「我們認為華北遠征軍的佔領區域，與華中遠征軍的佔領區域，是同一個管理區域。」

這兩個區域的關係，都歸所謂「華北開發株式會社」與「華中振興株式會社」支配。這兩個會社名義上附屬於華北與華中的傀儡政府。但這兩個會社的組織法案，都是日本內閣提出，而由日本議會通過。為控制並促進這些發展會社，在「對華經濟事務會議」支持之下，成立了一個「對華經濟事務部」。這些法案從未提交華北與華中的傀儡政府，同時創立與指導的職權，也歸與日本在華海陸軍的特務部。依照近衛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議會中所說，這些都是設立「大規模組織的臨時代理者。」而所謂「大規模組織」就是將要成立的「興亞院。」

事實上，整個的華北開發株式會社只是南滿鐵道會社的支社。華北華中所有各鐵路，本來都是直接歸後者控制的。依日本商工省官方的說明：「華北各鐵道（均歸南滿鐵道會社支配管理），都包括在日本政府交與華北開發株式會社的資產之中，作為政府投資的一部份。」華北的公共汽車業務，也是一樣。南滿鐵道會社並且準備替換所有在戰事期間被毀的車輛，華北的「通惠」（譯音）航空公司，與華中的「日本航空公司」也都集中歸由該公司管理，因此，牠管理了連接華北華中及滿洲，日本，台灣間的各條航空線。此外，日本在滿的各公司——大半都在南滿鐵道會社管轄之下——在開發礦產，發展鐵工業，公共利益事業（如電廠，自來水廠，自來水廠，電話電燈，無線電，）等都獲得特有的地位。例如華北電報電話組合，就由滿洲電報電話組合與北平的「臨時政府」合作辦理。因此，整個的華北，在日本的「開發」上，無異是「滿洲國」的次殖民地，不過依照日本拓務省所決定的計劃與政策辦理罷了。拓務部還受日本內閣的付託，計劃發展華北棉麥種植的事宜。「華北植棉協會」就是「日本植棉協會」的分會。一個九年的農業發展計劃，企圖每年在華北增加棉產至一千萬擔，增加麥產至一萬萬二千一百萬擔。華北與華中開發公司的特殊的營業範圍，就是所謂戰區的恢復，如交通的再建與新鐵路的建築，集中新舊各礦業於日人手中，並獨佔所有的公共利益事業。

這些開發會社的資金來源，是由日本政府與私人企業投資，情形跟南滿鐵道會社相仿。如華北開發會社的資本總額為三萬萬五千萬日元，其中半數由日本政府供給。這些會社的總裁一席，也為日本政府所保留。兩會社相互

獨立，但與雙方範圍有關的事務，則互相合作。例如，由日本遞信省的「輪船統制局」所組織的日本輪船公司，特許航行中國沿海及內河各水道。這公司二萬萬日元的資本，由日本各輪船公司共同供給（特別是「日本郵船會社」與「大阪郵船會社」）。北平的「臨時政府」與南京的「維新政府」以及雙方區域內的開發會社，都必須保證這公司的特權，也即保證牠在中國沿海與內河的航運業務的專利。

日本雖然口口聲聲喊着「中日合作」，但在這些所謂「開發」中國的組織中，都絲毫沒有合作的蹤影。只有在對那些業已開辦，並企圖多少獲得和保留牠們本身的獨立的中國工業，他們才需要並強迫「工作」。這所謂「合作」，事實上就是強迫加入獨佔的公司，讓資金與管理兩方面都歸日本人控制。他們所使用的方法，可以由華北麵粉工業的「改組」一例加以說明。他們特殊組織了一個「日本麵粉組合」來「指導」河北與山西的十家麵粉廠的管理事宜。這組合組織了一家「中日麵粉廠」來管理所有的中國麵粉工廠。例如「山西麵粉公司」，總辦事處設於太原，資金總額是二百萬日元，日人居一百二十萬，其餘八十萬為華人担任。「河北麵粉公司」，總辦事處設在石家莊，資金總額為三百萬日元，其中一百八十萬歸由日方，其餘一百二十萬則為華人股份。山東也組織了這樣的麵粉公司，以接管日軍佔領後所沒收之華人各麵粉公司（在濟南青島等處）。這「改組」的目的，是在華北統一麵粉的生產，壟斷麵粉的賣買，直接排斥中國的麵粉工業與國外的輸入。依據中國海關的報告，一九三六年澳大利亞輸入中國的麵粉達一二、四四八昆打（每一昆打約一百磅），坎拿大為一一〇、〇一八昆打，美國

則爲三四、八九三昆打。

日本在這些「合辦」的輕工業中，其過半數的投資，差不多都不是實際的投資，而是強迫的「讓與」，這就是說，由前主人給予若干免納的股份。上海英文大美晚報會描寫日本人對付上海中國紗廠的類似的手段：

「日本紗廠開始對中國紗廠建議，由他們給予「保護」和「合作」，這意思就是要得到開工的准許，須給日本人相當的股份。有一次，他們要求一百萬元的股份，而該廠的全部資產只值四百萬元，換句話說，日本人要求該廠以全部價值之百分之廿五爲酬贈。有些時候，他們的要求甚至高至百分之五十以上。……」

日軍佔領華北之後，就採用各種強迫的手段，以統制一切的國外貿易，像在「滿洲國」一樣。因此，「臨時政府」就發表公告：聲明水牛，乳牛，山羊，羔羊等獸類皮革，自一九三八年七月初起，「暫時」禁止輸出。同盟社對這宣告的解釋是：「這是華北統制貿易的第一步。」果然，隨後又禁止華北主要輸出品羊毛，棉花，馬鬃，蛋產品等的出口。依照「日滿華北經濟集團」的原則，日本並不受此類限制，「因爲日本是需要這些產品的。」

各國在華北的利益，不是被排擠，就在武力壓迫下「改組」，要不然，就須忍受重大的犧牲以取得暫時貿易的准許，來維持其華北的業務。紐約美孚油公司（Standard Vacuum Oil Company）就被迫派定三井公司爲華北日軍佔領區內售賣華人用油的代理人。英商開灤煤礦公司也被迫同意設立一新的日本公司，專在日本、朝鮮與華北銷賣開灤煤炭。控制這新的「開灤煤產銷售公司」的，是「日本製鐵會社」，這會社又獲得採掘開灤煤區內所

有的鋁砂的權利。英國的「皇家化學工業社」(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總社設於倫敦)業已被迫關閉華北各處的分社。

中國境內最大的製煙公司「英美煙公司」只有答應在付出款項中，一部份用外匯和「聯準銀行」的紙幣償付時，才能收購一九三八年華北收獲的煙葉。華北的中國捲煙市場，完全分給滿洲日本捲煙公司在華北設立的捲煙公司。「東亞捲煙公司」(Toa Tobacco Company 這是滿洲偽政府捲煙局所附設的)分得華北津浦路以東的市場；另一家類似的捲煙公司，即「滿洲捲煙公司」(Manchuria Tobacco Company)則分得河北省的西部與平漢鐵路沿線的市場。這兩家公司都訂有協定，聲明各不干涉對方的銷賣範圍，同時日本軍事當局也不許別家日本煙草公司混入上述區域。除開滿洲各日本煙廠那些實際上是免稅的輸入品外，他們還在天津、青島、濟南三地開了三家新的煙廠，並擴大秦皇島煙廠之生產。東京讀賣新聞會說：「這兩家日本公司決定造成強大的勢力，俾在最後的競賽中，超過外商的公司。」在日軍佔據之前，「英美煙公司」所供給的，佔華北全部捲煙業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在青島，所有華人只有在獲得日本海軍當局的出口許可證之後，始能賣出輸出品。但要獲得許可證，這筆買賣必須由橫濱正金銀行 (Yokohama Specie Bank) 當地「中國商會」會通知所屬會員，收回存於匯豐銀行及其他英商銀行之存款，一切交換業務，必須經過橫濱正金銀行與「聯合準備銀行」之手。

華北各華商土敏土廠，都被日本特務部分給日本各家最大的土敏土公司。唐山（北平附近）英瑞合辦的「振興水泥公司」（Anglo-Swedish Chung Hsin Cement Company）資金一千四百萬元，年產三十六萬噸，也接得特務部的勸告，請他以成本零數賣給「三井」與「三菱」。振興公司拒不接受些要求，所以一直停止到現在，但日本公司却佔奪了各華商的土敏土工廠，重新營業。

據東京日日新聞的報告，紐約與倫敦，過去曾是華北羊毛在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市場，現在只有在特准和經過日本商行之手的情形下，才能獲得這種中國產品。「日本毛商聯合會」（Japanese Wool Traders Guild）從日本製造的「內蒙自治政府」處，得到獨購蒙古羊皮的特權。一個巨大的「中日零售批發商聯合會」已在天津成立，專門控制華北每一家中日的商行。

顯然的，所有壓迫華北國外貿易的方法，不外是推行變華北為第二個「滿洲國」的確定政策而已。事實上，日本所控制的華北，只限日軍駐屯區，但這些區域，恰正是華北國外貿易的中心。日本在當地施用的壓迫手段，比在滿洲所施用的，更加惡毒，更加損害外商的利益。日本是先佔據滿洲，建立控制全滿市場的獨立組織之後，才進而以強迫手段（然又制定法律條例）以絞殺國外貿易的。但他們在華北却由日本侵略軍直接負責，公開打擊國外貿易與外人利益，在侵略過程中一味加以排擠，毀壞與剝奪。

日本對華北金融的工業的和商業的業務所施行的統制，跟在滿洲的差不多，但速率却加倍的快。一九三八年

八月遼東事件 (Oriental Affairs) 上所發表的瀋陽通訊員密齊爾 (W. A. Mitchell) 所作由滿洲寄來的信

文中，對日本在滿所用方法，曾作如下的敘述：

「政府（指偽滿政府——譯者）希望本國（指偽滿洲國）一切有價值的生產品，應合日本之需用。如果那種生產品本身並不輸至日本，那麼牠可以獲得進益。那些日本所需要的生產品，如煤，鐵，金，液體燃料，以及一大串次要的物品，則絕對禁止輸出。此間所需要的物品，特別是繼續增加生產所必需的配備如機器等，可以由那些購進巨量大豆的國家供給，但禁止牠與日本工業的出品，作劇烈的競賽。一般說來，他們贊成三方面的配合：即滿洲賣出大豆與第三國，第三國以其產品賣與日本，而日本則以其產品輸至滿洲。」

但華北的形勢，跟「一九一八」以前的滿洲的不同，早在日軍武力進佔之前，日本在滿的工業與對外貿易，已凌駕中國的與外國的而居於主要的地位。日本在華北是沒有這麼優越的地位的。因此，牠便不能不以軍事侵略作為主要的工具，以毀滅華北中外的一切競賽者，奪取中國的鐵道，工業，礦產，工廠，限制自由貿易，並實現日本的貿易獨佔。日本「一九一八」前後數年間在滿洲所使用的，現在在戰事過程中，即已作為戰事的手段而在華北實行了。

一九三八年春間，在華北所採用的「幣制改革」也是日本獨佔華北領區貿易並排除國外競賽者的整個計劃的另一部份。所謂「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已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間成立，由日本銀行團（包括日本銀行，橫濱正金銀行，朝鮮銀行及其他銀行）貸款一萬萬日元，並由「臨時政府」承認牠有在華北發行紙幣的特權。中國中

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以前所發行的紙幣，「臨時政府」下令禁止流通。而華北許多較小的傀儡銀行，如「民生銀行」(Minsheng Bank 譯音)，山東、山西、河北等省銀行，「晉綏中央鐵道銀行」(Shansi-Suiyuan Central Railway Bank 譯義)以及其他各銀行，則併成爲一個特殊的聯合銀行，附屬於「聯合準備銀行」之下，並有發行小額紙幣的權利。「聯合準備銀行」所發行的新紙幣，是與日圓聯繫的，牠的流通初僅限於華北，目的在使整個中國成爲「日圓集團」的一份子，此外尙有其他份子如「滿洲帝國」和「內蒙自治政府」等。他們宣佈前中國銀行紙幣，應依照「聯合準備銀行」所定的兌換率換成新幣。「聯準銀行」紙幣名義上既屬於日圓，並強迫使之流通，那麼以「聯準銀行」紙幣來贖回中國政府所發行的紙幣，顯然是向中國貨幣的外匯基金施行攻擊。

這裏，讓我們看一看日本以前在滿洲採用的「幣制改革」的辦法，這實在是很有趣味的，在上引由「滿洲國」寄來的信一文中，對這一點會作如下敘述：

「滿洲國」以一種紙幣代替了以前此間各種貨幣……當新幣普遍流通之後，他們就酌量減低銀幣的價值，這在每隻銀幣後面是印得清清楚楚的。……中央銀行（指偽滿的偽中央銀行——譯者）時常按期發表詳細數字，指出這些紙幣的準備，已超過其合法需要額多少……在牠下降的時候，新的滿洲「元」達到了貶值的「日圓」的標準。於是一切銀幣的假託完全放棄，官方也宣佈本國貨幣已與日圓相等。在「一五年計劃」下規定須作驚人的增加的產品就是黃金，政府以固定的價格收買牠，但金價近來已經高漲。稍有心思的

人，一定會想到，這些紙幣比起黃金來，已越來越發低廉了。此間的貨幣法准許用有名的外國貨幣作為發行紙幣的準備金，因此，滿洲政府所有的金銀條塊，便可以購買日圓，而用日圓來作為滿洲「元」的紙幣的準備。因爲日本想攫奪華北各中國銀行與中國人民間以硬貨與外匯，他們便採用了滿洲的方法，但稍加修改。爲着保證這方法的成功，他們所採取的政策，實際上等於沒收中國的貨幣。但華北的情形，跟「一九一八」前滿洲的貨幣流通情形不同，華北流通的中國紙幣是穩定的貨幣，爲政府銀行的金銀條塊與外匯準備所保證，同時中國銀元的穩定，也爲中國中央政府所管理的外匯供給所保持。日本以「聯合準備銀行」的新票來贖回這些中國紙幣，並禁止這些標準化的貨幣的流通，動機無非在奪取外匯，而以這些膨漲的紙幣充斥於市場。華北的「幣制改革」並不像在滿洲一樣，用來穩定以日圓爲基礎的貨幣，用來作爲統制滿洲市場的手段。這是一種奪取中國的金銀準備與外匯以運至日本的，並有組織地傷害中國貨幣的穩定與完整的強盜計劃，同時也是以迅速的步伐，毀壞華北各國的貿易與利益，並搶奪所有各種有用的資源，俾作進一步的侵略的手段。

由「臨時政府」所組織的所謂「中日經濟會議」，曾正式聲明，中日「合作」共同發展華北經濟的各項原則如下：

(一) 中日經濟的互相依賴——由「兩方」協力調整華北的農業，增加棉產及華北所有各種主要產物，俾輸至日本，以「滿足該國各項工業的需要」，並由日本輸入「同等價值」的製造品。

(二) 資源的開發——由「日本方面」組織華北開發公司，以發展交通，建築海港，開發礦產及其他各項資源。中國資本也可參加。至於煤，鐵，電力，鹽及其他工業，統歸雙方提倡主辦。

(三) 實現資本管理的互相合作——在此項中，雙方「協力」免除兩國企業間的任何可能的競爭，同時「協力」爭取第三國的投資，增加對各國的輸出。

最後一點，即「增加對各國的輸出」也決定嚴格按照「滿洲國」情形辦理。華北「政府」又將與各外國間締結商約（如「滿洲國」與德義兩國所訂者）某種日本所不需要的次要產物，將由日本的專營公司直接賣給各國，以獲得外匯。而日本和「滿洲國」工業所不能供給的物品，則可依據互惠的或信用貸款的基礎，由外國購進。

華北與華中開發會社經認定的開辦資本，為三萬萬五千萬日圓與一萬萬日圓，日本政府所批准的陸軍發展華北五年計劃，據說全部用費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這計劃包括建築新的戰略鐵路與公路，藉以擴展防區，「綏靖」農村，厲行植棉計劃，並開發華北煤鐵等礦資源，以「加強」滿洲國的重工業。就礦藏資源而論，在蘊藏量與實際開發量兩方面，華北是全中國最重要的區域。日軍計劃在華北建立新的鐵工業與鋼工業，而附於「滿洲國」重工業之下。據說二個每年可出產一百萬噸的鐵廠，將在天津與太原附近建立，同時並添築新交通線，以與晉東的井陘煤區相接（Tsing Shan 按原文所指如係產煤區之地名，則原文的晉東應改為冀西，而所指的井陘煤區大概就是冀晉邊界正太路上的井陘縣的煤區——譯者）但日方最注意的是龍煙與宣化的鐵礦的

開發。察哈爾的龍煙，自日軍加以佔據之後，即成爲中國最大的鐵礦。北平報紙批評這一計劃時會說：「因爲日本的鐵的供給，有百分之七十七係由國外輸入，因此華北的出產，特別是察哈爾、河北、山西與山東的鐵產，將直接運至日本。」據傳天津的「中山鋼廠」(Nakayama Steel Works)將擴充牠的機械工具廠，而名古屋的豐田汽車公司(Toyota)也購置了一大片地皮，以建築汽車工廠。該項造車機械，將由義大利輸入。

依照日方計劃，華北將發展成爲日本軍需工業的根據地，一如「滿洲國」並與「滿洲國」密切聯絡。這些工業的資本，將在日本國內動員，由政府財閥與日本公衆投資。同時，在侵略過程中所攫奪的華人的資本與財產，將幫助他們「渡過目前的難關」並與獨佔的利潤一同作爲「戰費的基金」——這是華北遠征軍的公報所承認的。陸軍方面對日本在華北的貿易與工業所抱的原則，已由「一個公司從事一種工業」這一口號表現出來，這就是說，在陸軍經濟部指導之下，獨佔一切工業，金融與貿易(包括外國貿易的「改組」)華北日軍特別強調主張佔領區的開發，應服從軍部的嚴格的全能主義的方針，同時又堅決反對東京財閥應允英美參加華北日本企業的投資的企圖。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海密勒氏評論會徵引如下消息：「足以決定華北未來經濟命運的重要人物之一，」即南滿鐵道會社總裁松岡洋右氏，在四月(一九三九)十六日曾「提出嚴重警告，反對輸入外資以供華北經濟發展之用。」

東京報知新聞對華北開發會社資金問題，曾這樣說過：

「華北陸軍認爲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日本怎樣才能籌措開發的資金。他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用籌措戰費的同一方法，籌出這筆款項……企業的統制必須嚴厲推行……當前主要方針，就是加強日滿華的集團。特別是滿洲國重工業的加強，更應促其實現。希望此後能給華北擬妥一個明確的，或許是以八年爲基礎的計劃。」

華北日軍最高當局，在這一方面所採取的態度，也可以由德國駐華大使館商務參贊溫德非特氏（Herr Von Winterfeldt）的可靠報告中反映出來。這報告是溫德非特氏正式觀察華北歸來之後，於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上海德國商會的理事會中提出來的。當時他這樣說：

「（在華北）還沒有現成的獨佔組織；無論如何，有的僅是收到獨佔成果的軍事手段。華北日本駐軍的一部份自成獨立，只有在極苛刻的條件下，方能和他們作經濟的談判。討厭的是那些所謂「組合」，只要某一商業有點買賣，他們便成立了這麼一種組合，什麼東西都要收定額的手續費。現在有許多不可靠的日人，跟日軍互相勾結。」

在「臨時政府」之下（實際上是在華北遠征軍之下的）華北「自治」自然是日軍爲其願聞實行此種計劃的一條件，因此華北日軍總堅決反對北平南京兩偽政府合併，也不贊成把北方的主要傀儡王克敏，屈服於所謂「中央政府」的傀儡候補人汪精衛之下。華北日佔領區的正統治者，是日本陸軍，正如「滿洲國」這所謂「獨立的王國」的實際統治者是關東軍一樣。

華北侵略軍唯一的成就，只是排斥了日本的外國競爭者，特別是英美兩國的利益。由於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成功，和第八路軍領導下軍民在日軍佔領區後方的英勇戰鬥，日軍所征服的華北，便只限於強大駐兵地，各大城市與沿海區域而已。因此，日軍所有「開發」華北的計劃，都被擊得粉碎。在上述德國商務參贊溫德菲特的報告中，也會提到這一點：

「華北目下仍然是戰區，甚至日軍將領也這樣承認。許多武裝齊全的中國游擊部隊在整個華北積極活動。幣制問題的前途也十分暗淡；稅收問題只有用武力壓迫。平津間的鐵路雖然暢通，但與張家口的交通却並不怎樣安全，此外困難更多不勝數計。」

這是戰爭後將近一年（溫德菲特氏的報告是在一九三八年六月）的華北形勢，在戰事的第二年，此種情形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變，即目下中國抗戰已入第三年的時期內，也是如此。華北內地的真正情況，在平尼爾（W. V. Penneil）以作的一篇通訊中（載於一九三八年九月的遠東事件）便有詳細的說明：

「依我看來，日軍的地位，任何方面都比軍事行動開始時要壞上許多。假如蘇聯邊境的糾紛擴大開來，那麼，他們在華北的地位真是危險到極點。企圖以武裝力量來保證「華北問題」的解決的計劃，已完全失敗了。這是一目瞭然的事實，誰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親日政府是個最大的失望，牠的威信業已掃地無餘，弄得老百姓都不理睬他們。老百姓從不提這些人。慣喜揶揄的漫畫家和敵對的宣傳家，都不把他們當作對象。目

下民衆談的只是共產黨和游擊隊，有時也談河北省主席鹿鍾麟。中國政府的法令，實際上已通行於本省省內，由黃河到冀東各關口。

「政治的合作是毫無成就的，經濟的合作還有一點點。關於建築天津石家莊間的鐵路，以溝通山西與沿海貨運的問題，中日兩方前曾爭持不下，但自戰事爆發之後到現在，日本人却已一聲不響。這預定鐵路線所經過的區域，現在完全爲華軍所佔領，而山西軍軍力又極微弱，假如莫斯科談到破裂，而蘇邊軍事行動又再開始的話，牠是有全部被華軍肅清的可能的。」

這位英國記者的通訊，恰好是日軍在張鼓峯失敗之後寫的，值得注意的，是牠指出華北的抗日力量，乃在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以蘇聯在中國西北東北國境的堅強防禦力量爲其遠景。日本與英美間對華北問題的妥協，決不能改變華北這種形勢。這種妥協只有使英美在華北的殘餘利益全被肅清，而中國的抗戰却仍然繼續着，直到華北跟滿洲一樣，完全重入於中國的版圖而後已。

## 第二章 侵華戰爭的破壞與掠奪：華中華南之部

猶如日軍佔領下的華北一樣，華中日佔領區內的工廠，如沒有得到日本軍事當局的准許，一律不得開工。但這法令的作用，在華中，特別是在長江下游三角洲一帶，跟在華北的不同，牠不是集中所有工廠於日人手中，而是毀壞

所有中國的工業以及一般的工業化的手段。同時日方對華北的外國工廠，主要是強迫他們出賣，但在華中一帶，他們主要目的則在破壞毀滅牠們。

一般地說，日本的政策並不是使中國工業化，而是阻止牠的工業化。中國對日本帝國所負的經濟「使命」，一是作為日本獨佔的資源供給地，以廉價的農產品與工業原料供給日本的工業，並作為日本輸出製造品與資本的獨佔市場。日本帝國主義需要一個軍事侵略的大陸根據地，以統治中國支配東亞和太平洋，因此日本建立重工業的計劃，偏重於華北和滿洲。中國這一部份的資源的開發，將與鋼、鐵、化學工業、鐵路材料、機械、汽車、和軍用品等的製造直接連繫。這主要是由於戰略上的理由，因為滿洲與華北跟日本本部與朝鮮不是比較接近，就是互相毗連。至於中和、華南，只有在海軍的目的上，方才有這類似的計劃存在，這就是說，主要只限於台灣與海南島等海軍根據地所掩護的沿海一帶。

除開關於華北（以及滿洲）的特殊計劃而外，日本在中國佔領區的政策，就是僅僅保留那些為保證日本對整個中國市場的獨佔所絕對必需的工業。在侵略戰爭之前，日本已在中國國內建立了許多輕工業，這些工業自然要和日本輸華的製造品發生競賽，但牠主要的還是要和各國輸華的製造品以及中國的和在「門戶開放」條件下在中國設立的外國企業互相競賽。這是在中國關稅壁壘之內，用以爭奪中國市場控制權的手段。此外，日本還以軍事的和政治的壓力，以大規模的走私組織，來攻擊中國這薄弱的關稅壁壘。但自戰事爆發之後，日本即以直接的

軍事佔領與強力的排除加之國外競賽者，一如過去在滿洲，現在在華北華南整個佔領區一樣，同時又對中國的工業競賽者，對中國的工業發展，給予直接的和強烈的打擊。「中日合作」現在成爲壓迫中國工業的手段。中國國內的輕工業，甚至是日人開設的，現在已不得不附屬於日本國內工業之下。

在華中和華南，特別是在上海廣州兩地範圍內，各種輕工業大半都爲華人創辦，尤其是上海—南京—杭州這三角地區與武漢，中國的與外國的工業佔據極大的部份，這給當地日本工業與日本國內工業的輸入品以極大的威脅。因此日本不唯完全無意保留這一區域內的各種近代工業，甚至不願把牠們移到日本人手中。他們所關心的，倒是如何最大可能地破壞這些工業，俾將牠們的機械，原料與製造品移給日本工廠，作爲他們的戰利品。或是當作廢鐵運到日本，以供製造軍火之用。只有極小部份的工廠，能够根據「中日合作」的基礎（自然這合作的標準，是根據「滿洲國」與華北的成例的），依照日本的計劃溶合在日本工業之中。其餘極大的部份，只有毀滅與被掠奪一途，聽任「戰爭的蹂躪」——這東西對中國工業的打擊是百發百中的。

根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官方的報告，在戰事之前，在公共租界登記開辦的工廠，共三、八〇一家。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大型工廠，和百分之七十的中小型工廠，是開在公共租界的東區和北區的。這兩個區域，恰正是日軍進攻華軍的軍事根據地。戰前在公共租界該部份的工廠約二千家，僱用工人約一三五、〇〇〇人。戰後，這一區域的日本工廠，自然復工，外國工廠也是一樣，但中國工廠却毫無此種「特權」。甚至在華軍撤離上海二年之後，情形還

是如此，只有幾家小工廠以及總共數百名的工人會得到日本軍事當局的許可，在該區內工作（一九三八年五月公共租界官方的統計數字是：在這些區域內，日本工廠共三十三家，工人三八、一五三人，英美德及其他各國工廠共五十六家，工人爲二一、三二五人，中國作坊則爲二十家，工人總數爲六三八人）。

上海及沿長江的戰事剛一開始，就表現出這是一個有計劃的毀壞中國工業的戰爭。這種戰爭甚至在華軍退出之後，還是繼續不斷，直到這毀滅工作完成之後，方才結束。日本的武力佔領，其意義等於袖決不容許獨立的中國工業的存在，只有日本的工業，或是那些被強奪或被迫俯就「中日合作」聽由日人管理的中國工廠，始有開工的希望。這裏也像華北一樣，日本侵略者指揮着和控制着兩項工作，其一是獨立的中國工廠與貿易的毀滅，其一則爲每一重要商業部門，都爲日本商行所獨佔。下面就是一九三八年四月日本陸軍海軍和領事署對被佔領的華中區的日本企業的條例（這條例因日軍的侵略延伸至華南，故也適用於華南）：

「次重要的企業將爲當地領事控制，但與國策有關的重要企業，應由陸軍、海軍及領事署共同加以監督。

「那些願意從事「自由」企業的人，應請求最近地的日本領事的許可，並提交必要的報告。若當地並無領事，則聲請書與報告書可交與當地日本憲兵。

「有意經營任何「被統制」的企業者，應提出三份聲請書交與上海總領事署。此項聲請書應聲明呈交上海總領事、陸軍特務部首席與海軍特務部首席。

「須受支配之事業，包括如下各項：銀行，信託公司，堆棧，開礦，捕魚，運輸（輪船，航空，鐵道，電車及公共汽車），交通（電報與無線電），電氣，瓦斯，自來水，重要製造工業（如織緋，石灰，麵粉，硫黃，煙草，酒類，胡椒，脂肪，及糖類）以及零售企業，如開設市場，屠宰場，及出賣食鹽等。」

這些條例也適用於獲得佔領區獨佔貿易特權的日本商行。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的上海日報，就曾詳細說明這些條例的目的：

「日本商人是不應重蹈他們在滿州的覆轍的。日本商人不應互相競爭。在日本佔領區內，同一種物品應有一致的價格，而一般貿易，應受當局的控制。」

爲着使日本的獨佔得以實現，毀滅和奪取中國工業的運動應同時而且儘量迅速地無情地加以實行。在上海，爲達到此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在一九三七年與一九三八年上海公共租界當局的報告中曾經述及：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公共租界蘇州河北岸工業區設立之工廠中，據報有九〇五家業已被毀，有一千家業已被劫或遭損害。經過進一步的調查之後，證明這數字大體上是正確的。」

自華軍撤離上海之後，據與上同一來源的報告，日方始終不准中國工業的修理或復工。同區中的外國工廠，却已修理完竣繼續開工，供給目前的需要。外國工廠（主要的是日商工廠）數量且已日有增加。

日本侵略者還謹慎地防止中國工業未來有在該區域恢復的可能性，這可以由如下報告中看出來：

「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前，在這些區做工的工人約一三五、〇〇〇人，但據去年十二月的調查，即使該區開放，恢復正常活動，至多也只能容納四萬人的居住。……據估計，能至中國人所有的工廠工作的工人，恐不能超過三千人。……實際上，也只有外人所有工廠，在設備與建築方面，能有開工的可能。……有許多國外工廠確如海中孤島，周圍的中國工廠均已被毀為平地。」

「此外，因東區住宅普遍被毀，工人要在工作地點附近覓得住處，因而非常困難。」

日本工廠的工人都住在他們的廠內。一九三八年三月，據傳日人為各日商紗廠承辦的工人住區，業已修理完竣，可以居住。同時，又有若干「神秘之火」弄得非日商工廠工人的住處問題，完全無法解決。一九三八年五月公共租界關於這事，有如下的報告：

「除開戰事時期內無數大火，毀壞了密擠的工業區的建築，使工人未來住宅問題極難解決之外，在戰事停止之後，楊樹浦方面又發生多次火災，使可住之處所再度減少。」

「據救火會供給的數字，指出一九三八年最初四個月來，在日軍佔領區中曾發生火警一八三次，結果，被毀或受損之住宅計四百六十一家，草棚計一九三家。」

「值得注意的，是滬東區所有的草棚，目下業已全毀。單此一事實，已使千萬工人，在此區開放時，不能立即回廠工作。」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上海英文大美晚報對日本侵略者在佔領區後方施之於無辜民衆及其財產的這種行動，曾給予嚴厲的批評：

「這種時尙的舉動，是一種無法形容的，無法了解此一組織的真正性質的，和在他們的犧牲者面前炫耀「不可解釋的」火災與變故的次數的加增的暴行，而在所有這些之後，就是那包括各色人等，包括那些放棄合法營業的觀念，而沉溺於大發橫財的人們的組織，他們正用欺騙把「榨取」一字變成爲蒼白的，幾乎被遺忘的陰影。」

毀滅與掠奪已成爲日軍侵犯華中的主要現象，每當他們用此種手段對付中國的工廠與產業中心時，他們甚至不屑加以辯解，以武力毀滅中國工廠，其本身已成爲一種運動，並爲事先擬妥的政策與戰略所組織所執行，所以這不僅是「戰爭的蹂躪」。這種蹂躪，在被佔領的華中區中，從未錯過一家中國工廠，在許多情形下，若干僅有工業發展的徵象的中國城市，即使與戰事無關，也構成了毀滅的充分理由。這大規模的瘋狂的蹂躪，在戰事期間內進行幾月不斷，有時，甚至該地已成爲侵略軍的後方，中國民衆也已逃亡殆盡，而這破壞還是無日或息。日軍當局告訴所屬士兵，中國的工廠與近代文化機關，不管是在戰區抑在日佔領區中，應一律視爲華軍陣地而加以摧毀。上海的淞滬據掠，已在著名的被稱爲中國的曼徹斯特的無錫重演，整個的長江下游一帶，也未倖免，而震撼世界的南京的可怖的姦淫，就正是這暴行的頂點。然而毀壞中國工業與貿易的進行，更是戰爭中分外殘酷分外長久的部份，因爲這

是日本法西斯的「全體性」的侵略方法的使用，有計劃地爲軍人與其「經濟專家」所推動者。近衛在戰事開始前的聲明，曾說「日本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中國打到屈膝，使他不再有戰鬥的精神」，這話對此種「經濟」戰爭，倒也是十分確實的。

上海和無錫是中國紡織工業的中心，在戰事以前，這一區域的中國紡織業，已和日本的紡織業作過長期的生死戰鬥。上海的中國紗廠共有三十家，共有紡錘（即錠子）一、〇八五、〇〇〇枚，無錫工業區則有十五家，紡錘共三七五、〇〇〇枚。日本在上海的紗廠則爲三十家，紡錘計一、三〇〇、〇〇〇枚。在戰事期間內，中國紗廠在英美軍防區內繼續開工的，只有七家，紡錘共三二七、〇〇〇枚。其餘二十三家（共有紡錘七五八、〇〇〇枚）則在租界東區北區，自戰事結束後，仍然沒有開工，而實際上早已成爲日軍的戰利品了。這些紗廠所受的重大損害，一半固由於直接的砲彈，一半則因爲某些大紗廠的機械已被運走，或成爲廢物，而無數的貨品與棉包，早已被竊或被「沒收」。上海的日商紗廠，依照公共租界官方的報告，因戰事而受損，在全數三十家中，僅有一家損害較大。其餘日本紗廠，在戰事期間，仍然如常工作，後來且改爲兩班工作。

依據同上的報告，無錫方面的情形是這樣的：

「無錫區的紗廠，在戰前與上海的關係極其密切，幾乎可說是本市產業組織的一部份（無錫的紗廠有許多是上海中國紡織界聞人的產業），此次也遭受極大的損害。在十五家紗廠中（共有紡錘三七五、〇〇

○枚，)有一家業已全毀，其餘全受非常重大的損失。」

依據字林西報一九三八年四月的報告，無錫各紗廠所受的重大損害，除一家外，其餘均由於火災。這報告對於日軍在無錫（因為他是中國的曼徹斯特）所作的可怕的報復，會有生動的敘述：

「在無錫北郊一哩左右，已被燬成平地，因為所有紗廠（一家除外）都在那兒。許多絲行和堆棧，也遭遇同樣的命運。介於車站和城牆之間的許多旅館，商店，棧房，住宅都已被燬，電話線與電燈線狼藉滿地。」

「一進入城內，同樣的景象現在眼前，據估計，無錫住宅至少有一半以上已經焚燬。這是包括由城之中心到北門，由北門至橫跨運河的長鐵橋中的整個商店區。這個曾經是巨大的製造業中心和穀倉的城市，現在已僵硬地直躺著。」

一九三八年四月，據華文導報的消息，日本人曾與上海日軍佔領區中各紗廠廠主接近，「提議」在「中日共同管理」之下，重開所有各廠。這「提議」終為中國人所拒絕，因為日本提出的條件實在無法接受，那些條件據後來所知，就是給日人以免費的股份（大半佔全額百分之五十一），組成中日公司，作為「共同管理」的代價。這免費股份的讓與，是以重開和修理該廠並給予「保護」為條件的，至一切修理重裝與乎一般費用，概由華人負責償付。此外還有政治的條件，諸如公開活動與推進上海「中日合作」等等。這舉動的唯一結果，是楊樹浦振華紗廠（戰前只有工人五四〇名，為租界紗廠中之最小者）在漢奸尤菊蓀（日方製造之「上海市民協會」會員之

一）所組織的新經理處下，准於重新開工。

日本第二步的舉動，也即做出警告的榜樣，就是沒收大紗廠，並交予日本紗廠的廠主。例如虹口的振泰紗廠與大豐紗廠，即由日商豐田紗廠所「接管」。而申新紡織公司第六廠（共有紡錘七五、〇〇〇枚），則交與上海紡織株式會社，此會社事先且已搬運過申新第七廠的機械與棉紗。

在日軍進攻之前，上海是全中國最主要的工業中心。華人資本與近代輕工業的大量集中，當地巨大的和發展迅速的機械市場，六十萬的產業工人，幾千家小型和中型的機械工具廠的存在，使上海成了中國最適於重工業的發展的地方。一九三七年公共租界的年報就曾指出：

「電力線的通至外縣，使沉靜的小城鎮如嘉定，南翔，真如和寶山等，都成了工業區，建起了新式的工廠，而免受擁擠的痛苦。中國內地最大的工業城市無錫，離上海六十哩，已漸漸成了工業上海的一部份。重工業——鋼，鐵，酒精，酸類，和其他化學品的製造——已迅速建立起來。」

工業上所需要的鐵和鋼，差不多都由國外輸入，主要的是英、德、美、比等國，因為華北和華中的大部份新式鐵礦，不是為日本所有，就是負日本的重債，所有出產的鐵砂和銹鐵，都必須運至日本。日本之控制華中鐵礦，也正是阻止華中的新式銹鐵工業與造鋼工業的發展的手段。目下日本開發華中鐵礦的計劃，還是嚴格地遵守着這一政策。戰前，在楊樹浦和浦東的堆棧裏，在上海的碼頭邊，堆集着無數由各國輸入的金屬品，而把這些分給各小型和中型的

五金工廠的，又盡是中國人經營的零售店與鐵商人，這類營業在公共租界與閘北一帶，比比皆是。還有一個特點，一樣使日本人非常不滿的，就是上海日趨發達的重工業，跟幾千家中小型的鐵工廠一樣，都在中國人手中。在輕工業範圍內，日本製造公司已遇到了中國人這死敵，現在中國人又企圖在外國的借款和除欠的物品扶助之下，建立起重工業來，這情形當然格外嚴重，格外引起日本人的仇視。他們以種種可能的方法來阻撓這一工業的發展，同時，甚且放棄在自身華中建立重工業的企圖。這樣，當日軍一侵犯華中，他們自然盡量利用此一機會，以打擊中國的五金和化學工業，以及和此項工業有關的全部的中外的貿易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公共租界對此項毀滅工作，報告如下：

「在被毀的工廠中，有許多是鐵工廠。單公共租界一地，就有四百一十家。在閘北和南市被毀者，更在數百以上。過去閘北那些櫛比相連的鐵廠，都毀大火焚燬。

「南市一地最大的損失，是江南機器造船廠的毀滅。（此廠後來改稱海軍江南造船所，隸海軍部，所作船隻，不下千餘艘，工人在二千人以上——譯者）在中國內河行駛的各外國砲艦，大半都由該廠承造。其次就是中央機器廠與東方鐵廠。此外，閘北的民新印刷機器製造廠，真如的中國科學儀器公司製造工廠，中政府最近在浦東設立的酒精廠等，都是租界外被燬（由於轟炸或砲彈）的較大的工廠。」

上海戰事結束之後，日本侵略者於毀壞之餘，又進一步作有組織的劫奪，把匯山區楊樹浦虹口一帶，各零售批

發店家中的鐵片和鋼鐵，掃數搬運，後來更運走中國工廠中的機器，在上述各區中的中國鐵商人的存貨，據估計約五萬噸，總值一千五百萬元。據東京朝日新聞的報告，日軍在戰事期間內搬運的五金，其總重量為八萬噸，但據外國五金商人的估計，被運至日本的金，至少在十萬噸以上，損失至少三千萬元。

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上海字林西報對此會有如下的記述：

「未遭轟炸的中國工廠，現在都已變成瓦礫和灰泥。牠們在被毀之後，其中所有的鐵器盡被奪去，因此，如華人回至這些區域，一切可以重作工業活動的東西，都已不復存在……主要機械（這些決不能作為廢鐵看待，其中不少可以使用）的被奪，是日軍最酷毒的打擊之一，足使本市未來繁榮大受傷害。上至價值數十萬的如製造橡皮的或製造織機的機器，下至小機械工具店的摩托鋼條，由重至若干噸，輕至只值幾元錢的小鐵片，全都運出上海……過去幾十年來辛苦造成的事業，都已無情地被毀碎，曾經是繁盛區域的匯山區與楊樹浦，現在只剩下昔日的繁榮的陰影……別弄錯，由匯山區和楊樹浦等處運走的，不僅廢鐵而已。中國工廠的機器也一樣被拆卸下來，運回日本。」

那些未被毀滅的華人大工廠，都由日本軍人移讓給日本大托辣斯如三井、三菱等的附屬組織。「接管」中國工廠的方式，依情形而異，但結果完全相同。各種工廠，如果為中國政府所有，那麼，就由「維新政府」或偽市府之類宣佈牠為敵產，加以沒收，然後移給日本企業（注意不是移給「維新政府」或是地方的傀儡組織。）至於私營的

華人工廠，則由日軍當局建議，將其「改組」為中日共營公司，條件則為資產均分。如這種提議被拒絕，日軍當局就加以「接管」，然後付託給日本公司。例如，日方會要求龍華的中國水泥廠和龍潭的中國水泥廠（每年合計產量達二百萬桶）的管理處在「共同管理」之下恢復工作。兩廠管理處加以拒絕，決定關門，於是日方把兩廠讓與日本的士敏土廠。而將前參加談判的代表列為「共同管理處」的候補者。龍華水泥廠本來已因機器借款未清關係讓與德商西姆森公司，但日方始終不願該廠的所有權，擅自加以劫奪。此外，各被「接管」工廠所負英、商、美商銀行公司之借款，日方也全不受理。

這種巨大的劫奪中國工廠的行為，日方毫不加以掩飾。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日上海日文、上海日報，曾發表如下的記載：

「華中許多中國工廠，業已讓與日本工業組織者，為——

- (一) 江南造船廠，由三菱造船會社接辦。
- (二) 龍華水泥廠，由同藤（Onate）是否與原名相符，待攷）接辦。
- (三) 龍潭水泥廠，由萬潮（Banishio 全上）接辦。
- (四) 上海五家麵粉廠，由日本製粉所組合和日清製粉所接辦。
- (五) 浦口硫化銨廠，由三井接辦。

此外上海南市一大肥皂廠，也由某日本公司接辦。至華商各捲煙廠，也決定由日本東亞煙公司接管，不久即可復工。最後，尚有日本公司多家，受命接管中國酒精廠與人造絲廠。

跟在華北一樣，日本「發展」華中日佔領區的計劃，包括建築戰略鐵路與公路，水陸交通，電氣和所有各項公共利益的獨佔，以及各種礦藏，特別是煤，鐵兩項的開發等項。然而華中並不創辦重工業，這是與華北的發展計劃不同的地方。華北與華中間此種異點，可以由一九三八年四月東京發出的電訊中得到說明，該電訊說日本當局已決定設立一個公司，負責將華中鐵砂運至日本，這公司直屬於華中振興會社。該訊接着又指出，日方並不想在華中鍊鋼，但華北則將設立一個公司，專門將晉察兩省的鐵砂，提鍊成鋼。

華中振興會社的資本，定為一萬萬日圓（華北開發會社則為三萬萬五千萬日圓）。其次，東京方面已草擬了發展華中的三年計劃，其總費用為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華北日軍五年計劃為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在這總費用中，據傳有八千萬日圓是用以建築華中的鐵路，三千萬日圓用以開發礦藏。其餘六千五百萬日圓，足以應付發展電氣，瓦斯，交通（包括電話，電報，公共汽車，水道的保護與疏導等）各項所需的費用。日本企圖在「中國民間」動員一部份必需資本，例如，建造鐵路的資金，有百分之五十將由「維新政府」和私人方面募集。但開發鐵礦的資金，却在「中日合作」之外，其全部股份，概由華中振興會社及日本民間認納。至於全部發展經費，已指定三份之二由振興會社供給，其餘三分之一，則由華人負擔。

但日本佔領華中所遇到的最主要的問題，還是統制金融的和經濟的中心上海的問題。日本所毀滅的，僅只是上海的一部份，雖然這是上海中國工業所在最多的部份。下面就是依據官方統計作成的概要，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破壞的成就：

〔紡織業〕：在日軍控制或佔領的區域中的二十三家紡廠（共有紡錘七五八、〇〇〇枚），如欲復工，均需大規模修理。無錫的十五家紗廠（共有紡錘三七五、〇〇〇枚）除一家全燬外，其餘大半遭受極大損失。

〔染織業〕：在總共九千架織機中，只有三千架可以使用。據中國織染協會估計，損失約值九、八三〇、〇〇〇元，工廠被燬者一百九十家。

〔針織業〕：在五十家針織工廠中，全燬者佔十五家。

〔纜絲業〕：因損害及貿易阻斷的損失，據估計約一萬萬元。上海區纜絲廠之四份之三，都已燬壞。無錫一地，纜絲廠四十六家受有重大損害，煮鹼盆燬壞者達一四、四〇二座。在上海租界內工作者只有四家。其餘被燬各廠的活動資本爲二、八三二、五八〇元，僱用工人達一八、八九六名。

〔絲織廠〕：戰前共有四百家，現存者僅一百家。單虹口及楊樹浦一地，被燬之小織綢廠達一百十八家。

〔化學工業〕：龍華水泥廠，資本二百萬元，已遭重大損失。電器化學廠，資本三十萬元，大半被燬。五家大油

漆廠，二家被燬，三家受損。其他化學工廠，有三家受有損害，有兩家（其中一家是新創的新式工廠，即中國工業公司）則完全燬壞。

〔肥皂工業與硝皮廠〕：虹口，楊樹浦，江灣，閘北，南市等處各大肥皂廠，每家損失約五十萬元。精益硝皮廠完全被燬。小肥皂廠差不多全行毀壞。

〔橡皮用具業〕：三十五家橡皮廠中，十一家爲火所燬。全部損失總計約五百萬元。

〔造紙業〕：上海八大紙廠中，五家全毀，二家頗有損害。損失約在一、五〇〇、〇〇〇元以上。

〔玻璃業〕：二十六家玻璃工廠中，有兩家玻璃廠，五家電燈泡廠，一家熱水瓶廠，完全毀壞。全部資產有一半業已喪失。

〔印刷業〕：五家大印刷廠中（包括商務印書館印刷所，與中華書局印刷所），有二家停工，一家爲日人佔奪，二家被毀。上海全市，共有二百左右家小印刷所盡行毀去。

〔捲煙業〕：十八家大捲煙公司（外商的與華商的），有八家被燬，資本損失約五百萬元。最大損失都是華商煙廠，如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華成煙公司，和大東煙草公司，上述三家僱用工人在八千名以上。其所餘機器，已作爲「廢鐵」運至日本。

〔麵粉業〕：十五家麵粉廠中，八家（也即其中最大者）業已全毀。

〔鋸木業〕：南市十三家較大之華商木廠，閘北八家，西區一家，不是被毀，就是受了嚴重的損失。其他在西區各家，皆受重大損害。有兩家火柴廠，一家受損，一家全毀。

〔機械業〕：四百一十家小型和中型的鐵廠，在公共租界日軍佔領區內被毀。在南市及閘北被毀者，也有數百家。大機器廠如江南造船廠，東方鐵工廠，中國科學儀器工廠等，都受了極大的損害。

但各國在上海的地位，對日方「發展」華中的計劃，仍然是一個極大的障礙。在英美和法國控制下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有華人三百萬人，外人也在六萬左右。兩租界在經濟上雖與華中隔絕，但牠仍然是國外貿易與中國沿海貿易的根據地。因此，日本侵略者就竭力把他們的經濟「條例」和「中日合作」的計劃，應用到上海租界上來。在兩租界內，華商工廠目下仍然繼續工作，戰後又復增加不少新開工廠，這一點當然也使日方極端不滿。此外，外國銀行與企業（主要屬於英美兩國）對於中國市場，仍有極大的影響。

日本在上海的計劃，是把上海日本佔領區變成爲上海全市的中心，變成爲日軍佔領下的「新華中」的實際都城。當日佔領區中外利益業已被毀之後，日本就開始在這區域，以獨佔和「中日合作」來進行「發展」與「重建」的工作。戰後日本已在各焚燬區域，如南市滬西區等地，開闢了許多直通虹口總根據地的大路道，就是日軍包圍上海租界計劃的一部份，他們計劃把上海日軍佔領區造成的一個統一的市區，獨佔這個海港，包圍兩個租界，而使之成爲日軍所控制的大上海的附屬部份。

爲着使上海包圍地區安全無虞，日本陸軍又分配土地給與數千台藉移民。以前在當地操作的中國農民，都已被逐，而且毫未獲得補償。這數千台藉移民，以及他們的牲畜，都由日本海軍運輸艦載到上海來（前此中國農民所有的牲畜，都已在戰事期間內爲日兵所宰殺。）據說，日軍已草擬一個大規模的殖民計劃，將大批台人移住在上海周圍及長江江口整個地區，這些新來台人都受過軍事訓練，並配有武裝，而其所佔區域，也被認爲特殊區域，歸由「自治協會」管轄。這殖民計劃的實際動機，就是把日本在上海的海軍根據與陸軍堡壘，以及把長江江口，作爲第二個大連和旅順口。

日本商業最重要的新領域之一，就是獨佔中國的一切船隻。戰事剛開始時，日軍禁止所有中國沿海和內河的航運權利，即爲這計劃的第一步。所有華商輪船，不論大小，只要日方能加奪獲，立即加以沒收，以作軍事之用，或移給日本的輪船公司。因此，附屬於日商清輪船公司的江浙輪船公司，據日本報上所載，其所屬二十二艘小輪的船隊，「已受華人委託（！）而擴充至一百四十艘。」其次，日方又封鎖長江與珠江，不准各國通航，於是把英國所獨佔的內河航權，完全加以排斥。依日方通訊社所做，日商輪船公司，準備收買行駛長江的英國輪船公司所屬各種船隻，不用說，他們只願付出本錢以下的極小的價錢。日本目下正準備成立一個獨佔組織，以統制中國與日本間，及中國沿海內河各種航運，和上海的拖船小船以及堆棧等各種業務。

一家所謂華中電力公司（資本二千五百萬元），將負責統制長江下游日佔領區的全部水電事業。這公司的

總辦事處設在上海，董事三人，二爲日人，一爲華人，其初步工作，卽爲獨佔上海佔領區的電燈與電力供給，包括分離日佔領區與公共租界公共利益事業，如上海電力公司，自來水廠，自來水廠等的聯絡。日本希望，由於上海日營公共利益事業的建立，一將使此項事業成爲整個華中建設工作的中心。（日文上海報語）其次，此一華中電力公司，將控制及經營京滬杭三角區內一切現存的電力公司。

甚至「日本旅館業協會」——依同盟社電訊所說——「在開發新中國的工作上，也不願落在其他各工業與企業的後面。」特別因爲華中所有各家非華人經營的旅館，都爲英人、美人和法人所開設，因此日本旅館業協會認爲「目下亟宜採取進攻政策，在資金所及範圍內，盡量接管這些飯店。」

爲着統制所有中國絲廠，日本農林部已決定如下的計劃：由日本絲廠廠主和絲貨輸出者組一同業公會，合資三百萬元，以發展中國絲廠。在原則上，華中絲業將在「中國管理」也卽在南京「維新政府」管理（！）之下，而新同業公會則監督收購繅絲、織絲等工作。關於華絲由新組織負責輸出事項，同業公會將與「維新政府」簽訂協定。

上海、杭州、無錫和蘇州都是中國絲業的中心。無錫的華商絲廠，都已「改組」爲中日合作的公司，並「邀請」日本專家管理。「維新政府」又委託上海日商紗廠廠主協會，重開杭州的絲織廠。無錫華商絲廠（資本三十萬元），已由日商以八萬元代價買去。蘇州三家絲廠，也被購去，而三家總共代價則爲四萬五千元。向江浙兩省農村收

買賣繭的業務，全由日人奪去，而所出代價，尚不及市價之半數。上海新聞報會這樣指出：「應該注意的，日本收購者下鄉收買時，有日軍保護，因此農民毫無講價的機會。」所有上海租界內各華商外商經營的絲廠，只能向日方購買繭，因為中外商人，如得不到日軍的通行證，便不能進入內地。（日軍就是用這方法，來保證他們獨佔領區的全部貿易的。）後來，這條例經過「修正」，他們另設立了「執照」制度，日人和華人，可以憑日軍所發執照至內地買賣；而執照是由日本陸軍海軍領事署和日本商會派出的代表，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專門負責頒發的。

上面已經說過，日本的政策是一面消滅華中的工業化，一面於日軍控制與指導之下，在華北建立全體性的工業制度。這一點，也可以用日本「改組」中國紡紗工業的計劃，來作證明。上海無錫的中國紗廠，雖已破壞殆盡，但日方並未計劃在此區域內，進一步大規模地擴張日本所有的紡織工業，反而在華北建立了新的紡織工業的中心。在天津濟南兩地，日軍已用極小價錢接管十二家左右的中國紗廠。不過這只是原計劃的一部份，華北日本紗廠的總數將增至二十七家，紡錘總數增至二、〇〇〇、〇〇〇枚。在戰前，全中國日本紗廠共五十家，紡錘總數為二、七〇〇、〇〇〇枚，其中極大多數是在華中，華北只有八二〇、〇〇〇枚而已。青島日本紗廠，已大半為華軍所燬，依照日方估計，那次的損失約一萬萬二千萬元。青島日本紗廠都與上海日本紗廠聯合，有許多且是上海日本紗廠的分廠。大阪紗業業主，曾請求日本政府，對發展華北紗業與推廣冀魯等省的植棉計劃，在金融上加以重大的支持。一九三八年，日政府已允撥三千萬日圓，補助中國的日本紗廠，其中二千萬日圓，用以協助華北的發展計劃，一千萬

日僱用以賠償青島各日商紗廠的損失。

上海唯一遭受損失而停止工作的日本紗廠，就是豐田紗廠，但豐田倒因此而分得了兩家中國紗廠。甚至就是許多毫未受損的日商紗廠，也分得了華商的紗廠或是棉花與棉紗，但我們却從未聽到上海或青島兩地的日本紡織工業，有大規模擴充的消息。除開與「滿洲國」相聯的華北區之外，中國其餘各處，都不許有大規模的工業化存在，俾作的日本國內工業的市場。

### 第三章 軍事的與金融的干涉

爲着獨佔中國市場，日本所作的軍事的與經濟的侵略，在戰略上和企圖上，是個最直接打擊中國對外貿易的戰爭。日本的海陸軍，以進攻中國沿海和沿海各省，來築成一道堤坊，阻斷中國的國際貿易（主要的是對英、美的貿易）的海路；而戰場的不斷擴大，由華北的天津進至華中的上海，再延至華南的廣州與北海，又好像已在中國和英、美——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兩個敵手——間置了一道障礙。在戰事的第一年，香港的戰時貿易雖很繁榮，但英國顯然已遭受了極大的損失，而美國未來對華貿易的境遇，甚至比英國還要危難。英、美因在亞洲擁有殖民地的關係，都是與中國接壤的國家，自日本在南海不斷進迫，佔據了海南島，又進攻北海，佔領了中國西南的邊境之後，法、屬、安、南實際上已爲日本包圍，情勢極端危險，英國則還控制着印度洋上由緬甸適至中國西南的重要陸上路線。但無論如

何，中國沿海之被日軍佔領，已使中美貿易大受打擊，中國海上的日本海軍，可以把牠完全封鎖。美國唯一與中國毗近的，只有菲律賓，但實際上，當美國正冒險維持中國沿海的貿易與投資時，牠是很難發生積極的作用的。

日本一佔據了上海和廣州，牠馬上就封鎖了長江與珠江的航運和貿易。軍事行動的向內地擴展，又使牠有機會包圍了各通商口岸的外國租界，並阻截牠們與中國內地的貿易。同時，日本海軍的有計劃的封鎖，也使中外各國無法利用較小的口岸以維持貿易的關係。爲着「證明」牠對各國的條約，權利「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等的尊重，日本軍事當局不斷保證所有這些方法，完全由於戰時的需要和對各中立國僑民的關懷。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的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上，對日軍當局的這一手段，曾作如下的說明：

「目下日本手中最可怕的武器，就是牠所熱烈地表示的，對各國的僑民與資產的關懷。……現在各國商人在黃浦與長城之間，都被限制在四個城市裏。如果他們沒有一張日軍通行證，就別想跑出這些城市一步，但通行證呢，日軍當局因爲焦心關懷中立國僑民的安全，總是拒絕發出。」

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上海英商出版物金融與商業（*Finance & Commerce*）也曾訴說這一點。開頭牠說到日本報紙勸告各國的僑民，砲艦和駐軍等離開中國，因爲中國是個「戰區」並說「全中國各個白色男女的小殖民地」不應希望外國砲艦和駐軍的保護。」在戰事期間內，中國境內有了這些保護者，勢必「引起不幸的」事件，「但要避免這些事件，非常容易，只要那些想冒險住在國外的人們，馬上回本國去就行。」同時日本人又極度關

心各外人在戰時所遇的困難，因此勸告他們把所遇的苦痛和所遭損失的清單，送給中國政府。金融與商業接着就批評說：「日本認為中日兩國既未曾宣戰，那麼保護中國境內各第三國僑民，乃是中政府的責任，假如各國利益因中政府未能遵守義務而受犧牲，那麼必須與以賠償。」

爲着破壞英國對中國各海關的控制，和強迫英國把控制權移給日本，日本軍人便在沿海佔領區中，組織和保護所謂「走私」——這實際是日本公開的免稅的輸入和輸出。因此，據海關的報告，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日本對上海的輸入，其貨物總值，竟由一九三七年同時期的六千一百萬元降至四百萬元，而輸出則由二千四百萬降至四十萬元以下。但單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據上海日本總領事日高（Hidaka）對日的廣播，日本貨物免稅輸入上海並未經過海關的，達四萬噸。日本的軍法是禁止淪陷區的海關事務的。據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海大陸報所載：

「免稅運進上海和中國其他口岸的各色貨物，實在源源不絕。由穀類糖類到各種有專賣標貼的酒類和酒精，都可以用很賤的價錢在某處買到。海關職員絕對無法控制此種非法的輸入，更沒有法子阻止牠……不論是商輪或是貨輪，只要掛着日本旗，便不許查驗。」

在沿海整個佔領區，到處組織着這種巨大的「走私」，只有在中國海關的英商總稅務司答應了日本的要求，這「走私」方才稍稍斂跡。日本的粟求是將海關交由日人監督，海關稅款交存橫濱正金銀行，並承認日本製造北平的「臨時政府」與南京的「維新政府」，有依照日本需要改修海關稅率的「權利」。這協定一九三八年春

間先在華北推行，隨後又在華中實施，至是日本方才改變牠對海關的態度，因為牠已可以應用海關（包括那種規定稅率的「權利」）作為另一種進攻日本以外的各國貿易的武器。大陸報對此一形勢的改變會作如下的評論：

「華北方面來的報告，指出冀東走私的活動已逐漸消滅，但如果研究修訂後的「華北稅率」就可以明白這特殊貿易的停止，跟關稅的修正是同時的。新稅率對日本商人是這麼優待，以至這「特殊貿易」的方法既不需要，又不省錢。」

現在上海的海關關員（連英國關員也在內）自然只好依照日本的命令行事。一九三八年一月施行的「華北稅率」據說為「統一」整個日佔領區所有海關起見，在形式上業已廢除。但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所施行的「新統一稅率」實際上仍是「華北稅率」，不過把牠推至整個日佔領區而已。在新稅率中，日本迫切需要的物品如棉花，棉花子，亞麻子油，各種礮砂和鐵等，出口稅完全免除。同樣，進口貨如開礦機器及其副用品，冶金器械，植物種子等，也即日本「開發」佔領區所需的各種輸入品，其進口稅也一律免除。新稅率對棉貨，漁類，麵粉，橡皮，自行車，熱水瓶，電器及其他物品（可說全是日貨）的進口稅也大大減低，因此一九二八年常中國獲得關稅自主權時為保證中國工業而公佈的前稅則，已經完全廢止。其次，豬鬃，羊毛，織物等的出口稅也大為降低。但某一部份進口降低，如煙草，酒與酒精，石油等，也有利於英美兩國的貿易，這是用來酬答英國的。總之，新稅則是英日妥協的產物，英日以中

國政府所定的稅權送給日本侵略者，並把一切有利於中國工業的保護手段完全取消，而日本方面則確認英國各債券持有人的以關稅爲担保的借款，並暫時減輕某種稅率，俾有利於英華物品的進口，但後一類的減低，實際上完全是一種欺騙，因爲一九三八年施行的「厘金制」已把牠完全推翻，諸如火油之抽百分之六十，汽油之抽百分之八十，便是明顯的事實。這厘金制對英美與華人的出品極力摧殘，但日本出品不用說當然是免納的。

然而，日本政府和南北兩傀儡政府在批評這新稅則時，還異口同聲的發明，必須頒佈一個更新和完全適合「新秩序」的稅則。「臨時政府」就曾宣佈：「將儘可能快地採用更合理的關稅政策。」日本外務省的批評則說，新稅率「與目前改變的環境並不適合。」接着還說：「中國事件目下尙未結束。」日本在這方面的目的，是製定像「滿洲國」一樣的特惠的稅則，俾使中國經濟加入所謂日「滿」的集團。

依照「三井貿易公司」總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東京「東亞經濟協會」上所作的報告，一九三八年日本與「滿洲國」和中國的全部貿易，總值達三、七五九、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比一九三六年（即侵華戰爭之前一年）要增加百分之六十一。一九三九年日本與「滿洲國」和中國的貿易，其數字據傳竟達日本與第三國貿易之兩倍。重慶方面對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八月間中國對外貿易的報告，指出日本輸至中國佔領區的總值，爲二二六、二〇〇、〇〇〇元，其次則爲美國（包括日佔領區與自由中國）爲一四九、二〇〇、〇〇〇元。同時期中中國對美輸出，爲九九、五〇〇、〇〇〇元，對日輸出爲四三、六〇〇、〇〇〇元。日本貿易的增加和各國與中國各海

口的貿易的相對的減少，可以由上海在對外貿易的地位中看出來，過去牠佔全國貿易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目下則僅佔百分之二十五。同時天津由不及百分之十五甚至全額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日佔領區中，日本已建立了貿易的獨佔，並迅速地把各國競爭者由各海口如天津，青島，廣州等排除出去，就是上海也是一樣，不過不是迅速地而是逐漸地罷了。

日本基於佔領區的軍力而造成的獨佔地位，在下面英文大美晚報（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的報告中有着特出的說明：

「日人在內地以他們自己的價錢，並用他們自己的紙幣買米，運至歉收的日本，和供養在華的土兵。

「日本人在鄉村間一向就這樣地做，食米獨佔已在松江縣（上海食米最主要的來源）建立了起來。

「日本承辦者以振記公司的名義，通知當地各米行，一切食米不能置予「無權承買」的人物，只能賣給該公司。因為壟斷買賣，每一石的最高價是二十元，這公司把買到的，一半運至日本，一半運至上海，利息非常豐厚。（按發表此消息時的市價，每一石米的價格達四十五元。）

「這公司顯然是得當地日軍的支持的，因為沿松江公路的日軍哨兵都得到命令，阻止一切米的運輸，只有所攜不及半石，或運至松江者除外。據說在所有的產米區，都有這樣的獨佔。一切的農產品和蠶繭，也都被同樣的方法所控制。」

由於日軍的佔據華南沿海各地，香港在經濟上的地位，已附屬於日本的佔領區，跟上海廣州等的租界一樣。中日戰事剛開始時，華商沿海一帶，即已劃在日本「和平封鎖」的範圍以內，但這封鎖開頭只大大地打擊了廣州和華南各海港的貿易，而未波及英國保護下的香港。但從地理上和經濟上說，香港是一個中國港口，雖然牠是英國的戰利品，和用以建立英國對華南的統治的海軍根據地，與金融的商業的和工業的中心。在戰事以前，香港在商業上的地位，乃是華南對外貿易的中心，同時也是華南主要的海口，但他的地位跟廣州和上海完全一樣。因此，在華南沿海的控制上，也即在華南與中國其他部分的貿易上，香港又是廣州的死敵。戰事一爆發，廣州已被封鎖，於是香港的地位大為變動，成了中國與世界貿易的唯一公開的港口。所有華南國外的和國內的貿易，都集中於香港或經過香港。此外，各國與自由中國的巨大的貿易，也一樣繞過香港，經由牠的鐵路與公路輸入華南。因此香港實際上成爲國民政府轄下全中國的最主要的港口，取得了過去上海在金融上的地位，並經營了中國向外國購買的軍火的最大部份。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軍的進犯華南和佔奪廣州——跟張伯倫達拉第兩先生在慕尼黑開的「勝利」同時——使得香港的戰時貿易大受限制。但當日本陸海軍切斷了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連絡，又進而佔領了南中國海所有各戰略的和軍事的據點，也即香港本身存危的生命線時，英國政府的確還採取了「不干涉」的政策。不錯，香港現在還佔中國所有市場中心的首位（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八月由中國輸出爲一三五、八〇〇、〇〇〇元）還是經

由安南的和華南各個未淪陷的港口的貨物的集散地，但日本不斷的進犯，却漸漸阻斷了香港與中國沿海的一切商業的航路。同時，自日本海軍佔據了海南島，控制了香港與新嘉坡的戰略路線之後，日本陸軍又已在沿香港的陸上邊界處設防了。

中國沿海和沿海各省的佔領，各海口通至內地的主要水道的封鎖，鐵路組織的軍事控制，外國租界，香港以及安南與被佔領區的隔絕，日本獨佔制度的建立——所有這些，都是日本打擊中國對外貿易的致命武器。自然還有計劃的和逐漸推行的「全體性」的進攻，也破壞和消滅了日本在華所有的經濟的競爭者，這就是說，被日本逐出遠東的，不唯英美法而已，即日本的盟友德義以及各中立國家也都包括在內。無論如何，就打擊中國的對外貿易而論，日本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武力驅逐那些侵害了中國的權益又與日本對敵的國家——那些借助金融的干涉，來保持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和保證資本與貨品兩方面的特權貿易（主要依據着放債和投資）因而與日本互相對峙的國家。目下日本打擊各國在華的利益，是軍事干涉，牠就以這種干涉，來阻止英美法等國對中國的金融干涉，來驅逐這些國家出遠東（連香港與安南都包括在內），來配合日本的金融干涉，以便獨佔整個中國的市場。事實上，英國對華的特殊金融干涉，也一樣由軍事干涉，即最初剝奪中國的民族獨立的鴉片戰爭得來的。在世界金融資本與殖民地市場上，居於統治地位的英美法三國，既共同合作對華進行金融干涉。自然大大地阻礙了日本帝國主義對遠東、東亞和太平洋的各種希望的實現。因此，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開頭的時候，就採取聯英反帝俄，和聯英

反美（即反對美國的要求與英法日「機會均等」）以培植自身在滿洲與華北的勢力的政策。這一時期，直至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告終。在第二時期裏，日本仍然與英國聯盟，但不斷準備着獨佔中國，同時也試以軍事的威脅與經濟的手段，來打擊英國控制中國金融的霸權。日本以借款的形式，賄賂了腐敗的北京政府——就本質上說，這與前時英法以賠款、貸款和鐵路建造權等來取得支配地位，並沒有什麼不同——於是在中國所負外債總額中，日本居然佔百份之三十一點五，英國所佔也僅百份之三十一點八，法國則為百份之十三點七，其餘則為比義美等國。在一九三一至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中，英日同盟業已廢止，英國便與美國聯合，以抑制日本對華的金融干涉。因此當英國又獲得支配權之後，牠又利用日美的衝突，來保留牠對中國政府兩項重要稅源——關稅與鹽稅——的控制，以為英國主要放款的保證。一九三八年五月，英日兩方所訂的海關協定，不用說，正表示英國已把海關支配權交與日本。另一方面，英國在中國抗戰的第一年中，即已犧牲了中國，背棄了華盛頓公約，而與日本成立這重要的協定，顯然表示英國願意以牠一向的拿手好戲，即金融的干涉來與日本的軍事干涉相配合。

一九三五年十月，作者在分析各國在華的金融支配一問題時，對當時的形勢，曾作如下的估定：（註）

「目下主要的有關國家，是英日兩國，至於美國，可說正在爭取地位。英國早已投下長期的利益，牠的地位

（註）原作見太平洋事件月刊（Pacific Affairs）一九三五年十月號，原題為“The Financial Cutting Edge in the Partition of China”。

所要求的，乃是關鹽兩稅支配權的保持。牠這地位，還可以用新債，（以統稅和新設的所得稅爲担保者，）和擴充舊有鐵路債款（日英兩國獲得華南與西南的新鐵路建造權，所以可用新債擴充舊債）等方法加以增強。從英國的觀點上說來，這些計劃的實現，可以使牠與日本抗衡，也可以使牠與日本平分中國，即華北歸於日本，英國獨得華南與西南，而華中則爲兩國角逐的場所。

「但無論如何，直到現在，日本還沒有表示出參預此項計劃的傾向，因爲這計劃將鞏固英國在遠東原有的地位，而日本帝國主義本身，又要求承認牠對整個中國的霸權，並且特別主張排除英國對中國金融的支配。因此，日本攫奪了滿洲與熱河的鹽稅與關稅之後，必然要進一步攫奪華北同樣的稅源，大規模地毀壞了英國在華的金融霸權。」

「美國居於中立觀察者的地位，正密切注視着英日兩國間的鬥爭，因爲牠不滿英國的獨佔的借款計劃，現在牠故意等着，到了英國爲排斥日本，被迫把掠奪品分出一部給美國的金融資本家時，美國將挾着自身的條件，即保證美國的投資足與英日兩方抗衡，而加入進去。」

目前日本所作的軍事干涉，終已把英國在中國沿海的基本地位完全推翻，連香港也已陷入重圍。美國呢，還是在爭取地位，不過牠足下那爭取的基礎，業已大起動搖，雖則英美目下還是採取「中立的」和「不干涉的」政策。另一方面，日本却在中國廣大內地中，陷入消耗戰的泥沼，要不是放棄軍事侵略，和放棄把中國變爲日本軍閥的

「反共的」軍事殖民地的計劃，牠便無法解脫。英法之向日本提議，以慕尼黑式的「和平」來鞏固日本的軍事征服與穩定她的侵略，其實不外是遠東帝國主義競爭史上的另一新頁罷了。如果這陰謀得以成功，那就是另一次劃分中國的，軍事干涉與金融干涉的聯合。然而這陰謀既不能停止中國的抗戰，也不能阻止日本帝國主義者繼續消耗牠的軍力與資源，直至牠在亞洲大陸上蒙受悲慘的失敗。

一九二五——二七年反對腐敗的北京政府與反對帝國主義的大革命，其目的就在打倒各國的金融干涉；這干涉表現於不平等條約，治外法權，租界，租借地，海陸駐軍和對中國稅源，海關和稅率的控制。一九二七年統一戰線的破裂與革命的中斷，又表示對這種金融干涉制度的妥協。事實上，這干涉的主要原因，大半由於國共兩黨的分裂，以及隨後的內戰與反共戰爭，與乎對民族革命民衆運動的高壓。這是帝國主義的金融干涉制度戰勝中國的革命結果，終於鼓勵了日本於一九三一年進而用軍事干涉侵犯滿洲。至此，又是金融干涉的制度，使中國採取不抵抗政策。當時，隱在不抵抗政策之後的主要勢力，乃是英國，牠是盼望與日本妥協的。對日本的侵略不作抵抗，就是讓中國的命運爲敵對的各國，爲軍事干涉與金融干涉間的競爭，以及他們間的新交易所決定。事實上，目下英國的政策，還是懷着與日本作交易的目的，雖然日本獨佔整個中國與遠東的野心，使英國不能不在某一定度內援助中國的抗戰，以強迫日本在中國的「新秩序」中，給英國的金融資本留下一些地位，抗日民衆運動的興起與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已使中國不再被帝國主義列強的交易所犧牲。在新軍事進攻的情形下，此種交易只有使中國分裂，並在另

一個銀行團的援助之下，使軍事的與金融的干涉，重歸於統一。中國的抗日戰爭，就是阻止此種計劃的實現的最堅強的力量。雖然目前的戰爭僅在抗拒日本的軍事侵略，但就歷史上說，牠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繼續，是中國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鬥爭的繼續。日本侵華戰爭的徹底潰崩，只有在中國的抗戰獲得最後的勝利，只有在獨立的自由的免除了軍事的與金融的干涉的中國建立之後，方才到來。

對華的金融干涉的歷史，是由軍事干涉開始的。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武漢革命的國民政府的宣言，就指出這一事實：

「在華的國際管理制度（即通稱為帝國主義）必須剝奪中國經濟上司法上和政治上的主權，使中國失去真正的和充分的獨立；這制度是從一八八四年英國以南京條約羈縛中國之後開始的。因此，就真正的意義上說，剝奪了中國的獨立的，乃是在鴉片戰爭中擊敗了中國的英國。在這黑暗事件之後出生的當代的英國人，也許記不清這事情，但皮肉上擦下了失敗的烙印的民族主義的中國，却必須記住牠。」

這一制度，直到十九世紀末年，由於滿洲朝廷對中國的壓制，和英國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亞洲的可說是獨佔的支配地位，而充分壯大起來。當時，最強大的金融國家英法，以賠款、借款，要求租借地，特別是要鐵路建築權等，獲得了控制所謂中國政府的地位。美國因為落後，要求在「門戶開放」政策之下，大家「機會均等」，英法為對付牠這干涉，便提議組織五國銀行團（英法日俄美），但美國拒絕參加，因為英法實際上又供給了俄日兩國的股份。

這銀行團，只有在排斥美國，和保護英國對中國公共收入的控制，與對中國政府投資的獨佔所必需時方才有效。因此英法日與此一銀行團的關係，便於華盛頓會議時告終。此後美英法日共同參加而由美國領導的「新銀行團」又告成立。但因為英國繼續維持現狀，也就是說，英國仍然控制中國政府各債務的主要保證，保留這些主要稅源以爲償還英債之用，這一「新銀行團」終於又告流產。最近英日間所成立的中國海關協定，也是在日本承認以關稅基金償還歷年來以關稅爲保證的各項借款之後簽訂的。爲着交換此一條件，英國便把日佔領區各海關的稅率 and 主權，完全送給日本。我們從這協定中，也可以看出，英國已準備參與另一個金融的銀行團，不過這團不唯包括日本，而且爲日本所領導，而分出有利的部份給予英國的金融資本家。

然而日本的態度，却是盡量攫奪在軍事手段與武力壓迫中所能奪得的各種地位，並且把所有此類問題的談判，擱到中國「新秩序」建立「和平」恢復之後再談。中國境內所有由外資建築的鐵路（主要是英國的），在戰事剛一開始，和在戰事整個期間內，都被日方當作戰利品。華北中各鐵路的管理權，統統交給南滿鐵道會社的附屬機關，而這些鐵路的資本，有一部份也已作爲新設的日本「開發」會社的資本。在華北開發會社的資金表中，有三八、四〇〇、〇〇〇日圓，原爲華北中國鐵路的資產，現已作爲日本政府所供給的股份。京滬鐵路的英國債權人，甚至連視察該路也爲日方所拒絕。依照一九三六年會計年度的官方數字，中國各鐵路所負外債，除日本的外，共計八萬萬元，其中有六萬萬一千八百萬元是用英金結納的，也就是英國的借款。

日本爲着根本推翻各國對華貿易的全部基礎，又發動一種反對中國政府與排除各國貿易的貨幣戰爭。上面我們已經說過，日本在華北的企圖，跟在滿洲國一樣，是立刻設立與日圓聯繫的貨幣，在軍事侵略的環境下，盡量耗用最少的真正資本，而獲得最多的中國金融準備。至於在上海與華中佔領區，却被迫施用比較緩進的方法，因爲上海強大的外國銀行——主要是英國的——擁有支配的地位，同時他們多少又與主要的中國銀行（政府的與私人的）互相合作。日軍當局與「維新政府」開辦了一家有權發行紙幣的所謂「華興銀行」，其所發行的紙幣，不與日圓聯繫，而跟中國法幣一樣，與外匯發生聯繫，並可以提票向「華興銀行」兌換。「華興」發行的紙幣，跟在華中日佔領區以刺刀強迫行使的那些不能兌現的軍用票與日圓票比起來，數目實在小得多。一九三九年九月三十日，「華興」的報告指出牠的紙幣流通額，只四、〇三五、三五〇元。目下日軍當局，「維新政府」，各海關和「華興」本身，都在竭力使「華興幣」的信用與流通額增加。他們的目的，是首先以行政的方法，強迫普遍使用，以提高「華興幣」的信用。直到在華中佔領區內，「華興幣」成爲唯一通貨之後，不久一定要漸漸脫離外匯，而與日圓相聯繫。

讓我們把英國在印度的通貨戰爭，與這作個比較。英國當時所用的方法及其結果是這樣的一八九三年，印度造幣廠都停止鑄造銀幣。在一個長達數十年的期間內，印度的羅比漸漸脫離以前的銀本位，而與金鎊發生聯繫，最後終於由皇家批定，每羅比合爲一先令六便士。這比率，直到一九三一年英國放棄金本位時，仍然保持着。這樣，印度

的羅比成爲英金的一個單位，這就是說，印度的銀幣或紙幣與英國金鎊的某一金額相當，其匯率爲英格蘭銀行所規定。英國的目的是把印度納入英金流通範圍之內，而把印度紙幣的準備移到英國去。爲達到此一目的，英國用了很巧妙的方法，這一點，在布洛克衛（Berner Broekway）所著的印度（India）一書中，曾作如下的說明：（註）

一九二七年，英國皇家批定的羅比匯兌率爲一先令六便士。印度金融界、商業界和實業界的領袖則要求將匯率改爲一先令四便士，以適應市場的價值與印度經濟的利益。又有一部份印度的資產階級，反對羅比與英金聯繫，要求將印度幣制改爲金本位，而由印度國家銀行的力量加以支持。然而英國拒絕所有這些要求，仍然定爲每羅比合英金一先令六便士，這就是說，給英國輸入印度的進口商以二便士的貼水，藉以補償彼等因提高保護稅所受的損失。作者布洛克衛訪問印度之後，即在該作中指出，每羅比合英金一先令六便士此一匯率的保持，一給印度的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幸的結果。由此……印度金準備之外流竟達二千四百萬鎊。〔孟買印度總商會秘書密打（J.K. Mehta）會說：「政府的金融政策之決定，獨未顧及印度的利益。」〕

這種轉換的最後結果，使羅比只成爲內國的流通手段，在國際市場上，牠不是一種匯兌單位，而是依蘇格蘭銀行所規定的英金的某一定額計算。因此蘇格蘭銀行成爲印度銀準備的實際佔有者，而羅比在國際市場上流通的準備金，就全受蘇格蘭銀行的控制。但最重要的是羅比價值的規定，完全以英國資本與商品的輸出利益爲歸趨。上

（注）見 V·E·布洛克衛所作印度特勒斯坦一九三一德文版。

述匯率的規定，已給印度的英國廠商以二便士的額外報酬，而此種特惠地位的獲得，顯然犧牲了印度的民族經濟與金融。印度政府的財政部是歸由倫敦支配的，英國殖民地的金融，貨幣與貿易，只作為大英帝國的金融主人的資產罷了。

日本在中國佔領區所作的貨幣戰爭，其目的跟英國在印度所推行的並無不同。但中國的抗戰，結果也必擊退日本的貨幣戰爭，不僅在整個自由中國，就是在大部份日佔領區內，不管經過二年餘的戰爭和在被佔領的情況下，法幣仍然是真正的和自願使用的通貨。（關於這一點，我將在下一章中詳細論及。）

日本竭力想在中國佔領區建立的殖民地制度，以及在目前戰爭中所採用的，征服、毀滅、掠奪等的殘酷野蠻的方法，都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戰爭所特有的目的與方法。許多作家與記者（特別是英、法、美三國的）在敘述日本的侵華戰爭時，時常使用「全體性戰爭」（Totalitarian War 即全面戰爭）一語，說這是一種新型的戰爭與征服，為法西斯國家所特有。其實，歷史的真理明白地告訴我們，一切為爭取殖民地，或為建立殖民地帝國的戰爭——包括英、法一類的所謂「民主的」殖民地帝國——都是全體性的戰爭。所有這些戰爭，都要毀滅一切足以危及征服者的民族抵抗力，包括軍事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各個方面。所有這些戰爭，都為着掠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

國的資本，把極蓄積在征服者手中。東印度的征服，就是一個大規模劫奪的過程，非洲的征服，也給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完成大批黑人奴隸的供給。而侵華的鴉片戰爭，就是這些爲建立歐洲世界王國所特有的戰爭的「現代」的續作。

馬克思在第一卷資本論中論及「原始的蓄積」時，會引用惠特（W. Hewitt）一八三八年論述基督教的殖民地制度的著作如下：

「任何其他人種，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不管怎樣兇猛，怎樣鄙野，怎樣殘酷與無恥，決不能和所謂基督教人種，在世界一切區域，施之於一切他們能加以壓服的人種之上的野蠻與慘酷的暴行相比擬。」

就我們所知，惠特是錯了，因爲目前日本的侵華戰爭，是足與「基督教的殖民地制度」相比擬的。

馬克思還引用爪哇副總督拉佛來（T. S. Raffles），一八一七年對荷蘭（是十七世紀模範的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統治的敘述作爲保證，指出牠是「背信的，賄賂的，屠殺的和卑鄙的最極端的敘述。」亞洲境內，凡是荷蘭人佔據的地方，全都破碎荒涼。荷蘭是第一個充分發展殖民地制度的國家，遠在一六四八年，牠已達到了牠的巨大的頂點。當時，牠差不多獨佔了東印度的，和歐洲東南與西北間的全部貿易。荷蘭的捕漁業，商船業和製造業，也凌駕當時其他各國。荷蘭的資本，「大概超過歐洲所有其他各國的總和，」但當時荷蘭普通民衆的「格外貧困，格外過度勞動，以及格外遭受野蠻的壓迫，也超過歐洲所有其他各國的總和。」

大不列顛帝國的創立的「光榮」時期，跟日本在華的「全體性」的方法，也有顯着的類似！馬克思曾作如下的敘述：

「如衆所周知，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不僅在政治上支配印度，而且絕對獨佔茶葉貿易，一般對華貿易和來往於歐洲的商品運輸事業。但印度沿海的各島間的，和印度國內的貿易，則爲該公司高級人員所獨佔。食鹽，鴉片，椒葉和日用物品的獨佔，乃是無窮的富藏。東印度公司人員隨意規定價格，無情地剝削不幸的印度人。印度總督也參加這種私有的貿易，他的親信們在白手致富的條件下接受種種的契約，因爲他們比點金術者還要聰明得多。於是財運如草的滋生，原始的蓄積不須一文本錢而日趨擴大。」

日本人以經過獨佔和規定價格，收買華中食米，再以極高價格賣給沿海華人的方法，也是模倣英國在印度的方法的。在資本論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敘述：

「在一七六九年和一七七〇年，英國以收買食米，和拒絕用平價出賣的方法，造成了一次飢荒。一八六六年，單在印度的奧利沙省，就有一百萬以上的印人處於飢荒。但他們還想提高賣給飢民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來增加印度國庫的收入。」

當我們讀到下面一段時，便會想起日本在華中所作的瘋狂的毀滅與掠奪：

「自然，對土人最殘酷的特遇，是強迫他們種植專用以輸出的東西，在西印度羣島就是如此；至於對富裕

和人口稠密的國家，如印度與墨西哥，則直接進行掠奪。」

這些真正的「全體性」的侵略與征服，其成就是什麼呢？馬克思曾作如下扼要的說明：

「在殖民地制度之下，商務與航務的成熟，有如溫室裏的花朵。特許的公司，都是促進資本集中的強有力手段。殖民地則給發達的製造業以廣大的市場，而這一市場的獨佔，又加強了累積。在歐洲之外，由直接的規奪，奴役，搶殺所得到的資財，像河水一樣的流向母國來，又在母國轉成了資本。」

——當代的大金融公司，如日本的三井，三菱與大藏省，倫敦與垣街的銀行家及其國際財團等，都是整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歷史中累積的財運的產物。他們都是他們的模範者的後身，並且繼承着後者的精神與傳統：

「因此，威尼斯的掠奪制度的罪惡，正是荷蘭的資本財富的祕密來源，猶如腐敗的威尼斯以大批的銀錢借給荷蘭人一樣。荷蘭與英國的關係，也是如此。……由一七〇一年至一七七六年，荷蘭貿易的主要部門之一，就是貸出巨大數目的資本，特別是借給牠的主要敵手英格蘭。今日英格蘭與合衆國的關係，又復如此。出現於美國而沒有任何身世證明書的大批資本，正是昨日英國那未長成的資本主義的血液。」（馬克思）

目下日本在華的侵略戰爭，是用着美國——日本的大敵——的軍火與原料的。在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屠殺中，形成了那巨大的「戰爭商人」的托辣斯的美國金融資本家，在遠東戰爭以及在歐洲新帝國主義大戰中，還是遵從着上述這一傳統。最後，英美兩國的金銀資本，又都在高昂利息和安實保證之下，歸由日本處置，正如

英國資本之由美國辦滯，荷蘭資本之由英國處置一樣。

今日日本在華所用的一「拓殖」方法，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剝奪殖民地民衆的海盜方法，和二十世紀的，併合金融資本與獨佔托辣斯的組織，俾使軍事侵略資本化，俾迅速地強烈地剝削殖民地人民與資源的方法併合而成的。這裏，在壓迫力量的組織與集中上，是「現代」的，但牠的國內的根據，却是對農工的半封建的剝削，牠的任務是使日本民衆與被征服的殖民地與民族，永遠同處於野蠻的壓迫之下。此外，這侵略又是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的東西，因為日本目下所企圖的，正是牠的歐洲敵手早已獲得了的。

日本的軍閥與帝國主義托辣斯，竭力想把中國變成爲另一個「滿洲國」。他們的目的和計劃，就是把中國拉退幾個世紀，徹底毀壞中國民族生活的基礎，在極短期間內，以獨佔中國全部的貿易與資源，以併吞中國的資本與企業等來大大地累積牠的財富，並迫使中國無限的人力來代日本勞動，爲日本的軍事機構服軍役。中國已不僅是日本侵略的目標，而且整個變成了日本在亞洲大陸和太平洋進行侵略與擴張的戰略根據地。因此，爲着使日本軍需工業的軸輪不斷旋轉，牠採用了最殘酷的最原始的剝奪殖民地的方法，同時，中國大幅的領土，也被任意分割，用作爲戰略的領土和日本軍需工業與重工業的附加的根據地。在日本目前的侵華戰爭，與當代歐洲各殖民地帝國「過去」所作的殖民地戰爭之間，其唯一的分別，僅在於日本目下是用機械化的部隊，用高度結合的金融資本的組織，金融的和工業的同業組合與托辣斯，巨大的獨佔組織（如南滿鐵道會社，華北開發會社與華中振興會社

等)而已。但以二十世紀的革命方法組織起來的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華民族，定將擊潰這帝國主義的怪獸。

## 第四章 建設與抗戰

日本對華的侵略，已把中國大半的近代工業摧毀了；這些工業，主要集中於各通商口岸與沿長江一帶。在戰前，這些通商口岸以及由沿海至內地的鐵路與水路，都是中國對外貿易唯一的孔道。世界與中國間的航運業務，全部操在外人手中，中國沿海與各內地通商口岸的航運，也大半爲外商的投資所操縱。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地位，中國各重要的港口以及各交通工具，都是外國資本，利益和特權的混合物。在各租界之內，所有的外人就像一個龐大的大家庭的成員，他們在業務上互相競爭，但在對抗外來的威脅時，却團結一致，這外來的威脅就是獨立的中國，也就是真正的中國民族經濟。

各通商口岸因有特殊保護的地位，招來了中國內地的和華僑的資本，促成了商業的發達和中外銀行存款的增加，因此，牠們也成了中國資本集中的焦點。這些資本的出路，大半在購買中國政府的債券，從事國外貿易，買辦業務，和地產投機，這就是說，華人資本走着國外資本在中國所走的路。在這種環境之下，很少有人從事工業投資，致此項投資的發展異常遲緩，一九三五年六月，即在白銀收歸國有之前，單上海的各華商銀行庫存白銀，已達二九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及至中國獲得部分的關稅自主權，進口稅的提高稍能保護中國的民族工業，各大銀行，也正在

找尋新的投資出路的時候，日本大規模的走私，外國工業在各通商口岸內部的競賽，又使中國工業的危機日深，金融日趨衰敗。此外，大部華資之由內地流入上海，也阻礙了內地工業的發展，而各通商口岸的工業活動，又都備受限制，因為當地的行情只有利於中國資源的輸出，甚且包括金銀的輸出在內。據中國銀行的估計（見一九三四年該行年報），同年中國白銀的輸出，約達流通銀幣的六分之一。在同一報告中，曾清楚地指出，通商口岸與各國租界的存在，使中國既不能保護牠的金銀準備，也無法平衡牠的對外貿易。又說，中國根本無從利用各種防衛的手段，諸如「禁止金銀的出口，貨幣的貶值和貨幣準備的集中，匯兌的控制或貶值以及匯兌的結劃，關稅的提高，進口的限制，以至互惠的貿易。」同報告接着又說：

「中國貨幣的不統一與發行紙幣的紊亂，銀幣之無法集中與儲積之無法阻止，匯率之無從控制（匯率大部份為外商銀行所規定，而此等銀行既享有治外法權的保護，又設於非中國法令所及之商埠，）都是這些統制手段的巨大障礙。由於中國的國際關係的現勢，牠目下尙未享有規定稅率的充分自由，也無從有效地統制各項進口的貿易。」

日本對華的軍事侵略，首先即以主要通商口岸為其對象，但那些有關的列強，那些打開中國門戶的戰士，都採取「中立的」和「不干涉」的政策。這政策使各通商口岸做了侵略軍的虛幻的樂境。集中於各通商口岸內部的中國工業，與外國投資，都已歸由他們控制。這些前時可說是中國境內最為安全的區域，現在已因租界當局的「中

立」而成了最不安全的地方。日本軍閥自然毫不躊躇地充分利用和濫用外國的特權，使租界成爲華軍不得進入的「非武裝區」，藉以控制租界，便利他們的侵略。華軍在各主要通商口岸的防務，既因各國在界內的特權與駐軍而大受限制，日軍就利用了這些限制，把各租界作爲牠的軍事行動的根據地，獲得了極大的便利，而且永遠不用害怕各國會與中國合作，共同抗拒日本的軍事佔領與統治。他們所要做的，就是「接管」中國各通商口岸的整個組織，依照牠的「戰時需要」改造牠們，直到外國的權利盡歸烏有，日軍的統治確實建立而後已。各國的「不干涉」政策，不僅在日本搜奪各通商口岸時，與以極大的便利，甚至在「綏靖」租界，創立經濟統制和設立傀儡政權時，還給與更大的支持。日本侵略者的確應該大大感謝這些「中立的」國家，一九三八年九月W·B·平奈爾氏在遠東事件所發表的文章，便是一個證明：

「日本或將無法控制內地鐵道線外的地區，但他們可以支配海關與各通商口岸……」

謝謝不抵抗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在滿洲佔領區內，已可以比較迅速地建立軍事的和經濟的控制，以及設立傀儡的政權。然而滿洲的義勇軍，在日軍佔領後許多年中，還不斷由邊界或山區進擊，一直英勇地抗戰到現在。這一事實，證明日軍今日在中國所遇的困境，將因中國的全面抗戰而重現於滿洲。今日滿洲的情形，大概跟華北游擊隊所控制的內地，如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山東等省鄉間的情形，沒有什麼不同。日軍之所以能够比較容易地征服滿洲，比較容易地集中優越的武器與兵力，以進攻自動興起和各別作戰的義勇軍，完全是由於不抵抗的政策。而這不抵

抗政策的教訓，也正說明着今日各國在中國沿海，特別是在各通商口岸所處的地位。

日軍佔領軍所建立的中國傀儡政權，都以各個被佔領的通商口岸，如天津、上海、漢口、廣州等處爲他們的「據點」。在日軍刺刀保護之下，在各「中立」租界當局默認之下，這些傀儡政權已「應許」日本作經濟的獨佔。他們依照日軍的意旨，頒佈各種法律與條例，用以毀滅日本的一切競爭者的條約特權與貿易。他們攫奪了一切能够奪到的中央的和地方的稅源，特別是——托庇英日的海關協定——關稅的收入。在各通商口岸所收到的中央的與地方的稅款，如關稅、釐金稅、鴉片稅以及一切可能收到的地方稅，成了維持傀儡政權的性命的主要金融基礎。各有關「中立」國家對日本製造的傀儡政權一再退讓的結果，弄得非日本的貿易須付特稅，使中國漢奸和傀儡獲得了活動的費用。

北平的「臨時政府」，南京的「維新政府」，大上海的「大道市政府」以及其他類似的傀儡組織，其最初的任务，就是修訂海關等稅率，並安插所屬爪牙以「控制」被佔領區所有各通商口岸的海關。日本方面，則以藐視海關，免稅輸入大批日貨，以強迫英國支配的海關當局，承認各傀儡政權是「事實上的中國政府」。同時，各傀儡也受權徵收由各租界輸入日本佔領區的貨物的釐金，收捐處就設在租界的邊境，凡是批販貨物或是購買用品的人，都須繳納。當英國讓步之後，日本至此又獲得另兩項戰利品，一是海關的控制，一是外國的認識傀儡政權，在日本進攻各國貿易和各國租界的運動中（這運動現在已經是「合法的」了），這兩件正是可怕的武器。

在中日戰爭之前，由滿洲、冀東傀儡政府和天津日租界輸入的鴉片與毒品，充斥華北一帶，及至各通商口岸被佔之後，他們又在人口稠密的租界中，設立新的販賣鴉片的中心，隨後又把這買賣擴張至沿海和長江一帶的日佔領區。自從日軍佔據天津之後，當地的日人韓人，開設了許多家鴉片館，並設立了一家「中日藥品製造廠」，資金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文報紙還說牠有供給「華北」中所需要毒品藥品的「生產力」。上海區內，鴉片的輸入，海洛英和其他毒品的製造，鴉片與其他毒品的公賣，更異常發達。當地傀儡人員，還組織了一家鴉片運輸販賣局，由官方設立的煙館公賣鴉片，並收斂鴉片稅，而這些公賣和收稅的組織，竟美其名爲「禁煙局」！據傳法租界當局會接得巴黎的訓令，因爲日內瓦的「禁煙委員會」會要求法政府以賤價方法，禁止界內毒品的買賣。在長江下游一帶佔領區內，已開設的煙館，爲數達數千家，而自從英日海關協定簽訂之後，一直就沒有聽到海關官員查獲入口鴉片的消息。但日本輪船之運載大量鴉片開入上海，並由當地傀儡政府代表派員保護，却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在通商口岸之外，傀儡政府甚至連徵收稅款以「保護和平與秩序」的威信也沒有。平奈爾氏在一九三八年八月的遠東事件月刊中，曾說到北平的「臨時政府」只能徵收中央的稅源，而無法收斂地方的捐稅。同作者在同文中還說，老傀儡偽山東省府主席馬良（八十一歲）曾對訪問他的美籍記者說，在山東一省之內，差不多有一百縣仍在作戰。省內所有的中國人，都牢牢地記着「代日本人做事就是漢奸」這一觀念。這老傀儡接着說，清除這種觀念，就是華北「政權」當前最困難的工作。

華北內地這種形勢，使日本擴展華北植棉，俾日本紡織工業的需要能够自治的計劃，完全無法實現。日方本來計劃在十年之內，使華北的棉花能年產一萬萬擔。但一九三八年華北棉花的產量，却僅有五百萬十萬擔，只及戰前華北產量二份之一。一九三九年的收成，據說更加慘淡，還不及一百萬擔，其主要原因，一半是由於游擊軍阻止人民把棉花賣給日人和日人的獨佔商行，卓著成效，一半則由於同年華北的水災，據華北各英籍記者的報告，日軍當局對此項的水災頗爲滿意，因爲他多少解除了游擊隊給他們的威脅。由此一點，就可以看出日軍開發華北內地計劃之難以完成，和他們的傀儡政府的澈底失敗了。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北平「臨時政府」會作發表如下的宣言，「和平」的呼籲，其中有說：（大意）

「我國東鄰，因與我等唇齒相依，業已興起義軍，清除我國敗類……」

「日本國內多數人士，均能明瞭真相，雖在軍刀揮舞之時，仍毫無征服之念。即在國民黨內部，當必有人也能認清世界，願意結束刻下尙在進行之戰禍。只須彼等自認錯誤，聽任前輩收拾殘局，共圖國內秩序之恢復，則彼等此種東方傳統精神，仍爲我輩所敬重……」

「在國民黨內部，當不乏顧念國家利益之士，即北方軍人，也仍統率彼等之部屬。彼等何不翻然率兵，回歸故鄉？至富有道德經驗之學者，也應毅然北上。只須擁護我人之觀點，縱使彼等會爲國民黨之黨員，也必與以適當之地位。」

這一宣言，明白地表現出日本傀儡對各通商口岸的「中立」列強，雖然神氣傲然，但在對付華人時，却又是怎樣的孤立無助。華北內地的真正統治者，仍是國民政府，執行政府法令的，就是第八路軍（牠由國共合作的政策所產生）所組織的抗日人民武裝部隊。平奈爾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份遠東事件的通訊中，就證明了這一點：

「在日軍佔領區內，在遠離主要交通線的廣大地區，由於分別的反日行政權的建立和自身的經濟制度的創設，現在一個全新的形勢正在逐漸創立中。」

華北內地有組織的中國民衆所作的這種鬥爭，證明日軍在各通商口岸的成就，並不能支配中國整個的內地。牠也證明「中立」列強對日軍征服的默認，以及各國租界當局對傀儡政府的默認，還不能使日軍戰勝中國民衆的堅強的抗戰。平奈爾氏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號遠東事件中，就會敘述日軍在各通商口岸的地位，與內地中國的抗戰兩者間互相抗爭的情形，他說：

「同時我們正目擊，在松岡洋右（南滿鐵道會社總裁）的構成中國百分之八十的觀念——指港口，鐵路和沿海區域等——和共產黨相反的觀念，——他們堅持構成真正的百分之八十的，乃是內地廣大的田地與無數的農民大眾——之間，正陷於僵持的狀態。設使內地充分強大，組織嚴密和配備充分，那麼各鐵路的交通，必定要比現在還要困難得多。目下這情形，也許可以再保持六個月，說不定還能保持到一年，但臨末必定是極難維持的。此刻那些重現的部隊正在繼續組織民衆，和鞏固他們在內地的地位。他們主要的困難就是軍火

的接濟，雖然這決不是不能解決的。」

日本遠征軍雖然跑過了，劫掠了和蹂躪了中國的許多省份，然而他們不唯沒有征服這些地方，甚至連有重兵扼守的城市與主要交通線，也不安全。真正的民衆的抵抗，大半只在日軍佔據了這些省份的大都市，鐵路線和公路線之後方才開始。同樣，日軍雖然竭力毀壞他們所能加以毀壞的中國工廠與資產，但在那些名義上已被他們征服的省份中，他們却無法征服中國的經濟組織。相反地，只有在他們着手毀滅中國整個的經濟基礎時，中國反侵略的經濟抗戰，方才認真開始。當侵略的，劫掠的，和蹂躪的大軍逐漸移入內地時，中國經濟的和軍事的抗戰，不僅沒有失去力量，反而日見加強。

日軍既佔據了中國各通商口岸，集中在這些區域裏的外國利益與投資，都只有破滅一途。中國的資產與企業，因爲比外國的遭受更甚的毀壞與掠奪，所以犧牲也最重。然而中國工業的損失雖極重大，牠還可以在中國其他區域內重建，目下一個新的健全的民族經濟正在建立中，新的中國民族工業，已不再像過去一樣，建在沙一樣的半殖民地地基上——建在各國「保護」的通商口岸上了。由內地根據地所領導的統一的抗戰，是民族建設的，也是爲收復失地而作的鬥爭的基礎。

日本以爲佔據了中國政府的金融中心上海之後，必然毀滅了中國統一的幣制，而其影響，不僅及於前時爲通商口岸支配的省份，且將波及於內地各省。但戰爭却證明了國家的統一，乃是統一的幣制的唯一堅強的基礎。由於

舉國的統一和全面的抗戰，中國的貨幣、金融、和經濟，在戰爭期內，已大大地擺脫了通商口岸所加的限制的與破壞的影響。

因為中國的民族革命的統一，在國民政府的轄區下，國內貨幣市場將不管抗戰繼續至何時而始終統一。就像任何獨立統一的國家一樣，中國政府在民族統一戰線幫助之下，可以絕對保證政府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在牠的轄區內，乃是貨幣流通的唯一手段。這種成就，在舉國一致抗戰的條件下，不論是侵略者的武力，抑或是牠的投機陰謀，都無從加以損害。相反，貨幣的和整個民族經濟的範圍，因為有了防守與保衛，將更加統一，更加密切，以對抗外來的破壞和進攻，同時，還可以依照抗戰的需要，由中央的政策加以操縱和調整。在這種條件下，法幣在國內的穩定，和民衆對法幣的信用，已不再完全倚靠金銀的和外匯的實際準備了。全國的統一與抗日的戰爭，已成為政府及其金融政策的威信的基礎，而政府為着挽救國家危亡，必須採取緊急措置時，民力的巨大供給與動員，也完全聽任政府支配。因此，中國政府就可以限制外匯的流出本國，阻止資本的大量逃亡，並吸引淪陷區的資本移入穩妥的內地。在對外貿易的範圍內，牠可以借藉種種統制的手段，以限制不必要的進口，以保持出口，達到國際收支得以平衡的程度，或暫時停止外債的償還或爭取國外的物品信用貸款。保證法幣的金銀條與外匯，可以減少或甚至動用，另以不動產代替牠，而不致危及國內的幣制。為着保證法幣的穩定，可以使流通紙幣的總額，始終適於國內物品交換所必需的程度。政府還可以發行由各地的準備所担保的紙幣。牠還可以避免大規模的通貨膨脹，在中國目前的情

況下，過份的通貨膨脹，將使日佔領區中法幣與日幣所作的戰爭大受障礙，並足以損害政府對外的信用，影響自由中國對外的貿易，和降低法幣在國際匯兌市場上的價值。中國政府的金融，雖因日本的攻擊而現出相當的緊張，但如果中國的統一團結，在戰事期間內能繼續增強，足以保證金融的真正集中和統一的貨幣政策的話，那麼中國所操縱的貨幣制度（這是到一九三五年才實行的），決不會發生嚴重的危機。中國幣制的統一，在戰事期間內仍很鞏固，而目前甚至比戰前還要堅強，這一事實正是對中國民族統一的力量之試許。

在中國經濟防禦戰線上所作的最重要的戰爭，就是保持法幣的穩定及其國際價值。前者是保證中國法幣成爲日佔領區，各通商口岸和內地的主要流通工具的條件。爲達到此目的，中國貨幣政策的原則，就是保存外匯的貨幣準備，和盡量平衡中國對外的收支。自從一九三五年幣制改組以來，中國法幣是以金條和存儲於國外（主要是紐約與倫敦）的外匯的準備爲基礎的。因此必須阻止中國貨幣的巨額的逃出，以免耗竭中國的金條和外匯的貯藏。

這一類陰謀的唯一來源，就是日本和日本控制的佔領區。中國政府要對抗這種威脅，決不能把法幣撤出日本佔領區，因爲這樣將促成日本將佔領區括入日圓集團的計劃。當華北傀儡政府設立後，日本爲吸收法幣並強以偽鈔代替而創設了「聯合準備銀行」的時候，中國政府當於一九三八年三月舉行反攻，把中國法幣購買外匯的業務，全歸中央銀行獨家包辦。這新條例規定，在中國政府直接控制的區域內，只有中央銀行有權以中國法幣購買外

匯。爲便利在日佔領區流通的，特別是在各租界中（如上海、天津）流通的法幣購買外匯起見，中央銀行又在香港設一通訊處。中國所有的銀行，不管其爲華商或外商，假如不能由其他銀行直接購得外匯的話，必須經過中央銀行才能代他的顧客購得外匯，同時，此項購買，只在從事正當業務和唯一必需時，始能供給，因此，要求購買外匯的銀行，必須提出清單，確實說明該項需要外匯的業務。

日本破壞中國通貨的運動，是從華北開始的，牠企圖收回所有流通的法幣而以毫無準備的偽鈔代替，然後以法幣的外匯準備金來支持華北發行的偽鈔，並在上海、香港等處，拋出大批的法幣，來破壞後者的穩定。爲着打破日方此一計劃，中國政府被迫封鎖此項陰謀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各個出口。如天津、上海和香港。中國政府當前最重要的問題，乃是保護直接的統治區內法的健全，至於天津、上海、香港等處，大半的法幣都在公開市場上，當然只好當作日本用以破壞中國法幣的地區看待了。

上海各外匯銀行對此的反應，就是破壞他們與中政府財政部間的紳士協定，也就是說，他們已違反了出售外匯不在中央銀行所定匯率之下的諾言。自此之後，上海法幣易外匯的匯率，便爲市場上要求與供給的關係所決定。當這種要求，大半爲日本損壞中國貨幣的陰謀與乎瘋狂的投機所決定，而中央銀行又拒不與他們「合作」時，中國貨幣便在上海市場上跌落了。不過這種跌落，影響於上海貿易者重，影響於法幣的準備者輕。

上海的英國銀行與公司以及他們的倫敦的總部，對中國政府未曾犧牲中國貨幣的準備，以尊重英國在上海

的利益，大爲不滿。他們警告中國，說這種手段已損害上海英國銀行與商家的利益，並且結果已幫助了日本。但事實上，日本却利用上海的外國租界（控制租界裏的外匯市場的，主要的是英國銀行）作爲拋賣法幣的中心。不論是各國當局或是強大的銀行，都不會起來對抗或限制這些競搶上海所有的外匯的投機。英國銀行是「中立的」，只要中國政府不干涉這「自由的」奪取中國貨幣準備的投機陰謀，而中央銀行也照樣供給上海所需的全部外匯時，牠也保持官方的匯率。但到了後來，倫敦金融家看清了，在匯率上幫助中國法幣以對抗日本的壓迫，於英國本身大有好處，於是牠就創設了中英平準基金。一九三八年年底，美國也決定增加對華的信用貸款，俾增加中國在美的金準備和平準法幣對美的匯率。與英美兩國援助中國法幣的「平行」行動同時，兩國政府又決定以信用貸款給予中國，俾中國能在美英兩國購貨，而以未來中國輸出的原料抵償。這些借款顯然是企圖鼓勵中國的抗戰的。因此日本對之大爲不滿。截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北平「聯合準備銀行」所「收集」的中國鈔票，並業已運至上海購買外匯的，已達四千萬元。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底，由中央銀行批准的法幣流通總額爲一、七二六、九九八、〇〇〇元，其中大約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在華北一帶（包括日佔領區內外）流通。依據天津的統計，中國法幣在華北流通的，總額爲三三八、二九六、五〇五元，然而這是不能視爲總數的，因爲中國貨幣的流入華北，不僅經由華北的各港口，而且還間接地由華中和西北各省流入華北的內地。「聯準銀行」企圖在三月初發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偽鈔。但這「接收」華北貨幣的計劃，恰在他們快要獲得大批外匯時，因中政府的統制外匯

而大受打擊。

日本在華北「收集」中國法幣的方法，在財長孔祥熙的聲明中會有如下的描述。這聲明發表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上海的金融與商業上，其中有說：

「華北至少有五種至六種的貨幣，由此就可以想像出當地那混亂的和可悲的狀態。首先就是日圓，名義上可換黃金。其次就是朝鮮銀行的鈔票，名義上可換白銀，但要兌現的話，必須到日本去。因此這些都是以刺刀強迫行使而不能兌現的紙幣。再次還有日方傀儡政權所設的所謂「聯合準備銀行」的鈔票，完全沒有準備，而由警察強迫使用。自然，此外還有中國的法幣，因為牠是良幣，都被中國人當寶貝一樣的藏起來。事實上，這些中國貨幣比日方的鈔票要多得一些貼水。」

中國控制外匯規例頒佈之後，日本的反應，就是發出一道命令，聲明中國紙幣「沒有交換價值」，聯準的鈔票才是華北唯一的「對外貿易的紙幣」。這些命令的收獲，據一九三八年九月號遠東事件上奈爾的報告，是這樣的：

「……聯合準備銀行的紙幣，在內地是不流通的，在像天津這樣的城市裏，牠的扣頭已增至百分之四。日本人力想以貶低法幣幣值的官方告示，來挽回他們的體面，但至今仍毫無成效。人們要外匯的，須先把聯準鈔票換成法幣——這樣，佔便宜的倒是當地的銀行與兌換商。」

日本的貨幣戰爭，目的在強迫中國加入日圓集團，劫奪中國貨幣的準備，以及獲取另一種武器來幫他們獨佔日佔領區所有的對外貿易。但日見增強的民族抗戰與統一團結，使得日本的金融陰謀無法滲入中政府所控制的地區。在反日戰爭中，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下，中政府控制的範圍——就是法幣也是一樣——已遍及全國，只有各港口南岸和沿海區域是例外。因此，日本強迫中國加入日圓集團的計劃，一開頭就遭失敗。中政府的貨幣政策，共有兩個目的，其一是把所有各省，都包括在被保護的法幣流通範圍之內，這一點業已大獲成功；另一點，即保護國外所有的外匯準備，也因中央對法幣的購買外匯施行統制，因而獲得保證。中國貨幣政策在國內市場上的成功，縱使國外未曾保有準備，也可以保證法幣在國內的流通，和牠的集中的統一制度，雖然此項舉措，可能使對外的信用受損。但中國政府在阻止法幣準備落入敵人手這一點上，既已獲得成功，也就保證了這些準備可以盡量地保持到適合抗戰的需要。中國方面這種成就，還大大地破壞了日本強迫通商口岸與日佔領區歸入日圓集團或使用與日圓聯繫的紙幣的企圖。因為各通商口岸與沿海被佔領區以及各交通線，既然依賴與內地的貿易，而內地（包括日佔領區域的後方）流通的和國內貿易主要貨幣，還是法幣，這就是說，內地還是在法幣的活動範圍之內。（註）日本

（註）平奈爾氏在一篇題為「被佔領的土地的再佔領」一文中，曾舉出一個例子，說明偽鈔在山東內地的情形，他說：「一個著名商人在一兩天前告訴我，因為抗戰部隊的統治內地，使濟南的商業業務，發生極大的混亂。人們不敢帶新聯華銀行的鈔票到鄉間去，因為要是被查到的話，就要被處死刑，因此他們不能不用各種狡猾的方法。」

雖在佔領區內，強迫華人接受他們那些僅在名義上與日圓聯繫的貨幣——如軍用票和不能兌現的日圓票——但這方法決不能毀壞法幣的信用，相反，只有降低了日圓在佔領區和國際市場的信譽。法幣在通商口岸之內，甚至在華北的通商口岸之內，其所以能夠對抗日方的陰謀與傀儡的法令，就可以由這加以證明。日本的金融戰爭，只有在一方面得到成功，牠已把這作爲打擊對外貿易與通商口岸內各國的利益的武器。牠幫助了日本的獨佔，在封鎖各租界上，又加強了日本傀儡政府及其軍事的、行政的和經濟的包圍，阻止了各租界與內地的對外貿易，更限制了沿海的對外貿易。日方這種成功，顯然應歸功於各國的「中立」政策。也即各國對日本的侵略及其貨幣法令與投機操縱的不干涉態度，以及對日本製造的傀儡政權的妥協。日本之建立傀儡政權，原來就是想把牠們，作了擊殺對外貿易與外國租界的「合法的」盾牌的。

中國政府除統制匯兌之外，又頒佈新的條例，以保證中國出口所有外匯，完全集中在政府銀行手中。依照這些條例，中國主要產品的出口商人，所售之貨，應以外幣計算，而取得的外匯，應賣與中國銀行或交通銀行，按規定之匯率換取法幣，俾將貨物運交「貿易調整委員會」。這委員會歸財政部管轄，負責改良運輸和出賣主要產品，並幫助出口商人在戰時情形下運輸貨物，又與各交通機關及海關合作，俾便利對外的輸出。此外，牠又咨照各政府銀行以信用借款幫助此種營業，並注意其收入外匯的售結事宜。

大半爲政府資本，並受財政部監督的四家銀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是國民

政府獨佔的貨幣機關。最重要的兩家，中央銀行與中國銀行，都直接歸財長孔祥熙與國民經濟委員會負責人宋子文分別管理。這四家銀行（共有的現金準備，總計約達二十五萬萬元）的地位，等於具有特權與國家獨佔性質的中央銀行托辣斯。在戰爭期間內，總行均移至重慶之後，這政府銀行的組織，已發展成爲包容政府的與私人的資本的巨大金融托辣斯，和集中民族資本的機構了。中交農四行在內地各處，遍設分行，單在四川、湖南、廣東、廣西、貴州五省之內，已開設的分行在一百家以上。目下這四家銀行實際上都已盡了各省銀行和各重要商業銀行的首腦組織的作用。牠們控制了所有的中國外匯，獨占了紙幣的發行權，還資助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大部分大規模的國內貿易，此外，又復負起出賣國內主要產品與限制進口等官方的職務。中政府又把進行國外的信用貸款，包括政府借款，貿易信用和貨物交換等的訂立。等委給此四行辦理。因爲具有這些作用，所以自由中國已於一九三九年確保了有利的貿易的平衡。在戰爭期內，此四銀行又成了財部批准的各省債券的中央機關，此項債券都在國立銀行支持之下，換成現款。

地方貨幣的改革與管轄的進步，財政部對貨幣和政府的預算與貸款的實際控制，已使全部貨幣直接地或間接地逐漸獨占化，同時又使貨幣的流通遍於全國。要以中央的貨幣管理地方的貨幣，唯有適當地擴充貨幣的準備，擴大白銀——舊貨幣的基礎——的國有化，把所有各省的白銀換爲金子與外匯——一九三五年改組後的中國新貨幣的基礎——然後才有可能。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就是一個有利的基礎，使這集中化的工作得以進行，而抗

戰的條件又迫切需要這集中化工作的推進。各省的貨幣，在未曾直接以法幣代替的時候，成爲後者的媒介的貨幣，由國立銀行保證牠的固定的兌換率（如粵幣爲一元四角四分等於法幣一元），而其貨幣的準備，則易爲法幣與政府的債券。

爲着改良內地的幣制，和適應農業區對法幣的需要，財政部又規定內地各金融機構（包括銀行和信託公司等）可以領用中交農四行的一元券和輔幣券，作爲地方流通之用，並規定可以用法幣，政府債券，農業的，工業的和商業的資產或商業的股份作爲此項貨幣的保證。中交農四行有權准予此種紙幣（其中一元券佔百分之六十，輔幣券佔百分之四十）的發行，但只有從事如下各項農工業務的公司，才能獲得這種准許：

農業倉庫的經營；

農產品的抵押；

種子，肥料，耕牛，農具的貸款；農田水利事業的貸款；

農業票據的承受或貼現；

完成合法手續及有繼續收益之土地房產的抵押；工廠廠產的抵押；工業原料及製成品的抵押；

商業票據的承受及貼現；

公司債之經理發行或抵押；

照常發息的公司股票的抵押；

農業，漁業，蠶產出品及日用國貨商品的抵押。

這些改善地方貨幣制度的方式，是借中交農四行和各地地方貨幣機關的幫助，利用現款與債券以外的農工業的業產與產品，以作為貨幣的準備，俾吸收農業區域的投資的。財政部一九三八年六月在漢口召集的金融會議，在這一方面會決定，由各地金融機關建立農產品倉庫，增加農業機械與農具的貸款與借款，而以農產品為其保證，增加農民的信用貸款，而以農民存放於倉庫的農產品為抵押，最後，就是大規模增放農產水利計劃的借款。

中國財部又進一部准許冀省內地日一佔領區一抗日人民根據地，以法幣為保證發行只供當地流通的特種貨幣，以當地資產，如土地倉庫等為保證發行只供當地使用的輔幣的辦法。這些辦法足以保證貨幣的穩定，和游擊區的巨量現款的供給，同時又阻絕了購買日貨，輸出貨物至日佔領區，和損耗內地法幣等可能。

中中交農四行非常注意工商業的活動，特別是為保證中國長期抗戰的力量所迫切需要的各項。這一方面包括兵工廠和軍用品工廠的移至川滇桂等安全的內地。（註）西南西北公路鐵路的建造，某種最能獲取外匯的出口貨的組織和在內地各省提倡植棉與設立紗廠等。

一九三八年四月，經濟部長翁文灝在漢口對外籍記者的談話中，曾指出中國戰時建設的如下各項問題：

「有許多工廠，在政府和各銀行幫助之下，已完全遷至內地各省。為着幫助這些工廠，有許多事情是必要

的。自然，大的工廠可以應用牠自發的電力，但小工廠都必需倚賴當地的發電廠。但內地城市有發電廠的爲數甚少，縱有發電廠，也大多沒有剩餘電力以供這些工廠應用。所以政府現在正協力在內地建立許多發電廠。現在四川、貴州、雲南各省，已設立了許多的發電廠。翁文灝博士進而確言在四川省內，可以發展其數種基於農業的工業，例如四川的製糖工業，可以取給於當地出產的甘蔗。福建、廣東、浙江等省以舊法製造的製糖工業，已因日本的競爭和傾銷而一蹶不振，但在四川省內，此項工業仍很發達。川省每年可出產價值二千五百萬元的食糖。如果擴大甘蔗的種植和建立新式的製糖廠，在極短期間內，四川可成爲中國糖工業的中心，並且將因市場的巨大而日趨繁榮。

據最近的報告，政府銀行在四川十二縣中，已放出六百萬元的農民貸款以提高甘蔗的生產，同時又投資三百萬（註）據一九三九年九月香港某華文報紙的通訊所說，中國西南等處，已設有一家飛機製造廠，僱用工人二千名，資本爲二百萬元，目下正在從事戰鬥機的製造。但這只是發展中國新空軍計劃的一部份。這工廠的工人，概受十五名美籍飛機製造技師的領導。

該廠廠址設在叢林之間，（其他住民僅三千五百人）空防設備十分嚴密。原廠最初於一九三三年設於杭州，一九三四年已開始製造飛機。戰事爆發後，即先後移至南京漢口，後來又移至西南某地。當由杭州移至內地時，共用貨車一百八十輛，目下該廠建築由三國機師造成，據傳建築費共達七十萬元。

萬元，在四川內江縣設立一新式的煉糖廠。

翁博士接着說，四川又是一個適於建立提煉柴油工業的省份。柴油是中國很重要的出口品，四川的地土。雖很適合桐樹的種植，但全省之內，却沒有一家良好的工廠，能够提煉質地標準化的桐油。此外，就是棉織工業在川省也有同樣的機會。戰前，川省是上海棉織工業的巨大市場，每年經由重慶入川的棉產品，其總值達三千萬元。

政府銀行和私人投資者，全都從事資助川滇兩省棉織工業的發展計劃。一九三八年，昆明已創辦一家紗廠，有錠子二萬五千枚。但至少還要再開設同樣的紗廠十家，才能供給雲南一省所需的棉織品。滇省所產的棉花，質地甚劣，但如貸款與當地農民，還可以得到質地優美的以及足用的棉花。目下川滇兩省，除煉糖工業和紡織工業之外，還創設了許多新的工業，如麵粉廠，皮革廠，繅絲廠，火柴廠，和造紙廠等。

中國政府已着手進行戰時的建設計劃，如連接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和湖南各省的新鐵路線，以及連接廣西與安南和雲南與緬甸的新鐵路線，目下已在建造中的，計有：（一）延長隴海路，由陝省西南的終點寶鷄，經過閬中而至成都，以與西南西北內地及通至新疆蘇聯的幹路相接。（二）粵漢鐵路通至廣西的支線，即由湖南的衡陽，通至桂林和柳州，後者已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完工。計劃中的成都——重慶——貴陽——昆明鐵路的勘路工作，已定於一九三八年年底之前完成。中政府已與法國財界成立借款，由其負責供給建造此路所需之材料。此外，又計劃與英國銀行界合作，將此一鐵路延伸至緬甸（經由大理與密芝那 Myittha）。

戰前黔滇桂等省的公路本已密切相連，戰事期間內，又把新式近代幹路通至緬甸，與通孟律蘭 (Mandalay) 的公路相接。桂省也一樣改良了和延長了通至安南邊界的公路，現在已有一條與安南的公路接通的新幹路了。戰事期內已築成和開車的公路，有如下數線：九龍——廣州武昌——長沙長沙——貴陽重慶——昆明和雲南——緬甸以及廣西與安南等。現在仍有數百萬名的工人，正日夜不息地在西南西北各省，進行建造新公路與新鐵路的工作。

除輕工業的設立之外，湘滇桂等省礦產的開發，也給予大好的投資的機會。雲南的銅礦，錫礦，和煤礦；湖南的錫礦，鎢礦與煤礦（質料極佳），廣西的錫礦，鎢礦，鉛礦與鋅礦，都是極值發掘的礦藏。然而要有大規模的出品，必需巨量的投資，以及現代交通線（如鐵路公路）的發展，與乎河道航務的改良。

驅逐侵略者出中國領土，這是一個神聖而巨大的任務，而獨立的民族經濟的建設，正是這任務的重要部份。中國要在爭取獨立自由的鬥爭中獲得勝利，單靠幾百萬戰士在前線與敵後作戰是不够的，全中國的民眾還須一致合作，從事經濟建設，使日本淪中國為帝國主義殖民地的計劃，無法實現。跟軍事的抗戰一樣，在民族經濟防禦戰中，也需要人民大眾：工人，農民，學生，技術專家，企業家和商人等的高度的犧牲精神，也需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與組織。要在這鬥爭中獲得勝利，必須保證民眾的一致團結，而要民眾一致團結，又必須共同努力，以改善人民的生計，解除帝國主義侵略者加之於貧苦飢餓的人民大眾的痛苦。由於這些求中國生存的客觀條件，由於為抗戰與民

族抗日統一戰綫所鼓舞的意念，創設全國性的工業合作組織的計劃，終告產生，而「工合」（CIC）即中國工業合作社）運動的先鋒工作，便奠定了實現這一計策的基礎。

「工合」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開始工作的，原來牠負有兩項任務，一是救濟逃難的工人，一是重建被日本侵略所毀的工業，以爲長期抗戰的基礎。由戰區和被毀的各城市鄉村逃至內地的難民，約達六千萬人。同時在被佔領的各港口和被蹂躪的沿海區域內所有的中國工業，業已被毀，千萬的產業工人與貧勞大眾，至此都已無法謀生。因此怎樣救濟這些受難大眾，怎樣引用他們至各工廠工作，以生產全國軍民最需要的物品，便成爲一個最迫切的問題。另一方面，要建立大規模的工廠，要取得充分的投資，要運輸機械與原料，要在戰雲瀰漫中獲得安全等，又是這麼困難，以致政府方面所能創辦的工業組織，極受限制。爲着把各式各樣的產業工人與手工業工人編入各合作社，以本地的原料爲本地的消費而工作，特別是在戰區後方，與日佔領區後方的人民抗戰根據地中工作，首先，必須在政府與統一戰綫各組織的幫助與鼓勵之下，發動廣泛的民衆運動，和提高民衆的自發性。這一種全國性的運動的組織，以及中國政府，中國民衆與各國體和國外各救濟組織等對牠的支持，（如前者撥發基金，後者給與資本上的和技術上的援助等），使中國工業合作社一方面能够吸收許多難民，一方面又能給長期的戰建立了經濟的根據地，並奠定了中國戰勝之後的民族再建設的基礎。這些小規模的工業合作社的生產，因爲是在有經驗的技師與專家指導之下，所以都可以做到標準化。只要政府方面，銀行方面和個人——國內與國外的——方面能以低利的資本

借給各種工人，以爲這些合作社的資本，這些合作社一定是可以廣泛發展的。中國工業合作社的發起人的計劃就是如此。

中國政府在財政部長孔祥熙（他本人就是「工合」的董事會的主席）提議之下，已撥出五百萬元爲開辦費，五十萬元爲促進費。「工合」的領袖都是些極有訓練的專家，對中國的工商業都有深博的學識與豐富的經驗。其中最著名的如劉廣沛、章乃器、林富怡（Frank Lem）都是分任技術顧問的幹事（劉廣沛是留美學生，曾任甘肅財長，現爲「工合」總幹事。林富怡是上海電力公司的電氣工程師，現任技術組正主任，副主任是伍志龍，也是上海電力公司的工程師。）香港促進會的主席是宋慶齡，幹事是「太平洋協會」的調查員陳漢奎（譯音）此外還有許多外國專家熱心輔助「工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新西蘭人艾黎（Ravi Alley）他曾任上海工部局工廠檢查員十一年，來華則達十五年，是一個對中國的工業與合作業務都有精勘經驗的專家。爲着「工合」她特地拋開個人安樂的生活，離開上海生活技術專家與顧問之職。

「工合」第一年的工作，單在西北一地就組織了三百五十個合作社，每社工人平均爲二千人。西南已設立的則達數百家。西北區的辦事處設在陝省西南部的寶雞，西南區的辦事處設在湖南的邵陽，東南區（包括福建與浙江）辦事處則設於贛州，川康區與雲貴區的辦事處，則分設於重慶與昆明。「工合」負責供給各合作社的資本，以購置機械原料，和工人的糧食，直到各社達到半獨立的基礎。此外牠又把最新的技術方法，最好的集體與民主的組

織形式教給工人們，以改良他們的工作，並借助社會服務，教育，適合健康的工作條件的設備等，來促進工人的進步。各社每日工作八小時，利益於年終按社中每人的工作與效率劃分。「工合」大半的作場都從事紡織業，如紡紗，織布，軋棉，繅絲，織網，織襪和縫衣等。（此外還有五類：一、食品類是製造餅乾，水菓裝罐，種植菜蔬，調味品，磨粉打穀，糖菓和煙草。二、化學品有：火柴，臘燭，紙，藥品，肥皂，陶器，玻璃，乾電池，電槽等。三、金屬工業計分：鑄金，金屬器，電筒，手工工具，家用器具，農具，腳踏車，人力車，汽車和機器腳踏車的零件，及很重要的軍器與輕軍器的修理。四、教育用品有：印刷，課本地圖，文具，鉛筆，毛筆和鋼筆。五、什類則如傢俱，磚瓦，鞋，皮革和橡皮貨物，造船，以及小規模的電力廠，鋼鐵廠等）至於「工合」的運輸組織，西北方面有騾車與手推車，西南則有帆船。江西省內，純由殘廢軍人組成的合作社，約有五十家。「工合」來年的計劃，是卡車運輸隊的組織和僱用數百名工人的合作社的建立，其中包括資本達五萬元，工人達二百名的煉糖廠，資本達二十萬元，工人達五百名的紗廠等。

目前在自由中國為抗日民衆所作的各種經濟建設工作，自然只是經濟的防禦戰爭，這就是說，以這種工作來獲得持久抗戰的堅強的經濟基礎，和擊敗日本侵略者在經濟上的各種企圖。中國民族建設的基礎，乃是收復所有的失地。中國是不能被限制於西南西北的內地的。中國經濟建設的工作與計劃，應該以收復一切失地——東北，華北，華中以及華南的一切失地為目的。



# 第四編 結 論

## 中國的解放——到遠東的真正和平之路

爲着要重分東亞和統治西部太平洋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開始於一九三一年的滿洲的掠奪。這一斷然的目的是爲了要把由英國爲首的與日本競爭的財政資本家驅逐出中國。滿洲的征服，這其間，日本帝國主義在這個區域內有過長期侵略的準備。這種侵略的擴大，是在英日同盟的這一名詞之下允許給日本的，似乎這是逼着日本劇動的最理想的開始之點。對這一征服的積極的抵抗，英國是說不上的，因爲英國不願華盛頓的協定，已自對日本的攫取滿蒙採取了一個不干涉的政策，而且直接的贊同着日本在這一區域的發展成爲一個侵略蘇聯遠東領土的戰略根據地。爲着這同樣的理由，不但不會有英美聯合來反對這一征服的畏懼，完全相反的，日本到盼望着美國，對於這事件來一個中立。至於中國的政府在那時候也只能希冀着不要違反了英國的政策，但和英國一樣，却也存有蘇會立即發生衝突的一個機會主義的幻想。這樣一個衝突的本身，似乎是英帝國主義對在遠東一切顧慮的最好，的解決。同樣，在那個時候的中國政府也是親英反蘇的，似乎認爲最安全的辦法是離開蘇聯，走向與日本競爭的英美集團，而找尋一個妥協的解決。

這樣，擁有三千萬中國人民的滿洲的命運是被決定了。因之，在日本和英國的他們自己之間，就決定着他們在中國應當維持着什麼立場。日本對中國的進行侵略，是企圖獨佔着中國的市場；而英國是企圖犧牲着一部份中國

的領土來作爲反蘇聯的一個武裝地帶去緩衝着日本。滿洲的易於征服，和不幸的不抵抗政策，以及希冀在中國與日本爲敵對的兩個強國英美的調停的投機，是被日本的軍人當做試驗箱的利用着，以爲就是征服整個的中國也將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他們可以答應日本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那就是在中國的日本競爭者，如果只是英美這兩國的話，是將不能够干涉這往前的侵略，整個的中國將成爲「滿洲國」一樣。他們討論着什麼一切是日本應當要去做的，就是侵略中國，而在歐洲和牠的競爭者相聯合來恫嚇英國；同時，在遠東方面，儘量的玩弄着英國爲了一個日蘇戰爭所容許的投機與妥協的政策。作爲這樣政策的有效的工具，是在柏林，羅馬，東京三角僞裝爲一個反共產國際的公約中找到了。他們預料着中國政府將會是要末投降，或者是因爲分裂而告崩潰，或者繼續的希望着英美的調停；而在這一情形下，壓迫着英國退讓，與對英國的妥協，也同樣的會使中國投降。中國呢？除非是當作爲列強間的一個戰場，牠自己是不用考慮着這一些預料的。

無論如何，日本的軍人和日本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同樣地是忽視了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這就是中國的民族革命。他們很好的懂得怎樣去對付他們帝國主義的競爭者，但他們對中國人民和他們的求民族自由與進步的意志是不會考慮到。由於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動的結合一致，他們相信着中國人民的民族的民主革命永遠是被壓制着了，而自由的恢復，因之等於夢囈。他們確實是對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這個革命感到了害怕，廣大的羣衆力量掃蕩着全中國，而他們是聯合了他們的武力與財政的壓力去破壞着它的內

部的力量，去分化着它的階層，和指使着反革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資產階級來反對着民主的人民及其組織。但是他們錯誤的估計了這在中國的國民革命暫時的低落當做是最後的崩潰。而這一革命是又從地下面起來了，它驚醒了中國民族去反對殖民地化的威脅，並動員了中國人民反對着不抵抗政策及對帝國主義的容忍，而為着解放的事業堅決地作戰。從解放的抵抗戰爭中來挽救中國的民族呢？還是不抵抗，讓帝國主義掠奪中國的領土和瓜分中國的市場而陷民族於滅亡呢？這就是由於日本的侵略而提供於中國人民面前的結局。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這一個時期底不可避免災難，曾經指示了給中國民族，這是由於不抵抗政策和反對羣衆救國運動的反動政策的結果。由於一部分國民黨的轉變，由於風起雲湧的救國運動，由於共產黨的統一戰線領導下的中國革命的民衆，會強迫着轉變了為國共合作，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

這一個戰爭的目的是什麼呢？差不多已經艱苦鬥爭了近三年，牠的結果和前途是怎樣呢？

首先，這一個戰爭的目的，是不能夠使中國再回復到戰爭以前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書裏面，列寧說過：

「至於「半殖民地的」國家，牠便是一切自然界和社會中所見到的那些過渡形式的例子。在一切經濟關係和國際關係方面上，財政資本有異常偉大的勢力。或者可以說是決定一切的勢力，能屈服政治上完全享受獨立的國家，並且在實際上已經在屈服這些國家；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例子。但是，對於財政資本最

「方便的」最有利的屬國，顯然是這種失去政治獨立性的附屬國家和民族。在這一點上，半殖民地的國家，便是標本式的「中間」形式。在世界已分割完全的財政資本時代，爭奪這些半獨立國的鬥爭，當然是特別的緊張。

日本在這一戰爭中的目的，是要在中國由與英、美、法等國的競爭，進展到獨佔，是要轉變半殖民地的中國，這一個英、美、法的財政資本下的半殖民地，成爲純粹日本的殖民地。孫逸仙博士曾經說過，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實際上是要比全世界任何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地位還要壞些。假如目前的這個戰爭，是將經過英、美的調停而告結束的話，這就是說，由於英、美和日本間的協商同意，承認日本在華的統治地位，而保持英、美集團在中國的相當的特權，這就等於不過只是使中國走向完全殖民地化的一個重要的步驟而已。因此，唯有以中國民族革命爲目標的抵抗戰爭，能够擊退日本的進攻，而在這一鬥爭的過程中完成着民族解放和民族的民主革命。擺在中國民族前面的這歷史的結局是：要末是由半殖民地過渡到完全的殖民地；或者是經過民族的民主的解放，由半殖民地的束縛，到民族的自由。此外，中國並沒有其他的出路。

不抵抗的意義，簡直的就是投降和民族的毀滅，所以，對這一人民的戰爭和動員民衆而限制着革命團體與否認民主權利的種種的障礙，就是幫助了敵人穩定和擴展着牠的侵略。在目前的戰爭中維持着半殖民地狀態和半殖民地的政策，也只是直接或間接的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從帝國主義列強和侵略者中間

關於中國的任何的協定及由帝國主義列強居中調停所得到的中日戰爭中的「和平」只能是犧牲着中國的領土與由帝國主義者的財政資本聯合的來奴役中國。

在上面列舉的一書裏面，列寧再指出：

「……財政資本估計可能的富源，生怕在爭奪世界上未被分割的最後一塊土地的鬥爭中，或重分已割的一塊土地的鬥爭中，自己要落伍，所以總是儘可能的無論用什麼辦法去奪取任何的無論什麼地方的土地。……資本輸出的利益，也同樣要促進掠取殖民地的舉動，因為在殖民地市場中，更容易（而有時祇能在殖民地）用壟斷的方法去消滅競爭者，保證訂貨條約的獲得，鞏固適當的「聯繫」等等……」

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巧不祇在乎併吞農業區域的傾向，他却連工業區域也要併吞的；因為，第一，地球已經瓜分完結了，在重分的時候，不得不伸手於所有的土地；第二，對於帝國主義很重要是數個列強各圖獲得霸權的競賽，其奪取土地不僅爲的自己，而且爲的是挫折敵手，顛覆敵手的霸權。」

日本因爲不滿意於她的競爭者在以前關於中國的協定裏面所給予她的地位，故會在一九三一年開始了爲濟東亞侵略的帝國主義戰爭。她已自準備了爲着將要到来的重新瓜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世界的鬥爭而攫奪任何可以安穩地得到的領土，並在一部分攫取得來的中國領土上樹立了獨佔，在滿洲的建樹一度鞏固了之後，她又擴張到了內蒙與華北。同時，她在那別的地的競爭者享有權益的中國部分，運用着軍事和政治的壓力及經濟活動，

用以減弱和降低她的競爭者的地位，因為這是爲着她最後在全中國達到獨佔的一個準備。這就是日本在中國侵略的基本的性質。事實上，中國已經是一個半殖民地，而在帝國主義列強間強加於中國的協定，曾經規定了他們在中國相關聯的地位和利益，以及中國政府的所謂的政策等等，是大大的有利於日本的進攻。因爲臨近的新的帝國主義世界的鬥爭，與英國世界霸權一般的衰落，特別是在遠東的方面，日本對殖民地化中國的一個前哨的突擊，是成爲了不可避免的。在這樣的環境下，阻擋日本征服中國的唯一道路，就是持久的民族革命的抗戰，與爲要獲得民族澈底解放的反攻。帝國主義列強間的有關中國的協定，現在只能是打算爲的要一和平的一分割，爲的聯合財政資本的榨取中國，及爲的在中國，的帝國主義的競爭者間一個暫時短期的休戰。這樣的打算，就是帝國主義的聯盟來反對中國民族的解放；而在帝國主義的競爭者間一種休戰的當中，牠們的鬥爭是用各種可能的形式繼續着，一直到再度的爆發着爲征服與獨佔的公開的戰爭。

這裏，除了用抵抗和反攻着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革命方法，同着覺醒的中國民衆的全部力量，與教育，動員及武裝民衆來急劇的改革着那致使現在日本對中國進攻的一切根源之外，是更沒有其他的方法來救中國。必須要在民主革命的基礎上去組織中國民衆，要使中國的人民意識到他們救中國的歷史使命，意識到他們有發揮民族力量的才能，這一民族的力量，是大大的優越於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強權的。必須要喚醒中國民衆對於他們現在歷史偉業的熱忱，武裝他們，使之充分的了解着在目前國際和遠東局勢中的中國解放的條件，這樣，他們才可以復興中

國，把國家從帝國主義者的佔領與半殖民地的狀態下解放出來，而在遠東樹立着一個真正和平的鞏固的基礎。必須要緊密的聯結着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進步的救國黨派間的統一戰線，擴大和發展他們的羣衆基礎與反日的力量，由實現人民的民主來保證他們的統一，這就是說，爲着中國解放的真正革命的統一。

×  
×  
×  
×  
×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這個期間，曾教訓了中國那對日本侵略的不抵抗，就是民族的自殺，或者竟是爲着征服者解除了民族和人民的武裝。那些半殖民地的賣國賊們，他們辯護着不抵抗的藉口是：中國是過於積弱的去抵抗日本軍事的侵略，而因此鼓勵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集合在軍人們的背後去從事征服中國的戰爭。就是他們，大大的幫助了在日本建立着很普遍的幻想，就是以爲中國只不過是一個已成熟的給完全軍事征服的半殖民地。因而他們幫助了征服者來沮喪中國民族的勇氣，分裂着中國民族與解除中國民族的武裝，並幫助了日本軍人們不單是聯合了日本的資產階級，而且也是廣大的人民去進行征服中國的戰爭。

日本的軍人們由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支持，從前同英法美的遠征軍一道，也曾侵略過革命的俄國，但在那兒，他們是遭受了游擊隊，有組織的羣衆和正在建立起來的紅軍的抵抗。革命的俄國趕走了侵略者，而因之給與了日本帝國主義第一個教訓，那就是向蘇聯侵犯是一個危險的和代價很大的冒險事業，這對於日本的資本主義沒有好處，而帶給與急燥的軍人的是失敗。當着目前這對中國的戰爭，日本軍人們又再一度的嘗試去侵犯蘇聯及蒙

古的領土，是在這帝國主義世界的面前想投機地來證明他們反共戰爭的作用，與藉此來增強他們爲着要征服中國的帝國主義的威信和地位。但這結果只是又一個教訓，比上一次還要相信的一個教訓，就是他們得到了可怕的打擊與失敗。日本軍人們是被迫的體會到向蘇聯挑釁是怎樣的危險，而打算和她的強隣保持着和平，離開她的領土，及尊重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互助公約又是如何的聰明。同樣，在征服中國的戰爭將近三年，仍然相信日本力能獨佔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得不害怕和尊重着這作爲中日隣居的強大的蘇聯。

日本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同樣的過程中，曾經又學到像進攻蘇聯一樣的經驗和教訓，那就是中國是不可征服的，而中國民族獨立的意志一定是要尊重的。中國人民一定要在民族生活的實踐行爲中來表現着這個意志，這就是動員全民來保衛國家的領土，用新興中國的組織力量來對付侵略者。那些現已充當爲日本傀儡的半殖民地，的賣國賊們，他們曾經向中國的民衆宣揚過不抵抗，現在更指陳事實，說大塊的中國領土已被搶去置於日本的佔領之下，這是抵抗不能阻止征服的一個「證明」。在他們幾年來用壓迫和恐怖阻止了中國人民抵抗侵略者之後，在他們幾年來用一切可能反革命的和官僚的手段禁止了抵抗之後，他們變爲公開的到了敵人的營壘（他們歸附着那裏與被收買着）來阻止真正民衆的抵抗，特別是在淪陷區域裏面普遍的軍隊和人民的游擊戰爭。這只足以證明他們的主人們是害怕長期的抵抗，害怕着動員民衆參加戰爭，害怕着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是絕望地嘗試着動員內部的反動去反對民衆而來解除中國民族的武裝。同時靠着對統一戰線的怠工與否認對民衆和革命團體

的民主權利，那些賣國賊們斷定中國的軍隊及有限的游擊隊力量，將永不能夠反攻和驅走侵略者。這還用得着別的什麼來證明：人民一定要保衛統一戰線，中國民族的最大多數一定要堅決地獲得民主的權利，去壓制賣國賊與激起全民族廣泛的抵抗到一個真正人民解放戰爭的高潮麼？而孤立着賣國賊，制止他們的活動，及把人民從一切反動的和官僚的種種束縛中解放出來（這些束縛阻礙了為加強反攻而採取的抵抗），這樣就會粉碎着侵略者對於他們在中國最後勝利的一切希望。

中國已經表現了她的長期抵抗的能力，而使敵人的營壘，在日本及在中國公開和隱秘的賣國賊之間，發生了無數的困難。從這三年的戰爭中，日本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已經懂得，征服中國不是一個「輕鬆的」進軍，而在中國的軍事進展，還是不夠壓迫得中國投降。在日本的軍人們和日本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之間，關於等待得很久的一「解決中國事件」的外交，政治，經濟的諸措施，是存在着極大的混亂。因為這延長的「中國事件」，日本人民是曾經深感到經濟的困迫，而為了要擴充帝國主義戰爭機構的原因，日本的經濟財源逐漸的枯竭。雖然這樣，在日本的危機，却還沒有動搖着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殖民地化中國的信念，這就是說，要由強迫建立起來的日本的獨佔，去榨取中國的市場和資源。在中國的佔領軍，和常常更換的日本政府，是把侵略的中國一部分當作了日本的殖民地，而其間與競爭的列強爭論與協商關於他們在日本獨佔區內的條約權利。日本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受着宣傳的日本人民仍然相信：那就是與英、法、美成立的協定，將會由中國的政府尊重與依隨着。日本的人民是被告訴着：那

就是日本是要出來從樹立日滿支的集團去創造一個「東亞新秩序」，這一個新秩序，英美企圖用一切的方法去破壞它，這包括了在他們政治、財政控制下的中國政府的抵抗。這是一個事實，就是大多數的日本人民仍然忽視了中國抵抗的民族革命的基本性質，忽視了中國人民是爲了民族的獨立而戰，而他們信以爲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的抵抗日本，是爲了要保持英美的統制下的半殖民地地位。

在中國的抗戰將近三年之後，因爲軍人的獨裁，新聞的檢查，及帝國主義的宣傳，日本這樣的信念和幻想當然是普遍的廣布着，不過，沒有疑問的，在中國抗戰的政治、經濟同軍事一樣，也顯出了相當嚴重的弱點。舉個例子：有一部分國民黨中的領袖們公開的宣布過，中國將要打算在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現狀的基礎上來進行和平，這就是說承認東北四省的征服。這樣的和平，一定是會受到英美的歡迎的。不過，從中國民族的立場來說，在東北的中國人民和其他部分的中國人民有什麼區別呢？對侵略東北的不抵抗已是罪行，爲什麼還要容許對這一地域內的數千萬中國人民另一個出賣的罪行？中國政府是否仍是想把東北用作爲帝國主義征服中國其餘部分的戰略根據地呢？如果中國能够發揚民族力量把侵略者從中國其他部分趕走的話，爲什麼在東北也不這樣的做呢？倘使中國人民和中國的任何一部分讓給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着，如同「滿洲國」一樣，那末，只是會使日本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相信：整個的中國是可以由日本帝國主義一塊一塊的吞滅與征服着。上面這種和平的宣布，也許是有這樣的意義在後面，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以爲在中國的其他部分還可以滿足與保有他們的獨佔。但無論怎樣，中國人民

的從帝國主義統治下求民族解放的原則，與外國或中國的財政資本家將中國零碎部分的出賣是不相同的。

無疑問的，這一有關東北的宣布，是合着英國的傳統的政策，就是把東北讓給日本，是會被中國接受的，爲的這樣是便於英美的調停。但是這樣的調停，只能是在依照着帝國主義列強間的武力來分割中國的基礎之上。這只不過是一個幼稚的幻想，相信中國如承認了這一妥協的原則，將受到影響的僅僅的是東北。

日本的侵略，阻止了中國於英日在遠東的競爭中做一個中立者。在這一遠東的戰爭中，英國雖然裝做了一個中立者，但事實上如碰到要考慮到英國的特權的時候，她常是準備着犧牲中國而向日本讓步，不過，不能夠盼望一個中國的真正國民政府會聽從英國的勸告，僅爲了要保持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的地位而來犧牲中國領土上任何部分的神聖權利讓與給日本。

另一個性質相同的例子，就是中國政府的發言人在這次戰爭的前後，曾經屢次的強調着英美的調停。而實際上，英國和美國因爲他們是日本在遠東及太平洋上主要的競爭者，同樣對這一個衝突的干預，特別的感到興味。雖然這對中國的戰爭，是一個公開反對英美在中國沿海的利益的進攻，及是爲了日本要統治西部太平洋的目的，而英美是同樣採取了一個「中立」和「不干涉」的立場，由於美國的供給，日本更能夠去進行中國的戰爭，這是公開的事實；而大英帝國呢？她是會首先的和日本妥協，如關於中國海關的屈服，承認日本侵略的軍隊在淪陷區內的統治權，及在華的英當局，對日本軍隊認爲已是被日本佔有的地方，抱着不干涉的態度。同時英美却又用種種的方

式，擴大對中國精神與物質上的援助，很顯然的，這爲的是要壓迫日本去考慮他們在華的特權。英美的這種政策，特別表明了他們是在作調停的準備，或者是，當他們從自己的利益觀點上出發，認爲這樣行動的時機已成熟的時候，來壓迫着停戰。因之，在英美看來，中國的抗戰，恰就是他們反對日本的鬥爭的手段，而對於中國的有限的援助也就是要估計着：保證中國的抵抗，僅是符合於他們的目的。當然，日本是拒絕了英美調停的這一個觀念的。在日本看來，英美是她們統治中國的戰役中主要的敵人，但是，日本却在企圖用一切的方法來利用着英國這種妥協的政策去強迫中國的屈服。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中國政府對英美調停的感到興趣，只會在日本（同樣的在倫敦與華盛頓）產生着這樣的印象：那就是有關中國任何的協定，英美接受了，中國政府也同樣的會接受。由此往前推想：在利益攸關的列強間任何這樣的協定，也將會終止中國的抵抗。日本政府自然是並不遲疑的利用着這一形勢去開始與英國直接的談判，目的是爲的要孤立中國與減低中國政府的信譽。英國由於在華北一個初步的協定，已經是準備了來開始合作，但從這一談判的計劃裏面，遺漏了美國，這却使美國的政府驚異，所以這一個英日新協定的圖謀就終於失敗了。

外國的調停，如果是爲的建立遠東真正和平的話，在日本的前提，是要確認中國的爲不可征服，以及中國絕不能容忍日本的軍事侵略。當這敵人已差不多佔領了整個中國的海岸（包括着主要的海口，城市與半個中國的交通線），並用這地方作爲榨取中國的資源及摧毀中國抵抗的時候，這一外國調停的本意，就等於將這次中國的神

聖抗戰出賣着。在中國還沒有足夠的反攻力量來反對侵略者的時候，在中國還不能保證重新奪回最遼闊和最重要部分的被侵略的土地的時候，談不上外國的調停，除非是把這作為中國投降的門徑。此外，英美調停也並非爲着中日間真正的和平，真正和平只有樹立在中國解放的基礎上。英美是爲了他們自己要分得中國的市場與資源而努力，至於他們的所謂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政策，目的並不在乎中國民族的真正獨立與領土的真正完整，到不如說他們是要與在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平等。大家都知道，這些國家同樣的運用着壓力加諸日本，去阻止日蘇間樹立和平與善隣的關係。這種的壓迫，不但是直接的反對着遼東的和平，但也是爲的是要把佔領的中國領土給與日本軍隊作爲反蘇的軍事根據地，這樣就把日本的征服偽裝爲反共的烟幕。在目前，這同一的列強，又在提議組織一個新的反共集團，這就是反蘇聯的戰爭；因之，要請求日本權利的利用這一顯明的詭謀來粉碎中國在全國各處的抵抗。假如任何的調停是能有所裨益的話，那末，這一定是由一個中立的強國或者是遠東鄰國間真正熱心和平的列強出來調停，這主要的是中國，日本與蘇聯。這一和平，是要以確認中國的民族獨立爲根據，這是中日及遼東和平唯一真正的基础。

其實，所謂和平條件，事實上也只能希望做到是由於英美日間對中國默契的一種英美的調停，這種調停，不會爲任何真正的中國政府與民族的統一戰線所接受的。無論如何，即使這種調停是手腕的玩弄，這對中國政府的抗戰國策是很危險的與投機的。毫無疑問的，中國人民與民族的統一戰線是爲了中國民族解放的原故而對日本

的侵略作戰。當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參加了這一戰爭，這目前的中日戰爭就是一個民族自衛的真理和正義的戰爭，不是在中國領土上的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北伐的統一戰線的後面，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中國民衆革命的堅決，因之使半封建的中國軍閥間的內戰就此告終。這些中國的軍閥們是由外國的帝國主義鼓動與支持着，而在中國的領土上進行着帝國主義間的戰爭。中國民衆熱烈的擁護着北伐軍來反對這些軍閥們與腐敗的北京政府，因為中國的民衆體認到，軍閥們的內戰是會毀滅着中國的民族與有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威脅。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如果中國人民容許帝國主義列強把這一民族自衛的戰爭降落到為他們的目的底帝國主義間的戰爭，那末，這個威脅是更加非常的緊迫的。日本的軍人們是很想在中國創造着這樣的戰線，因為這是分裂中國民族的一種辦法，而用內戰來支持這一個戰爭。另一方面呢？英美也正相信他們可以影響與限制着中國抗戰的方向與目標，在這樣活動的限度下，他們認為對日本同時保持中立與不干涉的兩重政策，最後一定可以成功。

中國人民不是爲的親英或親美與日本作戰；也不是爲的支持中國的親英派或親美派的利益與日本作戰。中國人民的對日作戰是爲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征服，是秉承着孫逸仙博士的精神，他曾教訓了中國，要爲民族的解放而戰，及聯合幫助中國人民解放，以平等待中國的民族。因之，中國廣大的羣衆也知道在列強間唯一同情中國民族解放的真正的朋友就是蘇聯。美國爲着太平洋上的安全與和平，爲着牠的在遠東很大的商業的賭注，她的生命依

關的利益，也只有站在中國獨立的一面，才可以得到保護。不過，美國到達這樣政策的道路，是由於外交上的支持。英國的計劃，擬將中國的一部分讓與日本，作為指揮中日反蘇的根據地，所破壞和阻塞了。作為日本人民的一個歷史的事業，就是為着日本民族的幸福與樹立遠東真正和平的這一個極重要的事業，要停止日本軍閥反對中國民族革命的戰爭，而在遠東的各國間鋪上真正友誼的道路。中國反對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的停止，是一直要到這征服中國的帝國主義底目的失敗了及中國領土從日本的佔領手中恢復了以後。

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必須由中國的人民來決定，這就是要決定於統一戰線；由於民主政治的實現，要使國民政府的本身，成為真正人民的代表。這是為着有效地反對漢奸，遏制受帝國主義的指揮煽動與陰謀反對中國的派別，以及仇視統一戰線敵人的必不可少的鬥爭。總之，一切是為的，要保證中國最後的勝利。革命民主政治的實現，是不能遲延的，因為民主的辦法，可使人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團體方面，為着解放的事業而充分的活動，不受到限制，可以決定着政府的政策和機構，這是中國的抗戰要成功地達到勝利的必需的措施。

由於中國人民的要求，建立了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終止了不抵抗政策。同樣的，一定是要由中國人民和他們所信任的領導，在統一戰線裏面用這種方式實行決定着抵抗與反攻的政策，而保證着他們的決定付諸實行。

日本，由於她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已成功地削弱了英法美在遠東的力量，與損害了她們在中國的利益。但她對

破壞或削弱中國的民族革命是全然的失敗了，恰恰相反的，日本向中國進攻的結果，掀起了她的一個新的民族革命的巨浪，而致使這一革命發展成爲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所遭遇到的，一個最堅強的力量。因爲這樣，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是在集中着她的活動向中國的民族革命進攻，在分裂中國內部抵抗的力量，在迫使中國再回到內戰的舞臺，在破壞國、共兩黨的合作。日本對這一進攻所用的方法大部分是政治、經濟和外交的，至軍事的手段多半是限於用在「綏靖」淪陷區的工作，要在這些地方保證着新的日本的獨佔。

假定日本一方面同傀儡、漢奸和半殖民地資產階級在「地方和平」的掩飾下進行武力的「綏靖」，另一方面與英、法、美的協定得到了成功的話，無疑問的這就是說，這是日本帝國主義一個極大的成功，雖然這還是不能終止中國的抵抗。再沒有比官方對英、美的「保護主義」寄以樂觀的希望，而忽視了實際有效抵抗的情形來得危險的。一個廣泛的反攻，特別是反對「綏靖」政策在淪陷區的實現，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唯一有效的抵抗。中國預備這樣反攻的偉大力量是她的人民，是要在統一戰線的下面，動員組織與武裝民衆去進行游擊戰爭和運動戰爭。這是破壞日本在淪陷區裏面獨佔的唯一方法，要使日本的派遣軍和駐防軍在那裏不能立足而且這也是孤立着傀儡與漢奸的主要的條件，使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在民衆的控制之下，並粉碎日本與列強間所訂關於在淪陷區內尊重他們權益的任何協定。有些部分的中國淪陷區之所以非常的重要，是恰因爲這些地方，廿世紀以前就是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根據地及勢力範圍，在那裏的外國利益與資產階級間的半殖民地性質的政治、經濟的關係，仍是

爲從這裏侵入到全中國的最活動的中心。在將近三年的戰爭這一個時期以後，不但日本的獨佔者，同時也是英法美的財政資本的投資者，及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都對於「商業」非常的渴望。日本戰爭的指揮者並沒有忽視了這個因素，而會與以極大的注意。他們是要使這一因素成爲代表着淪陷區裏面一切各界的輿論，因之，以便於管理統制，而來保護着他們的獨佔。他們企圖使這一因素作爲「綏靖」政策的廣大的後盾。這同樣也是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投機和陰謀，由於陰謀與財政的壓迫，這會成功地破壞了一九二七年的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這次是英國的領導，美日則一同的追隨着。破壞統一戰線也是今天中國民族獨立的一切敵人的第一個目標。

在中國及整個東亞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競爭者中間，英國在遠東的戰爭中曾遭受到最嚴重的失敗。日本已是把中國的海變作爲日本的湖沼，在揚子江與珠江——以前是爲了要保護英國的中國利益受着英國的控制——的口岸的重要地點設置了她的海軍。從上海，漢口，香港，廣東擴展了她的海軍連鎖的根據地到了海南（在印度支那灣內及香港到星加坡的航路），日本因此已據有從前英法在中國投資與商業利益的主要位置而統制着中國沿海的國外貿易。日本的海陸軍包圍着外國的租界，居留地及在中國的割讓的領土如香港，與封鎖了印度支那，荷屬，印度，菲律賓和星加坡。

無論如何，像這樣成功地侵及了英國的地位，同時也是對美法在東亞的利益與財產的一個打擊。日本因爲「中國事件」的尖銳化，致使在遠東的形勢更爲危險。抗戰，曾大大的擴展了中國的民族革命，會統一了中國，統一

了她的軍隊和人民，急速地發展了民衆的力量，這更有利於中國人民爲民族的獨立而作戰。日本帝國主義是需要着帝國主義的聯盟來反對中國獨立的鬥爭，所以對英法帝國主義反德的戰爭保持了雙方的中立，意欲請求他們的援助，強迫着對中國來一個光榮的和平。英法是儘可能的什麼都做了，不過他們的本身對中國政府的影響，已處於不足輕重的地位。是不是美國會同在歐洲一樣，也同樣的在中國會支持着英法的同盟呢？他們幫助着日本的活動，如果是沒有得到美國的支持，他們影響着中國進行戰爭的力量也是比較的小的。

另一方面，日本的軍閥是爲了這一概念而惱怒着，那就是在中國長期戰爭，會枯竭着日本的帝國主義；在爲重新分割殖民地市場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時代，比例起來，這是個較大的代價。日本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是害怕着「中國事件」仍將繼續的絆住日本戰爭的機器，假如是可能有一個共同的機會去攫取南洋的殖民地的時候。趕快的解決「中國事件」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政治的黨派中企盼着。自然，在他們腦筋中的所謂「解決」不外是中國向日本軍事統治的屈膝，佔領中國土地的重要部分，由日本制造的傀儡政府統治着中國的人民，及在中國市場的日本獨佔的把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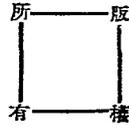
即使美國獲得英法的贊助，好像這是美國在利益有關的列強間的「會議席上」一致壓迫日本的機會，實際上這樣的一個「解決」是沒有用的。這樣的一個會議，像煞當做這是日美間對於中國的一個爭執，由英法在居間的調停着。這一個爭執與慕尼黑會議的不同的地方，就只在於日本多少要分些贖物與其他的列強。無論怎樣，中國

的民族革命定然是不會代表參加了這樣的一個會議的。同時這也是一個幻想，以爲「不干涉」的列強可以命令着日本到他們的懷抱裏去。

美國、英國和法國不會與日本作戰，與日本作戰的是中國。但除開了日本外，他們却希望作爲遠東「和平」會議的主要分子。他們忘記了：無論怎樣，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地位是強過於西班牙的共和國的。中國既將不會屈服於英法的命令，如同慕尼黑會議後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樣；她也決不會爲着權益國家的曲子而在她的廢墟上跳舞着，如同波蘭與芬蘭一樣。中國是爲着民族的獨立而戰。只要當日本的人民將要強迫着他們的軍閥放棄征服中國戰爭的時候，中日間的敵對是隨時的可以停止的。那末，在平等和民族獨立的基礎上的中日和平，中日間的友好，就會成爲一個真正的。這將會是一個新遠東的誕生，這新遠東是屬於居住在遠東的人民的，他們爲了要保衛和平的安全，是依靠着民族的力量，民族的獨立，以及相互間的利益。

# 遠東新形勢

定價一元



著者 葛·夏·遜·卡斯  
譯者 仲持 賓符 梅益  
出版者 遠東出版公司  
發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二〇〇〇



一元三角